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文库

倪力亚 著

论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
的阶级结构

LUN DANGDAI
ZIBEN ZHUYI
SHEHUI DE
JIEJI JIEGOU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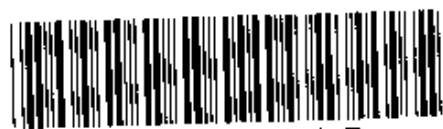
~~75818~~
75646

D509
3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论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的 阶级结构

倪力亚 著



20004611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倪力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0插页2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241 000 册数：1—3 000

ISBN 7-300-00635-3

D·72 定价：4.45元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罗国杰

副主编

周新城 李淮春（常务）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绍孟	王作富	王思治	许征帆
陈先达	吴树青	李占祥	李淮春
罗国杰	周文柏	周新城	胡乃武
徐安琳	徐志清	寇恩田	黄晋凯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总 序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以反映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博士论文），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促进我校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扶植学术新生力量为主要宗旨。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空前未有的宏伟艰巨的事业。为了使这一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前进，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一个国家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应当清醒地看到，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实践相对照，当前的理论研究，还显得很不相称。对理论的冷淡和忽视，已经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不懂得现代科学知识，我们不但会在决策上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会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迷失方向。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研究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博士研究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最高层次的学位研究生，他们有坚实而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而深入的专业知识，有较高的理

论造诣和较强的分析能力。他们的许多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密结合实际，对有关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同一课题或相关学科、相关专业的研究方面，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这些论文，不但在理论上具有科学性和开拓性，而且内容新颖、立论严谨，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科研处、出版社和书报资料社共同筹集出版基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以每年答辩的博士论文为选题范围，筛选其中的优秀论文，逐年陆续编辑出版。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伟大的时代，正召唤着与其相适应的理论成果。广大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特别是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必将会对活跃和繁荣我国的理论研究，发挥重要的作用。当此《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和读者见面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更多的博士研究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刻苦钻研，写出更多、更好的学位论文，有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在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罗国杰

1988年10月

序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带头掀起的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科学技术革命震撼了世界，它使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等等发生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60—70年代以来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理论问题。西方学者已就此课题发表了大量论著，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观点也不一致，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国以往由于对外封闭，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变化所知极少。自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路线、实行对外开放之后，西方的情况我们逐步了解了，西方的各种思潮也蜂涌而入，我国学者也开始重视研究这个课题，这是可喜的现象。我认为弄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是重新认识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只有弄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才能制定正确的阶级路线和无产阶级的战略策略，才能确定依靠什么人、联合什么人以及反对什么人。这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面临的头等大事，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应该考虑到的问题。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这个问题细加研究，旗帜鲜明地作出科学的回答。

倪力亚同志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博士点，成为我国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他于1979—1982年在我校研读硕士学位时，我曾指导他撰写《葛兰西对意大利革命的探索》学位论文，对西方社会的研究有一定的基础。在博士生学习阶段又进一步研读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共产党宣言》以及当代西方有影响的代表作《第三次浪潮》等等。因此我引导并支持他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要求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为指导，从掌握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外文资料入手，理论联系实际，吸取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批驳西方的各种错误论调，作出独立的分析，提出新鲜的见解，既要摆脱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又要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他的理论基础扎实，功底较深，又能熟练地运用英文和俄文两种外文书刊资料。前后仅用了一学期就写出近15万字的初稿，经我审读提出一些意见由他修改后，于今年1月8日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校内外15位专家的好评。针对专家们提出的不足之处，他又作了修改和补充才送交出版社。

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国外主要有五家观点：第一，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鼓吹西方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已经根本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现代社会已变成没有阶级的社会，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另一些人虽然承认社会上还有不同利益集团，但是用阶层来取代阶级，或者以“社会流动性”来否认阶级的存在。第二，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并且认真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出现了五大理论流派，提出了一系列与马克思主义貌合神离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小资产阶级”和“新中间阶级”论，还有人认为工人阶级已经同资产阶级“融为一体了”。第三，西方工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大都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越来越变化多端，中间阶级越来越增多，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变成新工人阶级或新中间阶级，资产阶级的产权越来越分散，“资

本民主化”的进程在发展。第四，苏联及其影响下的许多国家共产党人的观点。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持彻底批判态度，也不同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大体上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没有提出多少新见解。当然近几年苏联理论界的情况大有改变。第五，主张“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些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本国实际，认为依然只有工人和资本家才构成阶级，依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构成社会的两极；但是现在工人阶级的概念含义更广泛，除体力劳动者外也包括其它阶层的劳动者。中间阶层的队伍也在扩大，不论新旧中间阶层都面临破落的威胁，因而都向工人阶级方向运动。资产阶级的成分则更加复杂化，除原先的垄断资本家集团外，还出现高级经理集团、高级管理集团和中小资本家集团等。本书作者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上述五家的观点，对其中前三家的观点持分析批判的态度，也不赞同第四种传统陈旧的观点，大体上同意第五种观点，同时运用较多的资料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结构理论，并且力图结合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进一步发展这个理论。第一篇开宗明义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批判了现代资产阶级企图以阶层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以及以“社会流动性”来否定阶级存在的观点，同时指明了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阶层和阶级的关系，应该如何深刻地认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流动现象。作者强调阶级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批判了西方学者用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划分阶级标准的观点，指出他们正是依据这些标准把工程师和技术员定为“新小资产阶级”；同时批判了西方学者用权力和知识作为划分阶级标准的观点，指出掌握不同权力和知识的人应以其经济地位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还批判了西

方学者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作为区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标准的观点,指出这也是他们把非生产者列入“新小资产阶级”的理论根据之一,阐明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增多正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我认为以上这些分析是中肯的,观点是正确的。

第二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以说是全书立论的主体。作者有条理地说明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发生了五方面的新变化:数量上有较大增长,非物质生产领域工人的比重上升,脑力和半脑力劳动工人增多,文化和技术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据此作者认为,现代工人阶级的概念应该比过去有所发展,但是西方所谓工人阶级已经“非无产阶级化”、或者新工人阶级已经取代了旧工人阶级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作者从部门(职业)结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三方面来分析现代西方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这是颇有深度的新见解;作者由此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社会历史作用,认为工人阶级仍然是最革命的阶级,并且肩负着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这是正确的结论。书中指出:现代资产阶级虽然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并不是像西方所说的,出现了所谓工人剥削资本家、资本民主化或者权力已转移到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手中等现象,更未出现所谓“经理阶级”取代了资产阶级的情况。然而,作者在这一部分没有认真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资本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没有注意到资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这一重要的新现象,这是一个缺陷。除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极结构外,作者还着重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层。揭示了中间阶层中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在急剧减少,城市小资产阶级有所增加,而且成分更加复杂;批驳了西方所谓“中产阶级化”的理论,正确地指出那种认为中产阶级将取代其他阶级而成为下一个统治阶级的观点只不过是幻想。不过作者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危机

的加深，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将越来越多地无产阶级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以为这个看法未必全面。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的中间阶层无疑将更加扩大和壮大，我认为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中产阶级，由以往日益分化的中间阶层发展为比较稳定的中产阶级，这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即使资本主义危机加深，我看其中也只会有一部分人无产阶级化，大部分人将坚挺战斗，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这个强大的同盟军值得无产阶级重视。

第三篇是本着理论联系的原则，按照作者在第二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重点考察了战后美、英、法、德（联邦德国）、日、意六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分别说明了这些国家阶级结构的特点以及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情况。这一部分旁征博引，资料丰富，层次清晰，分析得当，使人们能够点、线、面相结合，看出美、欧、亚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现状。遗憾的是，由于国家没有条件把研究国外情况的博士研究生派出去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所以这一部分的书面材料虽然较为翔实，内容总显得不够深入、生动。

全书最后预测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变化的趋势，指出上述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变化将沿着战后已经出现的特点继续发展，只不过量的变化要小一些，而质的变化要突出一些。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未来趋势与社会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看来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只有认清这种新变化和新趋势，重新调整阶级路线和战略策略，探索新道路，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作者对主张“欧洲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寄予了很大的关注，可惜他们思想认识上虽然有所变化，但是看来并非十分彻底，实际行动上又遇到重重阻力；而社会党人虽然对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认识有所偏颇，但是在实际行动

上却取得了较大进展。怎样使共产党和社会党这两支社会主义力量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彼此接近、加强协作，我认为这是使西方社会主义走出低谷、摆脱困境的一条光明之路。当然这需要长年累月不懈的努力。从共产党人来说，彻底克服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和教条主义，立足于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仍然是当务之急。

我国人民在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革、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异常关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近几年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有关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问题的论文和编译文稿；去年9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蔡声宁、王枚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问题》，书中选译了较多国外各家各派的有代表性的观点；近年来我国还翻译出版了几本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倪力亚同志研读了中外文许多论著，吸取了前人的成果，推出了有自己新见解的论著。尽管本书还有不足之处，这毕竟可以说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论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问题的学术专著。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社会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且它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不全面继承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就搞不好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高 放

1988年12月6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篇 关于阶级结构的基本理论

第一章 阶级论和阶层论	13
第一节 马克思以前的阶级观	1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	18
第三节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阶层论”	23
第四节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社会流动论”	29
第二章 划分阶级的标准	38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	38
第二节 阶级意识和阶级	45
第三节 权力、知识和阶级	53
第四节 生产劳动和阶级	60

第二篇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分析

第三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	71
第一节 战后工人阶级状况的新变化	71
第二节 当代工人阶级的概念	80
第三节 工人阶级的“非无产阶级化”和“新工人	

“阶级”	88
第四节 当代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	101
第五节 当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112
第四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	131
第一节 资产阶级成分的某些结构性变化	131
第二节 资本家阶级是否在消失?	137
第三节 评“经理阶级论”	147
第五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层	156
第一节 中间阶层的构成及其变化	156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间阶层问题	168
第三节 评“中产阶级化论”	179

第三篇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阶级结构

第六章 当代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193
第一节 当代美国阶级结构的特点	193
第二节 当代美国的工人阶级	195
第三节 当代美国的资产阶级	200
第四节 当代美国的中间阶层	205
第七章 当代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211
第一节 当代英国阶级结构的特点	211
第二节 当代英国的工人阶级	212
第三节 当代英国的资产阶级	219
第四节 当代英国的中间阶层	224
第八章 当代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230
第一节 当代法国阶级结构的特点	230
第二节 当代法国的工人阶级	233
第三节 当代法国的资产阶级	238

第四节	当代法国的中间阶层	242
第九章	当代联邦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248
第一节	当代联邦德国阶级结构的特点	248
第二节	当代联邦德国的工人阶级	250
第三节	当代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	256
第四节	当代联邦德国的中间阶层	261
第十章	当代日本社会的阶级结构	266
第一节	当代日本阶级结构的特点	266
第二节	当代日本的工人阶级	271
第三节	当代日本的资产阶级	277
第四节	当代日本的中间阶层	283
第十一章	当代意大利社会的阶级结构	289
第一节	当代意大利阶级结构的特点	289
第二节	当代意大利的工人阶级	291
第三节	当代意大利的资产阶级	294
第四节	当代意大利的中间阶层	295
结束语	299

前 言

阶级结构是包括社会上各阶级的构成、各阶级之间和各阶级内部的关系的复杂体系，是体现阶级社会本质的深层社会结构。它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同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结构、职业结构、劳动力结构、民族结构和其它社会结构相互交错并相互影响。它是一个活的社会有机体，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是对各种阶级社会、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科学分析和革命性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在新的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其它因素作用下发生了某些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对于这些新变化，欧美学术界议论纷纭，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提出了挑战和非难，国际共运内部的认识也不尽一致。至于我国，由于过去长期封闭等原因，对这些变化知之甚少。因此，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前的社会阶级结构，对于在当代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和革命者，制定合乎当前阶级结构实际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阶级斗争战略和策略，对于我国人民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更好地执行改革和开放的国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是在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高放教授

的启发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问题产生兴趣并决定作尝试性研究的。高放教授给我们几位博士生定的研究总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善于借鉴和鉴别国外的各种社会思潮。1986年，他引导我们研读和评论了对我国当代青年颇有影响的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一书的中译本和原版本。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和其他著作中，否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提出所谓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之间的冲突是超乎阶级之上的“超级斗争”的观点，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片面的。托夫勒的观点引起了我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问题的注意。后来，我在高放教授指导下收集和整理国外学者对《共产党宣言》的评论资料过程中发现，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发展及其特性，关于中间阶层的分化等论述提出了似是而非的批评，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共产党宣言》的阶级观点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实际状况。这又使我感到有必要弄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活跃了学术研究空气，加强了对国外问题的研究。国内出版了一批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一些有影响的内部刊物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的文章和资料，图书馆进口了过去视为禁区的有关这类问题的外文图书和杂志。所有这些都为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于是，我从1986年冬天起，在高放教授的指导下，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结构的论著，联系历史和现实对他们阐述过的这方面的原理进行了沉思；参看了当代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的有关文献资料，

吸收了他们的优秀成果，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在阶级结构问题上的主要论调进行了分析批判；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六个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阶级结构作了概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终于形成了这篇著作。

社会的阶级结构是由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乃是研究这些国家的阶级结构的前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50年代前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约20年。在这个时期内，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2%、5.9%、3.0%、9.8%和3.5%，分别高于战前水平4.7、4.5、3、2.1和1.75倍。^①以1973—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为转折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滞胀”时期。1974—1983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大约只相当于前一时期的二分之一，但由于生产基数很大，所以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的增长仍然可观。从80年代中期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摆脱“滞胀”出现低速增长的趋势。推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新的科技革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际经济条件有利。这三个因素中最根本的是新的科技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过三次科技革命，每次革命都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增长。18世纪后期的以蒸气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

^① 王章耀等编：《世界经济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 19世纪后期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产力的大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40年代末50年代初从美国开始,后来逐步扩大到西欧的法、英、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60年代达到高潮,70年代由于经济陷于“滞胀”一度处于低潮,到了80年代中期,又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战后发生的科技革命,不但在科学技术的内容上较之过去更为先进,而且其规模也大大超出以往的科技革命,它对生产发展影响之大,更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无法比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推动突出地表现在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上。在现代生产中,一项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有时能够几倍、几十倍甚至成千上万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据统计,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80%以上是靠采用新的科技成果取得的。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美国、日本、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7%、8.3%、4.4%、5.5%、5.6%。^②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剩余价值率的增长和资本积累的扩大。例如,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从1947年的146%增加到1971年的237%;日本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率超过了20%。^③ 新的科技革命对于增加发展生产所必须的物质资料(原料材、燃料等)和扩大国内外市场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科技在内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调整,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尤其是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如下重大变化:(1)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2)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②③} 王章耀等编:《世界经济概论》,第39—42页。

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比重超过物质生产部门；（3）物质生产部门中农业、传统工业的劳动力急剧减少，与科技革命有关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增多；（4）脑力劳动者的比重超过体力劳动者；（5）雇佣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雇佣知识分子人数增多；（6）熟练劳动者和半熟练劳动者的比重超过非熟练劳动者；（7）妇女劳动力增多；（8）就业劳动力年轻化；（9）外籍劳动力增多；（10）雇佣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贫富悬殊在加深，大量资本和财富积聚在极少数人手里。社会经济结构的上述变化必然导致阶级结构的变化。

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前的阶级结构对于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既然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对它的认识就要尽可能及时地跟上它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抛弃个别陈旧的传统观念，对阶级结构上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判断，切不可墨守成规，脱离实际。例如，传统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是由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雇佣体力劳动者构成，不承认受雇佣的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又例如，传统观念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待遇较高的熟练工人上层以至整个熟练工人阶层视作“工人贵族”。还例如，在传统观念看来，现代工人的生活水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上述传统观念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们正确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工人阶级的实际和特点，但是显然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的实际和特点不那么相符合了。试想一下，如果抱着上述传统观念，势必要把越来越多的雇佣脑力劳动者排除在工人阶级范畴之外，势必将日益增多的熟练工人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势必把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看作是资产阶级化。因此，对这些传统观念应该大胆突

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论述中，有的论断本来是正确的，但是后来被人们从“左”的方面来理解和解释。例如，《共产党宣言》说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这一论断从历史发展总趋势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中间等级的分化和灭亡过程是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旧的中间等级消失了，又有新的中间等级产生。直至今今天，中间等级在发达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格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有联系和矛盾，摇摆于两者之间，具有保守和革命的两重性，是工人阶级应该争取和联合的对象。然而，在国际共运中曾经流行一种对待中间等级的“左”的策略观点。这种“左”的观点把中间等级的灭亡过程看得很短促，或者否认它的革命性，甚至把它当作危险的敌人加以打击。如何正确看待中间阶层，今天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需要努力解决的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有某些概念和思想是对当时开始露头的新现象的敏锐反应，或由于那种新现象发展尚不充分和成熟，或者由于其它原因，没有进一步得到详细阐发。《资本论》中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就是如此。国外学者对“总体工人”究竟是不是工人阶级颇有争议。我们不必拘泥于马克思本人对这个概念的表述，可以根据现在已经表现得十分充足并显示出规律性的事实，来丰富这个概念的内容，使之成为能表现工人阶级范畴扩大的普遍使用的科学概念。我们在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时，既要敢于正视现实，又要善于分析现实；不可人云亦云，而要独立思考，谨慎地对待复杂问题。要从变化中看到不变，准确地把握变化的量度，全面地考察各种因素，防止随意夸大或缩小。比如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类别，它不是一个阶级范畴，它向工人阶级转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按照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笼统地将它归类于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而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标准对各种不同的类型作具体分析，分别将其归入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

战后西方学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问题上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专著。他们之中有的人注重实际，对新现象敏感，善于捕捉新的社会信息，对社会结构的微观部分观察比较细致，取得了不少颇有价值的社会调查资料。在提出的五花八门的观点中也不乏个别的真知灼见。比如说，法国学者塞奇·马勒（?—1973）的“新工人阶级论”和希腊共产党人学者尼科斯·波朗查斯（1936—1979）的“新小资产阶级论”就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的。他们都试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新的解释。我们认为，尽管这两种对立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错误的，但还是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成分。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预见到了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转化，并将给工人阶级带来新的特征的必然性；波朗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论”则承认了现阶段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相联系的、某些阻碍其向工人阶级转化的现实特点。因此，对于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断然不可一概排斥。然而，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不少西方学者利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某些新现象，对马克思主义的至今仍然有效的基本原理进行挑战，提出了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奇谈怪论。他们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阶层论”、“社会流动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用思想意识、权力、知识、收入、劳动分工、职业差别、生活方式、声望地位等项标准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划分阶级的标准；用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一体化的臆断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学说；用所谓资本家消失和经理阶级的

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用中产阶级化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科学论断等。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往往是以一种公允求实的面貌出现的，很能迷惑人。因此，本书用了较多的篇幅对西方学者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力求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争取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研究社会的阶级结构是探讨社会利害关系、矛盾发展、阶级斗争和一切社会运动的出发点。因为在分析任何社会运动之前，应当清楚地了解其参加者的社会阶级成分。马克思主义政党总是从分析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配置情况出发，来决定工人阶级在每一斗争阶段依靠谁，团结谁和主要打击谁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当然，阶级结构和人们的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在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同一阶级的人持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社会观点，参加不同的社会运动。因此，判断人们的社会行为不能单看阶级成分，还要综合分析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素养、社会心理、民族、宗教、职业、性别、年龄等各种因素。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到个人来说，并非人人都永世不变地处在一定的阶级之中。有的人社会流动性强，有时当农民、有时当工人、有时成为小业主或自由职业者，有时能上升为资产者，其一生的阶级地位是变化着的。有的人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但又同时从事雇佣劳动，如半工半农的人、个体出租汽车司机、拥有较多股票的工人等，他们的阶级属性不确定，其阶级面貌是模糊的。还有少数人如游民、犯人、永久性失业者，他们由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原因，一个时期甚至永久失去了阶级性。然而，上述这些人终究是少数，他们的存在并不改变社会阶级结构。阶级关系终究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最根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的全部经济和政治生活都

渗透着阶级关系。阶级关系是一种深层社会结构，并不像其它社会关系那样总是明显和清晰地表现出来，以致一望可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统治阶级掌握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向人们灌输无阶级、超阶级的思想，模糊人们的阶级意识；由于在社会生活中除了阶级利益以外还有相互交错的大量其它的特殊利益，因此远非所有被统治被剥削的人们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社会阶级。很少有人能够独立认清由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组织所决定的根本利益，更何况能把这种利益表达出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往往有不少明明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人和职员主观认定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当前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数工人越来越多地处于无组织状态，工会运动遇到严重困难。这些都说明：工人阶级的范围虽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扩大了，但是大多数工人（特别是被扩大到工人阶级队伍的工人）在主观上并没有变为完全“自为的”阶级。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前工人运动低落的重要原因。所以，揭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启发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唤醒工人阶级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艰巨而又伟大的任务。弄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有助于认识当前这些国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新情况，克服对阶级斗争的简单化概念。

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反对环境污染、反对核武器和核能生产、反对军备竞赛和战争的群众性社会运动。使这些运动的参加者联合起来的因素不是阶级的共同性，而是某种别的共同性，例如种族的、宗教的、地区的、职业的、年龄的、性别的共同性。面对这类打破阶级界限的社会运动，对阶级斗争持有简单化观念的人感到茫然不解，看不清这类运动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实质。其实，这类运动曲折地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仍然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不是所谓

“超级斗争”。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贫富悬殊现象是产生社会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弊病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推翻剥削压迫制度，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现在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劳资双方阵线分明的经济和政治斗争，那未免过于狭窄了。以工人阶级、职员、知识分子、农民和部分其他中间阶层等绝大多数人为一方，一小撮最反动的资本家集团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在各种社会问题上的斗争也应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因为这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斗争总是对工人阶级有利，它总是增强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削弱和打击资本主义的最反动的势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理论界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作了不少调查研究，本书广泛地吸收了他们的成果。在着手写本书之前，作者请教过国内外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同志。宦老对重新研究和认识包括阶级结构在内的当代资本主义各种重大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见解，给了作者以巨大的鼓舞和启发。作者的指导教师高放教授自始至终指导了本书的写作，花费了许多的精力。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和评阅论文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张心绪同志，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对上述同志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一个新的重大研究课题，本书仅仅是对这一课题的初步的尝试性研究，书中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第 一 篇

关于阶级结构的基本理论

第一章 阶级论和阶层论

第一节 马克思以前的阶级观

社会划分为阶级并不是马克思发现的。马克思1852年3月5日在给他的朋友魏德迈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① 远在古代希腊的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的最博学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论述过阶级的存在。柏拉图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把《理想国》中自由民划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人数极少的统治者，他们是集政治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哲学王。第二等级是辅助者和武士，他们辅助第一等级进行统治。第三等级是农民、工匠、商人、佣工，他们为整个社会提供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执行的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职能。一个人属于何种等级，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而社会分工又是由天生的禀赋决定的。柏拉图说：“没有两个人的本性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才能是有区别的，某些人适合于这种工作，某些人适合于别种工作。”^② 柏拉图在坚持严格的等级划分的同时，认为第三等级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② 转引自范明生著：《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6页。

偶然出现了有高级禀赋的人，也可以晋级进入统治者行列，但第三等级绝对不能掌握政权。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进了一步，按照财产富裕程度将自由民分为三个阶级，他使用了阶级一词，写道：“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①亚里士多德看到了极富阶级和极贫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主张发展中产阶级，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来建立良好的管理和稳定的国家。亚里士多德竭力赞美中产阶级，他说：“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覬覦。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我们相信福季里特的祈祷文完全出于至诚：‘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②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只限于自由民内部划分等级或阶级，不把奴隶看作一个阶级，认为奴隶不过是“活的工具”而已，这充分表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局限性。中世纪天主教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维护封建等级制，认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属于下等阶级，他们是做低级工作的“雇工”和“脏汉”，不能参加国家的管理，只是国家其它成员的附属物；军人、法官、行政官、学者、僧侣和贵族属于中等阶级；属于上等阶级的则是统治者。

到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开始讨论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的阶级划分问题，向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挑战。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提出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关于财产的个人主义理论。霍布斯说，人的平等和个人之间的竞争是合乎规律的。洛克说，应该承认存在财产所有者和劳动阶级之间的划分。法国

^{①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5、206页。

思想家卢梭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区别了自然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平等，但是他宁愿用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不用阶级之间的关系来表示社会的不平等。随着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升到统治地位，主要用于新的社会集团即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这个术语广泛流传开来，逐步取代了封建社会通用的“等级”、“品级”之类的术语。美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美国第四届总统J.麦迪逊（1751—1836）意识到由于经济利益的对立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强调财产占有者和无产者的区别，指出：“在社会中，拥有财产和没有财产的人永远形成不同的利益。债权人和债务人同样如此。在市民化的国家中，地主的利益、厂主的利益必定增长，将他们分化为由不同的感情和观念支配其行动的不同的阶级。”^①但是，麦迪逊只是区分出作为政治派别基础的相当数量的社会集团，远没有把社会看作是一个阶级必定支配另一些阶级的阶级制度。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研究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确认，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地主是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劳动价值论对分析这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具有根本的意义。李嘉图说，收入的方式——雇佣工人的劳动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决定了阶级的差别。资本家的利润无非是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李嘉图通过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这一科学功绩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

① 转引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6卷，1973—1974年英文版，第15、946页。

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①当然，斯密和李嘉图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看成是永恒的，因而也把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看成是生产的自然规定。复辟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基佐、梯也尔和米涅，对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研究，从中获得了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事件的推动力的重要认识。基佐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单个人的、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上，放到不同阶级中具体个人的关系上，认为这种社会的基础在于地产关系。在他的主要著作《英国革命史》中进一步指出，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斗争。他不仅把地产关系，而且把一切占有关系看作是这一斗争的基础。米涅则首先指出，阶级的需求和阶级的利益对历史事件的进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政治事件的主要推动力，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斗争，这次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产生于法国的整个历史。诚然，这些历史学家不可能揭示这些阶级产生和存在的原因，竭力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否认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起的创造性作用，认为资产阶级一旦上台，阶级斗争就停止了。尽管存在这些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仍然是把以下事实当作“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这就是在英国和法国“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②

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在阶级问题上的敏锐观察力，大大超过了上述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1802年写的第一部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即认为法国革命不仅是由封建主和资产者之间的尖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第1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246页。

阶级斗争产生的，而且是由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尖锐阶级斗争产生的。圣西门特别直截了当地指出雅各宾党人的统治是无产者大众的统治。恩格斯在说明圣西门的这一卓越揣测的真正意义时强调说：“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① 圣西门在这篇名著中把人类分为三个阶级：（一）学者、艺术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所构成的阶级；（二）不进行任何改革的私有者阶级，但属于第一阶级的人们除外；（三）在平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的无产者阶级，它包括人类的其余一切成员。^② 圣西门在后来的著作中，提出了另一种阶级划分，强调社会主要划分为两个阶级：寄生者阶级和实业家阶级。寄生者阶级就是贵族、军人、食利者、国家官吏和法官律师，同这一寄生者阶级少数人相对立的是占全国总人数24/25的实业家阶级，它包括农民、工匠、商人、工厂主和银行家。圣西门离开了早先将社会基本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的观点，把无产者和脑力劳动者同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统统划到实业家阶级的范畴。圣西门由于受时代条件的限制，还未能看出刚刚形成独立阶级的无产阶级，就是真正能够为全社会的利益而改造世界的唯一的社会力量，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身上，认为他们是实业家阶级中的最积极最文明的部分，“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令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③ 显然，在圣西门的阶级观点里，除了无产阶级的倾向以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保有一定的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0页。

② 参见《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0页。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们的阶级观点虽然包含某些真理的颗粒，但只是在黑暗的背景中闪烁着丝丝微光，不可能用来透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工业革命把英、法、德等国的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自身发展和相互矛盾推向新的阶段。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1836至1848年英国宪章派运动为实行“人民宪章”而进行的斗争，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阶级斗争的锋芒越来越指向资产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工人阶级开始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提出了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随着工人组织的建立，开始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在发展着的工人运动内部，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条件和前景的需要，在工人空想共产主义中得到了最初的理论体现。它的代表人物法国的布朗基和德国的魏特林曾试图对以往阶级斗争的经验进行概括，并为工人阶级指出通向解放的道路。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先是与科学理论相脱离的，是自发形成的，而且仅仅凭借于战斗工人的直接经验。从自发的运动不可能产生出工人阶级的科学理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同科学的认识接触很少，所以，工人运动的理论武器只能来自那些毫不顾忌自己的社会出身和地位而完全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同时立足于本时代的认识高度，有能力接受人类思想的一切进步成果，有能力解答那些由人类先进的思想家业已提出的问题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对全部哲学的、经济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思想进行了变革，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阶级结构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就是关于决定社会阶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存在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的规律的理论，其内容要点大体如下：

第一，揭示了社会阶级的起源和发展的真实过程。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以前的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又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社会分工就成为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阶级的划分只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这种划分是以生产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把阶级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这与那种认为阶级是天然的、永恒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第二，揭示了阶级的实质和特征。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是一些大的社会集团，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这些社会集团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基础上产生以后，它还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即由“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过程。因此，一个阶级除了具有经济实体的本质特征以外，还应具有政

治特征和思想特征，这才是一个成熟的阶级的全貌。阶级划分是政治派别划分的最根本的基础。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是看他们的思想、理论上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斗争反对另一阶级。阶级对每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个人命运。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把阶级看作是经济范畴和政治范畴的辩证统一，这与那种否认阶级的经济实质和忽视阶级的政治、思想特征的观点是完全不相同的。

第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有三种主要社会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处在它们两者之间的中等阶层。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家阶级。资本家的灵魂就是资本，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但是，资产阶级的关系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不过

表明，他们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力量，增强自己的阶级意识，组织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下解放出来。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得到补充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各主要阶级的分析是紧紧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基本矛盾而展开的，因而能够揭示出这些阶级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作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中等阶层的分化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论断。

以上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最一般的概述。这个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独创的，其内容的深刻、丰富和价值、意义超过了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籍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极力贬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观的“跛子姊妹”。熊彼特十分武断地认为：“在马克思心中还有一些有关阶级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由于他对于现象坚持纯粹经济的和过分简单的概念，他为自己制造了某些困难，阻断了他走向成熟的阶级理论的道路。他和他的门徒们，都努力把这个没有充分发展的理论应用于某些特殊事例，其中他自己的《法兰西

阶级斗争》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除此而外，没有什么实际的发展可言。”^①熊彼特和一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所不同，他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永恒的制度，承认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同我们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的区别。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熟悉历史，研究政治学和社会学，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社会科学家”。他强调在科学研究中不要割断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熊彼特的上述特点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蒙上了迷惑人的色彩。但是，只要我们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就不会得出熊彼特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不成熟的，有重大缺陷的“跛子”理论的荒谬观点。在熊彼特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是纯粹经济的和过分简单的概念，事实上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首先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经济根源，确定了阶级的基础和阶级划分的标准是生产关系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高明于其它各种所谓阶级概念之处。只要我们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影响阶级的各种非经济因素并没有忽视，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把它们当作研究的重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阶级并不单纯是经济范畴，而是社会经济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十分重视阶级斗争、阶级组织、阶级意识和教育文化的素养对于无产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的积极影响，把阶级的成熟看作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多种因素起作用的过程。他们在分别研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无产阶级时，既强调了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本

^①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1、23页。

质和利益的一致性，又不忽略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民族、人口等社会经济因素而形成的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性和差异。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分析也是如此。他们并不把阶级简单地看作是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而是深刻地看到了阶级内部的差别和矛盾。例如，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内部就存在普通工人与“高级工人”、“工人贵族”的区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就是对由于社会劳动分工引起的包含着某些社会经济差别的各类工人的一种新的综合。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决不是熊彼特所污蔑的那种片面的简单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不是封闭的凝固的理论，它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向前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是完全成熟了的理论。它的基本观点经受住了140多年的世界历史的检验，至今仍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基础。它与资产阶级思想家、宣传家泡制的时髦肤浅、转眼即逝的社会结构理论相比不知高明成熟多少倍。

第三节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阶层论”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有的人根本不承认社会宏观结构存在，直接否认现代社会的阶级划分。美国的许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宣称：美国社会已在变成没有阶级的社会。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同类的论调。联邦德国的兰丝胡特教授断定说，在联邦德国、美国和英国都“已经不存在社会阶级划分”。英国的“社会主义联盟”也声言：目前国内“阶级结构已有改变。我们的社会愈来愈不会分裂为两个彼此之

间鸿沟甚深的不同的阶级。”^①另一些人则承认社会宏观结构存在，承认包括阶级在内的社会的集团划分，但是用阶层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阶层论在分析社会结构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和实际效能。例如，美国社会学家通常根据财产和收入的多少将居民分为若干阶层。这种划分由于有数量标准，能比较准确地勾勒出社会财富在居民中的分布状况，揭示出贫富的差别和由此而产生的阶层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政府制定缓和阶级矛盾的社会福利政策提供根据。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阶层论对于调查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在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等方面的差别状况也是有用的。因此，我们并不全盘否定西方社会学家的阶层论。但是，西方社会学家的阶层论毕竟在实质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而且它常常将“阶级”（Class）和阶层（Stratum）这两个不同含义的术语混合使用，有很大的欺骗性，在资本主义国家影响很广。

阶层这个术语原义是地质学上的岩层，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用它来划分社会的层次。照美国的《社会学辞典》解释，阶层就是指“从横的方面把社会划分为完全固定的和同等的许多层次，像阶级、门阀等级、地位身份等。”^②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阶层范畴是包括阶级在内的一切社会类别的范畴。或者说，阶级在阶层范畴中占普通的一席。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有时使用阶级一词，也是在阶层的意义上。这一点我们在读他们的著作时是要加以注意的。

西方社会学的社会阶层是根据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即根据任何一种不平等现象或社会差别而将人们划分出的等

① 转引自谢缅诺夫：《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反科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11页。

② 费尔采尔德：《社会学辞典》，1944年纽约版，第309页。

级层次。由于阶层划分的标志不同，因而划分出来的阶层也是各种各样的。例如，过去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划分的基础在于人们思想和心理上的差异，兴趣和意识上的差异，教育和精神文化上的差异，生活方式和品行上的差异，在生物学的“价值”上的差异，在出身上的差异，在种族归属上的差异等。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各种论调现在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常常从制造阶级划分的物质基础出发，对阶级作所谓“经济的”解释。一种论点认为，各种阶级差别的基础导源于收入的来源或收入的大小。于是相应地就把阶级称为“按收入来说的阶级”、“收入的阶级”。这种论点被称为“分配论”，因为它不是把生产领域中的差异，而是把分配领域中的差异当作阶级差别的基础。这种论点的拥护者用结果偷换了原因，把次要的、派生的东西摆在首要地位，又将首要的、主要的东西移到次要的地位。对阶级作“经济”解释的另一种论点认为，社会阶级划分的基础似乎是职务种类上的差别和职业上的差别。根据这种观点，从事同类职业或担任同类职务的人们的一定的总和，就形成了具体的“职业集团”，这种“职业集团”就是阶级。然而，职业和职务种类上的差别无论如何也决不能成为各社会阶级的基础。人们之所以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并不是因为他们从事不同的活动。正相反，人们往往已是因为分属于不同的阶级，才从事不同的活动。同时，阶级差别和职业差别决不是一致的。还有的社会学家依据一些居住环境方面的特点，如住宅类型、居住地区以及其他更次要的特点来确定阶级。例如，有的人根据住宅中是否装有电话来划分阶级。一切有电话的人就都被归入上等阶级。有的人甚至认为，个人仪表外貌就是阶级归属的标准。上述的各种观点都是从某个单一的、派生的、非本质的、次要的标志来划分社会阶级。这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不能深入钻研和发现各阶级的真正基础，他们只能在各种现象的表面上徘徊。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社会阶层论最精巧的形式，就是“多方面测定阶层”的理论。这种理论的中心环节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德国社会学家麦克斯·维贝尔（1864—1920）提出的由“阶级、地位和权力”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模式。按照维贝尔的模式，社会阶层是由财产状况、声望和权力决定的。维贝尔把阶级定义为“市场上的机会”，认为阶级是收入数量和收入来源相等同的利益集团。可见他的所谓阶级概念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的。维贝尔所说的地位，是指荣誉和声望，这是由人们的身份、仪表风度、生活方式、教育水平等因素决定的。他认为，荣誉和声望并不总是跟随在财产所有权或金钱的后面。为了进入最高社会阶层，光富有是不够的。对人们作社会阶层划分时，必须把社会地位作为一个主要特征。维贝尔的地位概念是对荣誉和声望的一种主观评价，用来划分社会阶层必然带有主观随意性。划分社会阶层的第三个尺度是权力。维贝尔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权力的最关键来源，不是来自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政治党派，来自日益发展的科学化的组织管理。维贝尔模式的拥护者宣称：如果说，“经济上”分化的结果产生了“阶级”，那末“社会上”分化的结果就产生了若干“有声望的集团”或“有地位身份的集团”，而“政治上”分化的结果则产生了若干“政权集团”、“实力集团”或政党。可见，维贝尔的三位一体的阶层模式不过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模式，它根本否认作为社会阶级划分基础的决定性的因素，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解释成为具有同等意义的东西。维贝尔的阶层理论在美国得到了发展和实际运用。美国社会学家华纳1930年按职业、住宅类型、居住地区、收入来源等项标准的综合指数，把美国社会划为六个等级，即上上层、上下层、中上层、中下层、下上层和下层。华纳用“指数”来确定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方法，在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著作中极为流行。华纳的“指数”得到各种

改进和增补。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许多项标准凑合在一起，其中除了收入、地位和权力外，还有住房、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宗教信仰、社会交往、兴趣爱好、母亲的劳动情况、参加社会事业的情况、发音情况、道德面貌等等，总之，把人们中最有差别的各种具体特征，人们处境上的各种最小的特点都凑合起来了。诸如此类的阶层“指数”是漏洞百出的，因为它们是把一些完全不同的、有时是彼此互不关联和彼此毫无因果关系的、忽视阶级根本基础的、派生的或次要的各项特点，随意地、折衷地凑合成为一个整体。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那末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①

社会阶层理论在哲学方法论上的缺陷是主观唯心主义和折衷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缺陷就在于把社会划分为社会阶层时脱离了对生产关系实质的分析，因而使社会结构失去了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的基础。然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从人的一切复杂混乱的关系中分出作为基本点和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关系，为研究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拨开了迷雾，创造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恩格斯说过：“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② 坚持阶层论的人往往强调说，社会中存在许多集团和关系，从中不可能分离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页。

出主要的。当然，社会关系的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是极其复杂多样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资产阶级的阶层理论的分歧，完全不在于阶层论注意多种多样的社会集团，而阶级论则没有察觉这一点。分歧的实质在于对待复杂的社会结构是否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从人的一切关系中分出起主要的和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关系，从一切社会集团中分出代表着社会生产方式的阶级。是阶级而不是任何一个其它社会集团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而阶级斗争最终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的进程和结局。资产阶级的阶层论则恰恰忽视或违背了这一基本的科学原则。

一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鼓吹社会阶层论，其目的除了混淆阶级界限，掩盖阶级区分和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外，还企图使人相信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表现在现代功能主义社会学派的阶层理论中。现代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帕森斯、戴维斯、穆尔和赫茨勒等人宣传这样的观点：客观上存在社会功能的一定等级；社会阶层是一切社会发挥功能所必不可少的东西；阶层是一切社会的特点。他们是这样来解释自己的观点：第一，社会中的某些地位在功能上比其它一些地位更重要，因为执行这些功能需要专门的技能。只有不多的个人拥有为此所必需的能力。第二，能力转变成技能需要一定的训练，在训练期间不得不作出某些牺牲。为了号召有天赋的人们去作这些牺牲和掌握知识，他们的未来应该是有诱人的价值的，这就是说，他们理应得到各种特权和优惠。第三，对完成各种社会功能的人的不平等的酬赏导致个人和各种社会集团享有不同的声望和荣誉。正是声望、荣誉、特权和财产造成建制上的社会不平等。功能主义学派把个人完成社会功能的天赋能力作为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标准。例如，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赫尔恩泰因是这样研究阶层的智力水平的，他写道：“一、如果智力水平的差别是遗传的；并且二，

如果这种智力水平为成功所必需；并且三，如果收入和声望取决于成功；那末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地位作为收入和声望的结果，将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人们的遗传差别的基础上。”^①既然这位社会学家认为智力发展的差别是遗传的因素，既然他相信智力水平对于成功的重要，而收入和声望又依赖于成功，那末从他的三段论式中推出的结论必然是：社会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进一步认为，现代世界生活在继承下来的等级划分的条件下，“有征兆表明，未来社会这种划分更要加强，而不是减弱。”^②“继承性越是强，人类就越要建立严格等级的社会体系。那时家庭一代传一代地保持在原来的社会阶梯的等级上，因为孩子们在基本特点上像自己的父母亲。对于每一个阶级来说，生物学上的确定性是有保证的。如果出现不寻常的‘退化者’——能力强于或弱于其父母亲的人——那末他就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家庭以上或者降到自己的家庭以下，将占据一个在生物上和社会上与自己相同等人的位置。”^③作者建议读者不要为这种前途感到愤怒，而要作好这种前途的准备，忘却昔日平等的理想。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不平等辩护，另一方面还企图证明：在已经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消灭社会不平等现象。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阶层理论把属于社会不平等性质的各种差别，同并不含有任何阶级不平等性质的各种差别混为一谈，其反动意义是昭然若揭的。

第四节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社会流动论”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社会流动论”同社会阶层论密切相

^{①②} 《大西洋月刊》，1971年第10期，第65页。

^③ 《大西洋月刊》，1971年第10期，第64页。

关，同样起着混淆和掩盖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的作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在各个社会阶层内部以及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一切转移和流动的现象。根据不同的标准，西方社会学家把社会流动分为垂直流动、水平流动、一生中的流动、代际流动、个人流动、集团流动、自由流动和结构性流动等。社会流动的确是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它是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量变过程，也是职业结构变化的表现。研究社会流动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但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用社会流动这个概念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则是值得我们警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夸大社会流动的现象，把它说成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美国社会学家罗哥夫断言：“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就是这样：它使得各个阶层的成员的互相转化更加提高了一步。”^①资产阶级学者公认美国的社会是高度流动的社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典范。美国社会学家K·迈尔说，“美国自诞生起就比现代史上的任何其它国家更重视社会流动。”^②《文明美国》一书的作者M·勒涅认为社会流动性是“美国阶级体系的最惊人的特点”^③。美国社会学家华纳认为，沿着“社会升降梯”上升到“上层”，沿着“走向明星的梯子”爬上去，从穷光蛋变为百万豪富——这种流动性，就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他声称：“社会流动性，无论对于工人说来还是对经理说来，都是一种主要的鼓舞力量。”^④英国也被描绘成为一种有自由的社会流动性的国家。例如英国社会学家比佛尔布鲁克写道：“在现代英国中，穷人要上升到享有权力和幸福

① 《美国社会学杂志》，1953年第4期，第357页。

② 迈尔：《阶级和社会》，纽约1961年版，第69页。

③ 勒涅：《文明美国》，纽约1957年版，第469页。

④ 华纳：《美国生活：梦想和现实》，芝加哥1953年版，第106页。

的高度，并没有任何障碍。”^① 联邦德国、法国和其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都被说成是具有社会流动力量的社会。社会流动被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用来宣扬资本主义社会的“开放性”和“机会均等”。他们把所有这些具有社会流动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称为“开放的社会”或具有“开放的阶级制度”的社会，以区别于完全缺乏阶级之间流动转移现象的“闭塞的社会”或“具有闭塞的阶级制度的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宣传这样一种论调：资本主义社会人人机会均等，它向“低的”社会阶层提供广泛的可能性来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流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硬说，社会流动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特点，是资本主义发展一切阶段所固有的，给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职能化以决定性的影响。例如，美国社会学家J.A.巴贝尔宣称：“社会流动对政治体制的影响是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两极分化为政治对抗阶级的预言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② 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并没有阶级壁垒，社会流动可以消除阶级和阶级斗争。联邦德国社会学家R.达兰多夫认为社会流动性阻碍群众参加阶级斗争，他写道：“如果个人看到自己的儿子或自己本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那末他就不会参加阶级冲突。”^③ 美国社会学家赫茨勒认为：在流动的开明的阶级制度中，阶级冲突并不是紧张的。”“在美国，阶级界限是有条件的和变幻莫测的，而阶级冲突是偶然的和断断续续的，集中在有直接的并仅仅是临时的意义的问题上。”^④ 美国社会学家N.布肯南也说：“企图在美国发现阶级

① 比佛尔布鲁克：《不要信赖幸运》，伦敦1954年版，第275页。

② 巴贝尔：《社会流动和投票态度》，芝加哥1970年版，第256页。

③ 达兰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伦敦1959年版，第222—223页。

④ 赫茨勒：《行动中的社会》，纽约1954年版，第275、237页。

斗争，是完全不能达到目的的。”^①资产阶级的社会流动理论绝对排斥社会发展的革命道路。流动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秩序”和“社会安宁”的框子里。赫茨勒宣称：“正常的流动总是具有沿着社会梯子上升或下降的平静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是由于个人或家庭勤恳努力和取得成就、或者缺乏这些努力和成就的结果。”^②任何离开了这种“正常”过程的现象都被认为是违反了“流动性”的本来性质，因为这么一来流动就变成不正常的“痉挛”了。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流动现象呢？

第一，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流动确能改变少数人的阶级地位，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只能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不能改变个人和阶级的关系，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不能改变阶级之间的关系。社会流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自由畅通的。资产阶级的宣传家抓住某些工人变为企业主甚至百万富翁的个别事实，大肆进行吹嘘和渲染，说劳动人民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达到同样的地步。实际上，劳动人民的向上流动，特别是向统治阶级流动，是极其困难的。美国在其早期历史的一定阶段确实发生过大批雇佣劳动者转变为业主的过程，但这是由当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尤其是由于存在大量“空地”所决定的。恩格斯觉察到了美国“空地”的消失和大量移民的停止，他在1886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指出：“防止无产者形成一个固定阶级的大安全阀，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了。”^③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开办独立企业所必需的资本数量比过去雄厚得多，在这种条

① 布肯南：《政治随笔》，纽约1953年版，第41页。

② 赫茨勒：《行动中的社会》，第2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6页。

件下个别雇佣劳动者要过渡到资本家的范畴是非常困难的。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普通工人要变成资本家的机会是极其有限的。美国大企业主库因在1953年纽约出版的《庞大的企业——民主的威胁》一书中承认：“如果说是在我们的国家中，所有的人都具有平等的机会，那是滑稽可笑和骗人的。”^①美国社会学家华尔纳德和阿贝格连对美国1928—1952年中商业和工业的“流动”情况作了分析，指出几乎没有什么下层人物流动到大企业主、大实业家和经理之列的现象。他们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商业和工业中的现存制度“只是有利于那些属于高等阶层的人们”^②。专门研究过美国经济界的上流人物的学者乌·约涅尔和约翰·艾格林写道：“美国实业领导人都是从社会高上层中选拔出来的集团。实业家的儿子成为美国经理上层成员的机会要比中等工人的儿子高17倍。”^③社会学家R.本狄克斯和F.霍通也揭露过美国经济上层人士的社会出身。他们的调查结果表明，生于20世纪上半期的经济上层人物中，73%出身于实业家和土地所有者家庭，11%出身于高级自由职业者家庭，只有3%出身于体力劳动者的家庭。^④这里说的是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对于中等业主集团的社会出身调查也表明，在他们中工人出身的人的份额是很小的。从代际流动来看也是如此。据美国1962年抽样调查，非工人的儿子有69%仍然是非工人，而工人的儿子有62%仍然是工

① 转引自谢缙诺夫：《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反科学理论》，第32页。

② 转引自谢缙诺夫：《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反科学理论》，第32页。

③ 转引自缅什科夫：《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莫斯科1965年版，第131页。

④ 参见本狄克斯、霍通：《社会流动和美国实业精英》，载《英国社会学杂志》，1957年11月，第63页。

人。①美国社会学家P. M. 布劳和O. D. 邓肯在60年代初通过调查得出结论说，“在工人阶级中开始自己生活的人们不同于其他人，少有成功的命运。他们达到的职业地位，只是在不大的程度上有利于其父亲的地位。”②

第二，要把职业流动和阶级阶层流动区别开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强调这样一个论点：由于科技进步，产生了社会流动的新机会。确实，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工艺的变化，特别是一系列的生产过程自动化，体力劳动被机器和机械所代替，这些变化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扩大了对许多传统上属于高级职业的职业需求，即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专家、管理人员、办公室职员等。美国社会学家J. A. 考尔经过调查得出结论说，在本世纪中期，美国30%的劳动力流动是由于同技术进步有关的一系列“低级”旧职业的消失和许多“高级”新职业的产生。③资产阶级学者用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职业流动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动趋向，从而混淆了社会阶级的流动性同职业流动性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在一些情况下职业的变化可以伴随人的社会地位变化，但是从一种职业转移到另一种职业常常没有跟着发生阶级属性的变化。从雇佣体力劳动者转变成雇佣脑力劳动者，其受雇佣和剥削的阶级地位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成员在科技进步条件下的职业流动，是在阶级内部的短距离流动，这就是说，绝大多数非熟练工人或出身于非熟练工人家庭的人，只是上升到半熟练工人或顶多上升到熟练工人。根据美国社会学家R. 海尔提供的材料，1962年美国熟练工

① 参见杨心恒：《社会学概论》，天津南开大学1984年版，第24页。

② 布劳、邓肯：《美国职业结构》，纽约1967年版，第424页。

③ 参见考尔：《美国阶级结构》，纽约1957年版，第261页。

人中59.4%出身工人家庭，20.1%出身农民家庭，6.2%出身于业主和管理人员家庭。^①可见，职业流动对阶级地位变化的影响是很小的。

第三，要全面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动，不但要看到少数人的向上的流动，而且要充分考虑到最近几十年表现出的大多数人的向下流动。向下流动的过程表现为一系列社会居民阶层的无产阶级化，他们原来处在比较高的社会台阶上。许多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流动大量是向下流动，首先是朝着无产阶级队伍流动的。小业主、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不能保持既得的地位，大部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所谓中等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不少流落到工人阶级中。据美国社会学家R. F. 哈米尔顿调查，在美国，1952年和1964年，工人中出身于中等阶级家庭的人分别为15%和13%。在美国的某些地区，如东北部和西部，体力劳动者中有20%出身于中等阶级家庭。^②据布劳和邓肯的估计，60年代初美国29%的体力劳动者出身于“白领工人”家庭。在法国，1959—1964年间，小商业主和手工业企业主的儿子37.6%成了工人，与此同时，只有1.1%的工人的儿子成了小企业主。^③

最后，还要注意与社会流动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排他性的社会关门主义”。德国社会学家维贝尔在坚持社会阶层论的同时，提出了社会关门主义，以论证社会阶层的稳定性。维贝尔所说的社会关门主义，是指各集团把获得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划归具备某种资格的特定小圈子，从而谋求最大收益的一套程序。这就必需选定某种社会或自然属性作为进行排他活动的冠冕堂皇的

① 参见海尔：《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纽约1969年版，第313页。

② 参见哈米尔顿：《美国的阶级和政治》，纽约1972年版，第309页。

③ 参见布劳、邓肯：《美国职业结构》，第102页。

依据。维贝尔提出，事实上任何一种集团的属性如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宗教等都可以作为这种依据，只要它可以用来“垄断特殊的、一般指经济上的机会”。“这种垄断针对具有正负特点的竞争者，其目的始终是排挤圈外人，不让他们获得种种社会经济机会。”^① 社会关门主义和社会流动论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但又是统一的，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资产阶级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压力，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因此一方面需要维持机会均等、社会流动的开放性，来缓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利用血统论的关门主义以实现本阶级的社会再生和保持本阶级的稳定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社会关门主义有两种主要排他手段。第一，靠有关财产制度的法律规定，来阻止阶级之间的流动。财产所有制是一种旨在制止普遍分享生产资料及其成果的关门主义形式。尽管一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已经不那么注重财产概念，而更多地重视管理的权力，但是管理权和财产权是不可分开的，前者是以后者为基础并为后者服务。假如工人占领工厂，封闭管理机构，那末法律指控他们的罪名不是“不服从”，而是“非法侵害”。因为“不服从”不过是对权力的冒犯，而“非法侵害”却构成对财产的危害。第二，靠学术和专业方面的资格及其证书来阻止职业的流动。竭力抬高毕业文凭的身价，用作控制进占分工中的关键岗位的手段，这被称之为“证书主义”，把证书用于排他性目的，是因为想要获得专业人员地位的人增多，为了保护和提高专业人员的市场价值，垄断技术和服 务，就用各种严格的条件来限制和控制某种职业的新参加者。德国社会学家维贝尔早在实施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以前就看到了限制专业人员的趋向。他指出：“在正常情况下，对于某种职业的利益和荣誉来说，首先要限制

^① 维贝尔：《经济和社会》，纽约1968年版，第342页。

本职业候补者补充进来，而对工作是否卓有成效，其关心倒还在其次。”^① 正式的资格和证书显然是一种简便而又合法的限制手段。美国社会学家伯格认为，证书主义会起到加强阶级壁垒和阻止社会流动的作用，指出：“在美国文凭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财产……这肯定将使得至今还存在的、令人生畏的阶级壁垒更为森严，哪怕在家庭内部由家长把利益传给孩子的权利也已不复存在了。”^② 证书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产生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反映了知识分子就业难的趋向，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就业问题。证书主义表面上对于每个人都平等，似乎与财产毫无关系，实际上它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离不开财产的背景的。学历证书或资格无非是雇主向雇佣脑力劳动者提出的受雇条件。提高对证书的要求是为了对雇佣脑力劳动者进行苛刻的挑选，压低劳动力的价格，制造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的确有个别大资本家宁愿把自己的家业交给有“文凭”的能干的非亲属人员管理，而不让自己无“文凭”的碌碌无为的纨绔子弟去挥霍，但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保住家业。也的确有一些劳动人民的子弟通过“文凭”找到了好的工作职位，后来通过不断的奋斗上升到了社会的上层，成了资产阶级的成员。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除了某些个别现象外，大学文凭对于资产阶级子弟来说是继承产业，飞黄腾达从而保持其优越的阶级地位的“宝贝”，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来说主要还是一纸谋生的凭证，而且还是很不稳定可靠的。众所周知，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定财产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单凭文凭找理想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证书主义归根到底是对广大知识分子就业谋生的限制。

① 维贝尔：《经济和社会》，第344页。

② 伯格：《教育与职业》，美国企鹅图书公司1973年版，第183页。

第二章 划分阶级的标准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

西方学术界大多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社会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给阶级确定一个基本概念，因而使后人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时产生了大量的分歧意见，甚至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西方学术界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阶级》。这一章开头就提出问题：“什么事情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这一章仅写了几百个字就中断了手稿，没有来得及深入系统论述这个问题就与世长辞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找不到对关于阶级的一般定义的表述。这决不是一种疏忽，也不能武断地推测他们在理论上没有形成一般阶级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没有给阶级下一个简明的科学定义，我认为主要原因是：阶级这个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早就广泛使用，并且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恩格斯基本上是一致的。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各阶级的分野很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提到社会各阶级，并对英、法、德社会

各阶级进行分析，只是来不及在《资本论》这部巨著里进行科学上的提炼。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注重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实质和特征。马克思说过：“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①就在上面提到的《资本论》的《阶级》一章中，马克思也认为只要解答了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答了什么事情形成阶级的问题。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给《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加的注释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分别下了完整的定义。这两个定义可以说是对《资本论》最后一章的补充。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其大量论著中没有直接明确地表述过阶级的定义，但他们是有自己的关于阶级的基本概念的，而且这种阶级的概念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充满了对于阶级、阶级的形成以及阶级的历史作用等问题的研讨。从他们的研讨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观点，是把阶级看作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把在一定的社会生产结构中各个社会集团地位的差别看作是划分阶级的决定性标准。划分阶级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集团之间的表现，确定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因此，阶级不是一般的社会集团，而是代表某种生产方式的特殊的社会集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就是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分化的最深刻的具有革命性的揭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的革命性是以科学性为基础和前提的。它的科学性表现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0页。

阶级标准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是本质性的（而不是非本质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一贯地认为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划分阶级的决定性标准，并同反对或歪曲这一标准的观点严格划清界线。许多资产阶级学者都以收入来源和收入大小来划分阶级。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直到最后停止写作都是否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未写完的最后一章《阶级》中，就表示了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不同的观点。李嘉图把收入的源泉工资、利润和地租看作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决定因素。马克思则认为，决定近代社会的三个阶级的不是地租、利润和工资，而是占有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收入分配把人分为穷者和富者，但它不是阶级形成的基础。社会阶级是根据稳定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来区分的，只有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分配才可能是稳定的。因此，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不是收入分配才是阶级形成的真正基础。马克思坚决反对用“钱包大小”的差别来代替阶级差别的粗俗意图，指出：“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阶级的两人互相反对。”^①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劳动分工的意义很重视。认为它是形成社会阶级差别的客观基础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绝不同意把阶级差别比作劳动性质的差别。这种比喻经常引起他们的反驳。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3页。

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① 马克思特别坚决地谴责把阶级矛盾比作“行业之间的争吵”。他写道：“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是在‘行业差别’的原则上互相对立的。但是大家也知道，现代的阶级差别绝不建立在‘行业’的基础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阶级内部造成不同的工种。”^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阶级意识的作用，认为阶级意识是阶级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只有具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才是“自为的”阶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认为阶级意识是划分阶级的标准，相反，他们始终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是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的基本概念在列宁那里得到了系统的表述和发展。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就对阶级的定义作过最初的论述，他写道：“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占有这部分或那部分社会生产资料，把它们用于私人的经济，用于出卖产品的经济，——这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同没有生产资料、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不同点。”^④ 列宁的这一论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概念是一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④ 《列宁全集》第6卷，第233页。

的，所指的“阶级”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确，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难道能脱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基本阶级来谈阶级的定义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一次给人类开辟了消灭阶级的美好前景。列宁提出了响亮的口号：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但是，“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列宁认为当时有不少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并不真正懂得这一点。他们把消灭阶级仅仅看成是消灭资本家和地主，没有认识到消灭阶级还包括改造小生产者、消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种艰巨的任务和深刻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给阶级下一个全面完整的科学定义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因此，列宁在1919年6月28日写的《伟大的创举》这一著名文章中给阶级下了一个完备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百科全书所普及。在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理论的研究，都是以这个经典定义为根据的。对于列宁的这个定义，国内外许多教科书和辞典都作了很好的解释。在诸多的解释中，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教授、社会学家斯·布里舍奇写的《社会学原理》对如何理解列宁的定义提出了值得注意的看法。布里舍奇对列宁的定义中关于阶级的四个重要特征（1.大的社会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2.这些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关系；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383页。

3. 这些集团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4. 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 分别作了论证，接着指出：“为了不使阶级概念模棱两可，必须考虑到上面所列举的、列宁在阶级的定义中提出的所有重要特征。只要遗漏任何一个特征，关于阶级的概念就会变得含混不清。尤其是如果把阶级概念只归结为其中的一个哪怕是最主要的因素，那就更是如此了。”^① 他举例说，只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个特征来区别阶级是论据不足的，因为奴隶主、封建主和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但他们毕竟是不同的阶级。奴隶、农奴和现代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同样的，都失去了生产资料。如果说他们是同一阶级那就错了。由此可见，在确定阶级时，除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外，还必须考虑到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这个因素。布里舍奇强调阶级概念的完整性、强调列宁的定义中诸因素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既是针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对阶级的庸俗化理解，又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片面强调某种因素如生产资料这个因素的倾向。布里舍奇的这个观点是可取的。实践证明，在生产资料 and 分配领域内消灭私有制并不意味着消灭阶级。要消灭阶级，就必须全部消除形成阶级的因素。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集团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这个阶级特征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大部分资本家都通过雇佣的经理和专家进行生产管理。经理和专家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发号施令，处于支配地位。但能不能就此认定经理和专家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呢？不能，因为在生产组织中的作用这并不是形成阶级的足够条件，还要看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收入的方式和多寡等方面的条件。总之，在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

^① 斯·布里舍奇：《社会学原理》，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

会，要科学地准确地划分阶级必须把握阶级的全部特征。这是列宁的阶级定义对我们的要求。

列宁的阶级定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的全面表述，有其独立的科学价值。它并不是像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对马克思的思想的简单的归纳。首先，列宁的阶级定义包括了阶级的所有基本特征，同时指出了特征的主次顺序，排除了以折衷主义的态度研究阶级特征的可能性。其次，定义概括的阶级特征是具体的，很容易运用到实际中，因而是可以测定的尺度。第三，定义不仅能够揭示由主要社会差别形成的阶级（前两个特征），而且能够揭示出由次要社会差别形成的阶级内部的社会阶层和中间社会阶层（后两个特征）；定义不仅指出了在生产领域存在阶级差别（定义的第一部分），而且指出了在生产领域之外的整个社会结构中存在阶级差别。有的学者有意把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起来，贬低列宁的阶级定义的科学价值，认为“把列宁的定义应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的‘阶级’一词的各种意义上都是极不确切的。”^①这完全是一种偏见。

近几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这些变化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新的阶级概念，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划分阶级的标准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垄断真理。在阶级问题上的任何严肃认真的有根据的探讨都无损于马克思主义，而只会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更加切合今天的实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概念和阶级划分标准问题上谈得最多和最受人注意的是：意识形态、权力地位和生产劳动同阶级的关系如何，能不能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划分的标准。

^① 斯·奥索斯基：《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伦敦1979年版，第72页。

这些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观点，确实需要讨论清楚。

第二节 阶级意识和阶级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划分社会阶级的标准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而且应该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在不断增加。

主张按照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标准划分阶级的重要理由，就是认为阶级的概念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一个复杂整体”，阶级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整体结构。希腊共产党人学者尼·波朗查斯提出了结构主义的阶级概念，写道：“社会阶级是这样一个概念，它表示结构的整体，表示一种生产方式或者一种社会形态的模式对承担者——他们构成社会阶级的支持者——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概念指示出社会关系领域内全部结构所产生的影响。”^①根据这种阶级概念，社会阶级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而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具有统一性。因此在划分社会阶级时，经济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也应该同样是决定因素，而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波朗查斯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什么是社会阶级呢？它们是由社会承担者所组成的集团，这些承担者的地位主要是由，但不完全是由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也就是他们在经济领域内的地位来确定的。在决定社会阶级时，社会承担者的经济地位起着主

^① 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一经济地位就足以决定社会阶级。马克思主义宣称，在一种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中，经济方面确实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上层建筑）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无论什么时候在分析社会阶级时却远远不是把自己局限于经济标准，他们都明确谈到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阶级是按照它们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在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在内的整个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来决定的。”^① 英国共产党社会小组书记艾伦·亨特也持类似观点，他说：“不应该把阶级看作是‘物’，看作是一些只能从经济关系方面去识别的固定不变的实体。阶级只能是作为构成阶级实践的种种活动或实践而存在的。决定技术员和经理的阶级地位的不只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实践和思想实践。”^② 波朗查斯等人的观点在方法上犯了多元决定论和结构主义的错误。近几十年来，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决定论”，认为马克思过于强调了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政治、思想等因素的作用。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一元论已经不能说明当前资本主义的多维性社会，主张用多元论代替一元论。60年代初，以法共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1918年生）为首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多元论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分析，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单纯的劳资矛盾，也不是单纯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同一个运动中既是起决定作用的，又是被决定的；它是被它所促成的社会形态的各个

① 波朗查斯：《论社会阶级》，载《新左翼评论》，1973年第78期，第27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书讯》，1983年第4期。

方面和各个层次所决定的。”“矛盾在它的原则上，是被多元地决定的东西。”^①波朗查斯在研究社会阶级时，提出要把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放到经济标准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显然是受了多元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多元主义和结构主义是折衷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后者虽然可以对前者产生反作用，但不能决定前者，而只能被前者决定。这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是不能颠来倒去的。拿阶级来说，阶级的存在是由其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即经济地位决定的，而不是阶级意识决定的，即使没有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即使它的阶级意识是一种虚假的变态的意识（即非本阶级的意识），这个阶级的存在也是不容置疑的。因此，阶级成份是可以离开阶级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相反，阶级意识是阶级存在的主观表现，它不能离开阶级而独自存在，它不是阶级形成的基础。

用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不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确定事物质的规定性的标准应该是稳定的和可以测定的常数，否则就无法确定。然而政治和意识形态却是易变的变数，没有自身的独立性，是随着阶级状况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不可能准确地确定阶级成分。资产阶级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其意识形态是有重大变化的，但是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变化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的本性。无产阶级在革命高潮的情况下大部分人积极进行政治斗争，革命觉悟表现得非常强烈，在革命低潮和反动统治下其中一部分人消沉下来，安于现状，甚至接受资产阶级的意

^① 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567页。

识形态，那末无产阶级在后种情况下还是不是无产阶级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没有根本改变。政治和意识形态不但是有变动性的，而且是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在一个阶级内部，有各种政治派别相左，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发生分歧，这些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思想意识是不能简单地给它乱贴阶级标签的。在资产阶级内部，既存在开明的民主的温和的鸽派，又存在不明智的专横的强硬的鹰派，总不能说其中一派就不是资产阶级吧。同样，在无产阶级内部，有革命的激进的一派，也有改良的保守的另一派，我们也不能说其中一派就不是无产阶级。在20、30年代，共产国际把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明明是由广大工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看作是资产阶级政党，不承认它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也是一种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划分阶级的表现。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波朗查斯运用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当然也用了经济标准即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后面将专作分析）去划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果划出了由工程师和技术员等知识分子组成的、说是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不同的“新小资产阶级”。1975年，波朗查斯的《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一书由伦敦新左翼书店出版，在欧美“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书中提出了“新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并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演变，工程师和技术员等受雇佣的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大增加，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受资本家雇佣和靠出卖自己的智力谋生。在经济结构中所处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关于雇佣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本文后面还要专门分析）。可是，波朗查斯主要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来决定工程师和技术员的阶级属性，把他们定为“新小资产阶级”。他在该书的第三编第三章《根据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分确定新小资产阶

级》中写道：“如果说工程师和技术员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一个集团，这是因为，他们通过自己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维护的是工人阶级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这是决定他们的阶级成分的一个主要因素。”“关于工程师和技术员的立场问题，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他们应用科学技术的劳动是在带有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标记的情况下发生的，即使他们的‘科学’工作，也是物化这样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关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的支持者。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他们在这种再生产中的作用通过科学技术应用的途径，以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分工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条件。”工程师和技术员的意识形态特点是：“永远担心（这种担心表现在反对革命的社会变革）由于收入水平不稳定而引起的无产阶级化，它的表现形式是金钱拜物欲；”“屈从于‘秩序’、‘纪律’、‘职权’和管理机构的‘合法等级’等等的道德价值；并且使这些道德价值内在化”；“常常期望通过‘个人’奋斗得到‘提升’，得到一种‘资历’，以及‘向上升迁’，即变成资产阶级。”^①这里，且不说波朗查斯用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判定工程师和技术员的阶级属性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就他上面所说的工程师和技术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来说，也是片面的和非本质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本人处于被雇佣的地位，在生产中执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能大都是技术性的，他们无权决定企业的重大方针，不能说他们代表着资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支配。他们的职能固然有帮助资本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一面，但又有参与剩余价值的创造并被资本剥削的另一面。在思想意识方面，他们由于劳动性质和生活条件同一般体力劳动工人有所差别而表现出保守的倾向。但是这种差别的

^①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91期。

发展趋势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他们的根本利益同工人阶级是一致的，因而他们在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激化的条件下会认识到这一点的，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工程师和技术员在工人阶级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中站到了工人的一边。工程师和技术员由于受资产阶级文化教育比较多，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深，但是他们的文化智力素养和他们同先进生产力的天然联系，可以使他们从理论上认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接受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因此，必须辩证地和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工程师和技术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仅仅抓住其暂时的落后的一面，而将他们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划出去，归入“新小资产阶级”范畴，这是很不科学的。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坚持用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就是因为他们把划分阶级的标准和阶级成熟的标志混为一谈了。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点。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目的是分清敌我友，启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推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并不限于对阶级作经济分析，而是联系生产方式的整个结构来确定阶级的全貌。从经济上确定一个社会阶级，并不等于这个阶级的全部内容。不能把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同生产关系的分析完全等同起来。生产关系固然构成社会阶级的根本方面，但却不足以说明各个阶级在具体方面的特征。在全面理解社会关系时，还必须考虑到属于文化、政治、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的这些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意识和阶级固有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另外加到确定阶级成分的客观因素之上的。事实上，它们是相互密切联系并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当一个阶级认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获得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团结起来进行政治活动时，这个阶级就成为政治上成熟的阶级。这时，阶级意识便紧紧与阶级结合在一起，共同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马克思为了说明阶级在政治上发展成熟的历

史过程，曾经使用过“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这两个黑格尔式的术语。^①很明显，马克思强调的是“自为的阶级”，即认识到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阶级。但是，“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并不是两个阶级，而是同一个阶级的两个发展阶段。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于形成阶级的作用，就把“自在的阶级”同“自为的阶级”分割成两个阶级，而且错误地解释马克思的个别论断。例如，他们经常用来为自己的观点作理论根据的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话：“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它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

^①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写道：“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6页）

来代表他们。”^①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上述引文后部分关于法国小农“没有形成一个阶级”的论断，就认为凡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不成熟的阶级不能称作阶级。流亡国外的波兰学者莱塞克·柯拉科夫斯基说，一个阶级没有在实践中表现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之前，“不过是一个潜在的阶级”^②。美国学者L.罗斯·甘迪对马克思使用“自在的阶级”这个术语不满，认为“自在的阶级这种不确切的用法在马克思的许多读者中间造成了混乱。”^③英国学者亨特在评论上述马克思的引文时说：“这一段引文并不是向黑格尔主义自为阶级的概念倒退。更确切地说，它断言，不能认为阶级可以脱离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东西而存在。因此，阶级不是经济关系。”^④马克思在上段引文中既说法国小农形成一个阶级，又说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曾经为说明无产阶级历史发展过程而向黑格尔借用过的“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这一概念。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当时法国的小农形成了“自在的阶级”，但还没有形成“自为的阶级”。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的“自在的阶级”含义不确切，而是上述西方学者把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不愿承认在经济上已形成阶级，但在政治和意识上尚未成熟的阶级是阶级。历史告诉我们，阶级的形成总是先于阶级意识的形成。在统治和剥削阶级的压迫和欺骗下，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要产生自己的阶级意识，要发展成为“自为的阶级”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且这种过程在它没有得到彻底解放之前是一个不断加强和完善的过程。比如，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伯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② 柯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第1卷，伦敦1978年版，第356页。

③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03期，第32页。

④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书讯》，1983年第4期，第68页。

塔夫特认为，目前的“澳大利亚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但是作为“自在的工人阶级”构成了澳大利亚人口的绝大多数。^①因此，如果把“自在的阶级”排除在阶级范畴之外，那只会导致从根本上取消阶级这个概念。

第三节 权力、知识和阶级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权力和阶级的关系是一个热题。他们一致认为，现代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阶级不能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标准去确定，而应该用权力标准去确定。在他们看来，阶级和阶级冲突的基础不在生产关系方面，而在于社会内部的权力在各个方面的分配情况，也就是说，社会的特性是：所有组织之间都是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每一个方面的权力分配都是“不平等的”。

用权力来区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的人首推联邦德国学者R.达兰多夫。达兰多夫1959年发表了《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权力阶级理论。达兰多夫认为，在工业社会（又称“后资本主义社会”）里，重要的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政治权力，随着生产资料的法律上的所有权的缩小，结果在经济与政治秩序之间就发生分裂。他说，旧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劳资矛盾已经“在体制上被隔离”，因此不会从工作岗位带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在各个领域内，权威则是有自主力的：“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业的统治阶级和被统

^① 塔夫特：《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定的》，载《澳大利亚左翼评论》，1983年秋季号。

治阶级以及政治社会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再是等同的了；换句话说，原则上有了两个独立的斗争战线。在企业以外，经理可能只是一个公民，而工人却是一名国会议员；他们的劳资阶级地位不再决定他们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地位。”简言之，生产手段不再决定对社会的控制、权力或特权。经济关系或财产关系虽然仍然产生其自身的矛盾斗争，却不再继续或普遍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中心。那么，构成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是谁呢？达兰多夫写道：“我们必须在授权向行政管理人员发号施令的那些人中间，寻找那些构成官僚阶层地位的统治阶级。”虽然可能有企业管理或资本主义的权势分子，真正的权力却是在政府权势分子手中。“有必要首先想到这一权势阶层，决不能无视它在国家权威结构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矛盾斗争首先是在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变革是由政府权势分子推行或阻止的。企业管理或资本主义的权势分子设法在他们领地之外行使权力时，他们总得设法影响政府权势分子才能这样做。谁是政府权势分子呢？国家的行政官员、内阁的政府部长、法官。但是既然政府代表各种利益，所以这些权势分子有着“幕后集团”。“所以，抽象说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统治阶级是国家的行政官员，居国家之首的政府权势分子和政府权势分子所代表的那些受益集团。这样坚持把政府权势分子视为统治阶级的核心，一定会使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考虑问题，或者比较一般说来以传统的阶级概念考虑问题的人感到吃惊……如果这听起来奇怪……那是因为现实就是奇怪的。”^①应该承认，达兰多夫的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如无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和政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随着国家垄断资

^① 达兰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第272、275—276，301—302页。

本主义的发展，政府的机构在增多，政府官员的权力大到了令一部分资本家感到不安的地步。但达兰多夫把政府权势分子视为统治阶级的核心，这就成问题了。政府权势分子是什么？统治阶级是什么？两者的关系是什么性质的关系？这是首先应该弄清楚的。达兰多夫回避的事实是：政府权势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统治阶级就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核心是垄断资产阶级中的工业巨头和金融寡头。政府权势分子本人一般不是资本家和银行家，甚至也可以超脱于某些资本家集团，但他们是被整个资产阶级严格挑选上来的，他们的权力是整个资本家阶级给的，因此他们必须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政府权势分子的地位并不是稳固持久的，他们的上台和下台都是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政府权势分子也可能在劳资冲突中采取调和立场，甚至执行某些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利的让步政策，但这是形势所迫，并且在涉及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一般是不会作出让步的，一旦形势有利于资产阶级，他们又会采取措施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赢得的成果重新夺回去。这些情况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屡见不解的。达兰多夫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同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分开，看作两个阶级，这实际上割裂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关系，是在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剥削阶级性质。从政治权力来单独划出一个统治阶级违背了一个基本事实：“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我们不赞成在阶级属性上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府权势分子同整个资产阶级分开，但是还是应该重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官僚”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达的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公共生活的各种功能明显扩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国家机构庞大，公职人员增多，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少数高级官员手中。“官僚”在国家的全部生活中起着管理控制的作用，成为一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社会势力。因此，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范畴。这个特殊范畴的意义在于：它是根据自己特殊的社会功能统一起来的；它对社会各阶级和各利益集团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它具有制度化了的相对独立的权力。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批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官僚”为社会的“寄生机体”^①、这实际上也是把“官僚”看作一种特殊的社会范畴。不过，必须重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官僚”并不是阶级。他们虽然也有其利益（收入来源、职业结构等），但这些利益在“官僚”的不同层次上是不相同的，还不足以使之构成一个特殊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官员是从各阶级和阶层招募而来的，他们分属于不同阶级和阶层。

达兰多夫按照权力的标准，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四个阶级：高层阶级、职员阶级、服从阶级和自由知识分子阶级。^②所谓高层阶级，是指高级立法机关的代表、执行和司法权力机关的上层官员，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政府权势分子。高层阶级处在社会阶梯的最高层，他们确立和维持社会一切成员必须遵守的法律、政策和行为准则，调节和控制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层阶级的成员对别人行使权力。所谓职员阶级，是指中下层官员。他们辅助高层阶级制定和贯彻法律、内外政策和行为准则，向高层阶级提供情报和意见，全力支持高层阶级的所有“创举”。达兰多夫解释说，职员阶级实质上是高层阶级的附属物，职员阶级和高层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页，《列宁选集》第3卷，第165页。

② 转引自A. B.波捷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基辅1978年版，第165页。

共同构成社会的统治阶级。达兰多夫很重视职员阶级的作用，认为社会的进步是与这个阶级的扩大相联系的，职员阶级的思想方式和道德价值观念将逐渐渗透到所有其余的社会集团中。^①达兰多夫构造的职员阶级是从没有根据的假定出发的，即认为似乎属于职员范畴的人们是一个社会“整体”，这个“整体”绝对地效忠于高层阶级。但是，这种“整体”是不存在的。绝对效忠于高层阶级，这无论如何不是职员基本群众的行为特征，而只适合于职员中的上层人物。所谓服从阶级，是指服从高层阶级和职员阶级的统治的人们。达兰多夫否认生产资料所有关系乃是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的源泉，竟然把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小资产者一起列入所谓服从阶级。服从阶级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被压迫阶级。在他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只存在服从阶级，而根本没有被压迫阶级。服从阶级是自觉自愿地接受统治阶级的管理的，他们并不感到自己受什么压迫。按照达兰多夫的逻辑，奴隶和农奴不是被压迫阶级，而是同奴隶主和封建主一道组成服从阶级。因为在那遥远过去的时代，国家的具体管理也并不是掌握在统治阶级的全体成员手里，而是掌握在以统治阶级的名义和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实施管理的一部分统治阶级成员手里。达兰多夫之所以得出包括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内的服从阶级这种荒谬的概念，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对社会阶级的划分离开了经济基础，建立在上层建筑的权力标志的基础上。第四个阶级是自由知识分子阶级。达兰多夫认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集团，处在权力等级结构之外。这种臆断是和众所周知的事实相对立的。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按其经济地位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另

^① 参见波捷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113页。

一部分积极地加入权力等级结构，根据其能力和社会关系在政权结构中占据各种不同的地位，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属于资产阶级。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用权力来划分阶级。他认为，阶级集团按照其在权力阶梯上的级别来划分。贝尔写道：“最终说来，阶级并不意味着一个特殊的人群，而是把取得、掌握和转移不同权力及其有关特权的程序制度化的一种体系。”^① 达兰多夫回避权力的来源问题，特别是否认权力关系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必然联系。贝尔则不同，他承认权力有几个来源。贝尔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阶层划分和权力的关系用下列图表^②作了区别。

	前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资源	土地	机器	知识
社会活动场所	农场、种植园	公司企业	大学、研究机构
统治人物	地主、军人	企业家	科学家、研究人员
权力手段	直接控制 武力	间接影响 政治	技术和政治 力量的平衡
阶级基础	财产、军事力量	财产、政治组织 专门技术	专门技术 政治组织
取得权力的途径	继承、武力 夺取	继承、赞助、 教育	教育、动员、 吸收

贝尔认为，在西方社会中过去主导的制度是财产。但是，在过去25年到50年间，财产制度已经在解体。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有三种权力和社会地位变动的方式：（1）以历史的财产形

①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99页。

② 资料来源：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397页。

式为基础的财富和权力，它以继承作为取得财产的主要途径；（2）以专门技术为基础的权力和地位，它以教育作为取得技术的必要途径；（3）以政治职位为基础的权力，它以组织机器作为取得权力的途径。这三种体系同时存在，相互重叠，相互渗透。贝尔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随着家庭企业的没落和家庭资本主义的解体，财产所有权的意义将急剧降低。在后工业社会，新的精萃人物的兴起不是建立在财产上，而是建立在教育、专业知识、个人素质和技术熟练上。贝尔把这种新的精萃人物称作“知识阶级”或“专业和技术阶级”。^① 技术和知识是后工业社会的中轴，是一种基本资源。知识阶级在社会中取得权力不是通过经济途径，而是靠教育、靠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企图通过知识和技术来取得管理社会的权力，这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学者近半个多世纪不遗余力地宣传的技术统治主义或专家治国主义。30年代美国学者T. 维布伦在《操纵者与价格体系》一书提出了技术统治的理论，他强调技术专家们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同体，把实业家从生产领域排挤出去，进一步掌握政权，从而把资本主义社会变成技术统治的社会。^② 60年代美国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J. K. 加尔布雷思（1908—）在《新工业国》一书中，对技术统治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的概念上的发挥。他认为，在现代的大公司里，权力应该从“资本”移向“组织起来的知识”，即属于那些“掌握着运用现代工艺的工业生产及编制计划所必需的各种技术知识、经验和才能的人们的总体”。这种总体又被称作“技术专家体制”。^③ 7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M. A·布尔尼埃在《新型知识分子》一书中提出，技术统治派“就是在科学和技术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中行使政权职能的知识分子”，他们

①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240、243页。

② 参见维布伦：《操纵者与价格体系》，纽约1936年版，第52、99页。

③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莫斯科1969年版，第98、99页。

和经理人员一起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技术官僚统治的管理体制。^①1976年，美国“新左翼”学者巴巴拉和埃伦莱克在《激进的美国》杂志上发表《专业—管理阶级》一文，把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拿薪水的脑力劳动者确定为专业—管理阶级。^②这些提倡技术统治论的学者如维布伦、加尔布雷斯、布尔尼埃、巴巴拉、埃伦莱克、贝尔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不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这个事实，片面夸大知识和技术的作用，认为单靠知识和技术就能产生权力，因而就能形成所谓“知识阶级”、“专业和技术阶级”、“专业—管理阶级”。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和技术不是存在于社会真空，它本身并不是权力，它要是脱离了资本就发挥不了任何实际作用。技术知识分子之所以有一定的权力，其前提是受资本占有者雇佣，不管其雇主是集体还是个人，是国家企业还是私营公司。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技术知识分子的权力是严格局限在技术问题的狭隘范围之内的，它并不超出这个范围而达到更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技术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能分享管理权，大多数人丝毫不能染指管理工作，他们的职能是应用自己的技术和知识。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更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由许多其权限大小和所处地位各不相同的集团所组成。

第四节 生产劳动和阶级

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物质生产

①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和现代》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② 参见《激进的美国》，第11卷第2—8期，1976年。

部门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相应增多，与此相适应，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借助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加以曲解和发挥，提出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作为区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只有物质产品的生产者才属于工人阶级，非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则属于小资产阶级。希腊学者波朗查斯的所谓“新小资产阶级”理论根据之一，就是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阶级区分。

波朗查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明确提出，“工人阶级的定义不是根据一个简单的否定性标准，也就是它被排除于所有权关系以外的标准，而是根据生产劳动这个标准来确定的。”^①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工人 = 雇佣劳动者，但是，雇佣劳动者 ≠ 工人；生产劳动者 = 雇佣劳动者，但是雇佣劳动者 ≠ 生产劳动者；这样，由于工人和生产劳动者都等于雇佣劳动者，所以，工人 = 生产劳动者。^②什么是生产劳动呢？他对生产劳动下了一个定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劳动是这样的劳动，它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同时，直接再生产着作为剥削关系的基础的物质要素，这种劳动直接包含在生产增加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的物质生产过程之中。”简言之，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劳动。没有生产剩余价值和没有物质产品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下面将要指出他的这个定义同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概念的区别)。根据这个定义，波朗查斯给工人阶级划出了基本界限。第一，在资本的流通领域，或者是在有助于剩余价值实现领域完成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商业、广告、市

① 此段及以下引语均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01期。

②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03期，第22页。

场活动、财会、银行以及保险事业等领域的雇佣劳动者，他们都不生产剩余价值，“因此都不能构成工人阶级（生产劳动者）的一部分。”第二，那些以劳务形式表现出来的劳动，从理发师到律师、医生、教师、国家机关的文职人员的劳动，都应该作为非生产劳动来考虑，因为这些劳动的产品和活动是作为使用价值直接被消费的，它们不是与资本，而是与税收或收入相交换的。因此，由这些劳务提供者组成的集团，“甚至包括这些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在内，都不属于工人阶级”。第三，科学研究工作和情报生产仍然是某种脱离直接物质生产者的活动，不生产剩余价值，“十分清楚地排除于生产劳动之外”。因此，科学研究人员不属于工人阶级。上述被排除于工人阶级之外的“非生产劳动者”都被波朗查斯归入“新小资产阶级”（归入“新小资产阶级”的还有工程师和技术员，不过，那是根据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标准）。在波朗查斯创造的“新小资产阶级”概念不同于“传统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在于：“传统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占有生产资料，经不住资本的竞争而破产，而“新小资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并不命中注定要步传统小资产阶级的后尘，面临被消灭的威胁，它的发展和扩大是以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及其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化为条件的。按照波朗查斯的生产劳动标准推算，美国60年代末的经济活动人口中，工人阶级占19.7%，“新小资产阶级”占68.3%。显然，这是不符合现代美国阶级结构的实际比例的。

因为波朗查斯是以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作为划分工人阶级和所谓“新小资产阶级”的标准，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的问题。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首先是由英国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提出来的。斯密给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下了两种定义。第一种而且是主要的一种定义是：生产劳动是资本雇用的雇佣劳动，

而非生产劳动则是用收入雇用的劳动。这是涉及社会关系的定义。第二种定义是涉及物质的定义：生产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是生产个人服务的劳动。斯密当时处在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目的是，支持产业资本家推动积累，增加资本主义生产，批评土地贵族雇佣大量非生产劳动者为他们的奢侈生活服务，主张非生产劳动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从斯密逝世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75年期间，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家阶级已经建立了对社会的全面统治。他们在促进资本生产的同时，同土地贵族一样学会了消费剩余产品和寻欢作乐，效法消耗财富的封建形式，雇佣了大量仆人。他们扩充了自己在国家、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仆人，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歌功颂德，进一步巩固这个制度。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适应资产阶级的这种需要，不再理睬斯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他们害怕斯密的这个本来针对土地贵族的理论会反过来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他们攻击生产劳动的定义，声称所有类型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活动都是生产劳动，都是必不可少的，好的和可能是最理想的活动。正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抛弃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的情况下，马克思把斯密的这个理论重新挖掘出来，加以改造，用来丰富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的剥削实质和非生产劳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腐朽趋向，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主要讨论出现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第四章、《资本论》第二卷附录第十二与流通费用有关的部分、《资本论》第三卷与非工业形式的资本与利润有关的部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的手稿《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也有简短的论述。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是一个比较复杂和困难的概念。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大都是他

逝世以后根据手稿整理发表的。其次是因为马克思是密切联系斯密的生产劳动概念进行论述的，马克思和斯密一样，也对生产劳动下有两种定义，一种是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劳动价值的角度下的，另一种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劳动的使用价值的角度下的。这两种定义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有时交错重叠，容易引起不同的理解。尽管如此，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基本思想，这两种劳动区别的的目的和意义仍然是明白无误的。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和斯密的生产劳动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其第一种定义即社会意义上的定义来说，斯密认为资本雇用的雇佣劳动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则把剩余价值这个革命性的概念注入生产劳动的定义之中，他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①“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②就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定义即物质意义上的定义来说，马克思虽然同斯密一样坚持认为生产劳动是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但是在具体解释某种劳动时还是有所不同。例如，斯密由于没有劳动力是商品的概念，就不把花在劳动力生产上的劳动（如教育）看作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则承认直接把劳动能力本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1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6页。

生产、训练、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如教授阅读和写作的基本技巧以及各种职业教育在这个意义上都是生产劳动。综上所述，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概念基本上 是经济理论，它在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资本的积累和合理安排社会的经济结构方面而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全部论述中，并没有任何地方说过可以用生产劳动来确定阶级的定义。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物质生产劳动者同工人阶级完全等同，波朗查斯根据马克思的某些论断，用形式逻辑推导出工人 = 生产劳动者，这是不符合马克思论著的本意的。除了这个大前提上的错误外，我们还可举出波朗查斯用生产劳动作阶级标准的几个不妥之处：

第一，波朗查斯用以确定阶级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同时包括剩余价值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方面（引文见前段），而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定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定义。波朗查斯的定义认为，剩余价值仅仅是在生产实际商品的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和物质商品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假设未免有些武断。诚然，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物质商品生产大都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也存在分离的情况。如果某些劳务的生产是为市场所需要，那就有可能在非物质生产中创造出剩余价值，使资本增殖。马克思关于教育工厂和香肠工厂的著名对比就把这一点讲得非常确切：“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① 马克思还举例说过，演员、作家、妓女的活动只要能为老板赚钱，那也就是生产劳动。可见，马克思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概念是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的。波朗查斯严格地将剩余价值的生产限制在物质生产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6页。

中，进而得出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雇佣劳动者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结论，这是同马克思的观点相违背的。

第二，按照波朗查斯的生产劳动标准，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者才是工人。可是，马克思对商业工人的分析则是对这种标准的否定。马克思认为，在流通领域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因而商业工人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商业工人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从来没有怀疑商业工人的工人阶级属性。马克思指出：“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由他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决定的，而这个劳动力的应用，作为力的一种发挥，一种表现，一种消耗，却和任何别的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不受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限制的。因此，他的工资和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之间，不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资本家为他支出的费用，和他带给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他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一部分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① 马克思还明确使用了“商业无产阶级”^② 这个术语。

第三，波朗查斯既然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那末这两者应该是完全分开的。可是，有些劳动者实际上既从事生产劳动又从事非生产劳动，而且这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怎么确定这种劳动者的阶级属性呢？例如，商店职员将商品从仓库放到货架上，完成了商品运输的最后阶段，这种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性的，但是他们收款和进行现金登记，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非生产性的。这种既是生产性的又是非生产性的劳动不仅存在于商品流通领域，而且存在于物质生产本身的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35页。

② 同上，第336页。

程。例如，在工厂车间里，工人直接进行生产操作是生产劳动，而对工人劳动的组织管理却是非生产劳动（从不创造使用价值这点来说，当然它还是属于社会必要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不少劳动既有生产性一面又有非生产性一面。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是劳动活动的两个方面的反映，而不是两种阶级的反映。

第四，按照波朗查斯的阶级划分标准，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必然有着根本不同的阶级利益，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作为生产劳动者的工厂工人同作为非生产劳动者的商业工人和服务业工人并没有对立的阶级利益。他们受不同行业的资本家剥削，虽然彼此间可能产生利益的矛盾，这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竞争造成的，出现行会主义倾向，但在反对资本剥削这个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另外，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相互依赖达到整体化的地步，那就不能说什么非生产劳动者靠生产劳动者养活了。

第 二 篇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分析

第三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

第一节 战后工人阶级状况的新变化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已有40几年了。在这样一段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发生过多经济危机，但总的说来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人们可以把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发展归因于科技革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等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生产力则反过来给工人阶级以深刻的影响。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人阶级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明显增大，成为本国人口中的大多数。工人阶级是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资本主义剥削的雇佣劳动者阶级。根据这个标准，苏联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在研究资本主义各国官方统计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计算，得出了反映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劳动者和工人阶级数量变化的一览表。^①

^① 资料来源：鲍里斯·波诺马廖夫著《马列主义在当代世界》，牛津波格蒙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A. B. 波捷欣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基辅1978年版，第23页。

国别	年代	雇佣劳动者 人数(百万)	雇佣劳动者占经济 活动人口比例(%)	工人阶级 人数(百万)	工人阶级占 经济活动人口 比例(%)
美 国	1950	45.7	81.0	42.4	72.3
	1980	91.0	89.2	80.8	79.2
英 国	1951	20.3	92.5	17.5	79.4
	1979	23.6	92.9	20.3	79.9
联邦 德国	1950	15.6	70.9	14.0	63.8
	1979	22.8	86.0	19.5	73.6
法 国	1954	12.5	66.5	11.2	58.6
	1980	18.0	84.5	16.5	77.0
意大利	1951	11.0	59.0	10.4	53.4
	1979	15.8	73.1	14.2	66.0
澳大利亚	1951	2.2	64.6	1.8	54.8
	1978	2.5	80.1	2.0	64.8
比利时	1947	2.5	71.2	2.1	61.8
	1978	3.1	75.6	2.6	63.4
新西兰	1947	2.6	69.7	2.2	59.3
	1978	4.3	86.0	3.6	72.0
日 本	1950	13.2	36.5	10.8	36.4
	1980	40.0	69.0	35.8	61.7
瑞 士	1950	1.6	74.9	1.3	61.9
	1970	2.5	84.9	2.1	69.4
荷 兰	1947	2.6	69.7	2.2	59.3
	1971	3.8	83.6	3.2	69.1
丹 麦	1950	1.5	72.5	1.3	62.0
	1974	2.0	80.9	1.6	67.9

(续前表)

国别	年代	雇佣劳动者 人数(百万)	雇佣劳动者与经济 活动人口比例(%)	工人阶级 人数(百万)	工人阶级占 经济活动人口 比例(%)
挪 威	1950	1.0	71.1	0.8	60.9
	1970	1.4	83.1	1.1	68.4
芬 兰	1950	1.2	58.1	1.0	49.5
	1970	1.7	78.2	1.4	68.7
加拿大	1951	4.0	77.1	3.5	67.1
	1974	8.6	88.7	6.4	73.8
瑞 典	1950	2.4	76.8	2.1	68.3
	1974	3.3	91.9	2.6	75.6

从上表可以看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最多；战后经济发展速度最高的日本的工人阶级的增长率最高；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70或80年代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超过了2/3。由于人们对现代工人阶级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各国工人阶级的计算结果有所不同。但是，凡是基本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进行统计，都会得出工人阶级已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结论。以美国为例，据美国进步学者赖特的估计，工人阶级占人口的41—54%，另外还有25—35%的人口是它的边缘，因而工人阶级共占人口的60—70%。美国工人出身的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认为，工人阶级包括候补就业者阶层，占人口的60—70%。美国激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安德鲁·列文森的《工人阶级多数》一书也估计工人阶级占人口的60%。^①

^① 参见潘培新，《国外关于工人阶级问题的争论》，载《国际共运》，1985年第3期，第28页。

第二，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人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领域工人的比重上升。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商业、金融、保险、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卫生保健、国家机关等非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数激增，其原因大致有以下5条：

（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为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2）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规模扩大和变得更加复杂，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联系得更加紧密；（3）科学教育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因而得到大规模的迅速发展；（4）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因而消费需求日益增多，消费形式更加多样化；（5）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增长。据有关统计材料，我们把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非物质生产领域就业人数及其在全国就业人数中的比例的变化情况列表如下：①（见下页）

据有的材料说，1975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业雇佣劳动者的人数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的从业人数（11 500万比10 100万）。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将继续增长。据美国劳工局对1982年至1995年就业增长最快的十种职业预测，今后美国就业增长最快的将是秘书、出纳员、办事员、售货员、护士、服务员、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师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职业。

第三，体力劳动的工人减少，脑力劳动工人和半脑力半体力劳动的工人增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科技革命的直接

①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中国财政出版社1985年，第425页；《国际工人运动手册》，莫斯科1984年版，第269页；《日本社会的工人阶级构成》，全总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编印，第5页；《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基辅1980年版，第121、176、262页。

② 潘培新：《国外关于工人阶级问题的争论》，载《国际共运》1985年第3期，第22页。

		非物质生产领域就业 人数(万)	占全国就业人数的 比例(%)
美 国	1950年	1237	21
	1982年	6610	72
日 本	1955年	770	
	1980年	2639	48
英 国	1951年	717	
	1981年	1403	62
西 德	1950年	533	
	1980年	1243	49
法 国	1954年	475	
	1981年	1179	56

影响下，其劳动方式由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和半脑力半体力劳动。不但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人是这样，就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人也是这样。在一些传统工业部门，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了自动化，使许多体力劳动者变为脑力劳动者和半脑力半体力劳动者。如钢铁生产部门采用了电子计算机，实现了生产自动化，炉前工人因而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成为仪表仪器的监视者和控制者。电焊工，喷漆工由于采用了机器手而避免了对身体有危害的体力劳动，成为机器手的“司令官”。在电子、核能、化工、航空等新兴高技术工业部门，产生了许多新的主要靠脑力劳动的复杂工种，如自动装置工人、各种传递装置工人、电子计算机程序编制员、电子计算机操作员、实验技术员等。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雇佣劳动者在总数上，接近或略为超

过了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雇佣劳动者，下表①反映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雇佣脑力劳动者在雇佣劳动者总数中的比重（%）变化的情况：

年代	美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加拿大	瑞典
1960年	40	38	34	31	40	35
1978年	50	45	40	40	45	45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脑力劳动者必将继续增多，因而会对工人阶级内部构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工人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有了普遍的较大提高，非熟练工人减少，熟练和半熟练工人增多，出现了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样一种工人阶级的新阶层。在科技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工人的生产技能日益提高。生产的自动化使工人的技能从直接生产过程转向辅助性生产过程，转向对自动化的复杂装置进行控制、调整、保养和维修，这种技能要比过去手工操作机器的技能更加复杂，需要在整体上提高智力和科学文化水平，要不断接受技术的训练和再训练。因此，工人阶级内部的技术构成发生变化。在生产部门的工人中，非熟练工人的比重在减少，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比重在增加，当然，变化速度是缓慢的。以美国为例，生产部门中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1982年占生产工人的86.3%，其技术构成的变化见下表②：

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生产工人，不是140多年前

① 资料来源同前表。

② 资料来源：《国际工人运动手册》，莫斯科1980年版，第291—293页；《国际工人运动手册》，莫斯科1982年版，第237—238页。

	1965年	1978年	1980年	1982年
熟练工人占生产工人的比重 (%)	35.1	39.6	41.2	41.2
半熟练工人占生产工人的比重 (%)	50	45.3	44.8	45.1
非熟练工人占生产工人的比重 (%)	14	15.1	14	13.7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那个时候的技术水平低和没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而是知识化、技术化的工人，熟练工人的技术知识已经接近技术员的水平。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工人技术化外，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数量及其同生产工人的比例也在增长。在最先进的工业企业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人数与生产工人的人数大致相等。例如，1979年美国制造飞机和航天设备的洛克希德公司，68 000名雇员中有工人36 000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32 000名。1981—1983年，美国工业企业雇佣的专业技术人员增加20%。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许多过去的自由职业者、社会地位很高的学者专家都成为雇佣的专业技术人员。下表①反映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数量及其与生产工人的比例情况：

年代	国别	专业技术人员 (万)	管理人员 (万)	合计 (万)	生产工人 (万)	与生产工人 的比例
1980	美国	1 600.7	1 118.9	2 719.6	3 421.4	71:100
1980	日本	438	220	658	2 074	32:100
1980	西德	371.2	79.2	450.4	987.6	45:100
1986	法国	163	119	282	830	34:100

①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981年《生产年鉴》。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达的美国，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人数最多，占在产工人的比例也最高。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多数属于现代工人阶级范畴，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新层次。

第五，工人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当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遭受资本的剥削，与资本家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结果。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工人阶级在战后整个国民经济有较大发展的条件下，通过自己的斗争，相应改善了生活状况。实际工资，即扣除了上税和消费品物价增长因素后的实际收入，是工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衡量工人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尺。从1949年到1971年，美国工人实际工资提高41%，年增长1.6%；英国提高92%，年增长3%；法国提高131%，年增长3.9%；联邦德国提高264%，年增长6.1%；日本提高316%，年增长6.7%。^①1971年到80年代初，以上各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率降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总的实际工资水平仍大大高于战后初期。从80年代中期起，这些国家的经济开始摆脱“滞胀”，进入低速增长，工人的工资可望得到新的提高。

工人收入的另一来源就是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工人享有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实质上是资本家为获得劳动力商品不得不支付的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战后，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和工人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一套由国家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包括养老金制度，残疾津贴和医疗补贴、遗属和低收入家庭补助以及失业救济金、免费教育等），此外还有私营企业的福利措施作

① 参见仇启华等著：《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与实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页。

为补充。美国政府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总额1950年为235亿美元，占政府开支的37.4%，占国民生产总值8.9%，1976年则为3300亿美元，占政府支出60%，占国民生产总值20%。^①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政府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60年的4.7%、14.9%、10.3%和12%增长到1971年的5.7%、18.4%、13.7%和20.6%。瑞典在世界上以“福利国家”著称，1978年全部社会保险和福利费用达870亿克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②

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反映在消费构成和消费形式的变化上。食品开支在整个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家庭耐用品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支出的比重增加。在美国工人家庭的支出中，食品开支1955年为总开支的46.9%，1978年则为27%。在联邦德国，1950年为46%，1978年为22%。在法国，1947年为44%，1978年为25.9%。在意大利，1954年为57.8%，1978年为36.9%。在瑞士，1970年为22%，1977年为16.8%。小汽车、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高级耐用消费品进入广大工人家庭。1977年美国85%、联邦德国78%、英国75%、日本54.6%的工人家庭拥有小汽车。1980年法国70%的工人家庭有小汽车。在日本，1979年97.8%的家庭有彩色电视机，99%的家庭有洗衣机，99.1%的家庭有电冰箱。工人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如在联邦德国，1975年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一套面积为75平方米的舒适住房；在法国，1979年平均2.5人一套住房，二口人的家庭住房低于25平方米可得到政府的住房补贴。工人劳动时间缩短，“付薪假期”和“法定假期”增加。70年代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据欧洲共同体的1975年资料，全年“付薪假期”联

① 《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

② 《日本国际经济要览》，1971，1976年。

邦德国为5—6.5周，法国和意大利为4周，英国为3—4周；全年“法定假日”联邦德国10天，法国8—10天，意大利17—18天，英国8天。收入和假日的增多带来了旅游消费的形式。法国1970年对2300万曾出国旅游的人进行调查，其中39%是一般职员和工业工人，11%是农业工人。^①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数量、素质、内部结构和生活条件的新变化，引起了人们对现代工人阶级的概念、构成、地位和作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新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的新探讨。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宣传家歪曲这些新变化的实质，竭力宣扬工人阶级“非无产阶级化”、“中等阶级化”和“与资本主义一体化”等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谬论。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问题上，肩负着探索和批判的双重任务。

第二节 当代工人阶级的概念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家与工人两大阶级对抗关系的发展，是工人阶级数量上和素质上同时成长起来的历史过程，也是一切非无产阶级特别是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等阶层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人口70—90%变成雇佣劳动者，这并没有简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分析，因为在雇佣劳动者中间有着各种社会阶级集团，出现了列宁所说的那种“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②和工人阶级内部的多层次化现象。

① 上述未注明出处的资料均见林振淦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状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40页。

这种阶级之间的过渡阶段和多层次现象模糊了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工人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成分复杂化现象引起了人们对现代工人阶级概念的争论。工人阶级的概念是确定工人阶级范围和工人类型的理论基础，是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科学化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概念仍然是揭示工人阶级本质特征的科学概念，是研究和确定现代工人阶级的范围的根本准则。19世纪40年代，当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刚登上历史舞台不久的时候，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稿本即《共产党主义原理》中，一开头就回答了“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问题，第一次给工人阶级下了定义：“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要看对劳动的需求而定，也就是要看生意的好坏，要看无法制止的竞争的波动而定。一句话，无产阶级或者无产者阶级就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①过了20多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经济学的意义指出了工人阶级的实质：“‘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②。又过了20年，即马克思逝世以后第五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注解上给工人阶级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③以上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中关于工人阶级的基本定义的论述。有的西方学者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给工人阶级下过定义，没有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于工人阶级的明确概念。^①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中，始终强调的是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和出卖劳动力这两个决定性的标准，完全不涉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物质生产劳动和非物质生产劳动、意识形态、收入高低之类的问题。列宁没有直接给工人阶级下过定义，但是他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关于阶级的著名定义是适合于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提供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最基本的、最概括的定义，另一方面又根据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新动向，研究和预测了工人阶级范围扩大的趋势，提出了“商业无产阶级”、“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和“总体工人”等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历史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没有来得及对这些新概念作深入全面的阐述。然而这些新概念正好是工人阶级历史发展的反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进一步地科学地阐述和发挥，它们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基本定义一起组成现代工人阶级的科学概念。

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内部，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划分上，目前没有完全一致的认识。由于各国的情况（历史和现

^① 英国利兹大学政治系教授、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拉尔夫·密利本德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一书中写道：“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尔后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们，当他们说到‘工人阶级’时，指的是什么？问题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不断使用这些术语，或许也正是因为经常使用这些术语，因此，它们的真正含意并不是它们使用时想要表明或所设想的那样清楚。要想从经典著作中找出这个问题的现成的明显的答案决不是容易的事。事实上，很难找出马克思使用“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等名词的的确切含义，而后来的研究工作也没有多大进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页。）

实、经济和政治等)不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差异,也由于阶级界限客观上存在着某些模糊性,因此这种认识不一致是极为自然的,无须强求统一。比如说,关于具体某一部分受雇的工程师和技术员的阶级属性,有的共产党把他们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有的共产党认为他们还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非常接近于工人阶级。这种认识程度上的分歧不是原则分歧。有可能它们各自的认识符合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但是,对于涉及工人阶级范畴的重大问题,如关于雇佣脑力劳动者的阶级特征问题、关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整个雇佣劳动者队伍的阶级属性问题等,是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的。后一个问题本书前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阶级那部分已作了阐明,这里不再赘述,下面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前一个问题即雇佣脑力劳动者的阶级特征问题所作的解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雇佣脑力劳动者是为数不多的工程师和行政职员。他们虽然也参加生产,但是处于特殊地位,对工人起着监工的作用,一到阶级搏斗时,通常站在反对工人的立场。因此,马克思从政治的角度把他们看作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生产过程和经济的角度指出了一部分雇佣脑力劳动者同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认为他们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马克思把工程师、机械师和细木工看作是一个集团,把他们确定为“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①马克思写道:在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这些工作者事实上同工厂无产阶级结合为统一的“总体工人”,结合为统一的生产集体,“生产这些产品的活机器”。同时,他们同企业主签订雇佣合同,即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接近工资形式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1页。

收入，“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①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的发展不只是归结于它们数量和质量特征的变化，而且工人阶级的概念本身也在发展，它获得新的更丰富的内容。马克思曾经对这个过程的经济基础作了说明。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是个别工人，而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联合劳动力渐渐地成为总的劳动过程的执行者。而且，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并建立总的生产机器的各种劳动力，不是同样地参加直接生产产品。一些人更多地从事手工劳动，另一部分人是首脑（一部分是作为管理人员的工程师、工艺师等，而另一部分是监工），第三部分是体力劳动工人，直接参加生产。因此，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的职能被列入劳动生产率的概念，而它们的体现者被列入直接受资本家剥削的生产工人的概念。整个工人的联合活动体现在总产品中，这种总产品同时是商品总量，至于是否从中找出个别工人的作用，这是无关紧要的。个别工人只是离手工劳动远近不同的工人集体中间的一个环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随着劳动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谓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②对于马克思的“总体工人”概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总体工人”就是工人阶级，有的人则不同意将“总体工人”与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总体工人”（Gesamtarbeiter）这个术语有两种不同的用法。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时说过“总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总体工人即工人阶级”，这里的“总体工人”概念的确等同于工人阶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6页。

概念。马克思在分析参加社会产品的生产的工作人员的成分时，“总体工人”则不是指阶级成分，因为马克思本人就谈过真正的工人阶级有别于工程师和经理，后者对资本家来说是生产劳动者，但不是真正的工人。^①另外，马克思使用的“总体工人”一词的德文原义既有“总体工人”的意思又有“总体工作者”、“总体劳动者”的意思。不管人们对“总体工人”概念作何种解释，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马克思相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扩大，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必然扩大。马克思把雇佣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工人一道纳入“总体工人”或“生产工人”的范畴，这毕竟为进一步将一部分雇佣脑力劳动者列入现代工人阶级的范畴提供了理论基础。恩格斯在雇佣脑力劳动者的阶级特征问题上持和马克思同样观点，不过他不局限于生产劳动的角度，有时还表达得更加明确一些。他在1881年8月的《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中提出，股份公司的职员“实际上地位相当于位置较高和待遇较好的工人”^②。1893年12月19日，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贺信中提出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概念，信中写道：“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③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宁对雇佣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地位也有重要的论述。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的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统计机关，从事簿计、监督、登记、统计和计算等实际工作的职员“大多数是处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地位”^④。1920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

④ 《列宁全集》第26卷，第88页。

年春天，列宁预言说：“在德国不久也会有，可以称之为工程师无产阶级。”^①

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脑力劳动者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他们的人数和在经济活动人口中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其次，他们本身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分化。极少数表面上受雇实际上手中握有相当数量股票、领取高薪、充当资本家代理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属于资产阶级。少部分雇佣中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属于小资产阶级。大部分雇佣中下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因为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智力）维持生活、受资本家剥削、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服从的地位，其收入与熟练工人的收入相差不多，而属于工人阶级。他们在劳动条件，生活水平和思想意识方面同一般的工人有一定的差别，是工人阶级中经济地位最高的一个层次。但这种差别不是本质的，它并不妨碍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他们之中的人越来越多地同工人阶级站在一边。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许多次罢工运动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成分的复杂化，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工人阶级的最基本和极概括的定义向前推进，使之具体化和更切合现代时代。5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他们提出的工人阶级的定义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所谓广义的定义，如苏联学者1956年提出：“无产阶级是没有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所有主，

① 转引自高放：《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第267页；原文见《列宁全集》第37卷，1970年俄文版，第213页。

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受到剥削的人。”^①美国学者布雷弗曼1974年说：“工人阶级乃是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能把这种劳动力出卖给资本以换取自身生存的阶级。”^②这种广义的工人阶级定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它有利于工人阶级范围的扩大，但是不够确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普遍雇佣化的条件下，这个定义不能把雇佣劳动者同工人阶级区分开来，不能纠正那种把工人阶级同一切雇佣劳动者等同的错误倾向，因此不是一个完备的定义。第二种是所谓狭义的定义，如苏联学者谢苗诺夫1969年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阶级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为资本家直接生产剩余价值，资本的现代雇佣工人的阶级。”^③法共中央1976年出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书指出：“不管情况如何复杂，不管劳动的性质如何（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管在什么部门从事劳动（国营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是否属于工人阶级，基本上取决于三个事实：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生产商品，不参与收集剩余价值。”^④这种狭义的定义强调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和物质生产，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工人阶级定义有较大出入的，它实际上把工人阶级限制在产业工人和体力劳动工人之内，而把大量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和无产阶级化了的雇佣脑力劳动者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第三种定义是对广义的定义的补充和对狭义的定义的修正，同时强调工人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

① 瓦·瓦·柳比莫娃：《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莫斯科1956年版，第4页。

②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页。

③ 谢苗诺夫：《资本主义和阶级》，莫斯科1969年版，第84页。

④ 法共中央经济部等编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2页。

中的作用是纯执行者的职能。苏联学者梅里尼科夫1974年提出：

“无产阶级是没有生产资料，从而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受资本主义剥削，并在生产、流通、办公室劳动中以及服务领域内执行纯执行者职能的雇佣劳动者阶级。”^①这个定义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定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范围扩大的实际，我认为是目前所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的定义中最合适的定义。

第三节 工人阶级的“非无产阶级化” 和“新工人阶级”

在现代工人阶级的概念和发展趋向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宣传工人阶级“非无产阶级化”或“中间阶级化”理论，硬说工人阶级在不断缩小并在不远的将来会完全从社会舞台上消失。另一方面，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提出“新工人阶级”理论，过于扩大工人阶级的范围，把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知识分子同传统工人阶级对立起来，断言“旧的”工人阶级地位正被马克思主义者未预见和未曾等待的“新工人阶级”所代替。

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中，工人阶级的“非无产阶级化”、“中间阶级化”和“新中间阶级”等概念广为传播。“非无产阶级化”这个概念是以错误的无产阶级的定义为基础的。这就是：无产阶级是由工业工人或在经济部门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所组成的阶级。根据这个定义观察现代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理论家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在不断被冲刷，其理由是：

^① 转引自《国际共运》，1985年第3期，第30页。

第一，对“兰领工人”的需要量减少；第二，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工人上升到无产阶级地位以上，接近或成为“中间阶级”。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一书中，就把无产阶级和技术较低的“兰领工人”等同起来，说“工业体系内部兰领无产阶级的比重在减少，其影响在下降。”^①“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创造者，美国社会学家贝尔也说，“无产阶级在先进的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中，甚至在其广义的定义上作为兰领集团是缩小着的少数。”^②按照贝尔的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无产阶级将丧失自己的社会意义，因为“兰领工人”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将微不足道，以致这个术语将失去社会学的意义。^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总是把工人阶级限制在所谓“兰领工人”范围，以为这样就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人数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增加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常常把无产阶级等同于雇佣体力劳动者这样一种虚假的思想硬加给马克思。事实上，马克思从来没有用狭隘的框框限制无产阶级。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关于现代工人阶级的概念这一部分已作了论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于兰领工人减少的论断，夸大了事实。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确实在减少，但是其减少的速度绝不是贝尔等人所想象的那样快。例如，在美国，本世纪前50年期间，体力劳动工人的数量在绝对和相对地增长。只是从50年代起，他们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才开始有某些下降。1950年，他们占经济活动人口的39%，1960年占36%，1972年占35%。要知道，他们在1900年也只占36%，也就是说，从1900年

①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莫斯科1969年版，第283页。

②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48页。

③ 参见贝尔：《后工业社会中的劳工》，载《异议》杂志，1973年冬季号，第165页。

到1972年只下降了1%。在相对数字减少的后面隐藏着体力劳动工人绝对数字的增长。如果说1900年他们共计1 040万人，那末1972年为2 900万人，1985年为3 300万人。这些数字说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力劳动工人的减少是一个长期缓慢的和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同时存在着对立的因素。一方面，科技进步造成的生产自动化减少了手和脚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它又对体力劳动的其它器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要求眼睛紧盯着仪表，要求反应高度敏捷，要求坚强的体力以便持续工作很长的时间（如实验室的工作）。一方面，资本雄厚的资本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取得高额利润，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从而减少对体力劳动工人的需要，增加对脑力劳动工人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中小资本家受条件限制仍然维持落后的技术和设备，需要雇用大量的体力劳动工人。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体力劳动工人不可能很快消失，他们将长期作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下去。

工人阶级“非无产阶级化”的第二个理由是越来越多的工人上升到“中间阶级”地位，成为“新中间阶级”。“新中间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学那里是一个任意确立的纯粹形式上的范畴，它主要按照收入水平把各种各样的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混合到一起。“新中间阶级”理论企图证明马克思的“两极分化的论断的失败”，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从而否定社会主义变革的必要性。本书下面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中等阶层时，将设专题批判“新中间阶级”理论，这里仅讨论工人阶级是否真的上升到所谓“中间阶级”的问题。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一般从三个方面论证工人阶级“中间阶级化”。

第一，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起了根本变化。他们描绘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真真假假的消费图景：在普遍的福利增长过程中，经济不平等的幅度减少了，进入中等收入集团的工人增加了；拥

有耐用消费品以前是少数人的特权，现在成了工人消费的特点。法国社会学家R.阿隆认为工人在工业化和私有制条件下可以有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因而扩大了中间阶级，他写道：“所有观察者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未来的预言遭到了失败，其原因很简单：工业化本身，特别是在私有制条件下，给了数量增多的人们某些值得保卫的东西；它没有加大贫困，而是扩大一系列中间阶级，保证所有增长着的居民有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①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说，无产阶级是一个没有财产的穷人的阶级，在工业社会条件下，工人有可能获得各种高级耐用消费品，拥有这样的物质财富的人们是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的，所以，“无产阶级”的定义对他们已不适合了。^②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用收入和消费水平来确定阶级，这种划分阶级的方法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格格不入的，本书第一章对此已作过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最近几十年生活和消费水平确实有显著的提高，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其阶级地位。他们仍然是不掌握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遭受资本家的剥削的阶级。他们虽然在衣食住行和文娱娱乐方面比起上一个世纪的工人要好得多，但是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受雇于资本家，不得不服从资本家的支配，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没有稳定的保障。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一方面把阶级分化归结为收入和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把贫穷变成某种抽象的超时间和超空间的概念。实际上，贫穷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不可能用一种一劳永逸的标准，尤其是不能用量化的指标来估价它。考察贫穷这个概念时，必须考察一定国家和一定历史时

① 阿隆：《工业社会，意识形态，哲学》，载《证据》杂志，1965年2月第168期，第17页。

② 参见兹威格：《丰裕社会的工人》，伦敦1961年版，第76页。

期的具体条件，要同有产阶级的阔绰和财富相比，要同对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的满足程度相比。如果用上个世纪的标准来衡量现代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就不能得到关于现代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确定而客观的概念，就会得出现代工人阶级已经脱离了贫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阐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需求提高的过程。马克思写道：“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①在现代条件下，工人阶级需求的社会性质比马克思那时表现得要充分得多。当时，广大工人的起码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需求远远超过了维持本阶级生存的范围，而是以全社会的需求为范围。现代工人阶级需求的提高是同劳动力价值的提高紧密相关的。在科技革命的条件下，资本家为了更加集约地利用工人的脑力和体力，不得不增加工人阶级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现代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价格不仅取决于衣食住的需要，而且取决于工人参加现代化生产过程所必需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取决于在保健、生活服务和文化服务、安排闲暇时间方面的需要。因此，工人家庭消费结构中的变化（耐用消费品、小汽车、舒适的家庭用品等比重的增加）只不过反映劳动力价格的提高罢了。尽管客观上存在着工人阶级需求增长的必要性，但是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满足工人阶级的需求的。统计材料表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家庭是难以达到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家庭饮食费用的比重高于中等居民的家庭，而与居民的富裕阶层相比，工人家庭饮食费用的比重则高得更多。这个事实证明，工人不可能满足超出社会起码需求的那种需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92页。

从绝对数字指标上看，例如，在美国，富裕阶层在食品方面的费用是中等家庭的2—3倍，在服装方面是3倍，在家庭设备方面是2.5倍，在住房和汽车方面是2—2.5倍，在其他商品方面是2—5.5倍。^①相当一大部分工人家庭的收入甚至不及官方规定的最低生活费用。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从生活和消费水平来论证工人阶级“中间阶级化”，在理论和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企图从工人阶级在现代化生产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来论证工人阶级同“中间阶级”的融合。他们认为，由于工人的知识和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也由于熟练工人的职能同技术员的职能相接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等级壁垒在消除，因此和科技革命联系最紧密的熟练工人过渡到了“中间阶级”的范畴。他们还提出这样臆想的论点：由于管理工作的技术化，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行政权力职能只具有技术性，而失去了人格化的性质。因此，在多数发达类型的企业里工人阶级的异化“在消灭”，工人的社会个性接近于新中间阶级的社会个性。^②应该承认，在现代科技进步的条件下，在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中，熟练工人确实同技术员和工程师一起研究和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但是，这与其说熟练工人提高到技术员和工程师的地位，不如说技术员和工程师降到了熟练工人的地位。以前，技术员和工程师人数很少，他们的职能不单纯是技术方面的，而且还执行一定的行政权力，参与企业的决策，对工人起监督作用。现在，技术员和工程师大量增多，发生了“贬值”。企业行政管理的权力集中在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手里，一般的技术员和工程师失去了以往的权力和某些特权，仅仅执行纯技术职能。他们的地

① 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82期。

② 参观R.布劳内：《异化和自由：工厂工人和他的工业》，芝加哥—伦敦1964年版，第181页。

位和熟练工人一样，要服从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支配。因此，不是工人“中间阶级化”，而是过去属于“中间阶级”的一部分职员“无产阶级化”。

第三，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往往用工人向往“中间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接受“中间阶级”的价值观念来证明工人阶级“中间阶级化”。他们说，农民出身的工人不像过去那样想简单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而是把自己目前状况看作是向上升迁的过渡，至少是向往小资产阶级的地位。结果，人数众多的来自农村的新工人冲淡了工业工人的成分，同时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再加上新的工人家庭居住分散，工人同“中间阶级”的社会集团接触扩大，在生活方式、心理和价值观念各方面受到“中间阶级”的影响，被中间阶级所同化。的确，在工人阶级中是有一部分人向往“中间阶级”，特别是那些原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他们被迫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当然想恢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他们之中有的人原来就较富裕，利用当工人期间辛辛苦苦的积蓄，开办小店铺和小企业，成了小业主。这样的人毕竟不多，大多数人降落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后，就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了希望。一部分工人受“中间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影响，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阶级地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严峻的现实打破了上升到“中间阶级”的幻想后，当他们在工人阶级队伍里生活较长一个时期以后，他们就会逐渐产生工人阶级的意识，成为工人阶级的稳定成员。

对于资产阶级理论家散布的“非无产阶级化”理论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的态度。对于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新工人阶级”理论，则应该加以分析，排除糟粕，吸取精华。在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60年代在欧美国家出现了以塞奇·马勒（?—1973）为代表的“新工人阶级”理论。马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参加过法国共产党，以后改而参加法国统一社会

党并任中央委员。他于1963年发表了代表作《新工人阶级》，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时期的考察后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局结构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从而工人阶级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存在许许多多小企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是自己的主人，工人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要求重新占有生产手段。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时期是资本集中和工业化时期，在这个时期，工人沦为机器的奴隶，福特和泰罗倡导的生产线创造了“纯粹的工人阶级”，工人及其家庭意识到自己是“无产者”，为了消除剥削，他们寄希望于政治和选举斗争。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资本更大地集中和在生产中引进自动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工人阶级的基本要求已经多半得到了满足，他们提出了消费领域以外的要求。在这个时期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以前在生产线上劳动的工人现在变成了生产过程的监督者，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大大降低，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发明者和控制者。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在工艺先进的生产部门工作的能够开动和修理复杂的自动化机器的高度熟练的工人；一部分是在研究和发展单位工作的技术员和工程师，这两部分人构成“新工人阶级”。由于“新工人阶级在其中活动和工作的客观条件，它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的先锋队。”^①他们认识到自己在生产和企业中的地位，要求根本改变社会关系，要求广泛参加对生产的管理，建立工人自治。这时工人的意识形态是“企业工团主义”，斗争的形式不再是总罢工，而是在企业中把权力和平地转入到工人自己的手中。新工人阶级尽管收入高，但这一点并没有使他们成为新的“工人贵族”，而是在事实上为其他工人提供了一个榜样。正如马勒写道：“事实上，‘新工人阶级’是与最

^① 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4年第6期。

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家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水平完全是由于这些企业具有高度的生产率。然而这种情况会随着经济形势而改变，把这些现代工业技术人员等同于‘工人贵族’，这是一种肤浅的分析。的确，他们和工人群众之间在生活水平上存在明显差距，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对于工人阶级其余部分的行为非但没有产生消极后果，相反，这种‘先锋队’的存在具有积极的影响。”^①法国研究工人运动的其他学者还提出了许多类似的观点。伯勒维叶在1963年发表的《一个新工人阶级》中提出，由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是在薪水上，而是在对企业的控制上。A·图雷在1964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中认为，工人运动的总的问题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本质问题，应该更多地强调政治和文化活动，而不是经济活动。A·高兹在1964年发表的《劳工战略》中指出，需要有高度复杂的技术人员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把工人阶级的成份改变得有利于受过高等教育的脑力劳动者，学生正成为新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自动化降低了非熟练的、兰领工人的地位。在法国的新工人阶级理论影响下，从1966年春到1967年底，在美国的新左翼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工人阶级理论，其代表人物是戴维森。这种理论认为，学生是实现历史变革的力量，大学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中心”，不仅是学者聚集的地方，而是同联邦政府和大公司紧密联系的、除教学外还从事其他各种活动的场所。大学像工厂那样已经变成社会物质基础的一部分，它们按工厂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知识变成了一个“产业”，大学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垄断资本的附庸。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客观上成了扩大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新工人阶级理论的出现，无论

^① 转引自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63页。

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影响的。就理论上来说，这些理论家所鼓吹的新工人阶级理论符合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理论，正好满足了这种思潮对于自己的阶级基础的重大需要。就实践上来说，由于新工人阶级理论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加以具体化，使工人自治的概念成为开放的，同时又强调学生在造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反中的作用，这就促进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发生和发展。

“新工人阶级”理论是“左”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思潮的反映。提出和拥护这种理论的人，大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压迫感到厌恶和压抑，对未来充满美好而朦胧的憧憬，主张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存的一切。他们在阐述“新工人阶级”理论的过程中确实列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新现象，提供了许多情况，提出了许多问题，这对研究工人阶级结构和工人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新工人阶级理论的积极因素是把科研和生产中的技术知识分子看作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揭示了他们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的革命作用。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雇佣脑力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趋势作过科学的论述和预测（如前所述），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贬低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倾向。即使是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也仅仅只把他们看作是工人阶级的团结对象而不是“自己人”。只承认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知识分子则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来判别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新工人阶级”理论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从经济地位特别是从生产劳动组织中的地位论证了技术知识分子和熟练工人的一致性，论证了技术知识分子和熟练工人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的共同性，从而确定了技术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地位。“新工人阶级”理论对资本主义条件

下技术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的肯定，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事业的，至少在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大肆宣传什么工人阶级“消失”了的情况下起到了扩大工人阶级视野的作用，让人们注意到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崛起。有的外国学者全盘否定“新工人阶级”理论，认为它实际上是“新中间阶级”论的变种，不过是把“新中间阶级论”者所说的那些阶层暗换成工人阶级，称他们是“新工人阶级”，以便更好地为资本主义服务。^①我们认为，这种指责是不符合实际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来看，“新工人阶级”理论的确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脱离工人阶级的现实。它的主要错误有两点。第一，“新工人阶级”理论受资产阶级的技术决定论的影响，夸大了技术知识分子和高度熟练工人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按照现代劳动等级制度把他们同其他广大工人隔离和对立起来，把他们看作是高于其他工人的特殊等级。“新工人阶级”理论主张变革科技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结构，也就是要恢复劳动等级制度，把因现代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而产生的专门职能固定化，并且认为只有承认这种职能的“新工人阶级”才有改革社会的能力。在科技革命条件下，那种分裂工人阶级的劳动等级制度是在加强还是在瓦解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自动工厂的分析，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分工的性质和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工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了机器体系所带来的工人分工的纯技术性质和劳动的平等或均等趋势，并且阐明，这种趋势与按照劳动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工人等级制根本相反。马克思对工人内部的工人进行了分类，并且把工人的主要种类（操作机器的工人及其助手）与少数较高级的工人

^① 转引自潘培新：《国外关于工人阶级问题的争论》，载《国际共运》，1985年第3期。

种类（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区别开来。但是，工厂内部工人的这种差别是由于机器体系所带来的技术分工关系而产生的，并不意味着过去那种工场手工业式的、即按照每个生产工人的技艺熟练程度划分工人阶层的劳动等级制度。马克思说，自动化工厂里工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①。机器体系瓦解了旧的劳动等级制度，降低了工人的工作种类和技能这些个别差异的意义，并使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基本上处于平等和均等状态。这就是说，在工厂内部，进而在社会方面，工人很容易结合为阶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社会化，正是各种类型的工人结合为阶级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过程中工人的结构出现了与19世纪和本世纪初显著不同的特征。首先，生产部门的工人在技术结构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比例增加，非熟练工人的比例减少。这说明工人之间的技术差异在缩小。其次，技术人员的地位降低了，他们除了受资本的雇佣从事工作以外，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越来越不独立。生产的科学性越强，技术人员相互之间的关系、技术人员与现场技术工人的关系以及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合作、交流与联系就越密切。现代科技革命将会更加促进各个工人阶层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接近和联合。因此，“新工人阶级”理论用现代劳动等级制度来划分“新工人阶级”是与劳动的平等趋势相冲突的，这只能起到分裂工人阶级的作用。第二，新工人阶级理论对技术知识分子和高度熟练工人的社会历史作用估计过高。马勒认为，“新工人阶级”处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复杂的机械装置的中心，它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快地认识到这个制度的固有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正处在以科学技术知识为决定性“生产力”的阶段。因此，“新工人阶级”取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0页。

“旧”工人阶级而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如果说，在狭隘专业化的传送带旁劳动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没有真正的阶级意识（似乎他们仅仅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那么，在“新资本主义时代”，在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部门工作的“新工人阶级”，则具有物质财富生产者的真正阶级意识。所以，“新工人阶级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的先锋队”^①。这种认为“新工人阶级”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锋队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在工人阶级队伍日益扩大和其内部成分复杂化的情况下，要以某一种特殊的成分来充当领导核心和先锋队，是不能被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接受的。工人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占人口大多数，它是由各种类型的集团构成。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类集团有各自的特点和特殊的利益，因而也有矛盾。各类集团都受本集团利益和思想意识的限制，不可能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领导集团。领导工人阶级的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它是来自工人阶级各类集团的先进分子所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了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无产阶级的原因，指出：“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②即使由技术知识分子和高度熟练工人组成的“新工人阶级”有这样或那样的优点，但远不能达到工人阶级先进政党应具备的条件。其次，“新工人阶级”虽然有要求变革

① 马勒：《新工人阶级》，巴黎1969年版，第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资本主义生产管理的官僚体制和克服劳动异化的革命性，但是又有一定的保守性。他们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比较深，再加上资产阶级的收买和人为地扩大他们同普通工人的差别，因此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是“工人贵族”，起着破坏工人运动的作用。从长远的观点看，“新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会越来越增强，其保守性会越来越减弱。但是，这个转变过程是长期的和缓慢的。在目前情况下，工人阶级先进政党既要大胆地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又要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弱点和增强工人阶级的觉悟，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第四节 当代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

现代工人阶级概念问题上的一系列争论，客观上是由于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由于社会劳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的不断重新改组和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扩大，工人的数量和种类也不断扩大，因而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出现多种类和多层次的复杂化的趋向。关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内部构成的具体情况，本书第三篇将分别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这里仅就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理论问题作点探讨。

工人阶级是一个能够团结的整体，因其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和带对抗性质的差异。这一点是首先必须明确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分化的政策，故意制造和夸大工人阶级内部各种集团之间的差别，搅乱工人阶级的阵线，否认工人阶级的统一性。例如，著名的联邦德国社会学家R.达兰多夫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中提出一种观点：不再有统一的同质

的工人阶级了。据他说，工人阶级瓦解成单个的职业熟练集团即有着各种社会利益的阶层。他把现代工业工人分为三个阶层：

（1）“增长着的高度熟练的工人阶层，他们越来越多地接近工程师和职员”；（2）“相对稳定的半熟练的工人阶层，他们有专门的工作经验，出身复杂”；（3）“减少着的完全非熟练的工人阶层，他们大都是新来到工业部门（新参加工作的工人、过去的农业工人、移民）和只有部分劳动能力的人”。达兰多夫说，这三个阶层和区别不仅按照其技术熟练水平，而且按照基本的社会阶级标志。这些阶层和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相对立。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是“贫穷的工业奴隶”，现在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工人这个术语本身失去意义”，成了“抽象的概念”，“在工人这个术语后面隐藏着许多具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常常是对立利益的熟练集团。”^①达兰多夫把工业工人中的技术差别同阶级差别混为一谈，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有的学者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和非物质生产劳动的差别，把大量在非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的工人排除在工人阶级队伍之外，或者轻视他们的社会历史作用，这也是不正确的。

当然，在肯定工人阶级的统一性的前提下，我们也应该承认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多样性这一客观事实。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可分为三种：部门结构（职业结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

工人阶级的部门结构（职业结构）是指工人阶级在社会各劳动部门的分布，这是一种横向结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一般分布在九个劳动部门中：（1）农林牧渔；（2）采掘业；（3）制造业；（4）电、煤气、自来水；（5）建筑业；（6）商业、旅馆；（7）运输、邮电、仓库；（8）财政、金融、保险、不动产；（9）社团和服务（含国家机关、文教卫生）。

^① 达兰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第50、51页。

农、林、牧、渔部门的工人称为农业工人。农业工人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人口比重都在急剧缩小，一般占工人阶级总数10%以下。这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的工业化和与之相关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引起的。随着在国民经济各部门普遍采用机器生产和工厂的劳动组织体制，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农业劳动转变为工业劳动的不同形态，这就导致农业工人逐渐与工业工人一体化。不过，目前条件下农业工人还是有别于工业工人。其特点是：人数少，分布极为零散，技术熟练水平、文化水平、工资收入和阶级意识都普遍低于工业工人。以英国农业工人为例，1980年，它的平均工资每小时为3.66美元，而同期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每小时为7.27美元。采掘业、制造业、电、煤气、自来水、建筑业、运输、邮电、仓库等部门的工人，统称工业工人。工业工人的绝对数量仍在增长，但它在整个工人阶级中的比例相对下降，目前大约占50—60%。工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基本部分，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传统优点：集中、组织程度高、阶级意识强、富有革命性和斗争性等。现代的工业工人除了有上述优点外，还具有文化教育水平，技术熟练水平和工资收入比其他工人要高这样的特点。例如，1980年，美国工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每小时为：煤矿10.86美元，石油开采9.70美元，制造业7.27美元，建筑业为9.94美元，铁路运输9.92美元，而同期商业工人和服务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每小时分别为5.93美元和5.85美元。商业、旅馆、财政、金融、保险、不动产、社团和服务业的工人称作商业办事工人。他们的人数比工业工人要少一点，一般占工人阶级总数40—50%，但呈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的国家如美国，已超过工业工人的人数。他们的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工资收入都次于工业工人而高于农业工人。商业办事工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属于职员范畴。因此，如果不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职员同属于工人阶级的职

员区别开，那就会大大缩小或不适当扩大商业办事工人的范围。

在职工的阶级划分上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它是工人阶级结构中的难题之一。职工形式上是一个法律范畴。资产阶级统计学和社会学通常把所有从事非体力劳动和得到以周薪或月薪为形式的固定工资的雇佣人员列入职工范畴。资产阶级理论家总是把熟练程度、劳动内容、职位、经济状况和其它指标方面极不相同的所有各类职工纳入一个人为制造的范畴“白领人员”，用以证明中间阶级的扩大和工人阶级的“消失”、“衰落”。实际上职工并不是一个阶级范畴。只要细心地研究一下职工的综合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职工的基本群众同高级职工和部分中级职工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差别。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职工人数很少，在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劳动性质和内容、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和较高的工资收入方面都不同于工人，居于较优越的地位。但在他们的特点表面上一致的后面仍然隐藏着物质状况、社会地位、权力等级的差别，分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三个阶级。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工人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商业、服务业、保健卫生、科技、文化、教育领域的扩大，以及资本主义公司、国家机关和各种行政管理机构的扩大，引起了职工的激增。职工的大量增加导致职工的基本群众的传统的物质和社会地位的急骤下降，导致职工之间的社会差别增大，加速了职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职工的无产阶级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职工的队伍中，低级职工的数量大大增加，成为职工的基本群众。低级职工在商业中主要有商店售货员、商品推销员，广告推销员、保险推销员、食堂服务员、小商业办事员。低级职工在服务业中主要有招待员、清扫工、电梯司机、搬运工、看门人、消防队员和家庭仆役。低级职工在事务机构中主要有打字员、速记员、秘书、办公室机器操作员、出纳员、统计员、簿记员、电话员、图书管理员、邮局营业

员和投递员等。第二，在经济状况方面，普通职员不再同工业工人有本质的差别。大多数低级职员的薪金比熟练工人的工资低。职员过去的那种就业保障不存在了。在经济衰退和办公室工作自动化的冲击下，普通职员的失业率增加了，虽然暂时比工业工人的失业率低一点。普通职员在福利待遇如退休金、疾病补助、付酬休假等方面同工业工人相接近。第三，在劳动性质、劳动内容和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方面，普通职员和工业工人越来越接近。普通职员大都从事半脑力半体力的劳动。由于管理劳动和办公室劳动迅速“工业化”，办公室职员的劳动大都是为各种形式的机器服务，即为机械化自动化管理系统收集和传递信息。普通职员失去了同上层行政管理机关的关系，处于服从的地位。当然，普通职员同工业工人在社会地位上还存在一些差别。如对工人要求纪律严格（必须准时上下班），对职员则要求松一点（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请假放下手头的工作处理私事）。还有某些纯粹象征性的差别，如为职员单独设置入口、汽车停放点、食堂等。因此，虽然普通职员和工业工人还有一些差别，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综合考察，普通职员已经无产阶级化，属于工人阶级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不肯承认普通职员的无产阶级化。例如，法国社会学家M. 克罗泽尔一方面承认，“职员的地位在工资、缺少自治、服从等方面很多却与工人相同”，但是作出了出乎意料的结论：“完全相反，这些职员没有无产阶级化。”“职员和工人的接近与其说是职员的无产阶级化，不如说是工人的资产阶级化。”^①他用什么来论证自己的结论呢？第一，“职员有良好的机会使自己或自己的儿女上升到较高的地位”；第二，“职员由于同领导人员有较多的接触，由于

^① 克罗泽尔：《办公室工人的世界》，芝加哥1971年版，第12、19、37页。

自己的文化优势，可以保持一定的社会特权。”^①这两个论据显然是无力的。在地位升降的阶梯上，职员虽然站到了最低的台阶，但是这个梯子很窄，上端距下端很远，要上去的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职员能爬上去，大多数职员向上爬是非常困难的。普通职员的儿女暂时比工业工人的孩子可得到较好的教育，有较多的机会在学校毕业后找到好的工作。但是，随着各种形式的教育的普及，在这方面职员的儿女上升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只有小企业的职员才同领导人有较多的接触，大企业的普通职员很少同领导人发生直接联系。普通职员的文化优势也在逐步丧失。正如统计材料所证明，按照教育文化水平，工人和广大职员大大接近，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比较突出。还有的学者强调普通职员的社会意识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有原则不同，以此来否认普通职员属于工人阶级范畴。美国经济学家J. K. 加尔布雷思说，职员“倾向于他们与之打成一片的技术官僚的目标”，他们的利益同“发展成熟的公司是同一的”。他引用对职员调查的结果证明，“四分之三的职员认为自己比起生产工人来，与行政负责人联系更加密切。”由于这一原因，美国的职员不可能吸收进工会。^②是的，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初，职员通常被拉向“高阶层”、“领导层”、“有产者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然而在最近几十年这种状况发生了强烈的变化。普通职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变，无疑导致其社会意识的变化。他们越来越接受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如团结一致和集体主义。把职员看作是惰性的无定形的人群的观点变得越来越过时，脱离迅速发展的现实。现在的普通职员不仅没有被拉向主人、行政领导和模仿他们的行为，而是反对他们。在大企

① 克罗泽尔：《办公室工人的世界》，芝加哥1971年版，第33页。

②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第286、319、321、327页。

业，普通职员不再接近行政领导了。他们对地位的关注完全或部分地让位于对捍卫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的关心。追求名望的愿望减弱了，因为他们认识到这在现代的条件下不现实，今天需要的是捍卫迫切的生活利益。他们不再是不愿意加入工会，而是意识到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在许多国家，职员在工会中的组织程度迅速增长。职员的罢工，游行和其他战斗行动，成了工人阶级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新科技革命条件下，职员人数将继续增长，这有利于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可是这一现象往往成了一些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忽略了”职员阶层的生长，认为职员数量的增长违背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预言。法国社会学家克罗泽尔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急剧地缩小职员的人数，使其降到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①。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虽然职员人数很少，以致在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中可以作为舍去的因素不作考虑，但是他们并没忽略职员。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其它著作中完全可以看到，他注意到了各种类型的职员如办公室工作人员、工程师和其他专家、管理人员的增长。列宁把职员的数量增长同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联系起来，指出：“资本主义大生产需要职员，并且越是使用机器和发展技术生产，就越需要职员。”“资本主义在国民劳动的各个领域特别迅速地提高职员的数量。”^②职员的增加并没有证明两极分化的观点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职员的增加和广大职员的无产阶级化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职员越多，工人阶级的成员就越多，这完全符合工人阶级发展的客观规律。

工人阶级的第二种结构是技术结构，主要按工人的技术熟练

^① 克罗泽尔：《办公室工人的世界》，第22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221页；第4卷，第209页。

程度和文化教育水平来划分，这是一种纵向结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内部，分为四个技术层次：（1）科技知识分子（技术员、普通工程师、普通科研人员）；（2）熟练工人；（3）半熟练工人；（4）非熟练工人。工人阶级内部技术熟练历来就有等级划分。马克思称工程师为高级工人，就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的。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工人的熟练技术主要是指手工劳动的技能，它是通过长期的实践训练而成的，同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在上个世纪，工业企业的熟练工人占工人总数的比重很小，他们得到的待遇大大高于非熟练工人，安于现状，具有狭隘的行会主义意识，因而成了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职能趋向复杂化，科技知识分子、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因而大大增加，而非熟练工人则相对减少。例如美国，1900年有工程师和技术员以及科学家8万人，1970年则增长到250万人，占全国劳动力的3%。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比例目前大致为40：40：20。半熟练工人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是由现代技术的发展水平引起的。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目前都还没有达到全面自动化阶段。现代工业基本上是使用专业化工人劳动的机械化企业和局部自动化企业。因此，在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生产工人的总构成中，从事简单、单调和颇大程度上纯机械作业的半熟练工人在可预测到的未来将仍然和熟练工人不相上下。熟练工人总的趋势是增多，这是生产自动化的要求。但是，生产自动化因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阻碍而其速度放慢。即使实现了生产自动化，资本家总是设法把劳动复杂过程加以分解，使之简单化，从而较少地使用熟练工人，较多地使用半熟练工人，以便更多地剥削工人的活劳动。非熟练工人在长时期内仍将保持一定的数量，他们是从事辅助性工作的体力劳动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使用方便，价格低廉，而且为生产过程某些环节所必需。科技进步不仅使工

人的技术熟练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使技术熟练的内容发生了重要变化。新型的技术熟练取代了过去以手工技能为主的技术熟练，有三个新特点：第一，新型的技术熟练的本质特点是手工技艺同力学、数学、物理学、电子学等基础知识以及广泛的专业知识相结合。熟练工人要能兼任各种不同的专业工作。例如，在石油加工工业的自动化系统中，熟练工人兼任操作工和修理工。现代工业生产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不断改进工艺，采用新技术，现代熟练工人不得不适应这种快速变化，要掌握和完善新技术。出现了能“包工到底”的熟练工人，他们在工业的许多部门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二，新型技术熟练的变动性大。在生产技术迅速变化的条件下，必要的专业知识的数量不断增大和更新。熟练工人为了保持其地位，就必须不断学习。据美国的资料，工人的技术熟练水平平均十年就要过时。在技术最先进的部门，如航天工业、电子工业、计算技术生产等，这种过时的年限还要大大缩短。第三，新型技术熟练的基础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只有受过中等教育才可能进一步掌握广泛的专业知识，才能接受高级的职业培训。据美国1971年的统计材料，熟练工人中45%为中学或中专毕业，11.6%为大专毕业。现代工人阶级技术熟练和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智力，对于工人阶级实现其改变资本主义和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具有深远的重大意义。诚然，目前和在今后较长时期工人阶级技术熟练和教育水平上的级差将继续存在，但每个层次之间的差距总是朝着缩小的方向变化。反映在社会上的差别也是如此。联邦德国法兰克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研究证明：科技知识分子即最熟练的工人与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出现普遍接近的趋向，低级的科技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不高于甚至低于熟练工人的工资。①

① C.H.纳杰里主编：《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莫斯科1976年版，第64页。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内部的第三种结构是社会结构。这是一种纵横交错的结构。由于年龄、性别、民族、种族、地区的不同，工人阶级内部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自然差异在统治阶级的社会政策下成为社会差异，妨碍着工人阶级的团结。从年龄来说，青年工人占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与中老年工人相比，技术熟练差，工资低，失业率高。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工人的文化和技术的提高赶不上发展和变化的需要，青年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更加落后于就业的要求，形成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和青年失业率高的现象。美国青年失业者占全部失业人口的比率，1960年为3.6%，1970年为48.2%，1977年几乎占一半。欧洲共同体当局公布，1977年春共同体区域内25岁以下的失业者约占失业总数的40%。在日本论资排辈很严重，不同年龄工人的工资差别较大。1978年，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工人工资最高的年龄是50—54岁，为258 000日元，最低是17岁以下，为79 800日元，最高等于最低3.28倍。青年工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最为不满，他们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最敏感最有生气的力量。从性别来说，女工一般占工人总数1/3，她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其经济状况要低于男工。日本1976年女工的工资是同等男工的工资的56.1%，美国1972年女工的工资是男工的工资62.8%。法国1984年女工的失业率为25%，而总的工人失业率为15%。从民族和种族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少数民族和黑人的工人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比白人工人更加沉重。在美国，800万墨西哥裔美国人是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的牺牲品，他们遭受职业歧视，失业率超过全国平均数的两倍；有100多万波多黎各人被集中在无组织的血汗工厂中从事最艰苦、工资最低的工作，他们还受到房东、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敲诈勒索。在美国，黑人工人多数从事低等的职业和工种，与白人工人相比收入最低，失业率最高。据《美国统计

摘要》1978年的材料，黑人的白领工人干的大部分是低档收入的工作。1976年黑人管理人员占黑人劳动力的4.4%，而白人则为11.4%。白人工程师在自由职业者和技术人员中占的比重为20%，黑人只有5%。在蓝领工人中，黑人主要是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黑人的非熟练工比重高出白人的一倍。在服务工人中，黑人占的比重比白人大一倍。《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记载，1976年家庭平均收入，白人为15 357美元，黑人为9 821美元，黑人收入只有白人收入的一半多一点。黑人的工资一般是同等白人工人工资的75%左右。据美国官方统计，1975年3月美国的失业率为8%，而黑人的失业率高达14.2%，几乎接近白人失业率的一半。1977年10月，白人失业率为6.1%，黑人失业率达15%。在不少城市，美国黑人青年失业率超过40%。从地区来看，外籍工人同本国工人相比明显要低一等。从50年代开始，来自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工大量涌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涌入联邦德国、法国、瑞士、瑞典、比利时和英国。外籍工人一般干最脏、最累、收入最低的活。联邦德国和法国的建筑业中1/3是外籍工人，联邦德国的皮革工业中外籍工人占35.8%，巴黎的街道是由1 000名外籍清道夫打扫的。而当经济危机时期他们往往首先被解雇。近年西方经济不振，外籍工人有许多人被驱逐，外籍工人的居住条件恶劣，在联邦德国，他们租来的住房近30%是在地下室和阁楼上，或是住在工棚里和工厂的老房子里。①总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中，青年工人、女工、少数民族和黑人工人、外籍工人都是受压迫和受剥削最深的工人，他

① 上述有关材料参见林振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状况》，第102、149--151页；王振基：《日本工资和社会保险概况》，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34页；《美国共产党纲领》（1981年6月）。

们的反对歧视争取平等的斗争是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一致的。资产阶级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别和矛盾，采取种种歧视政策，故意加以扩大，制造工人阶级的分裂，用心极其恶毒。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应该支持他们的反歧视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引导到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五节 当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关于现代工人阶级的种种问题最后归结为它的地位和社会历史作用问题。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工人阶级问题上所作的一切文章，都不过是为了推翻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革命力量的原理，证明工人阶级失去了革命性和实现其世界历史使命的能力。多数研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学者虽然承认从长远看革命的主力仍然是工人阶级，但对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因此，结合现代资本主义和新科技革命的条件阐明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社会历史作用，揭示工人阶级新的特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否定工人阶级的谬论，克服对工人阶级的各种悲观情绪，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是政治科学领域中真正伟大的创见，因为正是他们第一个发现了由资本主义产生的新的现代无产阶级，一个能够把全世界从所有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阶级在历史上的潜力。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的第一个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发展的原理。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解放、吸收和同化所有其它社会阶级，消灭剥削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最后也消灭作为阶级的本身，从而使人类进入无阶

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先对工人阶级发展的原理作了鲜明的论证，以后又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进行了更详尽的说明。《共产党宣言》指出了影响无产阶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以及以此为基础使生产关系革命化，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宣言》把无产阶级当作社会进步的主体，当作具有自己特殊发展规律的体系，考察了无产阶级经历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数量发展和组织发展的巨大意义。《宣言》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①与那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宣言》特别注意到了无产阶级的精神发展问题，指出：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的不断斗争过程中“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在阶级斗争中，“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恩格斯在《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再次强调了无产阶级的精神发展的观点，指出：“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②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约140年期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宣言》的科学论断。现在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宣言》时期的工人阶级相比，无论在数量上和组织程度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9—2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243页。

还是在精神上，都有了重大的历史性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宣言》时，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英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多数，参加工人组织的人在工人中的比例很小，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先进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刚成立不久，其人数不过几百人。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和思想理论水平很低，大都处于文盲状态，精神上主要受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现代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已稳定地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30—50%的工人参加了工会组织，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文化教育起码超过小学水平，一般达到中学水平，少部分具有大专和大学水平。这是工人阶级发展到今天的总的概貌。对工人阶级发展的各个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会看到，这样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步的。数量的发展往往超过组织的发展，组织的发展往往超过精神的发展。职业的普遍发展可以同政治发展没有联系。在工人阶级的数量增加过程中，在特定的情况影响下，无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改变。由于这些改变的结果，工人阶级个别队伍的绝对数量和比重在变化。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大大缩小，工业工人的绝对数量增长而在工人中的比重相对减少，工业工人中采掘、冶炼部门的工人减少，而制造业中最先进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工人大大增加。商业和服务业的工人在绝对数量和比重上都在增长。在工人阶级的组织发展中，传统工业部门的工会组织比较强大有力，而新兴工业部门的工会组织则相当弱小；体力劳动的工人加入工会的多，脑力劳动的工人加入工会的较少。有的国家（意大利、法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发展成为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的国家（如美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则长期处于人数少和影响小的状态。在工人阶级的精神和政治发展方面，组织程度高的工人组织（如英国工党）往往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影响很深，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组织的人数

则往往很少。教育和文化水平高的工人的组织程度低，可是他们在争取参与企业管理和反对企业主的专横方面走在斗争前列，而组织程度高的工人常常是教育和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他们往往注重于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发展中出现的上述复杂现象成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曲解的对象。于是，关于工人阶级“缩小”、“消失”、“非无产阶级化”、“中间阶级化”、“新中间阶级”等种种奇谈怪论出现在资产阶级的书刊上。对于这些谬论本书前面已作了批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解释现代工人阶级发展中出现的这种复杂现象。我认为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复杂并不否定发展，复杂正是发展所造成的。工人阶级在数量、组织和精神方面此消彼长，此进彼退，这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辩证发展过程。我们不能只看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局部的停滞和倒退，然后将其夸大，而应该从长远的历史阶段、从全局、从总的估计去观察。从这种观点看，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得出否认工人阶级全面的重大的历史发展的结论。第二，工人阶级发展中的消极不利因素是暂时的，终究是要被克服的。例如，在经济结构的转换调整过程中，传统工业部门的最富于革命性和战斗性的传统工人在减少。但是，当新的经济结构稳定下来后，新兴工业部门的工人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素质上必将超过传统工人，在经济的要害部门和关键岗位，采取高超的斗争形式给资本主义以更加有力的打击。第三，工人阶级发展中的复杂性预示着工人阶级向着更高级发展阶段转化。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非产业工人增多。科技知识分子增多、熟练工人增多、文化教育水平高的人增多，这种现象确实在改变工人阶级的面貌，然而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趋势。工人阶级正是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自己和完善自己。随着资本主义和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将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在精神和智力的素质上超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为社会公认的领导

阶级。工人阶级发展到这一崭新阶段之日，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消亡之时。

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但否认工人阶级无限发展的巨大能力，而且极力贬低工人阶级在经济进步中的伟大作用。第一，他们对科技革命作歪曲的解释，否认或缩小工人阶级在科技革命条件下作为生产力的作用。他们所理解的科技革命，仅仅是生产资料的技术改造，把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排除在科技革命之外。一个由美国的学者和政论家组成的团体1964年发表了《三重革命的宣言》。他们把生产的新时代，同控制论的革命、计算机的革命和自我管理的自动化机器的革命联系在一起，根本不提科技革命的主体即人的重要意义。美国社会学家Z.布热津斯基认为科技革命的实质是在运用控制论和电子论中的“第三次美国革命”。他写道：“后工业社会是技术社会，它是在技术和电子论特别是计算技术和大众信息手段的影响下，在文化、心理、社会和经济上形成的。”^①这种观点的作者忽视了这一点：科技革命是不仅包括生产资料而且包括劳动力的整个生产力的质的综合改造，工人阶级并不是科技革命之外受其影响的消极对象。工人阶级在实现科技革命中起着积极的活跃的作用。马克思曾经透辟地指出过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②改变人的作用，改变人同体现着科技革命最大成果的崭新的生产资料相互作用的性质，这正是现代科技革命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不阐明这一点，就不能理解科技革命的实质，不能理解由科技革命产生的新的社会经济的性质。忽视人的

① Z.布热津斯基：《两个年代之间：美国在技术时代的作用》，纽约1970年版，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因素必然导致科技决定论和科技神秘化。第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预言，在科技革命条件下，自动化将完全把工人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物化劳动将完全取代活劳动，因而工人阶级将成为一个不必要的多余的阶级，整个社会将成为“闲暇社会”。上面提到的《三重革命的宣言》说：“在发展着的控制论时代，借助于机器系统，潜力无限的生产资料的强力是能够达到的，这种机器系统只要求极少人的参加。”^①按照《三重革命的宣言》的观点，生产资料的强力在利用控制论的基础上增长得越大，使用活劳动的范围就减少得越厉害。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涅尔更尖锐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技术导致一个既充满巨大的财富同时又有一个巨大的劳动真空的社会。”^②他由此作出结论说，人面临着退化为劣种的危险。在这些理论家的观念中，由于“控制论的革命”，将产生一个类似古希腊罗马社会的拥有无限闲暇和富裕的社会。但是，这种闲暇和富裕不是建立在统治奴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电子机械所创造的财富的基础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总爱把自动化吹得神乎其神，宣传“无人工厂”、“无人车间”和“机器人”，认为在“后工业社会”活劳动将无限变小。毫无疑问，现在的自动化系统在没有人的直接参加下可以极迅速地完成了以前需要几百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现代发达的生产水平同技术装备和各种形式的物化劳动及科技知识的增长有密切关系。但是，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的差别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能将这种差别加以绝对化，而不考虑总体劳动力的劳动性质、职能和成分的变化。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中的根本改造的全部内容归结为强大生产资料的结果，

① 转引自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5年第4期，第84页。

② 转引自罗西托尔：《神话的编造者们》，波士顿1964年版，第137页。

不过是继承了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夸大了物化劳动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英国庸俗经济学家J. R. 麦克库洛赫（1789—1864）和其他吹捧物化劳动作用的人的观点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物化劳动的实质不过是资本占有的活劳动，他写道：“那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参与活劳动过程的过去劳动所取得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就被归功于这种劳动的同工人本身相异化的形态，即它的资本的形态，虽然这种劳动是工人的过去的和无酬的劳动。”^① 现时代的物化劳动本质上仍然是资本占有的活劳动，只是这种活劳动的形态和性质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更多地采用智力而不是体力。与马克思写《资本论》那个时代不同的是，现代的生产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人的手而且是人的脑的创造，是科技知识的物质化。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话很适合说明现代生产资料的这种特点：“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② 在技术发达的现代化生产中，尽管活劳动的数量对于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的劳动来说减少了，尽管现代技术可以腾出大量的劳动力，但是甚至最自动化的生产没有人的参加也不行。这是因为，不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220页。

多么高度的自动化装置，也离不开人的劳动，即使是“无人车间”，也不是真的无人管理和控制，只是少雇管理人员，或不需要雇人直接操纵这些机器设备而已。任何自动化装置都只能是整个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生产的全过程。在这些自动化装置之前或之后，仍需要有劳动者为它的正常运转创造条件或作善后处理。它本身的起动、调整或停止运转，都需要有人控制，“机器人”也需要人修理和控制，而管理、控制、操纵这些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的人员，便是科学技术发达条件下的生产工人。自动化和其它最新技术不但不能把工人从直接生产过程中完全排除出去，而且为把劳动力吸引到新的和迅速成长的经济部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革命下虽然存在着失业的严重问题，但是劳动人口的总量总是呈增长的趋势。工人阶级中的个人会因经济衰退和部门结构变化而经常失业，但整个工人阶级永远不会失业。科技进步不但不会造成“劳动真空”，而且也不会导致劳动的退化。在自动化生产过程中，工人劳动的直接执行的和动力的职能减少，而代之以组织和协调管理系统、设备的技术服务，完善生产技术和工艺等方面的职能。在技术最先进的生产领域，工人的作用与其说是表现为直接参加加工劳动对象，不如说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信息的创造性的加工，目的是提高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集约性和有效性。这同样地为加快科技进步和为人的自身发展创造前提。人的自身发展第一次成为生产过程本身的必需要求。劳动的集体性、自主性和责任性都在增强。工人阶级作为新型的劳动者在现代化大生产中不断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为创建和管理更高形态的美好社会准备条件。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究竟还有没有革命性，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是关系到工人阶级社会历史作用的尖锐问题。现代国外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致否定的，

但是其论据各有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根本改善”了，它的革命性的根源也就失去了。用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来否定其革命性，这是资产阶级宣传机器惯用的简单的手法。美国经济学家R. L. 海尔布隆纳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没有衰落。马克思生动描绘的物质贫困渐渐减弱了……结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情绪和社会世界观成了较少‘无产阶级的’和较多‘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期待自己的革命阶级的统一和纪律被摧毁了。”^①法国社会学家R. 阿隆（1904年生）则宣称，广大群众体验的“绝望感”是革命斗争的必要前提，既然这种绝望感在群众那里只有在极端物质贫困的情况下产生，那末现代工人阶级就不可能趋向革命。阿隆有保留地说，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完全满足自己的现状，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可以描述为“爱唠叨的满意”，即接受整体而反对枝节。^②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H. 马尔库塞（1898—1979）说：“只要现存社会能够生产越来越多的奶油和大炮，能借助新形式的全面监督来哄住人们，那么它就能够封锁住革命力量。”按照马尔库塞的意见，在生活水平提高基础上需求的满足能够使阶级统治体系更加坚固。“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如果女秘书穿得同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好，如果黑人拥有‘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一种报纸，那么，这种同化……表明，依附阶级参与保证统治阶级存在的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手段达到了何等程度。”^③上述种种说法，在事实和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在

① 转引自纳杰里：《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莫斯科1976年版，第212页。

② 参见阿隆：《阶级斗争》，巴黎1964年版第139、229页。

③ 马尔库塞：《单面人》，巴黎1968年版，第11、33—36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的生活水平确实有较大的提高。但是工人阶级的物质贫困依然存在，如：相当部分的工人仍然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在美国，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私营部门的工人平均工资为官方最低生活费用的56%；在联邦德国，60年代中期62%的工人家庭收入低于官方规定的最低标准。现在欧洲共同体中几乎1/4的家庭平均收入在最低生活标准以下。大量工人受失业之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总人数1960年是800万，1972年是950万，1974年是1 000万，1984年是3 000万。在这些失业人口中，差不多半数是25岁以下的青年。^①工人的实际收入由于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而停滞、下降。贫困的具体材料不胜枚举。应该注意的是，贫困的尺度和表现形式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转移的。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物质匮乏，往往是以不同于100年或50年前的另外的尺度来衡量和另外的形式来表现。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社会原因。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早期发展阶段，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水平都很低，由于资本主义剥削采取特别贪婪残酷和赤裸裸的形式，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令人触目惊心，其贫穷表现为饥寒交迫、住贫民窟或露宿街头等。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贫穷一般表现为工作没有保障，过不上中等的比较舒适的生活和得不到应有的文化教育及娱乐享受等。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论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丰裕的社会”总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相对穷困基础上。可以说，贫穷是资本主义消灭不了的，它永远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动因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不但真实地描写了那个世纪工人的悲惨生活，而且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仅仅归结于贫穷。在某种意义上

^① 参见1985年1月15日《参考消息》。

说，流氓无产者是最贫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没有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相反还强调他们在反动派的收买和腐蚀下宁肯去干反革命的勾当。工人阶级和历史上的奴隶和农奴阶级相比，其贫苦程度不如他们，但工人阶级比他们更具有革命性。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和受剥削程度最重的受害者，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不断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当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第二，工人阶级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受的剥削越来越少，以致消失，虽然处于被统治服从的地位，但这是为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因此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没有革命的要求。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作较复杂化的描绘，用多种色彩来代替单一的美化性的玫瑰色彩，在这多种色彩中既有黑色的悲观，又有红色的抗议。他们并不否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矛盾，不否认工人阶级在生产和其它社会生活中的依赖服从的地位，但是认为所有这些并不足以使工人阶级成为革命阶级。他们承认工人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性异化，要求消除这种异化，但不承认个性异化的根源是劳动异化，把剥削和统治割裂开来，认为科技革命终将消除剥削，把个性异化归咎于科技进步和官僚制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J.哈贝马斯（1929年生）在1968年出版的《技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一书中强调说，现代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社会的依赖和压迫，没有消灭统治和服从的关系，相反，还发展了它们；但是，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古典资本主义，这些关系并不处在同生产力的矛盾中，而“被生产力承认合法”。异化失去了自己的贫困的经济方式。“社会解放的兴趣不再体现在直接的经济利益之中。”在西方国家，工人在自动化生产中已经不是主人，剩余价值已经由自动化设备所创造，即由科学技术所

创造。因此，“革命理论失去了对象”^①。科学技术代替工人创造剩余价值，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剥削而经常宣传的一种观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自动化生产设备创造剩余价值的论调，是一百多年前传统庸俗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等人所谓机器或牛马创造剩余价值的谬论的变种，早已受到马克思的彻底批驳。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所购买的生产资料，是资本家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物质条件，生产设备的先进与否影响着工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从而影响新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多少，但新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并不是由生产资料创造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在前一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已定的量；在这里，它只是借助于工人的具体劳动，改变了它们的自然形态，并把它的价值一次或根据其磨损程度分次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被转移的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过是它们原有价值在新产品中的再现。它们的价值原来存在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生产后存在于新产品形式上，价值量没有任何变化。在生产过程中，正是工人在用具体劳动同生产资料相结合，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的同时，支出了抽象劳动，创造了价值。“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它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②科学技术本身不可能自动地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可以成为资产阶级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进步只会加重而不是减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这一趋势可以从战后美国和联邦德国剩

① 转引自C.H.纳杰里主编：《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莫斯科1976年版，第2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4、235页。

余价值率变化的表①中看出来。

	1950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1975年	1977年
美国的剩余价值率	241.2	247.6	266.0	255.0	272.6	280.9
联邦德国的剩余价值率	181.4	236.3		273.9	260.0	

1950—1977年，美国的剩余价值率提高39.7%。1950年—1975年，联邦德国的剩余价值率提高78.6%。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同剥削的新形式有密切关系。战后在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断改进剥削工人阶级的办法。通过采用最新技术、充分利用工时、消除工时“损失”和加快由机器迫使的工作速度，依靠急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从而使在业者的产量达到高指标。同时，单位时间内重复动作的次数是由复杂的劳动定额方法决定的。“劳动定额领域，至今还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很少加以监督的范围。正是在这个领域内，资本家力图保持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劳动定额纯技术方面的极端复杂性客观地促成的，因为现今它采用数学和统计方法、事先编制好的定额表和包括电子计算机在内的复杂设备。”^②从60年代起，为了寻找更完善的资本主义剥削方法，对心理学、社会学、医学生理学、人体测量学以及其他与劳动有关的指标进行综合研究，成了人类工程学的研究对象。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研究并实验了“自治作业班”的办法。各“自治作业班”自己规定任务、分派

① 资料来源：见《世界经济》，1980年第11期，第28页；《世界经济译丛》，1979年第2期。

② 莫申斯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定额和工资》，莫斯科1971年版，第85页。

工作、对委托给他们的工段负责，实行产量和质量的监督，并在许多情况下自己对设备进行维修。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自治作业班”最能克服工人对加快作业速度的经常反抗，解决普遍的旷工和破坏生产过程的种种现象。在最大的现代化企业中采用上述新的剥削方式。在中小型设备比较落后的企业，多半采用传统的“科学榨取血汗制”。总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决不是像资产阶级学者宣传的那样只有个性的异化而没有劳动的异化，只有被统治而没有被剥削。铲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把自己创造的日益增多的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永远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基本动因。

第三，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衰退，在社会心理上同资产阶级“一体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H.马尔库塞虽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进行了批判，指出了这种社会的“自杀的倾向”，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并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有着“完全不同面目”的人，即由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新左派。马尔库塞认为，“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潜力的低水平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相一致的。”工人阶级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满足，思想上被统治阶级同化，因而不想革命了。他写道：“在大多数工人阶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当然革命的意识只有在革命的形势下才会显示出来；但是和以前相反，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这并不是—种表面现象，而是扎根于基础，扎根于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之中的。”^①我们完全承认，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身上存在着某种消极落后的意识，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资产阶级思想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通

^① 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3、84页。

过教育、文化、新闻、宣传等各种手段对工人阶级有着长期的普遍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许多工人将它当作普通常识接受下来，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其次，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影响颇深。第三，在生活水平提高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工人的消费心理阻碍了阶级意识的形成。资产阶级利用广告和所谓大众文化向工人群众灌输“消费的”生活理想，使工人的眼界囿于物质消费和消遣的狭隘天地，使工人的注意力离开自己的阶级地位和社会政治制度这些根本问题。第四，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农民、大部分职员和科技知识分子降落到工人阶级队伍。由于社会意识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他们的心理状态还保留着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心理特征。尽管存在着上述不利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因素，但决不能说“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因为还存在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的相反因素，而且这些因素起主导作用。这些因素是：（1）工人阶级仍旧是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在生活条件方面仍然是社会中最贫穷的，在社会地位方面仍然是最受压迫和依附之苦的。只要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不改变，反映其阶级利益的要求的基本意识就不会变。一个工人的意识和百万富翁的资本家的意识总是有基本差别的。（2）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很能迷惑人，但是它的普遍性形式和资产阶级狭隘私利的实质内容之间的矛盾总会不断暴露出来。工人阶级在实践中总会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抛弃它，与之彻底决裂。（3）科学社会主义在现代条件下通过完善和发展，必将战胜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所接受，成为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4）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虽然一方面导致消费心理，另一方面为把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创造了前提。摆脱最沉重的物质贫困，提高教育和文化水平，这为工人阶

级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思考自己的命运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促使工人更尖锐地感觉到自己劳动的被迫性、依附性和与生产目的的格格不入，以及人类尊严受到从属于资本权力制度的玷辱。束缚于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生活缺乏前途和不可能有什么发展，这在现代工人的眼里乃是其状况最阴暗的方面之一。工人的所有这些情绪和要求，构成工人阶级的共同社会心理：渴望丰富生活的精神内容，个性的更大自由和独立性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日益不满。（5）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农民、职员和科技知识分子在实践中逐步改变其原有的思想意识，形成与传统工人阶级共同的阶级意识。特别是工人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他们给工人阶级带来大量的教育因素，为把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提高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平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由于上述积极因素，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总的说来还是趋向于增长的。联邦德国纽伦堡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一批研究人员，在1973—1976期间通过对当地两个工厂的产业工人的政治觉悟所进行的调查，发现：（1）对政治漠不关心的随大流的人占14%；（2）盲目崇拜议会民主制的人占27%；（3）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人占16%；（4）持改良主义态度的人占34%；（5）狭隘的工人利益的激进代表占7%；（6）主张阶级斗争的人占3%。从上述调查结果看出，主张运用阶级斗争武器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只是极少数，满足于现状的工人也是少数，近半数工人一方面对战后40年其经济状况的明显改善感到满意，但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许多不公正现象感到气愤，主张在不触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和限制大资本的权力来实现“更多的社会公正”。这一调查虽仅限于两个工厂，但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我国赴联邦德国考察的学者通过一些实际接触得出的印象也是大体吻合的。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处于沉睡状态，但大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改革，这

可从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得到证实。从1965年到1974年，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参加罢工的人数从1 900万增加到4 700万。在意大利，工人阶级在1969年“热秋”的阶级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工资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实行周40小时工作制，承认工人选举的代表。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意大利共产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党员人数最多的群众性政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成为有巨大影响的第二大党。在法国，1971年“雷诺”汽车公司工人大罢工得到全国工人的广泛声援。1973年别赞森城的“利浦”钟表厂工人抗议关闭企业，举行了历时几个月的“反”罢工。1975年8月，250个企业被工人“占领”。在英国，1972年开始了1926年以后的第一次煤矿工人总罢工。矿工斗争的主要方法是群众性的罢工纠察线，这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没有过。政府被迫满足了矿工的基本要求。在美国，工人阶级加强了罢工斗争，发生了不承认工会官僚的狭隘经济主义的普通工会会员运动。罗尔德斯坦的“通用汽车公司”汽车厂一万工人罢工。这次罢工的特点是青年工人起带头作用，提出的要求不是满足物质利益，而是要改变劳动条件，限制企业主的专横。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出现直接革命的形势，工人阶级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还是很有限的。在革命低落阶段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比较缓慢，这需要工人阶级政党进行坚持不懈的有说服力的宣传教育工作，帮助工人阶级树立科学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常常用马克思主义尚未被大多数工人所接受这个事实，来否认工人阶级已具有阶级意识。法国社会学家阿隆把阶级意识描绘成某种同阶级相异的由外部强加给阶级的东西，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根源于工人的现实利益的意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①另一位法国社会学家H.列费伏尔（1901年生）

^① 阿隆：《阶级斗争》，第125、134、229页。

则相反，完全不承认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形成阶级意识中有某种独立作用，认为它只是“有条件的官方词典”，阶级的代表用这个词典来“确定他们所要说的话”。^①这两种观点把阶级意识和阶级的意识形态截然对立起来，其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进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我们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发展中的统一体。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表现在以下几点：认识到必须同资本家作斗争，认识到阶级团结的必要性，要求干预政治事务。这些表现反映着工人阶级共同的社会心理。工人阶级的这种社会心理靠日常社会经验和日常阶级斗争形成。它并不是意识形态从外部对工人灌输的结果。从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工人阶级就形成了阶级意识，进行了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现状来说，虽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为大多数工人所掌握，已有上百年、几十年长期阶级斗争历史传统的、有着强大工人组织的、现在仍然坚持同资本主义作顽强斗争的工人阶级应该说是具有自己的阶级意识的。不应该把赞同不赞同这种或那种思想理论、方案、战略、党派或某个人作为阶级意识的标志。工联主义虽然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相对立的，但它毕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过这种阶级意识仅反映工人阶级的日常的目前的利益罢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工人阶级创立了最科学最革命的意识形态，同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但是他们并不要求工人阶级无条件地信奉他们的学说，并不希望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教条和宗派的性质，而是十分尊重工人阶级从现实条件中产生的共同愿望和意向，允许工人阶级“容纳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②。马克思1870年致拉法格的信中告诫

① 列费伏尔：《社会阶级的心理》，巴黎1963年版，第3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页。

说：“在国际协会中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标签’。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愿望和意向为整个阶级所共有，尽管在工人的意识中运动以极其多样的形式反映出来，有的幻想性较多，有的幻想性较少，有的较多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有的较少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因此，只有最能理解我们眼前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内在含义的人即共产党人，才会最少犯赞同或鼓励宗派主义的错误。”^①现实条件是复杂的，从中反映出来的工人阶级的意识也就是多样的，其中有比较科学的，也有非科学的，但它们都属于工人阶级的共同意识。工人阶级所处的现实条件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它的阶级意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并不是完美无缺和不可改变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最科学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变化中逐渐成为其主导因素的。我们坚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必将不断增强自己的阶级意识，接受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的伟大的革命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58—659页。

第四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

第一节 资产阶级成分的某些结构性变化

同现代工人阶级一样，现代资产阶级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而相应改变自己的面貌。在垄断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构成比较单一，主要是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在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等种种因素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也使资产阶级内部结构出现了某些变化。组成现代资产阶级的，除了传统的大资本占有者和中等资本占有者外，还有国营或私营的各种大公司和大企业的高级经理、行政官僚机构的高级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结构性变化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脱离经营管理而依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资本家愈来愈多。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就已经产生了食利资本家，不过那时他们一般还不同程度参加一些经营管理活动。由于企业规模小，资本有限，单靠吃利息过日子的资本家也不多。所以，当时食利者的寄生性在整个经济生活中还不明显。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要求企业管理者不仅需要广泛的生产技术知识，而且还需要有经济学、行政管理学、法律

学等方面的知识。这样一来，必然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家不能胜任企业的管理工作，而不得不把企业管理交给受雇的专业管理人员。同时，由于大资本家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有价证券，可以借此取得为数可观的利息收入，于是，大部分原来的大企业主便不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成为专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此外，由于少数金融寡头控制了生产和市场，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创办一个企业所需要的资本数额越来越庞大，也使得一些货币资本所有者不能自由地投资开办企业，于是把这些货币资本存入银行或购买股票，以获得稳定的利息或股票收入。于是，食利者的人数就大大增加了。例如在美国，单是食利者阶层中的大富翁人数，1948年为1.3万人，1958年为4.7万人，1962年为7.1万人，1969年为14.7万人，1972年为22.2万人，1978年为25万人，1980年为57.4万人。32年美国的百万富翁增加了40倍。这些大富翁大都是与生产脱离的食利者，1978年，他们拥有的资产构成是：股票48%，不动产12%，联邦债券5%，地方债券5%，抵押和其他债券4%，现金4%，其它资产22%。通过这些资产，他们每年取得巨额的股息、租金、利息和其它剥削收入。例如美国的大富翁，1947年个人股息和利息收入为138亿美元，1950年增至195亿美元，1970年更增加到897亿美元，1975年激增到1428亿美元，比1947年增加了9.3倍，而同期的国民收入只增加了5倍。^①不参加经营管理的食利资本家的增多，表明资产阶级越来越成为多余的和不必要的阶级，是社会的赘瘤。

第二，金融寡头即垄断资产阶级人数的扩大和无限权力的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许多旧的金融寡头家族迄今仍占最大财团的首位。但是，在美国和西欧各国，

^① 王茂湘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当代资本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8页。

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最富有家族属于新一代的金融寡头。他们基本上是在战后发财致富的。至于日本，由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主要的康采恩的化整为零，以及金融资本结构的迅速变动，那些把旧的财阀王朝排挤到后面去的新的财阀家族已上升到这个国家的金融寡头的前列。金融寡头的兴起是垄断资产阶级实力增强的结果。垄断资产阶级随着生产集中程度的提高而扩大。1953年，美国共有2.7万人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财产，1962年则为6.7万人，而到1970年已达到20万人。在20万个百万富翁中，可分成几千个家族。它们形成紧密联系着的各种枢纽，成为美国真正的主宰。1974年，美国的洛克菲勒等十大财团所控制的资产额达12505亿美元，约占美国全部公司资产总额的30%。在现代日本经济中，三菱等六大财团控制了日本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业部门。在联邦德国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德意志银行等五大财团。在法国，巴黎荷兰银行等十个最大金融集团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英国，巴克莱等十个大财团操纵着整个国民经济。列宁指出：“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①金融寡头取得政治权力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由财团人员加入政府，占据要职，控制国家政权。战后美国的历届政府是“百万富翁的全国委员会”。杜鲁门总统任命的125个重要官员中，有49个是银行家和大工业资本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272名高级官员中，有150个是大垄断资本家。肯尼迪总统是波士顿财团的一个家族成员，其父是美国75个大富豪之一。在福特政府中，由洛克菲勒财团的家族成员威尔纳·洛克菲勒出任副总统。在卡特政府的最重要的17名成员中，有12名属于大财团或同大财团有联系。里根内阁的13名部长，有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29页。

8名是百万富翁，3名是准百万富翁。^①一位美国学者写道：“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政党，即财主的党”，“不论何时，也不论就哪一个党说，在幕后操纵的总是大财主，他们为了自己的优厚利益，布置景物，安排场面，导演出了一幕幕千奇百怪的戏剧。”^②金融寡头还通过向资产阶级政党秘密捐款，建立各种政府咨询机构等手段，左右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他们还直接掌握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通讯、文艺、教育等工具，给予社会舆论和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以决定性影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③

第三，中等资本家的数量在稳稳中有增长，成为资产阶级中人数最多的部分。在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大规模的生产集中过程使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遭受排挤和吞并。但是，中小企业并没有被消灭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革命的发展，中小企业的数目不断增多，发展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例如，在日本，50年代，每年新增加的中小企业为4.3万个，60年代增加10.6万个。从1960年到1981年，日本中小企业总数由335万个增加到623万。^④在美国，1950年创办新企业约9.3万个，到1980年，这个数字猛增到每年约60万个。^⑤目前，在主要的资

① 李乾亨主编：《今日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② 菲迪南德·伦德伯格：《富豪和超级富豪》，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8、20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④ 转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5年第1期第17页；《世界经济文汇》，1985年第4期，第23页。

⑤ 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势》，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本主义国家，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都在95%以上，中小企业的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将近一半。中小企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大致有四个。一是科技革命的发展为中小企业现代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开辟了许多新兴工业部门，使生产更加专业化。二是社会需求的多样化、高级化和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三是垄断大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求积极发展与中小企业的协作关系。四是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局部调整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关系，从而获得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主的支持，对中小企业采取了重视，扶植和引导的保护政策。既然中小企业至今在发达国家中仍占重要地位，既然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是战后生产力发展和垄断资本统治加强的结果，那末中小企业就不会被淘汰，不会被消灭。因此，作为中等企业主的中等资本家将长期稳定地与垄断大资本家共存，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基础力量。

第四，私营和国营的大公司大企业的职业高级经理的数量日益增多，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全部经济活动的重要特点，是雇佣经济人员在大公司大企业中执行主要的行政管理职能。就形式和本质而言，行政管理工作的报酬应当是工资的变种，即一定种类熟练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反映。但是，大公司大企业的高级经理人员所得到的工资和附加收入的数额，超过相应熟练劳动市场价格的许多倍，所保留的只是工资的外貌。实际上，在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附加收入中隐藏着利润。所得利润之大，以致使他们不仅可以厕身于中等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跻入大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家所有制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特殊范畴的国家高级职员即国有化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人。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私人垄断组织的上层管理人员很少有共同之处。国有化经济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处于国家官员的职位上，形式上是作为国家

官员而与工人相对立，并向政府领取工资。他们不是私人资本家的支配者，而是国家资本的支配者，不直接参与为私人资本家捞取利润。但是实际上，无论就其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还是就其获得收入的方式而言，国家经济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所处的社会地位同私人垄断组织上层管理人员完全相同。同样，国家高级管理人员作为企业主和剥削过程的组织者而与工人和职员相对立，其收入来源也是剩余价值，尽管其特殊形式的工资不是来自私人垄断组织，而是来自政府。在许多情况下，其数额不少于私营企业上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因此，具有巨大经济权力的国家上层管理人员直接属于大资产阶级，而其中的某些代表人物有时还加入金融寡头的行列。

第五，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高级国家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执掌者（国会议员、部长、将军、行政机关的高级官员等），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资产阶级政权体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寡头，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比其他类型的金融寡头更紧密地与国有经济成分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的党政高级人士中的许多人，通过人事结合和其他联系形式，牢固地结合于国营公司之中。例如，6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238名官员在国营股份公司和合营股份公司的监察委员会中拥有660个职位，其中包括十个最高职位。这就是说，每个官员在国家股份所有制的重要管理环节中平均占有三个职位。^①他们利用国有经济成分有效地“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行政和政治上流社会的许多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大实业家。他们来自实业界，待到政治生涯中断时再回到实业界去。那些出身于中等居民阶层和实业界

^① 参见H. H. 伊诺泽姆采夫等主编：《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481页。

没有直接联系的职业政治家，虽然本身并不是资本所有者，但由于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收入上通过高薪分享了资本家剥削来的利润，因而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

现代资产阶级发生的上述结构性变化并不表明资产阶级的本质有什么根本改变，它只是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的成分进一步复杂化，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压迫和剥削进一步加深并变得更加隐蔽。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利用资产阶级的某些结构性变化宣扬“资本家阶级在消失”，鼓吹所谓“经理阶级”、“专业管理阶级”、“知识阶级”，预言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对于这类美妙的神话，我们必须彻底揭穿。

第二节 资本家阶级是否在消失？

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由实际的调查统计资料来回答。据美国官方统计资料说，美国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上层阶级占人口的10%。这个阶级的成员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他们占据着联邦政府、州政府、城市、军队、商业、大企业等机构的最上层领导地位。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戴伊根据大量统计资料指出：美国最高掌权阶层共有5416人。除去最高统治集团，在每个政府部门，每个州及每个地区也都存在着一个统治集团，没有他们的命令和同意，任何重要行动都难以实行。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多姆霍夫1983年在《当今谁统治美国》一书中，用大量的例证说明“美国仍然有一个人数很少的上层阶级，其成员握有全部私人财富的20%至25%，全部私有股票的45%至50%。”^①资产阶级的官方统计机

^① 威廉·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26页；邓方：《美国社会学家怎样划分阶级》，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12期。

构和学者对社会阶级的概念当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不同，但不管怎么样毕竟承认了资本家阶级存在的客观事实。苏联和我国的学者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官方统计提供的关于最高收入者的资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标准加以整理和修正，得出了50—70年代美国等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人数及其在本国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的图表^①：

国 别	年代	资产阶级人数 (万)	在本国经济活动人口 中比重 (%)
美 国	1950	127	2.3
	1977	270	2.7
联邦德国	1950	77.5	3.5
	1976	140	5.4
英 国	1951	44	2
	1979	51	2.1
法 国	1950	91.5	4.8
	1977	85	4.5
意 大 利	1950	22.7	1.2
	1970	35.1	1.8
日 本	1950	68.1	1.9
	1975	320	5.9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法国以外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人数和比重都有所增长。这说明社会的两极分化在普遍加深。

^① 资料来源：波捷欣主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基辅1978年版，第44页；傅殷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初析》，载《经济学动态》，1983年第12期。

尽管资产阶级客观存在着，但还是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抓住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些有利于抹煞阶级差别的表面现象大作文章，从理论上论证资本家阶级的本质已经改变从而正在消失。下面就他们的谬论举例加以剖析。

例一，所谓“工人剥削资本家”。1958年，美国纽约出版了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垄断资本的职业辩护士L.O.凯尔索和M.J.阿德勒合著的《资本家宣言》。作者狂妄地宣称“要以《资本家宣言》代替《共产党宣言》”。该书的主要“理论”观点之一就是鼓吹资本家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并受工人剥削，完全颠倒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该书作者说：“既然劳动价值论是虚妄的，资本和劳动一样，都是财富的生产者，那么，一切从劳动论引伸出来的结论，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发达的工业经济中资本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由于技术和机器的进步，“劳动对财富生产的实际物质贡献，比起资本工具来，现在是很小的。如果说今天美国工人对财富生产的物质贡献，不到所生产财富的10%，而资本工具的所有者通过他们的资本工具所作出的物质贡献，占所生产财富的90%以上，这不是夸张，而是低估了。”^①这种掩盖资本家剥削本质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第一，他们所说的“资本工具”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因而“资本工具”本身就是转移到生产资料上的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凝聚。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工具”的价值只有通过工人的劳动才能部分地转移到新产品上去，“资本工具”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以资本家用机器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只是来源

^① 转引自商务印书馆资料室编：《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1964年版，第161页。

于资本的可变部分。”^① 无论凯尔索和阿德勒怎样说“资本工具”可以脱离工人的劳动而“独立作出物质贡献”，“资本工具”在今天的美国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都不能否定劳动是价值的最终源泉。凯尔索和阿德勒从污蔑劳动价值论的庸俗价值学说的基础出发，提出了所谓“经济公平”的分配原则。按照这个原则，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家在财富生产中的“贡献”比工人的贡献“越来越大”，因而所得的份额应该“同比例地”增多。可是，“美国的工人在财富生产中的贡献只有10%，却得到了国民收入的70%”^②，因而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而是工人“大大地剥削了”资本家。

例二，所谓“资本民主化”。资本家为了加速资本的集中过程，创建了股份公司形式的大企业。随着股份公司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流行和股票持有者人数大为增加，“资本民主化”的理论就应运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爱德华·伯恩斯坦就说过：“股份公司‘能够’使资本分散”^③。本世纪20年代，在美国喧闹过一阵“所有权分散论”。美国资产阶级学者瓦休在《美国各公司股份所有权的分配》一文中说：“在美国，股东人数增加很多。不但所有权基础扩大了，而且股份所有权由富有阶级转移到中产阶级和工资阶级手中。”^④ 50年代以来，由于股票持有者人数进一步增加。“资本民主论”获得更大规模的宣传。美国经济学家纳德勒说：“美国的经济正在很快地带有我们可以称为‘人民资本主义’的那种性质，在这种制度下，全国的生产设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46页。

② 转引自严仁赓等：《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第5册，第22页。

③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4卷，第175页。

④ 转引自厦门大学经济学系编：《“人民资本主义”批判》，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页。

特别是工业设备，已经逐渐为低等或中等收入的人士所占有。”^①美国经济学家P. A. 萨缪尔逊也惊呼：“所有权分散在成千上万的小股东手里的现象成为大公司的最令人惊奇的特征。”^②美国经济学家M. 萨尔瓦多里则进一步宣扬阶级界限的消灭，他写道：“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少地属于特权人物，而分享其利的人则大大增加，它已民主化了。”在美国，“大部分工人有一些资产，大部分资本家劳动。……工人与资产所有者的合流，已经发展得足以抹平二者间的严格划分，而这种划分在其他国家则成为社会冲突，特别是阶级斗争的主要根源。”^③综上所述，“资本民主化”的主要论点是：由于资本主义公司的股票分散在成千上万的人手中，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已发生了“变化”。它不再由少数资本家所占有，“千百万人民正在变成资本家”，“人民控制着他们自己的私营公司。”^④

股份公司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企业。如果撇开其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而就其形式来看，它是广泛筹集资金和吸收更多的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有效方式，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化意义。所以可以说，股份公司在形式上包含着社会化的因素。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资本的民主化”真的能使少数资本家不成其为资本家而人民成为资本家吗？让我们作一点分析吧。战后以来，美国股票持有者人数是有增加的，如1952年有650万，1959年有1 250万，1965年有2 010

① 纳德勒：《人民资本主义》，纽约1956年版，第5页。

② 萨缪尔逊：《经济学》，纽约1961年版，第92页。

③ 转引自严仁赓等编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第5册，第4页。

④ L. 劳伦斯：《什么样的一种世界？》，转引自严仁赓等编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第5册，第19页。

万，1972年有3 250万，1975年有2 520万。^①但是，持有股票的是些什么人呢？据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计资料推算，1971年美国各类人员持有股票的市场价值的百分比分别为：企业主、经理、食利者阶层占78%，中等阶层占6.2%，工人占5%。^②目前，美国股票持有者人数虽然有三四千万，但大部分人只持有很少量的股票。1958—1971年，收入最高的1%家庭持有股票的价值始终占到51%以上。^③1976年占人口0.1%的24万大富翁占有了股票市场价值的20%。1983年，最富有的10%的家庭持有公司股票的比例为89.3%，其余90%的家庭持有公司股票仅10.7%。^④那种看到股票持有者人数增加就说所有权在“分散”是同美国的现实不相符合的。股份分散的实质是资本所有权的集中。列宁指出，所谓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实际上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股份分散，意味着垄断资本家可以控制和支配比自己拥有的资本更大的社会资本。在20世纪初期大股东要控制某个大公司需要占有其40%的股份。现在只要占有1—2%的股份就能大大影响大公司的政策，占有5—6%的股份就能有效地控制大公司。例如，洛克菲勒家族只占有大通曼哈顿银行5%的股份，就牢牢地控制了美国第二家最大的银行。还应该指出，战后以来，股份资本在大公司筹得的其它资金形态中所占的份额相对来说并不大，因为公司对增发股票总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因此，股份的分散对资本家阶级构成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其三，所谓“权力转移”论。现代资本主义的公司企业一般由资本占有者雇佣管理人员直接经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有

① 参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3年2月26日和1975年12月22日。

② 参见《商业现况》，1974年第11期，第29页。

③ 同上，第25页。

④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美国财富集中状况》，第24页。

一定程度的分离。于是，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片面夸大这种现象，并作歪曲的解释。他们提出，公司企业的权力已从企业主转移到职业管理人员手中，公司企业在职业管理人员的掌握下实现了民主化，也不再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而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企业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企业主也就不再是资本家。美国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J.K.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大公司的权力转移到了一些在生产、经营、财务、推销、法律、科技研究等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材的手里，他们担任公司的经理、工程师和各级主管等职务，他们的决策最有权威性。这样一来，“权力已经从股东转移到管理部门……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以后，对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设就引起了剧烈的争论。”^①美国管理主义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R.马里斯这样表述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中发生的权力过渡现象：“管理的资本主义，这是20世纪中叶在西欧和北美形成的经济制度的名称。在这种经济制度中，生产集中到大股份公司手中，在许多经济部门，古典式的企业家实际上已经消失……结果，现代大公司中的企业家的职能落到了从事公司内部管理工作的人员手中，他们的立场与传统的从属人员或‘单纯的管理者’的立场有所不同。这些人可以掌握权力，但不一定拥有股票资本从而分沾利润，也不承担亏本的风险。”^②这样，在他们看来，资本家变成了消极的被剥夺了权力的股东。美国经济学家A.伯利为此写道：“资本依然存在，资本主义也原封不动，唯一趋于消失的人物是资本家。”^③资本家真的失去了控制公司的权力吗？资本家真的在趋

①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0页。

② 马里斯：《管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伦敦与纽约，1968年版，第11页。

③ 伯利：《20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纽约，1954年版，第7页。

于消失吗？事实并非如此。所有权和经营权形式上相分离，实际上是统一的。经营权总是来源于和归属于所有权。马克思指出，权力始终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结合在一起。“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①资本家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一致，资本家是凭借经济上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才得以对企业实行计划和监督的职能。“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②资本家脱离企业的具体经营，但并没有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股份公司现在大体分为两类，其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关系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一类是不发行股票的公司，公司财产分成若干股份，由家族成员或亲朋好友掌握。这类股份公司一般是中小企业，其数量占股份公司的大多数。这类股份公司与经营权有某种分离，但所有权的财产约束关系依然清晰可见。首先，资本家控制了企业的人事大权。企业的管理人员由资本家雇佣。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被资本家用高薪和奖赏等手段收买，实际上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已被资产阶级所同化。他们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对企业的管理也就是资本家对企业的管理。其次，资本家虽然不参与企业管理，但对企业的计划、投资、利润分配、劳动工资等关系企业命运的大事则是掌握了决策权的。资本家的董事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经理人员不过是执行者。当经理人员的管理违背资本家的意旨时，资本家就会毫不客气地收回自己的经营权。例如，美国最大的运输公司之一“联合航空公司”多年来由派得逊控制。1963年，派得逊退休了，由凯克担任高级经理。但公司的董事会继续由派得逊指定的董事们控制。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9页。

凯克想“按自己的方式来经营”，终未如愿。1970年12月，凯克不得不宣布“拒绝担任傀儡”而辞职。^①另一类股份公司向社会大众发行股票，其股票在市场上公开买卖，它们一般是大企业。在这类公司中，股东对公司的经营虽然无直接的约束权，但可以通过市场买卖股票的方式，迫使经营者为其利益负责。高度发达的股票市场实际上是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所有权和经营权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其四，所谓“知识资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用“知识资本”来解释公司权力的转移，并进一步引伸出阶级关系变化的结论。加尔布雷思继承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庸俗经济学家J.萨伊的“生产三要素”理论，并在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之外加上一个新的要素——专门知识。他提出，由于工业不断发展，技术迅速进步，出现了“储蓄过多的倾向”，现在资本不再是“稀缺的了”，而专门知识却成了“最难获得或最难代替的”生产要素，从而使得权力转到了高级经理人员、科技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的手里，而原来掌握权力的资本家成为“正在消失的形象”。^②他从此得出结论说：由于这种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不应再以财产状况，而应以受教育的状况来区分阶级。当前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有知识的人同没有知识的人之间的矛盾。加尔布雷写道：“在美国，怀疑与愤怒不再指向资本家和单纯有钱的人。人们带着忧虑和惊异望着知识分子。这不会使任何人惊讶。当粗通文字的百万富翁出来领导或经济上支持没有知识的人，反对知识

① 转引自厉以宁：《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9页。

② 参见傅殷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初析》，载《经济学动态》1983年第12期。

上的特权者和满足者的时候，这也不足为怪。这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阶级区分。”^①美国未来学家贝尔、莱恩、奈斯比特、托夫勒等人，就是以知识为中轴来考虑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又称“知识社会”、“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的社会结构，从而得出结论说：“正在兴起的新社会里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

“就地位而论，知识阶级可能是新社会中的最高阶级，但是根据那个结构的性质，这个阶级以其内聚力或共同一致性的基础而言，并没有成为一个新的经济阶级或者争夺权力的一个新的政治阶级的内在理由。”^②在贝尔设想的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中，以专业阶级为主，它包括科学阶层、技术阶层、行动阶层和文化阶层。除此以外就是技师和半专业人员、职员和销售人员、技工和半熟练工人。财产所有主或商人作为一个阶级完全不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承认知识对社会有重大影响，认为科学阶层是内部蕴藏着未来社会胚胎的细胞，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把知识作为阶级的基础则是完全错误的。知识并不是生产资料，在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社会，任何知识才能都只能依附于资本，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支配。知识只有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成为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知识是没有生产资料的知识分子受雇的条件，能管理和使用生产资料，但不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家阶级由于掌握了生产资料而处于统治地位，许多失业的知识分子无处运用自己的知识。广大受雇的知识分子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获得谋生的机会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经济状况，但是他们因受雇主的支配而不能自由地充分地发挥知识的作用以达

①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载《经济学动态》1983年第12期。

②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411页。

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受剥削和统治的阶级地位。只有消灭了私有制，知识才会获得无穷无尽地自由地发挥其作用的条件，知识分子才会成为知识的真正主人。

第三节 评“经理阶级论”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劳动分工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了代替资本所有主担负企业的监督和指挥工作的职业管理者——经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①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随着股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广泛发展，随着生产的集中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资本所有者日益把企业事务的日常监督和经营管理更多地交给雇佣的管理人员去担当，于是经理人员大批大批地出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企业主直接经营管理到由经理人员专门负责经营管理的转变叫做“经理革命”，把经理集团看作“经理阶级”。1932年，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A.贝利和G.米音斯在《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说，“当所有权非常分散时，董事会的成员就变成一个自行永存的集团。”这个集团就形成了“经理阶级”。^②40年代初期，美国的经济学家J.白恩汉出版了以《经理革命》为名的著作，认为经理的力量和自主性在增强，爆发了夺取企业主的权力的“经理的革命”。白恩汉认为“经理革命”是一种由于权力转移而发生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5页。

② A.贝利、G.米音斯合著，《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纽约1932年，第86页。

会变革，通过这场社会变革，社会的统治阶级已经由过去的资本家变成了现代的企业管理者们。他写道：“这些变化意味着，经理们无论作为个人来说，还是从法律地位或历史地位来看，都越来越不再和资本家一样了。有一种连带在一起的转变：经理的职能通过生产技术的变更而变得比较特殊、比较复杂，比较专门化，以及对于整个生产过程比较有决定性，从而使得那些履行这些职能的人，作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集团或阶级与众不同。”^① 50年代，在美国，“包括大小公司，合伙和许多个人所有但非个人经营的企业内，经理阶级的人数已达百万之多。”^② 60和70年代，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越来越多，除了“经理阶级”的提法外，出现了包括经理在内的概括所有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新术语，如“技术结构阶层”（又译作“专业组合”）、专业管理阶级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经理阶级美化成起于布衣，与资本家毫无瓜葛，清贫自守的人。形成“经理阶级”的是些什么人呢？据他们说，“担任职业经理的人主要是由于他擅长于这种工作。他往往是从下层工作开始，由于劳绩提升上来的；更经常的是从许多聪明的和受过适当教育的青年人当中慎重地和科学地挑选出来的，他学习有关训练经理人员的课程，并且逐渐担任最能表现他的才能的工作。”“飞黄腾达的条件只是有智慧、有魄力和受过教育；财富和家庭关系当然有所帮助，但目前要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小。”职业经理“靠他所挣的钱为生，甚至当他拿高薪时，付税以后所剩也就无几了。”^③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职业经理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下列不同于资本家的优点。一是经理更关

① 转引自厉以宁：《论加尔布雷斯的制度经济学》，第53页。

② 转引自严仁赓等编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第5册，第27页。

③ 同上，第129页。

心如何尽可能地使企业长久兴旺，进行再投资常常优先于红利的分配，而资本家主要关心的是在最短期间内尽可能多赚钱，结果甚至削弱或弄垮了企业。二是经理对工人有责任感，关心和同情工人，愿意缓和劳资关系，而不像资本家那样自私自利和对工人那样狠毒。三是经理有对社会的责任感，认为他们的企业不仅是为股东和工人的利益，而且要为全民的公共的利益经营下去，而资本家则以盈亏得失来衡量企业的经营。总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笔下的经理阶级是一个不同于资本家阶级的新中产阶级。

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论述过经理问题。马克思多次提到，经理人员是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他写道：资本家“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① 马克思认为，经理没有生产资料因而他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②。经理的工资一方面“会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这种工资又像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会随着使特种熟练劳动力的生产费用下降的一般发展，越来越降低”^③。恩格斯也认为经理人员是工资劳动者。1881年他在《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中指出，“铁路和大部分远洋轮船都不属于那些亲自经营业务的单个资本家，而属于股份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由支薪的雇员，由那些实际上地位相当于位置较高和待遇较好的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7—438页。

人和职员代为经营。”^①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来看，他们倾向于把执行资本家职能的经理人员看成是工资劳动者，看成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特殊的构成部分。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经理是“为了低微的工资”而受雇的“单纯的经理”^②，其地位十分低下，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下层管理人员，因为只有下层管理人员才真正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才拿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理人员的论述对于我们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下层管理人员仍然是适用的，但如果机械地搬用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就不合适了，这是因为高级管理人员在经济地位上已转化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一百多年来，随着股份企业的规模扩大，企业管理的环节增多，因而管理人员也增多并分化为不同的层次，管理人员形成了金字塔权力结构。处在金字塔顶部的就是高级管理人员，一般是指大公司企业的董事长、总裁、副总裁、正副总经理以及其他上层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经理阶级，他们表面上受雇佣的形式并不能掩盖其资产阶级的本质。在判断现代资本主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阶级属性时，我们应该以下述的实际状况为依据。

第一，现代资本主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一般都拥有本公司的股票，有的则是公司的大股东，因此他们占有了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下表^③是美国50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行政首脑即董事长、总经理握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上述材料表明500家大工业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中90%以上都握有本公司的大量股票，都是本公司的重要股东或最大的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

③ 资料来源：《幸福》杂志，1976年5月号，第176页。

股票价值	百分比
不拥有本公司的股票	9.8%
低于10万美元	16%
10—50万美元	28.9%
50—100万美元	15.6%
100万美元以上	29.8%

东。就少数不拥有本公司股票担任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人来说，他们一般都拥有别的公司的股票，都是有巨额财产的人，有些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原先并没有巨额财产，并不是公司的大股东。但这类人在为垄断资本家效劳期间获得高薪，并运用公司给予的按优待价选购相当数量的本公司股票的权利，也就逐渐变成了拥有本公司大量股票的重要股东。例如美国福特公司总经理麦克纳马拉出身中产阶级，哈佛商学院毕业后于1946年进福特公司任一般经理，得到大老板福特第二的赏识，不断得到提拔，1960年提到福特公司总经理职位时，已积累了市场价值为160万美元的股票。此外他还保留着按优待价格购买价值350万美元的本公司股票的权利。又例如，美国西部最大一家零售公司的董事长卡特原是哈佛商学院教授，1946年参加该公司工作时手头没有股票，到1972年他已拥有价值1 000万美元的股票，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① 这些例子说明，一个没有多少财产的一般管理人员在爬到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位时就已不是一般雇员，而是转化成为腰缠百万的大资本家了。

第二，现代资本主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俸优厚，不仅远远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而且大大高于中下层管理人员和熟练专

^① 参见《商业周刊》，1972年4月15日，第91页。

家的收入。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2年5月的调查材料，在美国349家最大企业领导人中，有26人年薪为100—266.85万美元，74人年薪为70—100万美元，75人年薪为60—70万美元，102人年薪为50—60万美元。最高数目266万是美国总统年薪20万美元的12倍。现代美国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金是一般管理人员薪金3—5万美元的数十倍。西欧各国也类似。高级管理人员的高额薪金中也许多少包含应得的（无法精确计算的）劳动报酬，因为经营管理劳动也创造价值。但是他们的绝大部分薪金实质上是从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转化形态，是从资本家获取的利润那里分割来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一部分工资表现为利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如亚当·斯密已经正确地发现的那样，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这个利润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同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总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后作为所谓企业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相独立并且完全分离出来。”^①一个高级经理即使没有股票，也就是说没有生产资料，但仅凭获得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态的高薪这一点，就可以说他实际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尽管这种实际占有缺乏法律的形式。如果把拥有生产资料仅理解为法律上的所有权而不承认实际的占有权，那就会看不清那些形式上不拥有生产资料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资产阶级实质。

第三，现代资本主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与企业主的根本利益是共同的。从资本家对代理人的选择来看，被提拔到企业领导岗位上的人都是最能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的人，即使他们出身于非资产阶级家庭。近几十年以来，美国各大公司的高级经理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1页。

员的家庭出身状况有一定的变化。据1976年《幸福》杂志对500家最大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和50家最大商业银行、人寿保险公司、各种金融企业、零售公司、运输公司、公用事业公司的300名高级经理人员的调查，几乎有25%的人出身于蓝领工人或小职员家庭。^①这些非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高级经理人员是由于对老板的忠心效劳才一步一步地爬上来的，他们的职位上升过程就是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过程。资本家也乐于挑选非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作自己的代理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西欧中世纪时，“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②从企业的经营目的来看，资本家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与高级经理人员的私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据美国《幸福》杂志报道，近些年来，有些刚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司工作的青年经理人员批评过公司的“盈利政策”，认为“公司的主要缺点是‘过分’强调利润”。针对这种情况，有的公司的高级经理把这些青年经理人员召集开会，让这些“不了解社会和竞争”的人理解公司的处境，以便统一思想认识。高级经理对他们说，“少赚些钱”固然是件好事，但如果只有一家公司这么做，“而竞争者不这样干，它就很可能破产。”《幸福》杂志最后这样写道：“那些性急的青年经理们看来不认识这些复杂性。”^③由此可见，现代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所谓“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不以最大限度利润为目标”，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经理人员的“迂阔的理想”，决不是老于世故经

① 参见《幸福》杂志，1976年5月号，第1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9页。

③ 《幸福》杂志，1971年3月号，第104页。

验丰富的高级经理的思想。高级经理对社会和公共利益并不抱有责任感，他们经营企业的目标就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当然，高级经理和资本家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经济形势下会有行为动机的差别。一般说来，高级经理在经营决策上不像资本家那样急功近利，比较稳重，不大愿意冒险，这只能表明他们为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加尔布雷思认为，经理人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薪水和奖金，所以企业赚得多或赚得少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高级经理的薪水不是固定不变的，奖金更是随利润的多少而变动。有人对93名高级经理报酬的调查表明，“公司的现金利润收入和资产的盈利率是影响高级经理报酬的整个水平的主要变量”。变动的幅度有时是相当大的。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1969年的薪水和奖金为44.2万美元，由于公司盈利多，1971年上升到67.5万美元。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总经理1969年的年收入为24.8万美元，因公司赚钱，1971年达到35.5万美元。反之，由于1971年美国钢铁工业和有色工业盈利状况不佳，1971年和1970年相比，钢铁工业高级经理的年收入下降8.9%，有色金属工业高级经理年收入下降17.2%。^①除了薪水和奖金外，高级经理的优惠股票同公司赢利有很大关系。公司赚得越多，股票行情越高，获得购买股票特惠的高级经理的私人利益也就越大。总之，通过薪水、奖金和股票，高级经理的切身利益紧密地同公司的盈利目标拴在一起。从对待工人的态度看，高级经理人员并不比资本家好，因为他们都是工人的剥削者和统治者。高级经理人员由于经营管理的需要，不得不给工人施点小恩小惠，“关心工人”，使工人以厂为家，吸收工人的合理化意见并加以奖励；在劳资冲突中迫于工人阶级斗争的压力不得不作出让步的姿态，这都是为了

^① 转引自王慎之：《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5页。

安定工人，刺激工人卖力工作。高级经理人员主要是通过加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精心制定和推广所谓行为科学方法，加速掠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正是在技术高度发展的采用自动装配线的大公司中，工人们抱怨说：“速度总是太快”，“这简直不是人干的工作”，“经理们想得到的是超过工人能力所及的东西”，“每天干同一种活，白天黑夜都这样干”，“简直像在牢房一样”，“工头还老是催我们快快快”。^①连美国一些黄色工会的领导人都不得不承认，高速生产作业线的“非人道化”是目前工厂爆发罢工的直接原因之一。^②

以上的事实表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按其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占有，对工人的剥削和在生产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来说，完全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传所谓“经理阶级”是独立于资产阶级之外的阶级，把极少数高级管理人员同大多数一般管理人员混为一谈，其目的之一就是以此抹煞高级管理人员的资产阶级属性，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

① 转引自厉以宁：《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第168页。

②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2年10月30日，第84页。

第五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层

第一节 中间阶层的构成及其变化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层是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居于中间状态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它包括城乡小资产阶级及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管理机构中占中等地位的雇佣工作者。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互不相同的一些集团的集合体，其中每一个集团在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各占据自己独特的地位。某些社会集团与工人阶级接近一些，另一些社会集团则与资产阶级接近一些，还有一些社会集团则不与两个基本阶级毗连。在广泛的社会领域里，存在着许多等级和从一个阶层过渡到另一个阶层的阶梯。可见，中间阶层是个非常广泛的社会范畴，而不是一个社会阶级。我们之所以不用“中间阶级”这个概念，一是因为我们不认为它本身是一个阶级，二是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中间阶级”（通常译作“中产阶级”）这个术语，同马克思主义者讲的“中间阶层”在内涵上有原则的区别。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间或也用过“中间阶级”这个词，但通观上下文，其含义仍指的是介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各个社会阶层，与我们使用的中间阶层是

同一个意思。在现实生活中，中间阶层远非总是表现为严格确定的和一目了然的集团。他们常常处在同各种职业、部门、文化、种族和其他共同体的复杂结合之中。实际上，社会的千百万成员也不可能用完全相同的社会经济特点加以区分，而确定某一具体社会集团的具体阶级界限和阶级属性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所说的中间阶层（特别是边缘性的集团）同基本阶级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消灭中间阶层，而只是一方面不断冲刷旧的中间阶层，另一方面又不断再生产出新的中间阶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和科技革命的迅速推进，不但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也影响到了中间阶层。

中间阶层最鲜明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农村小资产阶级在最近几十年急剧减少，而它恰恰过去是中间阶层人数最多的一个社会集团。农村人口减少到几乎最低限度，农民严重分化，大批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流入城市，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普遍现象。下表^①反映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自立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下降的情况。

国家	年代	农业自立人口数量(千)	占全国自立人口的比重(%)
美国	1950	6 900	12.2
	1982	3 870	3.4
英国	1951	1 422	5.6
	1980	657	2.5

① 资料来源：波捷欣主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基辅1978年版，第41页；《世界经济年鉴》（1983—198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3页。

法国	1954	5 142	27.3
	1982	1 758	7.6
联邦德国	1950	5 112	23.2
	1982	1 405	5.1
意大利	1951	8 261	42.2
	1981	2 239	10.1
日本	1950	17 352	48.3
	1980	6 111	10.7
加拿大	1951	1 009	19.1
	1983	519	4.4
奥地利	1951	1 079	32.3
	1974	487	16.0
瑞士	1950	355	16.5
	1970	231	7.7
比利时	1947	424	12.2
	1974	162	4.5
瑞典	1950	635	20.3
	1974	272	8.1
丹麦	1950	518	24.5
	1974	233	9.5
挪威	1950	360	25.9
	1973	201	11.6
芬兰	1950	912	46.0
	1973	429	18.4
荷兰	1947	748	19.3
	1971	325	6.8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是：（1）科技革命导致农业过渡到机器生产阶段。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大幅度提高，从而排挤了大量使用落后生产手段的个体农民和中小农场主。（2）战后各国经济的恢复和一度高涨，工业生产规模扩大，第三产业的兴起，能够吸收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大量劳动力和资金。（3）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调节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向大农场提供相当多的补助金。（4）资本在农业技术改造中的作用加强，工商业垄断资本直接渗透到农业领域，建立垂直一体化的农工商综合体。农村中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蓬勃发展不仅造成农业人口的大量减少和外流，而且导致作为一个阶级的传统农民消失。在垄断和竞争的双重强大压力下，传统农民迅速分化，少数人成了大农场主即农业资本家，一部分人成了中小农场主即农村小资产阶级，一部分人沦为农业雇佣工人或半农业雇佣工人，大部分人流入城市或成为工人或转化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垄断资本对农业的控制日益增强的条件下，农业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这就是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越来越垄断化。不仅资本家经营的农场，而且小资产阶级经营的农场，都日益被纳入垄断化的轨道。小资产阶级农民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独立自主性，不得不依赖于垄断资本的垂直一体化的农工商综合体。这样，农村小资产阶级就受到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控制，从而存在着与垄断资本家的深刻矛盾。当然，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也不是绝对的。小生产的概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资本主义农业技术改革所毁灭的并不是一般的小生产，而只是非机械化或机械化水平低的小农户和小农场。农业的机械化与工业的机械化有所不同。工业

中使用机器系统需要许多工人的协同劳动，而农业的机器都是小型轻便的机器，照料一组机器往往只要几名工人，甚至只要一、二名工人。农业机械的这种特点使得一部分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小农户和小农场保存下来。因此，资本主义大农场并没有在农村中占完全的统治。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新的人数众多的农业生产者阶层，他们不使用或者极少使用雇佣劳动力，而是采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先进技术，进行集约化经营。他们基本上是由过去比较殷实的小农户和小农场主组成。由于这种集约化家庭经济具有经营合理、对市场变化的适应性强、非生产性开支较小等优点，因此在西欧各国这种采用集约化家庭经济的农业生产者阶层的户数正在增加。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大企业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这种集约化家庭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在农村的中间阶层急骤减少的同时，城市的中间阶层在自立人口中的比重没有缩减，其绝对人数往往还有所增加。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中间阶层50—70年代的人数和所占比例的情况如下表^①（见下页）：

从下表可以看出，城市中间阶层的地位是相当稳固的。这与下列因素有关：（1）第三产业的广泛发展为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第三产业，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远比工业小，劳务的作用比较大，因而不需要多少资本就可以建立小企业。（2）许多农村小资产阶级流入城市，他们将自己原有的农业资金转移到工商业部门，成为城市小业主。（3）社会劳动分工的加深，情报信息和管理活动的作用不断增长，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膨胀，进一步促进了中级职员和中级官员的人数和比例的

^① 资料来源：波捷欣主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基辅1978年版，第42页；隅谷三喜男编著《现代日本劳动问题》，第100页；日本《经济》杂志，1979年3月号。

国家	年代	城市中间阶层的人数 (千)	占全国自立人口的 比重 (%)
美国	1950	9 840	16.9
	1960	12 382	18.2
	1970	14 740	18.2
英国	1951	2 369	15.3
	1966	4 550	16.8
	1971	4 850	19.1
法国	1954	3 464	18.0
	1968	3 576	17.5
	1972	3 884	18.7
联邦德国	1950	3 514	16.0
	1970	4 201	16.1
日本	1955	23 108	55.1
	1975	15 770	29.2

提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中间阶层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在传统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外兴起了由中级职员和中级官员组成的阶层。中级职员和中级官员通常被看作是新中间阶层。现将城市中间阶层作以下分类：

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1）制造业和采掘业的小企业主；（2）建筑业的小承包人和次承包人；（3）手工业者；（4）小零售商人；（5）服务业中的小业主；（6）自有运输工具的司机；（7）保险和不动产的小事务所经营者。

自由职业者包括：（1）小法律事务所的主人和私人开业的律师；（2）小医疗诊所的主人和私人开业的医生；（3）独立的建筑师；（4）非雇佣劳动者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新中间阶层：（1）私人垄断组织管理机构的中级工作人

员；（2）工业、金融和商业企业管理机构的中级工作人员；（3）中等企业管理机构的中级工作人员；（4）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中级管理人员；（5）科学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市政公用事业机构中的中级工作人员。这里所说的中级工作人员指担任中级领导职务（股长、科长、处长、分经理、主任等）的管理人员和地位与之相当的中级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几乎都是知识分子。

游民。他们是失去职业和阶级性的人。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中间阶层变化的重要特点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这类旧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比重略有减少，而中级职员和中级官员这类新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比重显著增加，其变化对比如下表①：

国家	年代	旧中间阶层		新中间阶层	
		人数(千)	比重(%)	人数(千)	比重(%)
美国	1950	4 676	8.0	5 160	8.9
	1960	4 682	6.9	7 700	11.3
	1970	3 690	4.6	11 050	13.6
英国	1951	1 311	6.0	2 500	9.3
	1966	1 295	5.2	3 050	11.6
	1971	1 560	6.3	3 100	12.6
法国	1954	2 432	12.6	1 039	5.4
	1968	2 062	10.1	1 512	7.4
	1972	2 066	10.0	1 810	8.7
联邦德国	1950	2 065	9.4	1 449	6.6
	1970	1 846	7.1	2 335	9.0

① 资料来源：波捷欣主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42页。

城市中间阶层混合了各种社会集团，成分繁杂，对它们的变化需要分类加以考察。

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特征是：拥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具有独立生产者的地位；直接参加生产过程；有轻微的雇工剥削（一般雇工在5—10人以下）。由于劳动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及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资产阶级会发生某些变化，但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这个本质特征不会改变。在资本集中和科技革命的影响下，那些自己管理自己的资金而又不雇很多雇佣劳动者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纷纷破产。法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在法国，1954—1966年，在雇佣不到5人的手工业企业中有12.75万家关闭，1954—1968年，小商业主减少了9万人，这基本上是不雇人的企业。^①许多传统的手工业部门在消失。但是，现代化大企业并不能完全吞并和消灭小企业。一方面，落后的老式手工业者不断被现代化生产排挤。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生产和科技进步的影响下，逐渐发展了一种使用最新式的技术装备的新式手工业。这种新式手工业不仅没有受现代化工业的发展所破坏，而且还同现代工业的生产相辅相成，它顺应了现代工业中小型化和多样化的趋势。一方面那些资金较少经营不善的商业和服务业的小业主在竞争中被淘汰，另一方面还是有大量的小商店和小旅馆与超级市场和大饭店并存，这主要是因商业和服务业的小企业能满足社会多样化消费的需要。由此可见，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还将顽强地生存下去。

自由职业者在性质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以前的自由职业者是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独立提供精神享受和劳务的生产者。他们一般不使用雇佣劳动，或者雇佣很少几个劳动力作帮手。现

^① 参见法国《经济与政治》，1970年10月号，第145页。

在，自由职业者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集团。在资本主义竞争的作用下，一部分自由职业者由于积累了相当的财产而成了资本家。提供精神享受和劳务的生产，发展成大的商业企业，大中小法律事务所、私立学校、私人诊所和私人医院广泛建立。具有手工和半手工劳动的药品生产、出版印刷发展成实力雄厚的专业化部门（制药工业、印刷业）。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自由职业者以股东的身份掌握劳务和精神生产的企业，集中了以最新技术和设备为形态的大量资本，因而就不再是真正的自由职业者，而属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精神生产和劳务的资本主义化的结果，一方面是少数自由职业者上升为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大多数自由职业者即普通的律师、医生、教师、新闻记者、艺术家失去以前的社会地位，成为雇佣或半雇佣劳动者。据法国1962年调查的材料表明，30%的法律工作者，近半数的卫生事业和社会事业的工作人员，2/3的艺术家和美术工作者已经成为受雇的工资劳动者。^①1969年法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每100名医生中有22人是全部时间受雇于人，32人是部分时间受雇于人，完全自行开业的医生不到一半。^②雇佣劳动化有多种形式，或者是并入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劳动医疗），或者是并入公共机构（全日制医疗），或者是依靠由银行资本投资的联合医院的发展来建立专门的资本主义企业。这样一来，名副其实的 free 职业者只剩下那些私人开业的专家和在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从事精神生产和劳动的小私有者。这一类的自由职业者也还在分化，其方向明显是私人开业的专家竭力想成为在自己专业领域做小生意的私有者。

城市的新中间阶层即中级职员和中级行政官员，是广大受雇

① 参见法国《经济与政治》，1968年11—12月合刊，第40页。

② 参见法共中央经济部等编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1页。

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与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受私人或国家雇佣，靠薪金为生。他们的这些特点同工人阶级的特征相一致。广大受雇的普通管理人员和低级专业技术人员已经无产阶级化，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级职员和中级官员还没有无产阶级化，在经济、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与工人阶级保持着重要的差别，并且由于资产阶级的收买政策这种差别难以消除。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他们在社会管理和劳动组织中担任中级指挥员的职务，其工作除了合理的必要的组织管理外，还有对工人和下级管理人员、下级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人身监督的一面，帮助资本家进行剥削的一面。（2）他们有固定的收入，其薪金通常要高于熟练工人的工资2—4倍。例如，美国1969年中级职员年薪平均15 000美元，熟练工人则为8 174美元；法国1970年中级职员年薪平均4 195法郎，熟练工人则为1 924法郎。^①（3）他们在工作条件、休假、福利待遇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优惠和特权，“向上”晋升的机会比较多。（4）他们害怕无产阶级化，要求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拉开工资收入档次，抵制工人管理和监督企业的主张，政治上走中间道路。战后新中间阶层的增长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整个阶级结构中的突出现象，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使绝大多数人变成雇佣劳动者这一历史趋势，同时它又是科技革命、企业大型化、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扩大、行政官员科层制化、科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等方面因素直接影响的结果。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新中间阶层由于其特定的地位所限，始终是雇佣劳动者中的一小部分。

游民或称流氓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由

^①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5年，第361页；法国《人民》1974年第3期，第11页。

于它脱离了无产阶级，失去了无产阶级的特性，我们在这里把它当作中间阶层。资本主义由于不能解决基本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就不断扩大再生产出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堕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人数和比重还不小，并且有增加的趋势。被冲刷的社会集团经常向社会最底层的人提供骨干。堕落到社会最底层的人是那些由于物质损失和破产引起的精神震荡而不能恢复元气的人，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找不到自己劳动的新领域。处在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集团的成分开始显示出稳定的趋向。加入这个脱离生产劳动的社会集团的人，除了上述堕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外，有“结构性”失业的牺牲品，即那些由于年龄或旧的专业不适用而找不到新的专业工作的人，有受教育水平低因而不可能得到最低职业训练的人。在这个社会集团中占有显著位置的是劳动能力低的老一辈人。随着科技革命展开这些人获得劳动的机会将不断减少。他们暂时的失业变成经常的永久的失业。

战后几十年中，虽然城市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比例稳定中有增长，但是农村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比例下降幅度大，故城乡整个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比例有一定的缩减。下表①反映了战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中间阶层人数变化的情况：

整个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间阶层战后这些年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占全国人口的20—30%，是一个仅次于工人阶级的庞杂的社会阶层。这一事实决定了它仍然是工人阶级需要争取的同盟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中间阶层一方面不断地分化补充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对立的基本阶级中去，另一方面也不断纳入一部分破产的资本家和一部分来自工人队伍的人。中间阶层由

① 资料来源：波捷欣主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40页。

国家	年代	人数 (千)	占全国自立人口的比例 (%)
美国	1950	14 934	25.4
	1970	16 090	20.0
	1977	20 700	20.7
联邦德国	1950	7 214	32.7
	1970	5 826	22.4
	1976	5 400	21.0
英国	1950	4 080	18.6
	1971	4 850	18.4
	1979	4 900	19.0
法国	1954	7 021	36.6
	1972	5 661	27.3
	1977	5 300	25.2
意大利	1951	8 899	45.4
	1971	6 480	33.6
日本	1950	25 780	61.7
	1965	17 716	37.3
	1975	16 700	30.8

于具有这种混杂的成分，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对立的基本阶级的同盟者。因此，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必须制定对待中间阶层的正确战略和策略，从而有效地把中间阶层的大多数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挫败资产阶级拉拢和欺骗中间阶层的社会政策。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间阶层问题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层发生的上述结构性变化引起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的怀疑、责难和攻击。因此，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中间阶层的论述，弄清马克思主义关于中间阶层的基本观点，从而正确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现状和变化趋势。

有的资产阶级学者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简单地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是一种“简单的两级分化的阶级结构观”，似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从未予以足够的重视。^①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中侧重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忽视中间阶层。据初步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9卷中，就有83处直接论及中间阶层。至于对中间阶层的具体成分如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的论述那更是多得难以计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层的概念、特征和历史地位作了深刻的科学阐述，丰富和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认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各种社会集团的概念始终没有使用一个固定的统一的名称，而是交替使用如下名称：小资产阶级（Kleinbürgertum）、中等阶级（Mittelklasse）、中间阶级（Mittelklassen）、过渡阶级

^① 参见J.洛普里尼与L.哈泽利格合著：《阶级，冲突与变动》，伦敦1977年版，第21页。

übergangsklassen)、中等阶层 (Mittelschichten)、中层等级 (Mittelstände)、中间阶层 (Zwischengruppen)。

下面分别例举说明这一点。(1)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1871年) 这部名著中谈到巴黎公社的伟大功绩时说：“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层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和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① (2) 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 一文中指出：“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残余和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工人组成的。”^② (3)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 指出：“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③ (4)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 中说：“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④ (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 这部伟大文献中指出：“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页。

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①（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说：“捐税只会使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中间阶层遭到破产，因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能把捐税的重担转嫁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②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用了如此众多的名称来表述中间阶层，但其含义清楚地是指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所有社会集团。他们使用了“阶级”这个字眼，但显然是在广义即阶层的意义上使用而不是在严格的阶级意义上使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中可以发现，他们的中间阶层的概念大体包括这样一些社会成分：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农民、医生、律师、牧师和学者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中间阶层的特点是按其存在的不稳定性接近于无产阶级，按其生活条件接近于资产阶级；中间阶层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居于极重要的地位；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争取联合中间阶层的大多数。例如，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中间阶层“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它“永远摇摆两者之间：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③。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页。

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但是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能继续采取团结中等阶层的正确策略，“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层在结构上出现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不同的变化，但是他们关于中间阶层的基本思想仍然适用于现时代，是现代无产阶级制定联盟策略的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的理论中，最受攻击的就是关于中间阶层趋向消失和社会两极分化的观点。从本世纪初伯恩斯坦就中间阶层的膨胀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企图作出修正，到现代各派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中间阶级化的荒谬理论，都贯串着一个论点：中间阶层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在扩大这一事实，使《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中间阶层趋于消失和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营垒的预见遭到了破产。例如，1940年，英国工党理论家F.德宾说：“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诸阶级，是注定要在其他两个阶级的上下两片磨石之间碾碎的。这是《共产党宣言》的著名预言。……马克思论题的这一重要部分有本质上的错误，冷酷的事实是：近年来中间诸阶级并没有在任何磨石之间被碾碎。相反，他们兴旺了，更多了。”^②50年代，英国工党另一位理论家C.克罗斯兰提出：“社会的阶级结构越发变化多端了……这大部分要归因于技术和专业的中间阶级的兴起（这是马克思所完全没有料到的）。”^③60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9页。

② 转引自格兰特：《社会主义与中间阶级》，伦敦1958年版，第19页。

③ 转引，同上。

代到80年代，类似的攻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屡见不鲜。美国社会学家Z.乔丹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分化观点时说：“工业化国家事变的发展证明这个命题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完全忽视了社会的升迁现象及其后果，由于它预测所有中间阶级和过渡性阶级都要消失，两极分化和分解为两个主要阶级。”^①美国社会学家米切尔在80年代出版的《新社会学词典》中写道：“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是阶级斗争和阶级觉悟，两者产生于阶级成员与统治者之间的令人怀恨的对比（见《共产党宣言》，1848年）。这里限于篇幅，不能对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论述予以充分的讨论，这里只能使读者注意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他的关于社会两极分化的预言并未成为可见到的事实。”^②即使某些左翼学者也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如意大利左翼学者拉比尼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中等阶级逐渐消失的预见已经破产，主张阶级两极分化的论点已不再站得住脚，即使这种阶级两极分化是趋向性的。”^③所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中间阶层趋于消失和社会两极分化的观点的责难，都是违背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事实的。上面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层的构成及其变化的分析，已经用具体统计资料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间阶层在不断减少。如果同马克思所在时代相比，这种减少更加显著，因为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层的主体即农民现在已减少到占人口很小一部分，大多数自由职业者降落到雇佣劳动者的地步。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小生产者的分化和劳动的雇佣化，这种现象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它就会不断地产生

①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103期，第5页。

② 米切尔：《新社会学词典》，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③ 保罗·拉比尼：《意大利的中等阶级》，拉泰尔查出版社1981年。

出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向大资本集中和使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的作用，所以中间阶层不断向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立的基本阶级的两极发生分化是必然的结果。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这种两极分化加以直线化和绝对化，他们指出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展变化的长远历史趋势，并不排除中间阶层的数量在某个国家和在某种具体历史条件下有停滞和增加的可能性，更不排除中间阶层中的某些集团衰落而另一些集团兴起的可能性。就在备受攻击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提到资产阶级社会经常重新形成新的小资产阶级。《宣言》写道：“在近世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已经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资产阶级。它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既然中间阶层的某些浮动的集团能够不断以新换旧，那就可以推断中间阶层不可能很快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完全消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是先知，不能预见一切。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科学分析奠定了后人所遵循的基础。克罗斯兰等人认为马克思完全没有料到技术和专业阶层的兴起，这是十分荒唐的。说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怎么讨论技术和科学队伍的相应扩大，但马克思既然看到机器使用的增长和大规模工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日益转化为生产力的伟大作用，而同时却没有看到需要更多的经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没有看到增加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可能会使更多的人不直接从事商品生产，这是十分不合逻辑的。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论述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加深，经理人员和工程师的作用在日益增加。根据当时经理人员和工程师人数不多和还没有分化为高中低不同等级的情况，马克思就他们受雇佣和参加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这一特征来说，将他们把作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也提到，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可能使

更多的人不直接从事商品生产。他说：“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异常的增进……容许工人阶级中一个不断增加的部分，被使用在不生产的方面。”^①这就是说，马克思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人将要增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评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对采用机器给工人阶级带来某些后果的观点时，肯定了他们的某些正确判断；同时批判了他们为资产阶级剥削辩护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的采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资产者在非生产劳动上的花费增加，“结果仆人和其他靠非生产阶级的钱过活的劳动者就会增加”，“一部分工人变为仆人”，“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上升为中等阶级”。“这些非生产劳动者要消费生产工人的产品，他们在剥削生产工人的利害关系上也多少和那些直接从事剥削的阶级一致起来了。”^②马克思总结性地指出：“他（李嘉图）忘记指出：介于工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③“他（马尔萨斯）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④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的上下文看，这里讲的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的增加，不是指小业主、小商人之类的小资产阶级，而是指“仆人和其他靠非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30页；第2册第6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65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63页。

产阶级的钱过活的劳动者”。“仆人”即资产阶级的奴仆，除了家仆外，还包括在政治上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安全效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警察、狱吏等。“其他靠非生产阶级的钱过活的劳动者”可能是那些为资产阶级提供精神财富和特殊劳务的受雇佣的医生、律师、教师、学者、演员、高级妓女等。由此可见马克思实际预见到了与小资产者不同的、又有别于工人阶级的特殊的雇佣劳动者，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增长，并把他们看作是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不可能预见这种新的中间阶层的确切构成和详细的特征。要他作这样的预见是违背他的科学方法的。除了上面两段引文外，在马克思的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再也没有发现有关中间阶层不断增长的直接论述，这说明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持谨慎的科学态度的。此外，马克思虽然讲了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的增长，但同时又指出在机器排斥工人而又吸收工人的两种不断交错的趋势下，工人仍然是“社会基础”，“雇佣劳动还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它将绝对地增加，虽然和雇佣它的不断增长的总资本相比它会相对减少。”这又说明马克思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随大工业的发展而人数增多这一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布的重要观点。马克思所讲的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的增长并不是绝对地无限地增长，而是讲有人不断地补充到中间阶层中来这种现象。毫无疑问，按照马克思的两极分化观点，中间阶层的人又不断分化到两个对立的阶级其中主要是无产阶级中去。因此，中间阶层总是处在增加和减少的两种运动状态中，总的趋势则是缩小和最后消失，而不是越来越大以致成为社会的大多数。现在有的鼓吹中间阶级化的理论家把马克思关于中间阶层增长的说法加以歪曲和引伸，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条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要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抽掉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就必然断送马克思主义，断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科学社会主义。”^①这样赞颂马克思的中间阶级理论，显然包藏着夸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的意图。我们且不说中间阶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何等的位置，就马克思的上述两段话本身来说也需要作历史的分析。只要仔细阅读这两段话所在的章节内容，就会看到：马克思是针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观点，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理论角度来谈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的增长的。马克思预见到非生产劳动的劳动者和纯粹的消费者有增多的趋势，预见到作为生产劳动者的工人阶级将会因这些人的增多而负担加重，并没有对这些人作具体的阶级属性的分析，而是根据他们是非生产劳动者这一特点，借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话，将他们列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所说的“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的范畴。现在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完全照搬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层。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在人数和比例上接近或超过了物质生产领域的传统产业工人。从阶级属性来说，他们决不都是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如果细作分析，他们大部分属于工人阶级，只有少部分才属于中间阶层。因此，我们必须对马克思关于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的上述论断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它的科学价值和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要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把握其精神实质，不可以断章取义，任意引伸。

国外一些理论家中除了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两极分化和中间阶层的观点外，还有的人竭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发现“矛盾”。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的模式否定了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

^① M.尼科劳斯：《不为人所知的马克思。马克思论述的无产阶级和中间阶级》，巴塞罗那1972年版，第89页。

的两大阶级的模式。在目前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由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雇佣劳动者的人数不断增加，所以有不少学者拥护三个阶级模式。他们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研究，认为马克思早就预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级”的发展。马克思的阶级模式的这一“矛盾”使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陷入困惑。他们相信三个阶级模式更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不过他们没有否定马克思的二个阶级模式，而只是作了一番好心的解释。例如已故波兰社会学家、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斯·奥索斯基对三个阶级的模式作了这样的解释：“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和充满激情的历史观的创造者，他提出了把阶级社会分为两极的观点。而作为社会学家，马克思在分析当代社会结构时又改变单纯的两分化，引进了中间阶级。”^①奥索斯基认为他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一分为三的社会图式。”按照第一种图式，资本家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相应与生产资料“有”各种关系。按照第二种图式，地主、资本家所有者和那些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别无所入的人都“决定于”他们与各种生产资料的关系。这里，“劳动能力也被视为是生产资料的一个范畴”。^②简单说，奥索斯基认为马克思按和生产资料的关系将社会阶级分为资本家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按和劳动的关系又分为地主、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奥索斯基的上述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第一，马克思是革命家和社会学家的统一，当他在《共产党宣言》提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两极分化的论断时，他不仅是革命家，也是社会学家，他完全注意到了中间阶层的问题，认识到了阶级结构的全部复杂性。当他在《资本论》中拟对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进行分析时，他并不是一个搞纯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

①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03期，第6页。

② 同上，第8页。

家，同时还是一个革命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作为《资本论》这部巨著的主要内容的剩余价值学说，难道不是从经济上深刻揭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吗？应该说，《资本论》深化了《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两极化的观点，给它提供了科学的论证，而不是抛弃了它。第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始终是以生产关系为标准的，而不是以劳动为标准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批判过所谓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庸俗观点，强调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决定性意义。就在《资本论》第三卷那句关于三大阶级的论述中，马克思也完全是按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阶级类别的，因为那句话的主语就是“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那末，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资本论》中关于三个阶级的论断呢？如何将它与《共产党宣言》关于二个阶级阵营的论断相协调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实事求是，即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出发。我们知道，农业由于生产力落后是资本最后征服的一个部门。西欧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和资本化是在本世纪50、60年代才真正实现的。而在马克思所处时代，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还是封建落后的农业，土地所有者即地主阶级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即使在马克思常常用作资本主义典型国家进行分析的英国，虽然那里雇佣劳动已成为主要形式，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土地所有权的资本属性表现得不明确。农村的阶级结构还没有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农业资本家和农业无产阶级的结构。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把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资本，而把土地所有权看作是资本相对立的东西，认为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完全是多余的，并沿用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魁奈和斯密的阶级分类方法，将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

所有者看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①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仍然是工业资本主义和农业非资本主义相混合的不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在农业资本主义化了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所有者是土地资本家或农业资本家，他以土地为资本形态，再结合其他生产资料，雇佣农业工人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攫取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作为土地资本家或农业资本家的土地所有者同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一样，同属于资产阶级。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就还是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两个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②

第三节 评“中产阶级化论”

本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最重要的反映就是“中产阶级化论”^③。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北美雇佣脑力劳动者人数增长的速度加快了。当时伯恩斯坦曾证明由于独立经营的扩展，中间阶级靠无产阶级的分化而得到发展。英国费边分子提出了中间阶级由于雇佣脑力劳动者的增多而发展的理论。1912年，德国社会学家埃·莱德勒在一篇论文中把白领薪给职员（办公室职员与专业人员）称为“新中产阶级”，这主要不是依据它的职能，而主要依据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0页。

② 参见樊季刚：《关于地租理论的新思索》，载《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6期。

③ 中产阶级又称“中间阶级”，这里一般采用“中产阶级”。

们自身及他人的评价而得到的社会估价。1926年，莱德勒和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雅·马尔夏克发表了一篇题为《新中产阶级》的著名论文。他们对薪给职员——技术工人、办公室职员、推销员和公务人员——的发展加以详细的统计分析以后得出结论说：

“职员阶级的迅速发展必须视为经济继续不断的发展，尤其是大企业的发展和企业的组织新方法发展的结果……仅仅从数量上看，职员成了不断增加的工人阶级数量的抗衡力量。”^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变化，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述“中产阶级”的专著和文章。他们的论著虽然提供了不少反映阶级结构变化的新材料，但大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或正在“中产阶级化”，以此来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抹煞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英国社会学家T.马歇尔认为，“中产阶级”的增长是本世纪上半期“西方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总结”。他甚至断言：“几乎整个西方社会正变成一个巨大的中产阶级。”^②联邦德国社会学家H.舍尔斯基说，由于“社会流动的异常加强，在联邦德国形成了无差别的小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社会”^③。法国社会学家R.阿隆写道：“所有观察者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的预言由于很简单的理由遭到完全的破产。这个原因就是：工业化本身，特别是在私有制条件下，给日益增多的人们以某些值得加以保卫的东西；它不增加贫困，它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它保证向日益增长的那部分居民提供小资

① 转引自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82页。

② 《第三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学报》第3卷，伦敦1956年，第15页。

③ 舍尔斯基：《现代德国家庭的变化》，斯图加特1954年版，第346页。

产阶级的生活条件。”^①美国社会学家H.马歇尔说：“中产阶级”将囊括“几乎整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国家走向无阶级社会“不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通过中产阶级并吞下层阶级而迅速扩大”^②。美国经济学家亨利·格莱逊要人相信：社会可以不必经过各个发展阶段就走向“中产阶级的最后胜利”。他描绘了空想的“中产阶级”社会的面貌，写道：“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全都是中产阶级的成员。”^③美国名噪一时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这部80年代世界畅销书中预测了中产阶级的作用。他提出，“第三次浪潮阵营中的许多人无疑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是由信息工作者、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新阶级”。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技术权威被迫扩大权力班子，“把中产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到政治舞台上。”^④如果从“中产阶级化”的理论中清除使它出现几种不同说法的次要细节，那末它的实质内容大致如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两极分化不是加强，而是被克服；中产阶级不是被冲毁，而是在扩大的基础上再生产出来；中产阶级有把其它社会集团吸收过来的趋势。中产阶级的特点是：具有特殊的价值体系，原则上接受现存社会制度；从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到劳动的性质都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满足；具有迫切的消费心理。中产阶级是一个既支配现代社会政治发展，也支配现代社会思想发展的社会集团，“它将取代其他阶级，起到推动现代社会运转的中枢作用，是下一个统治阶级的候选人”^⑤。这就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

① 阿隆：《工业社会、意识形态、哲学》，载《证明》，1965年2月号，第17页。

② 转引自潘培新：《国外关于工人阶级问题的争论》，载《国际共运》，1985年第3期。

③ 格莱逊：《中间阶级的危机》，纽约1955年版，第51、98页。

④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04、506页。

⑤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页。

什么“中产阶级化”的理论历时80多年而不衰呢？为什么它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呢？答案是这样：这个理论并不单纯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空中楼阁。它的部件并不是虚构的，而是建立在真真假假的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新变化进行曲解的基础上。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宣传的“中产阶级”概念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中间阶层的概念有部分重叠，因为两者都是指社会两极之间的部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讲的社会两极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他们讲的两极则是概念模糊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他们的“中产阶级”是按照收入、职业、名望、权力、心理等各种指标来确定的，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标准。例如，他们按照职业性质的标准，将从事脑力劳动的雇员划为“中产阶级”，仅将从事体力劳动的雇员划为工人阶级。他们说：“工人阶级是由从事体力劳动的雇员和他们的家属组成的，几乎所有其余的人口都是中产阶级”。“什么是中产阶级？最好的概括也许是：他们是社会中用脑劳动，而不是用手劳动的各种部分。”^①在美国的职业统计分类中，出现了“白领人员”和“兰领人员”的类别。白领人员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销售员。兰领人员包括技工、工头、机械操作工和杂工。白领人员主要从事脑力劳动，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白领人员的人数超过兰领人员，这成了“中产阶级化”的标志。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说：在美国，“1965年，白领工人比兰领工人差不多多出800万人……在这些年里，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即技术结构上最有代表性的类别的人数大约增加了一倍。”^②用

① 转引自格兰特：《社会主义与中间阶级》，第25页。

② 转引自陈其人：《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化论”》，载《广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第53页。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来区分现代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是行不通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方式，他们既要用体力又要用脑力，而且越来越多地用脑力进行劳动。劳动方式的改变并不导致阶级地位的改变。在自动化越来越成为现实的今天，在脑力劳动日益成为主要劳动方式的今天，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来划分阶级地位，是绝对没有意义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即根据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地位和收入多寡，就可以揭示白领人员中各种社会集团内部成员的阶级分化的真实情况。

行政管理人员分为高级、中级和低级三种。前面已经论证高级和中级行政管理人员分别属于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低级行政管理人员一般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担任低级职务的公务员、国营和私营企业的最基层劳动单位（车间、工段）的监工。低级行政管理人员在人数上占行政管理人员的多数，在权力的阶梯上处在最低一级。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受雇佣、在劳动中受高中级管理人员的指挥，处于服从地位。他们虽然担任管理职能，但他们的管理主要属于技术性质，而不是或很少是对人的统治性的监督。过去具有的那种与工人相对立的监督职能已经转给了中级行政管理人员。这是企业规模扩大和管理科层制化的结果。他们在管理中常常同熟练工人一起研究解决问题，因而其地位与熟练工人相接近。他们的薪金也与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差不多。例如，1978年美国经理与管理人员平均周薪为323美元，技工则为279美元。^①低级管理人员的周薪肯定低于平均数。由此可见，低级行政管理人员大都属于工人阶级范畴。

专业技术人员的阶级划分比较复杂，这类人员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艺术家、作家、大学教授、建筑师、会计师、

^① 参见美国《每日劳工评论》，1979年8月号。

医生、药剂师、护士、律师、中小学教员等。一般说来，他们中独立经营的自由职业者属于中间阶层，受雇依靠薪金为生的低级科技人员、护士、教员、医生和药剂师及一般艺术工作者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

办事员几乎全是工人阶级成员。办事员这个职业类别包括出纳员、图书馆员、邮递员、电话员、打字员、速记员、接待员、秘书、办公室机器操作员以及各种办事人员。办事员的工作简单，事务性强，与操作工的工作相比，在工作性质上无大差异。他们的薪金与兰领工人相当。例如，1978年美国办事员的平均周薪为175美元，而机械操作工为191美元。虽然在收入形式、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办事员要比兰领工人好一点，但这些差别并不改变他们的工人阶级地位。

销售人员大都属于工人阶级。他们包括店铺柜台售货员、街头小贩、杂货铺店员、广告推销员、保险推销员。这类人当中多数属于下层销售人员，基本上受雇薪金工作者，而且有些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薪金在技工和操作工之间。另外有些大销售商同资本家勾结，专营大交易，属于中间阶层。^①

分析的结果表明，白领人员的多数是工人阶级，而不是“中间阶级”。因此，用白领人员的增长来证明“中产阶级”的扩大是站不住脚的。

同样，以收入为标准，将一部分工薪较高的工人阶级成员划入中产阶级的范畴也是牵强附会的。按照美国官方规定，个人年收入为2—5万美元者为中产阶级。据统计，1981年美国不同职业男全时年工资的中位数超过2万美元的有：专业和技术人员25 350美元、工程师31 069美元、医生38 504美元、教师（大学

^① 参见梁世隆：《美国工人阶级结构初析》，载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87年编印《国际工运专题资料》。

除外) 20 369美元、工程和科技人员21 690美元、经理和管理人员(农场除外) 26 656美元、销售人员22 144美元, 手艺和熟练工人20 458美元、其它产业24 599美元。^①上述职业的许多人按阶级标准来说属于工人阶级。他们中确有一部分人的收入超过了全部职业工资的平均数, 但也不能将工人阶级中工资或收入较高的人看成是中产阶级, 就像不能将奴隶社会中从事文化、艺术、监督劳动的奴隶说成是自由民一样。他们的工资或收入较高, 主要是因为从事复杂劳动, 劳动力的价值比较高。然而他们终究是处于被剥削的阶级地位, 他们的一部分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另外还有许多名义工资收入达到中产阶级水平, 但实际工资并没有达到,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严重的通货膨胀、沉重的税收、经常失业、工时不足等各种致使实际工资下降的因素。据美国劳工部统计, 从1968年以后, 生产工人的工资就由于通货膨胀而经常下降。当1974年出现双位数通货膨胀时, 平均周工资比1973年下降4.6%, 1975年比1973年下降7.5%。1978年至1980年, 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幅度高达10.2%。1980年的实际工资水平只相当于1962—1963年的水平。《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1年11月2日载文说: “1981年时, 一位有工作经验的律师的实际工资减少了4.4%, 一位被雇用的工程师的实际工资减少了7.5%。”^②律师和工程师的处境况且如此, 工资或收入较高的那部分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过去就业比较稳定的技术熟练工人也遭到结构性失业的威胁。据报道, 美国钢铁企业一位31岁的熟练工人麦克尼里, 1981年连续四次被解雇, 前三次解雇不久, 被重

① 美国《每月劳工评论》, 1983年4月号。

② 金婉如: 《美国工人的生活处境》, 载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87年编印《国际工运专题资料》。

新雇用，第四次失业后就较长时期找不到工作，每月领取的失业补助金正好相当于他买房每期应付的款项。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指出，目前失业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熟练技术工人也进入了失业者的新行列。^①用收入的数额来确定中产阶级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就是人们的收入并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波动很大的。同样一个人也许今年的收入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明年由于各种因素降低到中产阶级的水平以下，到底怎样确定他的阶级属性呢？正是由于收入标准的不确定性，使得有的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与中产阶级增长论截然相反的结论。据合众国际社报道，1986年12月9日美国国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透露，由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委托马萨诸塞州大学及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进行的调查发现，1979年至1984年，美国总雇佣人数增加800多万人，但年工资等于或超过1.4万美元的受雇者，实际减少了180万人，实际增加的就业人员年工资均低于1.4万美元，其中六成低于7000美元。调查报告指出：高工资的制造业职位日益减少，低工资的零售业务及服务部门已逐渐扩大，使人们产生同样的印象：美国的中产阶级可能快要消失。^②在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观点。1981年9月法国《新观察家》周刊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对法国人的收入和财产进行了分类排队，结果发现，全国1870万个家庭中，月收入在5500法郎（低于两个最低工资数）以下，家庭财产在3万法郎（刚好购买一辆普通小汽车）以下的穷人家庭占42%；月收入在5500—10000法郎之间，家庭财产在3—45万法郎之间的中产阶级家庭占22%；月收入1万法郎以上和家庭财产在45万法郎以上的富人家庭占36%。中产阶级中的多数人是在经济发展迅速的60年代由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上升到

① 金婉如：《美国工人的生活处境》，载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87年编印《国际工运专题资料》。

② 参见1986年12月23日《深圳特区报》。

中产阶级地位的。许多家庭买了住宅，有了汽车，每月收入平均7 000多法郎，似乎前程充满了希望。但是，法国经济进入“滞胀”阶段后，中产阶级的上升希望变得渺茫了。调查报告得出结论说，法国并没有变成一个广大中产阶级的国家，中产阶级的前途已“今不如昔”了。^①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宣传的“中产阶级”是一个人为制造的范畴，它把一部分资产阶级、一部分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混合在一起，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共同特征装饰成一个独立的阶级。

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中产阶级的增大体现了社会平均化发展的趋势。应该承认，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为下层的人们提供了从事白领职业的机会，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使得很大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上升。由于高生产、高销售、高消费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在社会上广为宣扬并得到一定的普及，表面上出现了社会差别平均化的趋势。由此，人们渐渐沉缅于所谓平均化的富裕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幻想之中。可是，这种表面上的平均化和富裕化既不意味着阶级差别的消失，也不意味着全部消除贫困化。在新中间阶层膨胀的过程中，工人们向上流动的机会还是很少的。在白领人员的上层与下层之间，由于学历不同而造成的隔阂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此外，下层白领人员无论在工作方面还是收入方面，都停留在与蓝领工人没有多大差别的状况中，灰领化（自动化工厂中操纵仪表的工人）倾向十分明显。因此，上述现象与其说是新中间阶层的膨胀，不如说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化的扩大和深化。

^① 参见长宇：《法国并不是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2年第4期。

中庸的价值观念，满足现状、迫切的消费心理也被西方社会学家描绘成中产阶级的共同特征。不可否认，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即我们所说的中间阶层具有这些特征，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决定的。但是，要说广大本属于工人阶级范畴的白领人员具备这些特征就不尽其然了。广大白领人员奉行的并不是中庸之道，而是进行斗争，他们不是满足于资本主义的现状，而是要求改变现状，他们最迫切的心理不是要求高消费，而是保证不失业。为说明这一点，只需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各国兴起的白领工会运动就行了。在英国，白领会员由40年代初的161万人上升到1979年的513万人，增加了352万人。在美国，白领会员由1946年的约150万人上升到1976年的667.3万人，增加了约3.5倍。在人数增长的同时，会员密度（指会员与全体同类雇员之比）也迅速上升，英国白领会员密度由30年代的21.2%上升到1978年的44%，同时期美国白领会员密度增长了近三倍。^①根据70年代对意大利的抽样调查，77%的白领雇员主张采用罢工手段，75%的白领雇员参加了各类罢工。^②技术人员、专业人员过去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但是战后40年来，他们走出实验室、办公室和书斋，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如60年代末法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罢工斗争曾成为当时法国罢工运动的基础；70年代初期至中期英国大批受雇科学家、专家为争取提高薪金而组织了多种形式的罢工；80年代美国机场塔台指挥人员的罢工震撼了整个美国。至于各国教师的罢课斗争更是层出不穷。^③白领工会运动的斗争目标主要是提高薪金、保障就业、参加企业管理。这充分证明所谓中庸的价值观念、满足现状和迫切的消费心理等中产阶

① 转引自李强：《西方国家白领工会主义的兴起及其历史原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5年第6期。

②③ 转引，同上。

级的特征，对于广大白领人员是无缘的。

那种认为中产阶级将取代其他阶级而成为下一个统治阶级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这种观点出自一种假设，即最高政治权力来自功能上和经济上的不可或缺性，在完成社会秩序要求的主要功能中不可缺少的阶级，将成为统治阶级顺序表中的下一个阶级。这是技治主义、功能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高政治权力仍然来自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诚然，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转中起着组织者的作用，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将更加处于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是受雇于私人资本家或集体资本家的。他们的管理和组织经济的权力是雇主授予的。即使他们在政治上行使某种权力，这也主要是执行资产阶级的意志。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决不会允许受雇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用权力来损害其阶级利益。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并不是独立的阶级，其上层本身就是（或依附于）资产阶级，其下层本身就是（或接近于）工人阶级，只有其中层部分才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是两个基本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争夺对象。中间阶层由于其自身的力量不大和固有的摇摆性、不稳定性，由于它所处的中间地位，不可能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时排斥而独占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将越来越多地无产阶级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只有在改变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才能去掉束缚自己的各种枷锁，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第 三 篇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

第六章 当代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第一节 当代美国阶级结构的特点

美国的社会结构除了有许多和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特点之一是：在美国，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典型性变化都存在，而且变化的速度特别高，变化的规模特别大。在美国这样一个大国，许多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进行得比大多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迅速。例如，1945年至1965年，农场主人数减少了近60%，商业部门就业人数增加40%，办公室人员(办事员)和服务部门就业者人数各增加2倍。仅从1972年至1978年，农场主人数又减少13%，服务部门就业人数增长23%，商业部门就业人数增长11%。1960年至1979年，“白领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从46.4%增加到50.9%。“蓝领人员”的比例同期从36.6%下降到33.1%。服务部门的就业者人数同期从9.9%上升到12.3%。^①职业结构重新改组的速度和规模伴随着社会政治后果，因为大多数居民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固。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职业结构变化给一部分群众相反的影响，使他们产生一种幻想，即认为美国社会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

^①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第407页；1979年，第414页；1980年，第48页。

根本改善自己的地位。在当今的美国，资本的集聚和雇佣劳动者的数量的增加都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基本阶级的两极分化还在继续发生，贫富之间的差距没有缩小。根据美国官方的材料，1977年初有2 600万美国人的收入处在贫困线以下。

美国社会结构的第二个特点是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处在过渡状态，没有彻底融入某个阶级或阶层。社会结构的大规模变化必然产生这种过渡性集团。研究者之所以对数量众多的知识分子、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有各种不同的估价，其原因就在于这部分人的行为的不稳定性在美国表现得很典型。在美国历史上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是，各种政治派别和政治运动兴起得快，落下去同样快。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些不稳定的过渡性的社会成分参加了政治派别和政治运动。例如，1980年的选举运动就显示了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摇摆不定的居民成分的增长，据计算，他们的人数达选民人数的三分之一。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阶级、中间阶层和阶级内部的各集团都是复杂的有机体。但是在美国，由于特别巨大的和发达的经济结构造成的各种具体活动条件，这些阶级、阶层和集团成了特别复杂的共同体。这种复杂性产生一定的政治效果。一方面，工人阶级数量的巨大是最广泛开展争取普遍民主和反垄断斗争的前提，另一方面，工人阶级队伍的分支增多和成分庞杂给为这种斗争所必需的统一和团结造成了困难。

美国社会结构的第三个特点是垄断资产阶级和最贫穷的阶层这两极地位的反差极为强烈。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上层和低层之间在生活水平、经济和政治权力方面的鸿沟竟如此之深。一个亿万富翁的财产往往超过几十万工人的年工资。实业界的巨头可以对地方性和全国性政策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而美国的穷人则不可能对政策有什么影响。差别刺激着群众的阶级斗争，使群众看到美国社会中人们的不平等。

美国的种族问题对社会结构的发展也留下了一定的痕迹。虽

然这个问题并不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直接有关，但是，既然种族问题是社会紧张的重大根源和催化剂，那末它就会促进使美国人认识到美国社会的真面目，认识到美国社会内部对抗的不可调和性。这种认识同样加强了社会结构界线的政治表现，使之变得比较清晰。当然，有时也可能产生局部的与此相反的效果：在个别情况下种族冲突有时会模糊群众对阶级对立的认识。

现代美国社会和其它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中间阶层构成。

第二节 当代美国的工人阶级

美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比重和重要意义都在增长，它把越来越多的人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美国官方统计所使用的范畴如“兰领工人”掩盖了工人阶级增长的事实。我们可以根据“工薪工作者”这一范畴来判断工人阶级的情况，因为工人阶级显然占“工薪工作者”的多数。1965年“工薪工作者”占非农业领域就业者的89%，1970年占90%，1975年占92%，1978年占93%。^① 要比较准确地确定工人阶级的增长数字是很困难的。据苏联学者计算，美国工人阶级占全国自立人口的比重1947年为73.9%，1960年为74.1%，1970年为75.1%。1950年至1976年工人阶级人数增加了2 140万，1976年共计9 477万人。^② 除了数量增长外，工人阶级的素质也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今天在职业上与30—40年代的工人阶级大不相同，且不说更早一些时候的工人

①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9年，第403页。

②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基辅1980年版，第14、15页。

阶级了。今天的工人阶级结构变复杂了，其内部的分化在加强，某些社会心理的特点在改变。过去工人阶级基本上由产业工人这支大的队伍组成。现在工人阶级扩大了，增加了商业和服务业的两支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虽然他们在一些方面同广大工人群众还有区别。那些已经加入和正在加入工人阶级，但又没有在政治上和心理上与工人阶级完全同化的人们，被称作“阶级新手”。工人阶级的技术结构在发生变化，非熟练工人的比重在减少，高度熟练工人的比重在增加。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越来越少，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工人越来越多。属于工人阶级的低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增长得特别快，1960年为750万人，1970年则为1 110万人，1979年达到1 500万人。^①工人阶级内部的移动过程（改换专业、提高熟练程度）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过时的专业转入新专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专业的复杂程度提高了，需要花费在改换专业和达到熟练程度的时间和精力就比以前多。结果工人的移动还是落后于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工人的失业在最近这些年具有特别稳定的性质。那些失去了旧专业的工作而又不能得到重新培训的人遭到了失业。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所指出，美国出现最有教育水平的失业者这一情况，不仅反映全国的总的教育水平在提高，而且说明改换专业的困难在增加。

美国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是工业工人、商业和服务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农业工人。工业工人仍然是最重要的队伍。它比其他队伍形成早，在很长时期里体现着几乎整个工人阶级，对本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认识得最深刻，富有斗争传统并掌握了一定的斗争手段。工业工人的组织性和战斗性最强。工业工人的变化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它的成分中熟练工人的比重提高了。在

^①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80年，第413页。

“兰领工人”中，专业人员（指操作工等）及类似人员1960年占35%，1970年占38%，1978年占40%。^①另一方面，非熟练工人还保持着相当的比重。在美国统计中对劳动力的分类没有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分。按照工资高低的类别可以近似地计算出非熟练工人。1960年至1977年非熟练工人的比重从14.3%增加到16.9%。^②近几十年来，虽然体力劳动的工人有了较大的减少，但是仍然有370万干粗活的纯体力劳动工人，他们大多数是黑人和少数民族工人。^③其次，工业工人的工作部门分布起了较大变化。在战后一段较长时期里，采掘业的就业人数从1947年的90万人减少到1970年的60万人，但是在1979年增长到90万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煤矿工人的增加。^④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增加，但不平衡，在经济危机时期就业人数有所减少。1946年制造业共有就业人数1550万人，1950年有1520万人，1970年有1930万人，1975年有1830万人，1979年有2090万人。^⑤建筑业就业人数1950—1976年增长了37.4%，1976年为359万人。交通动输和市政公用事业的就业人数同期增长了10—11%，1976年为450万人。^⑥第三，工业工人的数量变化呈两种趋势：绝对人数增加而在整个工人阶级中的比重相对减少。1950—1976年，工业工人由2018万增加到2393万，占工人阶级比重由54%下降到40%。^⑦事实表明，科技革命虽然

①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9年，第415页。

②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8年，第419页。

③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7页。

④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80年，第412页。

⑤ 参见《经济年鉴》，1964年，第72页；《美国统计摘要》，1966年，第222页；1980年，第413页。

⑥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第402—404页。

⑦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第388、402、691页。

加速了生产的“无人化”，但是经济扩大和新部门的产生这一总的发展过程还是使工业工人的人数增加了。此外，工业工人超出了自己的传统范围。由于商业和服务业中实现了一定的工业化，可以说出现了工业工人的添加成分。可以预计，商业和服务业的这种工业工人将来会继续增多。

商业和服务业的工人（推销人员和办事员）是工人阶级中增长最迅速的成分。1972—1978年，服务业就业人数由980万人增加到1 150万人。1970年商业就业人数为1 500万人，而1978年为1 800万人。^①虽然这两个行业的就业者不都是属于工人阶级，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标准。据计算，商业和服务业中属于工人阶级的人数1950年为1 237万人，1976年为2 700万人，占工人阶级总数的42%。^②现在，商业和服务业的工人在总数和比重上都超过工业工人，他们的阶级觉悟必然会随着队伍的发展而提高。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表明，他们的阶级觉悟成熟的速度落后于其人数增长的速度。至今这两个行业的工人阶级相对说来处于比较消极的状态，不大愿意同企业主展开斗争。他们暂时还较少参加工会运动。

农业工人在减少。1960年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工作者有500万，1970年为310万，1975年为290万，1979年为240万。^③与此同时，他们在生产计划中的意义提高了，因为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大农场和农业企业，在农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中小农场（不雇佣或雇佣很少的劳动力）在减少。农业工人从完全分散的状态变为比较集中的状态，这为他们的阶级意识提高和反对资本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前提。但是，在说明这一点的同时不可忘记农

① 阿尼金主编：《美国》，莫斯科1982年版，第273页。

②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第388、402页。

③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9年，第415页。

业工人那些阻碍自己进步的弱点。首先，他们的集中程度与其它经济部门相比还是很低的。其次，农业工人中一部分是季节工和流浪汉（后者1975年约占农业的雇佣劳动者10%），而且有许多人是外国侨民（大都是墨西哥人）。农业工人的极低微的工资和几乎没有怨言的行为（极少举行过有组织的抗议）就因此而反常地结合在一起。

战后美国工人阶级在性别、民族、年龄和文化程度等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战后以来，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人数与日俱增。60年代以来，每年大约增加200万女职工。涌入劳工市场的妇女人数比男子几乎多两倍。1982年美国11 000多万劳动力中女劳动力4 700多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43%。劳动妇女的大多数仍然从事收入低的没有提升机会的所谓“妇女传统职业”，属于工人阶级范畴。妇女的职业构成是：办事员35%，兰领工人15%，服务人员20%，教员6%，店员7%，行政管理人员6%，农业工人1%，其它职业10%。妇女劳动力在就业范围，工资收入、福利待遇，提升以及解雇等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歧视。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劳动力同白人劳动力之间的社会差别非常明显。一般说来，黑人就业靠后，解雇在先，在历史上黑人失业率一般比白人高一倍以上。在职业方面，白人不屑做的工作，便是“黑人的专业”。黑人在就业总数中所占比例为11.1%，按职业划分，黑人在白领工人中占7.9%，在兰领工人中占12.6%，在服务人员中占19.4%，在农业工人中占8.9%。美国工人出现了年青化趋势。美国工人平均年龄1970年为39岁，1981年降为34岁。1983年18岁至24岁年龄层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20%。25岁至34岁年龄层的劳动力占28%。美国工人的文化程度战后有明显的提高。从1959年到1977年，在全国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从30%降到10%，高中毕业的职工从49%增至73%，完成大学四年或四年以上学业的人数从10%增至17%。1982年，

职工大学毕业的比例增至22%。中等学历的职工仍占最大比例。大学毕业生从事白领工作的占89.6%，蓝领工作占6%。^①

第三节 当代美国的资产阶级

美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集团是垄断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人数极少，是整个资产阶级中的核心部分，它主宰着美国。科技革命加速了资本的集聚和集中，这使得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许多变化，其中有的集团被改组，某些新的集团在形成。但是，透过这种变化的图景可以清晰地看到统治阶级的不可改变的基本社会经济特征。进一步加强垄断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发展变化的轴心。垄断资产阶级主要是金融寡头，包括最大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所有者。美国的金融寡头大约有500个家族组成，他们都拥有超过5 000万美元以上的资本。^②那些掌握重要行政权力和拥有大量资本的垄断企业的高级经理和高级官员也属于垄断资产阶级。60年代中期有2 000个这种高级经理。^③金融寡头的实力加强首先表现在它集中掌握了巨大的日益增长的财富。美国官方统计不可能提供金融寡头的财富的绝对准确的数字，但是从下面的数字可以看出金融寡头的微不足道的人数同他们的巨大财富形成鲜明、刺目的对比。不足1%的家庭拥有全国80%的工业股票。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计算出，仅0.2%的美国人

① 参见梁世隆：《美国工人阶级结构初析》，载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87年编《国际工运专题资料》。

② 参见格·普·阿波斯托尔主编：《当代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页。

③ 参见阿尼京主编：《美国》，莫斯科1982年版，第276页。

拥有全国居民的股票的65—71%。^①1972年约占全国人口1.7%的极少数人的财富在1 000万美元以上。^②1%的成年美国人1945年拥有总财富的23.3%，而1964年达24.9%。^③在财富集中到少数人的同时，股票持有者人数减少了。1970—1975年，股票持有者减少了1/6。^④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拥有决定性的财产份额，管理生产的决定性部分，用各种可能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使自己在资产阶级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整个社会中起支配作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调节促进了金融寡头权力的增大。在7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金融寡头的这种联系表现得特别明显。与肯尼迪、约翰逊的执政方针相比，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的经济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向企业主提供补贴和优惠来刺激经济。因此，大公司得利更多。在政府同大资本合作和支持大资本的利益方面，里根政府更是大大向前推进了。里根政府进行的税收改革和紧缩社会开支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调节的实践本身必然引起垄断资本对国家政权的压力加强，因为垄断资本比过去更加注意对政府机关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加强的表现之一，就是近十年院外实业界组织兴盛起来了。垄断资产阶级面临日益增长的内部和外部困难，不得不多少协调行动，对某些有关问题采取共同的态度。随着实践的扩大，协调的习惯巩固下来，协调的机构（首先是那些大实业界组织）也随之完善和扩展。垄断资产阶级势力的持续加强对美国社会的整个经济和社会政治制

① 参见G.W.多姆霍夫：《谁在统治美国？》，纽约1976年版，第45页。

②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82年，第472页。

③ 参见图雷等著：《不平等：特权和贫穷》，加利福尼亚1967年版，第19页。

④ 参见《经济学家》，1977年1月22日，第56页。

度产生了重大的后果。垄断资产阶级对其余统治阶级的优势变得更加触目。金融寡头开始有了某些种姓等级的特点，变得更加封闭，更加难以渗透。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1958年通过计算指出，大资本家的巨额财富有一半多是靠继承得来的，而不是靠自己“经营”得来的。^①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70年代初就研究这个问题，他得出结论说：“美国财富绝大多数掌握在继承人手里。”^②美国金融寡头的家族的稳定性特点，使人想起封建主义在世袭特权方面所固有的特征。

美国资产阶级的第二个集团是非垄断的大资产阶级。它包括约一万个家族，每个家族拥有1000—5000万美元的资本。^③大资产阶级中的60%的人是工业企业的所有者或共同所有者，他们中的某些人虽然拥有同垄断资产阶级某些人大体相等的资本，但他们的企业不属于垄断联盟组织。因此，非垄断的大资产阶级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很稳定和不很独立的。他们几乎所有的人在财政和其它方面多少依附于垄断联盟组织。他们常常被迫接受垄断资本集团强加的意志，具有一定的反垄断情绪。

资产阶级的第三个集团是中等资产阶级即中小资本家（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小业主”）。他们在70年代约有200万人，占整个资产阶级人数的绝大部分，约占全国人口的1%。^④衡量资本家在其阶级内部结构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尺度是雇佣劳动力的数量。下页的表^⑤是美国各种规模的企业劳动力分布情况：

从下表就可以看出，在美国每10个企业就有9个是雇佣1—19

① 参见切姆贝伦：《劳动》，纽约1958年版，第6页。

② 参见德·托马斯：《世界金融巨头》，莫斯科1981年版，第76页。

③ 参见阿波斯托尔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第131页。

④ 参见阿尼金主编：《美国》，第277页。

⑤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1970年，第475页。

企业中工人 数量 (个)	1945年		1967年	
	占全部企业 比例 (%)	占全部工人的 比例 (%)	占全部企业 比例 (%)	占全部工人 比例 (%)
1—8	59.9	6.0	53.7	6.0
4—19	31.8	14.7	35.1	19.1
20—99	6.7	16.3	9.2	24.3
100—249			1.3	13.2
250—499	1.3	16.0	0.4	9.8
500以上	0.3	47.0	0.3	27.6

名劳动力的小企业。这种小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全国受雇佣劳动力总数的20—25%。1945年至1967年，小雇主（其中有很大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和他们雇佣的劳动力的绝对数增长1.6倍。雇佣劳动力的基本群众集中在大中型企业。雇工20名以上的大中企业所雇劳动力占全国受雇劳动力总数的75—80%。但是，大中企业的数量和其雇佣劳动力数量并不是同步增长的，而是存在受雇佣劳动力相对减少的趋势。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革命的后果之一。科技革命使大公司能够靠物化在机器设备中的活劳动来扩大生产和增加利润，因而活劳动力的份额可以减少。与此同时，雇工5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主买不起价格昂贵的最先进的新机器设备，只好采取传统的剥削方式，即增加活劳动力的份额。1945—1967年，雇工20—99人的企业的劳动力占全国受雇劳动力的比例从16.3%上升到24.3%，雇工100—499人的企业所雇劳动力的比例从16%上升到23%。科技进步使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要量减少。因此，雇佣劳动力的数量并不是反映资本家地位的足够指标。像企业资产、产品实现的进款、利润这类指标对于确定资本家的地位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美国官方统计通常把年进款量（出售总收入）和纯利润（上税前）作为划分企业等级的基础。中等资本家的资产一般为50—1000万美元。其企业主要在商业、

制造业的老部门、服务业和建筑业。小资本家的资产一般在50万美元以下，其企业主要在零售商业和服务业。中小资本家受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排挤，因而同垄断资本有着尖锐的矛盾。

美国资产阶级的特殊部分是高级经理、高级政府官员和一部分有实业的高级自由职业者。高级经理中有极少数在垄断资本主义企业中任职的人属于垄断资产阶级，大部分属于中等资产阶级。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是受雇佣的管理者，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们之所以是资本家，因为他们的巨额薪金是占有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70年代年薪超过4万美元的高级经理有5万人。高级政府官员中的极少数人即在联邦政府任高级职务的人，与垄断组织关系非常密切，属于垄断资产阶级。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属于大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70年代，年薪超过4万美元的高级政府官员有5万人。高级自由职业者中有比较大的实业的人，如有大型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有大诊所的医生，有大设计室的建筑师等，属于资产阶级。70年代，年薪超过4万美元的高级自由职业者有5万个。^①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虽然并不直接剥削或几乎不剥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但是，他们依靠的工具，他们个人享受的财富，是为加强剥削、替剥削辩护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分享的剩余价值。例如，最近几十年在美国出现了成千上万个这种“生意单位”，为五角大楼定货的“思想工厂”，为公司测验工作人员而设置的心理分析实验室，帮助公司隐瞒收入以便逃税的法律商行，受公司捐款帮助的从事美国主义、神学和反共说教的宗教宣传中心，按公司需要编制关于破坏分子、破坏性组织的卷案的情报中心，创办和经营这种“生意单位”的研究人员、律师、教会人员、联邦调查局的退职代理人等，掌握几十万、几百万美元，是典型的资产者。

^① 参见阿波斯托尔：《当代资本主义》，第131页。

第四节 当代美国的中间阶层

美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成分复杂，有的成分不定形，难以确定其阶级属性，大体可分五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农村小资产阶级，即小农场主及有关人员。1950年以来，由于农业机械化和农业资本的竞争，农场急剧大型化，小农场特别是租赁农场迅速减少。1950—1974年，180英亩地以下的农场减少60%，180—250亩地的农场减少47%。1974年，25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占农场总数的68.6%，占全国农田面积15.2%。^①1959—1974年，年进款量4万美元以下的农场减少8%，年进款量1万美元以下的农场减少55%。^②尽管在美国农业中大农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但在人数上小农场主及类似人员仍是农业中的基本力量。1974年，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小农场主有121.8万人，大中农场管理人员1.8万人，在中小农场的经营中经常被利用的家庭工作者39.1万人，为农场服务的企业和网点的所有者或农业企业公司的代理人6.1万人。结果，1974年美国农村小资产阶级共有168.8万人，占农业活动人口总数的38.5%。^③农村小资产阶级除了受采购者、供应者、银行家和运输部门的传统压迫外，还受到大公司的统治。大公司带着百万美元资本侵入农业，目的是建立“田野工厂”，从事“农业企业”。农场主特别是小农场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迅速分化，被抛入农业企业的雇佣工作者行列。因此，小农场主的被排挤和受压迫的地位迫使

①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第677页。

②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3年，第587页；1977年，第678页。

③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第409、678、691页。

其在政治上曾经参加过反垄断的民主运动。但是最近一二十年农场主的运动减弱了，这是因为农场主发生了社会分化，很大一部分小农场主转化成资产阶级。

第二个层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城市小业主的命运同农村小资产阶级有所不同。一方面，小业主像小农场主一样不断遭到破产，特别是在70年代中期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候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小业主受冲刷的趋势受到一系列因素的阻碍。1945—1974年，小业主人数从568.9万增加到1 087.4万，即增加了1.9倍。^①小业主的小生意渗透到美国资本主义的一切裂缝和毛孔。特别是那些投资少、难于管辖而垄断资本家认为无利可图的部门，更多地是由小业主在那里经营。1974年，年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932.1万小业主中，32.9%在农林渔业，28.5%在服务业，16.6%在商业（主要是零售业），7.9%在建筑业，7.5%在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3.5%在运输和公用事业，1.8%在制造业，0.5%在采掘业。1974年，在小业主的收入总数中，农林渔小业主的收入占30%，服务业和商业小业主的收入占24%，建筑业小业主的收入占9%。^②在其余工业部门，小业主的经济比重小得让人感觉不出来。何以解释小业主的生命力？不言而喻，大资本家是能够压倒、吞并和排挤小业主的。但是实际上，由于小业主对于大资本家往往在经济上有某种依附关系。因此，大资本家在同自己的势力相当对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时，对同自己有关系的小业主却加以庇护，向他们提供优惠贷款、批发的减价、政府订购的转包合同等。当然，小业主并不靠大资本和政府的优待过活，其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企业越是小和简单，剥削就越是粗暴和赤裸裸。小业主虽然参加过

①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第550页。

②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第552页。

程，其剥削的一面是不能忽视的。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出现了企业小型化的现象，这也是小业主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美国的现代化工业的后院，仍保存着小业主经营的、利用最落后的劳动工具和工艺的小企业。这种小企业主要靠加强活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来维持。美国的大公司把这种生产技术十分落后的企业看作是对本公司工人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从各个小业主的经济地位来说，他们是极不稳定的。许多小业主存在几年就破产了，同时代之而起的又出现许多新的小业主。小业主经常面临两种前途：或者破产，或者爬到上层，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极不稳定。一方面，他们能够对社会制度表示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又可能爆发出一种极端保守的冲动。这种两重性还由于他们的收入水平出现很大差距而加深。一些小业主成了比较稳固的小生意人，另一些小业主则成了真正的穷人。美国近几十年的历史多次表现了小业主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他们常常参加对立的政治营垒。一方面，一部分小业主参加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抗议种族歧视和反战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在同一个时期许多小业主参加了右的和极右的政治流派，组织极右的和种族主义的团体。在80年代，大部分小业主支持右翼保守的里根总统。根据民意测验，近70%的“中产阶级”（在美国，小业主也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的选民投票选择里根当总统。

美国中间阶层的第三个层次是地位和小业主接近的工业、建筑、银行、商业和服务业的中级管理人员，资产阶级私人机构的中级行政管理人员，中央、州和各级地方政权、公立学校的中级行政管理人员。这个阶层的收入水平总的说来高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1.5倍，其中制造业的中级经理人员收入较高，超过独立小商人收入水平75%。在这个阶层中，男人和白人占大多数，妇女占17%（1970年），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1950—1970年，这个阶层的人数增长23%，达646.3万人，其中受雇佣领薪金的人员占总人数56%，约305.1万人，主要分布在制造业。与此同时，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的独立小企业主的人数减少44%，降到91.3万人。在商业部门，经理人员和采购代理人补充到减少了67%的独立小商人之列。服务业的经理人员和中央、州和地方政权机关的中级官员的数量1950—1970年几乎增长2.2倍。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所得社会产品的份额来说，属于这个阶层的还有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经纪人、不动产投机商、保险代理人、工业企业和批发商业的商务代表，零售商业的调度员和大宗商品的推销员、会计和检查员。1950—1970年，上述人员总数增加1.5倍，达到337.3万人。^①

美国中间阶层的第四个层次是高中级专业人员和私人开业的自由职业者，包括律师、法官、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思想文化和艺术界人士、业余商人、社会保障代理人、医生和药剂师等。1950—1970年，这个阶层的人数增长近2倍，达到222.5万人，其中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增长3倍，达11万人。这个阶层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律师和医生。在美国，律师和医生这两个职业被认为是最有名望和最有利可图的。劳动人民一般难以得到这两种职业，因为要上大学，要花大笔钱。妇女在医生中的比例占8%，在律师中的比例占3%。律师这种资格是政治家和高级行政管理人員升迁的基础。无论是国家机关高级官员还是公司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員，大都发迹于律师。律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因而资产阶级慷慨付钱给律师。1970年，全国有35.5万律师被资本家聘为代理人，比1954年增加1.5倍。在美国，每八个律师中有一个为政府服务，一个被私人雇佣，其余六个在

^①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政策》，第25、26页。

自己的法律事务所或律师商行为自己工作。①1972年，全国有14.45万个法律事务所和法律商行。它们几乎有一半使用雇佣劳动（26.8万人）。4.2万个法律商行年收入达2—10万美元。2.06万个法律商行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②在美国，医生这种职业能对群众的劳动收入作有利于自己的分割。自己有诊所开业的医生1975年平均收入4.75万美元，在公司医疗机构工作的医生年平均收入达7.63万美元。医生靠什么获得这些收入？当然，首先靠自己的复杂劳动。但是也应指出医生的高收入中包含着一定的剥削。除通过高额收费来剥削病人（1975年，病人一天住院费全国平均151美元）外，医生还直接剥削自己的辅助人员如护士、助理护士、清洁工等。1976年，医生的辅助人员达340万人。③

美国中间阶层的第五个层次是高、中级科技人员。科技人员在职业上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机构无关，而同物质生产领域相联系。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科技人员越来越多地直接参加物质生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工人接近。另一方面，在美国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高、中级科技人员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按其作为资本服务的作用和得到社会产品的数量与形式，又是同工人阶级有很大的社会差别的。在美国，工程师的中等收入高于全国中等收入水平2.5倍，更不说同一般工人的工资相比了。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科学家的中等收入高于全国中等收入水平3.5倍，在私营公司工作的科学家的收入更高一些。在工程师和科学家中黑人和少数民族占3.5%。妇女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的比重分别是8%和0.5%。④获有理工科学士以上学位证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1970

①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26页。

②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6年，第163页。

③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第98、99、102页。

④ 参见《美国统计摘要》，1974年，第352、357、539、540页。

年全国共有229.9万人，超过1950年人数近3.1倍。按专业划分，1970年有10.8万自然科学家、49万大专院校教师、5万建筑师、17.8万化学家、25.8万计算技术专家、121万工程师。^①应该指出，在科技人员中技术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地位同科学家和工程师有较大的社会差别。1970年，全国各部门的技术员和与之地位相同的专业人员的总数较1950年增长2.8倍，达267.8万人。1970年，全国中小学教师比1950年增长2.6倍，达277.5万人。在技术员和中小学教师中，妇女分别为20—25%和70%，技术员的工资平均为工程师工资的2/3。黑人和妇女技术员的工资则还要低10%。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等于学校行政负责人工资的2/3。^②技术员和中小学教师地位的特点不仅在于劳动工资低，而且在于他们的工作是间接得到的。技术员要通过工程师和科学家、中小学教师要通过学校行政负责人才能得到工作。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国家教育机关通常同工程师、科学家和学校行政负责人签订工作合同，让他们自行选择执行者。在这种情况下，签订合同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学校行政负责人就像是雇主，技术员和中小学教师像是他们雇佣的劳动力。因此，技术员和中小学教师既可以说是中间阶层中紧密与工人阶级相连接的部分，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身上一般交织着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的特征。

综上所述，美国社会的中间阶层70年代共有2344.5万人，其中工业和国家机关共有502.9万人，商业、金融、服务业共有516.7万人，科技、教育、保健、社会保障、意识形态领域共有1156.1万人，农业共有168.8万人。^③

① 《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第407、408页。

②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31、32页。

③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37页。

第七章 当代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第一节 当代英国阶级结构的特点

最近几十年，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虽然保持了历史上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特点，但也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大英帝国地位的丧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发展变化，所有这些因素使得英国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使得一些阶层和集团迅速增长，而另一些阶层和集团则相对或绝对地衰落。与此同时，英国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阶级之间的数量关系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英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的稳定性是由它的资本主义悠久历史和它作为“工业工场世界”的发展特点所决定的。英国比其它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更早地形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包括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这些阶级和阶层的内部还可作更细的划分。对英国来说，阶级结构中的阶级之间或阶层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楚。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英国农业人口的比例极小。

在70年代，英国社会的经济活动人口有不大的增加。1971年英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为2 420万（不包括武装力量），1980年则为2 540万。^①经济活动人口增长主要是因为已婚妇女参加雇佣劳动。

^① 参见马德佐耶夫斯基主编：《英国》，莫斯科1981年版，第213页。本章以下有关数字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该书第213—241页。

雇佣劳动妇女的人数1980年比1971年增加100万，比1951年增长400万。这一情况影响到了国家的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与此同时，就业率增长不多，因为70年代自立人口的增长被失业大军的增长抵销了。9/10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是雇佣劳动者。一个重要的社会进步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大大增加。

战后英国社会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英国仍然是在生活的各方面表现出严重的阶级不平等的国家。对社会流动的研究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证明“阶级的消失”和基本群众变成“统一成长的中间阶级”。70年代由社会学家戈德索普等人作的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证明，英国阶级体系的实质依然如故。阶级和阶层的成分及地位的重大变化既影响到目前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也影响到阶级斗争的前景。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它们内部的每一个阶层都有共同阶级利益之外的特殊的利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大都决定着这些阶级的立场和表达其利益的党的战略。中间阶层特别是新兴的部分以及传统集团都无疑起着重大的作用。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雇佣劳动者同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斗争，影响这种斗争的广度和形式。

第二节 当代英国的工人阶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工人阶级中新的集团在生长，旧的队伍在变化。近几十年非体力劳动的工人和新兴职业的工人的比重增加特别显著。工人阶级中的妇女比重不断提高。“有色”移民第一次构成英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70年代失业的数量和时间急剧增加，长期的失业者开始转变成工人阶级的一个特殊类别。70年代末英国工人阶级共有2 000万人(其中1100万工人，900万普通职员)，占自立人口80%。妇女占工人阶级2/5，

他们中41%的人承担不完全工作周。英国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是产业工人、服务业工人和农业工人。

产业工人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核心，它包括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的生产工人，产业工人有着悠久的组织传统和斗争传统。产业工人分布高度集中。制造业的近一半工人和职员集中在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中。采掘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的工人和职员集中的程度同制造业相类似。60和70年代相交之际，出现了新的情况。1968年工业普查以前，500—999人的大企业和1000人以上特大企业的份额增长了。1974年和1976年的工业普查结果表明，1000人以上特大企业的比重从36.9%分别降到32.2%和29%，而500—999人的大企业的比重从15.6%分别下降到15.5%和14.7%，几乎没有什么变化。^①如果考虑到与此同时制造业的总就业率减少，那末在最大企业的工人的数量就显著减少了。大公司关于劳动力缩减的经常报道也说明了这一点。工人集中程度不再增长的这一事实对于工人运动有不小的意义。

在战后的头20年里，英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不断增长。后来，产业工人的数量有某种程度的下降。1966年，产业工人的数量达到最高点，在工业、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供应部门、建筑业和运输业共有1250万工人和职员，其中90%即1100万人属于工人阶级。1980年，这些部门的工人减少200万人，下降到900万人。^②工人的缩减遍及所有的工业部门。采掘业工人减少近40%，从57万降到36万。制造业工人从830万下降到720万。重工业即黑色金

^① 参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人阶级》，莫斯科1965年版，第179页；《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中的工人阶级》，莫斯科1977年版，第154页；《年度统计摘要》，1980年，第166页。

^② 参见《人口抽样调查》，1966年，第46—50页；《劳工部公报》，1980年9月，第1034—1035页。

属、造船和某些机器制造业的工人的数量减少特别显著。纺织、服装业和铁路的工人减少也很明显。整个说来，不但传统工业部门的就业率在继续下降，而且新的和最新的工业部门如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的就业率也在下降。新工业部门比旧工业部门更需要能操作最新设备和具有一定理论知识的新型熟练工人。这种工人同技术员很接近，将变得越来越多，但目前很缺。新兴工业部门工人的社会心理与传统工业部门的工人有所不同。他们很少是该职业的世袭工人，多半住在“混杂的”住宅区，职业团结感比较淡薄，对工党和工会很少有那种百依百顺的传统忠诚。但是，他们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对周围事务较多地采取批评的态度。英国社会学家从60年代末起所作的这方面的专门调查，无论如何也没有证实这种工人“资产阶级化”。^①

工人阶级的技术熟练程度和教育水平在继续逐步提高。年青的新工人比老一辈工人来说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要长。工人阶级中技术员和类似的专业人员的比重在增加。熟练工人的份额在增长，半熟练工人的份额变化不大，非熟练工人迅速下降。

工业中妇女就业率性质的变化是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发展的极重要因素之一。妇女在产业工人中的比重，近几十年减少了。这是几种对立过程的结果：传统的妇女工业部门如服装业和纺织业衰落；在所有工业部门中各种职员的份额增长，而职员中近1/3是妇女（主要从事办公室工作）；妇女在最新工业部门（电子工业和化学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门的就业率提高了。1979年与1966年相比，制造业的女工（不包括失业者）减少了44.5万人，或减少了24%，女职员减少了8.3万人，或减少了12%。^②工业中的

^① 参见J.戈德索普：《阶级结构中的富裕工人》，伦敦1969年版；J.韦斯特加德：《现金交易关系的再发现》，伦敦1970年版。

^② 参见《英国劳工统计》，1971年，第290页；《劳工部公报》，1979年12月，第1042页。

妇女在传统上是觉悟和组织程度比较低，斗争性不大强的工人阶级一部分。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妇女的这种状态发生了变化。妇女越来越把自己的受雇看作是经常的事情。他们参加罢工（包括争取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加入工会，并且在工会中活动比较积极。

工业中的职员份额（大部分属于工人阶级）在增加，虽然增长的速度放慢了。1960年制造业的职员占全体雇佣劳动力21.1%，1970年占26.4%，1979年占28.6%。^①

服务业的工人阶级在迅速增长。1966—1980年，服务业的工人和职员增加了270万人，即从930万增加到1200万，比1950年增加480万即1.5倍多。^②服务业的雇佣人员85%属于工人阶级，也就是说，1980年服务业有近1000万工人。服务业的工人阶级成分比较复杂，包括商业和传统的劳务部门（饭店、旅馆、洗衣店、修理部等）的工人和职员，金融业的工人和普通职员，医疗保健、教育和科研机关的工人和普通职员，国家各级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机构的普通职员。服务业的工人阶级分布的重心从私人成分移向国营成分，即移向医疗保健、教育、社会服务、国家管理等部门。根据近似的计算，70年代末在国营单位工作的工人占服务业工人阶级的40%。

服务业工人阶级的近2/3的成员是普通职员：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商业职员、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办事员、护士、实验员、小学教师等。这些职员通常受过中等教育或专门职业教育，大都出身于职员、工长、熟练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家庭。

① 参见《办公室里的计算机》，伦敦1972年版，第66页；《劳工部公报》，1979年，第1249页。

② 参见《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中的工人阶级》，第144—145页；《劳动部公报》，1980年9月，第1034、1035页。

最近几十年里他们的地位发生了白领人员和蓝领工人接近的重要变化。随着职员人数的增长，职员的劳动变得粗笨起来，他们就业的状况恶化，不仅在工资方面同工人接近（男办事员的中等工资甚至低于工人的中等工资），而且在休假、退休金等雇佣条件方面也同工人相接近。但是，明显的差别还是存在着。早就开始的办公室劳动机械化和60年代以来办公室采用电子计算机，对服务业的普通职员的地位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办公室劳动自动化的蓬勃发展给职员带来严重的后果。新“工业革命”使微电子技术的价格急剧下降，使微电子技术得到极其广泛的采用。80年代办公室劳动自动化使大量职员首先是女职员失去工作岗位（在70年代末女职员在办公室工作的有300万^①，比战后初期多2.5倍）。整个说来，受微电子技术威胁的普通职员的目前处境，比服务业的其他部门的工人要好一些。旅馆、饭店、洗衣店、化学洗衣厂的工人，学校和医院的辅助人员，大概是英国工人阶级中最受苛待的、受压迫的和工资最低的部分。他们一般只受过低级教育，多数是妇女和“有色人种”。地位处在服务业的职员和工人之间的是商业的雇佣劳动者：售货员、搬运工、分装工、仓库保管员、办事员、出纳员等。他们中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工资较高，按其他地位与职员接近。他们中另一部分与劳务部门的工人接近。

根据1976年就业登记资料，服务业近1/3的雇佣工作者（70万人）在18.5万个1—10人规模的企业中就业，还有50万人在11—24人规模的企业中工作。在商业中总数270万雇佣工作者的34%在小“商业点”（平均3.7人）就业，还有18%在稍大一点的“商业点”工作。在金融部门，全体工人和职员的36%在小的或稍大点的营业店工作。在国家机关和保健、教育等部门，职工就业集

^① 参见1979年6月19日《晨星报》。

中程度要高得多。例如，在保健和教育部门，19%的职工在小企业工作，41%的职工在500人规模的企业中工作。^①

整个说来，各部门参加工会的组织程度是极不平衡的。在国家管理机关中非常之高，在教育系统则较低，在医疗保健单位还要低些，在金融和商业中就更低，在旅馆和公共饮食业则微乎其微，人工会的工人不足2%。

服务业的私营成分尤其是劳务中的工人组织程度低，部分原因在于：这里大多数工人是妇女（往往承担不完全工作周）和“有色人”。低工资工人的流动率高。在旅馆和公共饮食业中这种流动率达83%。在服务业的小企业和特小企业，雇佣人员可以同雇主或管理人员直接接触。这些情况都妨碍工会组织的发展。

农业工人这一衰落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今天已经不大了。1979年，英国农业中共有不到30万的雇工（相比之下，1951年为81万，1971年为41.5万），其中少部分是季节工和临时工。^②由于近几十年来英国农业出现了“工艺革命”，农业工人中占优势的类型也在变化。现在占优势的是管理各种各样常常是复杂的技术的相当熟练的工人。可是他们的工资最低（大约为工业工人工资的2/3），组织薄弱，政治上落后。这是由传统（农业工人大都世袭），由集中化程度很低以及同农场主有密切的日常接触（1968年，他们中有61%在不到5人的农场工作，每个农场的雇工数平均为18人），同国内总的工人运动相脱离所造成的。^③

在60至70年代，主要来自英国前殖民地国家的“有色”侨民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它的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人数80年代初约有80—90万人，其中大多数在劳务

① 参见《劳工部公报》，1978年1月，第38—39页。

② 参见《农业年鉴》，1980年，第19页。

③ 参见《社会学评论》，1972年8月，第425页。

部门从事低工资的工作。其次，“有色”侨民在制造业通常从事不太熟练的劳动。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大企业的组装车间和其他车间从事白人工人不愿承担的繁重工作。例如，在达格涅姆的汽车车身厂（福特公司的一部分），1978年60%的工人是“有色”侨民。^① 侨民工人虽然最受压迫和遭受最残酷的剥削，但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一个孤独部分。只有工会和整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才能阻止由于种族和民族的区别而造成的工人阶级的分裂。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正在为反对歧视和压迫“有色”侨民，为吸引他们到共同的组织和斗争中来而奋斗。

由于70年代失业剧增和失业持续时间增长，长时期没有工作的工人越来越成为一支具有自己特点的英国工人阶级的队伍。1980年年中，失业半年以上的工人计有55.6万人（其中失业时间最长的在52周以上，计有32.4万人）。^②

长时间处于失业者之列，通常会使人脱离集体，脱离同事，常常脱离工会，有时甚至脱离自己的职业。缺钱（或者钱大大减少），失去作为日常生活中心的工作，以及失业的其它结果，都在产生严重的心理影响。

迅速增长的青年失业孕育着重大的危险。许多青年人陷入失业的队伍，他们还没有从事过固定的工作，常常连阶级意识的萌芽都没有，同工人组织也没有联系。有时，那些有经验和熟练技术的受工会保护的老工人，同第一次找工作的学校毕业生之间产生利益上的矛盾。所有这些都向工会和工人政党提出一系列复杂问题。左翼力量在为解决失业问题而斗争时，对失业者的离异危险提出警告，这种离异可能导致失业者失去阶级性，并使之成为

① 参见《今日马克思主义》，1978年2月，第34页。

② 参见《劳工部公报》，1980年9月，第954页。

极右势力的猎物。

几十万人（特别是青年人和中年人）长期失业，许多有色工人、低工资而又家庭人口多的工人，以及其他处于“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极端艰难的处境，保守党的社会基层组织的缩减，所有这些有产生十分广泛而又稳定的最低层的趋势。在英国不同于意大利，这些人同小资产阶级下层（有时称作流氓资产阶级）少有瓜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因其出身、社会经验和文化素养而与工人阶级相联系，似乎处于它的外围。80年代“工艺革命”的发展必定会使这个形成了自身特殊的利益和意识的阶层的人数增加，并要求工人运动对这个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近几十年来，尤其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成分和结构显著地改变了，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低级办公室职员、技术员、计算机操作人员、护士、社会服务机构的普通工作人员和其他“中级专业人员”，在数量上增长和逐渐接近（首先是客观上的接近）“传统工人阶级”，以及妇女和“有色”侨民在工人阶级中的份额增长，这些都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新的分化并可能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则促使工人阶级更加同一和团结。由于科技革命对劳动力的要求日益提高和教育的广泛普及，促使各类工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力价格进一步接近。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本身，客观上导致各种雇佣劳动者受剥削的条件趋于一致和均衡。工人阶级自身日益增多的再生产和阶级内部的社会流动性增强，也在促进工人阶级的集聚。最后，工会中各类工人和职员的良好组织性也促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团结。

第三节 当代英国的资产阶级

在英国和像在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资产阶级是由在

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实施对社会的统治的过程中，执行各种不同的职能的集团和阶层组成的。战后以来英国统治阶级的成分发生了局部的更新。经济的部门结构的变化使得资产阶级的相应成分之间相互关系也发生变化。一系列经济部门的国有化破坏或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某些成分，同时又产生资产阶级的新集团。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干预急剧加强也在统治阶级中造成了相应的集团。股份所有制形式的持续扩展给予资产阶级成分以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个形成得很早和相对稳定的阶级。它没有因为重大的经济和政治事件而经受根本性变化。这一点与联邦德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有所不同，促使资产阶级现代化和复杂化的因素，发生作用比较缓慢。在英国资本家阶级中，其上层人物和一般资本家“群众”的区别比较明确。

在英国的官方统计中，多数属于资本家阶级的人被列入“雇佣工作者”。这是因为在英国大多数小私有企业具有股份公司的形式。1978年底，这种小私有企业有70万家。^①这种小企业的主要业主通常是董事长或主管经理。这70万小企业雇主大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只有1/5即12—14万雇主属于资本家阶级。他们是传统的资产阶级，同19世纪的资产阶级先辈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们之中受过高等教育或有专业文凭的人很少。他们多数是实干家，根据经验和合理的看法领导企业。他们之中不少人是企业创办人的继承者。

在农业中个体所有占优势，大约有3万大农场主。与大农场主接近并局部相吻合的是4500个“土地贵族”。^②由于农业在

① 参见《1978年的公司》，伦敦1979年版，第9页。

② 参见《农业年鉴》，1980年，伦敦版，第2、16页；《新社会》，1976年10月号，第65页。

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次要的地位，英国农业资产阶级的作用不大，但是，它组织良好，在全国农场主联盟中当领头人，在农村各地和政府部门有着较大的影响。除了农业外，个体资本家还存在于商业、劳务业和建筑业，在较少的程度上存在于运输业和工业。

英国资产阶级总人数的大部分是大中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即“雇佣的”资本家。属于资产阶级的高级管理人员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原先的个体企业主及其继承人。由于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个体企业主要变为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或主管经理。他们拥有相当份额（往往是大部分）的股票，得到高额薪金，继续剥削企业的工人和职员。这种情况首先为不大的和中等的企业所特有，但是也常常存在于大企业，其中包括某些著名的工业和商业大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决定高级经理的收入和地位的主要是资本占有的数量。第二类高级管理人员是真正的经理，而不是董事。他们占有剩余价值主要不是通过股息的形式，而是通过薪金、奖赏、优惠、退休金加算等形式。英国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间接证实：薪金份额的增长与利润份额的下降相关，通过上述这些形式再分配的剩余价值的部分在增长。同时实践表明，第二类高级管理人员虽然在资本家阶级中起着重要的和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却是资本家阶级的比较薄弱和一定程度上“权利不平等”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资本家的社会出身基本相同。对曼彻斯特地区纺织和机器制造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钢铁工业的董事的调整表明，上层管理人员基本上由实业家、高级行政长官、土地所有者、高级专家的儿子组成，即出身于资本家阶级和与之相近的中等阶层。在大的工业和金融企业，他们大多数都毕业于各种私立学校。在英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实业家比重较低。据1970年的调查，在100人以上企业中只有27%的董事和高级经理受过高等教育。^①

^① 参见《社会学评论》，1978年11月，第816页。

英国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有几万个，他们在许多社会特征方面不同于资本家阶级的“群众”，即几十万“普通的”资产者。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较多地表现出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民族特点，表现出它的最新变化。资本家最高层的基础是几十个特大垄断公司的领导人和所有者。这些人多数在几个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拥有数百万股股票。另一部分人通过巨额薪金、福利补助、优待购买股票、补助金等获得不小的一份剩余价值。随着国民生产和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在特大公司，垄断寡头集团的权力和影响在增长。跨国公司的推广使得垄断寡头集团具有国际的特点。英国社会学家阿·福克斯对此写道：“某些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对英国资本主义是否繁荣抱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只要国际资本主义繁荣他们就会占有牢固的阵地。”^①

英国垄断寡头的特点之一是贵族在其中占不小的位置。随着很久以前就开始的经济上的混合生长，实业家和贵族的上层人物在社会文化方面日益接近。至今在英国保留着用有爵位的人来装饰特大公司的董事会的习惯。1978—1979年，50个特大工业公司和24家储存银行、商业银行的董事长中有31个爵士和11个勋爵。^②

英国传统的银行家族在金融寡头中起巨大的作用。他们同包括国际垄断组织在内的特大工业和商业垄断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战后时期，控制保险业务专营和养老基金的一小撮金融寡头的财富和影响急速增长。1980年，证券交易所流通的股票有1/5属于他们。1979年《新政治家》杂志写道：“30个基金组织占有

① A.福克斯：《工业民主：国际的观点》，考文垂1978年版，第45页。

② 参见《泰晤士报一千页》（1979—1980年），伦敦1979年版，第30、77、80页。

几乎全部养老基金的2/3，这意味着二三百个人控制着新的命脉。”^①

国营公司的领导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按其地位是资本家阶级上层人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大的私有企业的高级经理和董事关系密切。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大都来自私有成分的实业家和高级经理，来自同实业界有联系的专家和官员以及少量右翼工会首领。这些人的薪金虽然比在特大私营公司要少一些，但其数额仍然很大，通常高于内阁部长的薪金。

国家机关的上层人物同实业界有密切关系。据1971年的调查材料，英国中央政府有39 000个职位较高的职员，地方政府有37 000个职位较高的职员。按其地位、社会出身、受教育程度、收入，这些人中相当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在70年代，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高级国家职员转变为私营大公司的董事，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实业家应邀到国家机关和半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采取的缩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的措施和减少国营成分的努力，导致统治阶级中这种高级国家职员的影响有所削弱。

与私营和国营企业、国家机关的领导局部紧密连接和局部互相交织的，还有这样一些上层知识分子：法律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各种咨询公司的业主和领导人，各大报刊的总编辑、电视广播公司的领导人、教会的主教、资产阶级政党的职业政治家等。特权地位、收入数额、家庭和其它社会联系以及参与对大实业的管理，使这部分知识分子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综上所述，根据1971年的调查可以分划出属于资产阶级的下述集团：企业主12—14万人；高级经理和高级行政人员30—35万人；自由职业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6—9万人；雇佣的高级专家

^① 《新政治家》，1979年9月7日，第334页。

10—20万人。资产阶级总共大约58—78万人，占英国自立人口的2.3—3.1%。

资产阶级的基础是资本的占有者。根据皇家委员会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的资料计算得出，1974年公司发行的65.5%的普通股票、73%其它有价证券以及78.9%的土地属于约50万人（他们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25%）。显然，这50万人属于掌有大公司和特大公司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有的进步作者写道：“掌握在私人手里的工厂、事务所、商店网、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基本部分属于主要的股票持有人，即1.25%的成年居民。他们是掌握和支配国内生产工具的资本家阶级的核心。”^①

无论是掌握资本的系统还是统治社会的机制，都复杂化起来。资产阶级内部越来越明确地分划出各种职能集团就是这种复杂化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在更新。统治阶级的新分子和最新分子首先进入其上层。统治阶级的“群众”由中等的和不大的家族公司的“传统”业主，以及社会上和心理上与之接近的人组成。资产阶级的上层集团大都现代化了，而资产阶级的“普通成员”则很少现代化，这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产矛盾。这些矛盾表现在政治领域，特别是表现在保守党内部的斗争及其曲折的方针之中。英国资产阶级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力图制定统一的路线并通过政府较有效地贯彻这条路线。像英国工业联盟、董事协会、英国经理协会之类的实业组织的职能得到急剧扩大。

第四节 当代英国的中间阶层

英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所占人口比例

^① 劳工调查部：《今日英国的不平等》，伦敦1977年版，第7、8页。

要少一些，这是因为在英国农业小资产阶级比较少，经济中的集中程度高。根据1971年的资料，中间阶层占全国自立人口的17—18%，而小私有者只占中间阶层的1/3。

虽然英国社会不断发生两级分化，但是小资产阶级即小私有者至今还是人数众多，70年代末约有170万人。每年有几万小业主破产或被兼并，与此同时又有不少新的小业主产生。英国小资产者主要是小农场主、小商人、手工业者、劳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财务代理人和部分自由职业者。小农场主逐年减少，1969年计有31.6万人，而1979年只有25.7万人。^①虽然有政府津贴，但是多数小农场主处境困难。据全国农场主联盟主席说，联合王国的全体农场主的平均收入1977年为3 500英镑。^②这个数字比同年男工的中等工资高不了多少。城市小资产者比较稳定。他们的作用在工业中不大，但在建筑业、商业和各种劳务中比较大。60和70年代小商人的数额有所减少，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大公司广泛采用新的商业形式，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排挤了大量的小店主。例如，经营食品杂货的小店主在商业中的数额，1972—1978年，从42%降到33%。1971—1978年，经营一个店铺的小商人的数量下降了27.6%（从33.86万人降到24.5万人）。^③然而商业至今仍是英国小生意活动的基本领域，小店主仍是小资产者的最典型的代表。70年代末，英国共有35—40万小商人。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工党政府通过就业抽样税法，这使得建筑业的独立工作者的数量迅速增长。建筑公司不利用自己的雇佣人员更有利一些，因为利用自己的雇佣人员必需缴付新税和保险费。因此，建

① 参见《农业年鉴》，1975年，第6页；1980年，第8页。

② 参见1978年11月13日《晨星报》。

③ 参见1978年9月13日《晨星报》；《国民威斯特明斯特尔银行季刊》，1980年5月，第34页。

筑公司利用“独立的”分包人和单个的手工业者。70年代末，建筑业的独立工作者达40万人。^①商业、劳务业和手工业中的多数小业主为了维持生计和免遭破产而不得不付出极大的努力。小业主的工作时间通常都比较长。爱丁堡的小店主日平均工作10.5小时。^②许多小店主在星期六至星期天也坚持工作。皇家委员就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所作的调查结果表明，“独立生产者”的中等年收入，只比中级雇佣工作者的收入高2%。^③但是，在“独立生产者”之中收入的差别是很大的。据此可以认为，小资产阶级的中等收入接近于工人或普通职员收入。现代英国的城市小资产者的社会出身各种各样，他们之中有不少是原先的工人及其子女，不少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是自愿选择这种职业和谋生手段的。多数小资产者在民意测验时对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劳动、对在自己事业中自我表现的可能性、对同自己的顾客和雇员的“人际关系”表示满意。小业主一般都热忱于自己的“事业”，并竭尽全力维持它。小资产者的心理和思想上的极其重要的特点，是个人逞强和反集体主义。他们常常对“高税”、“不公正的政府保险税”、“高价”、“官僚主义的国家干预”、“集体主义”、“工会的霸道”表示愤怒。他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但这些组织通常存在时间不长并且人数不多。在政治上多数小业主及其组织偏右，支持保守党。

科技革命的开展、教育和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等因素使得知识分子迅速增长。据人口调查资料，知识分子1961—1971年增长了近1/3，即从124.5万人增加到165.6万人。^④1971—1976年每年

① 参见《经济贸易》，1979年11月，第99—104页。

② 参见《社会学评论》，1974年11月，第473页。

③ 参见《评目前形势》，1979年12月，第390页。

④ 参见V.伍德沃德：《英国1961—1981年职业趋势》，剑桥1975年版，第34—37页。

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从6.1万增加到8.2万。^①1981年，英国计有知识分子185万人。80年代初英国知识分子90%是雇佣工作者。在历史上，英国的知识分子比其它国家的知识分子更密切地同统治阶级相联系。一些英国学者指出，与西欧大陆国家不同，英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没有任何自治，不与资产阶级社会对立，不采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立场。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的作用增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知识分子从社会低层得到补充，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大学生运动的影响，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的降低，所有这些一方面加强了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的意识，产生了技治主义观念；另一方面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工人和普通职员在利益上有一定的共同性。虽然在政治上大部分高级专家依附上层人士和资产阶级政党，但是中级的科技人员，大学教师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大都倾向于工党，有时还倾向更左的力量。

英国社会中间阶层的重要成分是中级经理。中级经理这个概念通常包括处在“第一线领导者”和上层管理人员之间的管理人员。在英国，中级经理约占全部经理的80%。中级经理活动在所有的经济部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级经理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各种较大商店、饭店、中等规模的事务所、工场、建筑工地、车间的人数众多的传统的管理人员。这类中级经理在许多方面与小资产者相似，在某些局部方面同中等资产阶级相似。他们的教育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很少受过专业训练。他们大都是“实干家”。另一类中级经理是职位较高的“职业经理”和各方面的管理专业人员，他们多在国家机关、半国家机关、特大公司、新兴工业部门、金融部门和大商业公司工作。随着英国在

^① 参见R.巴特勒：《高度合格的雇员》，伦敦1978年版，第4、12页。

“管理教育”中的落后状态的消除，具有专业文凭的经理增多。职业经理流动性大，常常从一个单位转到另一个单位，同时其职位得到上升。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经理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独特队伍。但是他们的数额不大，1971年仅占知识分子总数的12%。^① 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在英国增长很快。1951—1961年，经理和行政管理人员增长1.5倍，1961—1971年又增加了50%（从63万增至94万），1981年达128.3万人。^② 中级经理的社会阶级地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受资本家雇佣的被剥削的被支配的职员，另一方面又是帮助资本家剥削工人和职员的人。中级经理的各人情况不同，有的第一方面比较突出，有的则第二方面占首要位置。在英国历史上，管理人员自出现起就同业主联系密切。至今相当多的经理在日常实践中按其职能性质也同工人和普通职员相对立。近几十年，尤其是在70年代，一系列因素改变了中级经理的地位。随着经理的增多，一部分经理流向权力的上层，上升为高级领导，从而形成了官僚化的管理体系。在这种官僚化的管理体系中，中级经理受到详细的规划和指令的压制，难以表现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随着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管理自动化的深入，通过决定的集中化趋向加强了。继工人和普通职员之后，“普通”经理由于无个性的领导方法和失去独立性而感到痛苦。中级经理的权力在减少。工会力量的增强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当工会同企业或公司的领导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时，大多数管理人员并不参加这种谈判。在日常实践中，工会积极分子在企业 and 机关中的影响和权力的增加限制了中级经理手脚的自由。管理人员的就业保障遭到了破坏。特别是年龄渐老的经理受失业的威胁。由于政府的收入和税收政策，由于经理缺少有

① 参见巴特勒：《高度合格的雇员》，第7页。

② 参见伍德沃德：《英国1961—1981年职业趋势》，第31页。

组织的力量，中级经理的薪金和实际收入在相对下降。英国经理的收入低于大多数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在“额外优惠”方面，工人、普通职员和普通经理的接近，也降低了中级管理人员的地位。所有这些不利的因素导致经理的严重不满。民意测验中心1977年指出，英国的经理“充满痛苦，士气沮丧，缺少刺激”。他们感觉到自己处在资本家、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地位的矛盾性。60年代末，英国的经理人员开始加入主要由普通职员组成的工会，一部分经理人员加入强大的工人工会。在一些部门和特大公司开始成立了经理的组织，如英国经理协会。

第八章 当代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第一节 当代法国阶级结构的特点

法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其社会阶级结构与其它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法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下半叶，比英国、比利时甚至德国都要晚，而且发展极不平衡，没有触及到一些地区和工业部门。统治阶级在价格形成、工资、税收、外贸方面的政策促使法国保持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高比重。本世纪30年代法国农业就业人口占全国自立人口的36.4%，而当时在英国占5.7%，在比利时占17%，在德国占29%。^①法国社会学家阿·吉格弗利德写道：“甚至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工业进步以后，法国按其社会结构实际上还是农民、手工业者和资产者的国家。”^②小资产阶级似乎是缓冲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冲突的中间层。它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后备军，保障了资产阶级统治制度的相对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经济的深刻变化，引起了法国自立人口成分的急剧变化和社会阶级结构的重要变化。人口情况的变化，如人口增长速度提高，没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的数量和比重增加，也影响了社会阶级结构。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如青年学

^① 参见格·季里根斯基主编：《法国》，莫斯科1982年版，第187页。

^② 吉格弗利德：《法国政党概观》，巴黎1930年版，第84页。

生毕业后的就业困难问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同人口的变化有关。但这些问题的根源无疑在另一方面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

战后法国社会结构发展的决定性特点是雇佣劳动者的迅速增长，其在自立人口中的比重的急剧提高。1954年法国开始经济高涨，那时雇佣劳动者约有1 300万人，占自立人口66%，1980年则有雇佣劳动者1 800万人，占自立人口84%。^① 雇佣劳动者的增长主要靠小业主人数量减少来补充。1954—1974年，小业主连同家庭辅助成员从662.4万减少到475万，其在自立人口中的比重从35.2%下降到20%。^② 大资本和垄断资本对小生产阵地的不断进攻，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中发生的深刻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一方面削弱传统中间阶层即小土地所有者、小店主、小商人、手工业者、服务业中的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等；另一方面引起新的中间阶层即受雇的工程技术人员、高中级管理人员、中级官员、教员的激增。

战后时期法国农业出现了深刻的转变。1954年，自立农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5%，1980年只占8.2%。^③ 一直到1975年前农业人口减少的速度都是较快的，只是到70年代下半期才放慢。1976—1978年，农业工人和独立农户年平均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6%和3.2%。^④ 离开农村流到城市的主要是破产的农场主及其家庭、寻找受教育机会和工作的青年。如果说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国内工业发达地区的工业和服务业吸收了从农村来的劳动力，那么70年代失业问题的尖锐化则阻碍了

① 参见季里根斯基：《法国》，第188页。

② 参见《经济和政治》，1974年6月号，第33页。

③ 参见《经济 and 统计》，1977年第91期，第4—5页。

④ 参见季里根斯基：《法国》，第188页。

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

城市小私有者阶层受排挤的速度要比在农村的小私有者慢得多。不但如此，从70年代末起像过去已经减少的手工业者开始有了一些增长。结果，1975—1980年，城市小私有者的总人数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

除了城乡小私有者无产阶级化外，雇佣劳动大军的重要补充来源是日益增多的参加生产的妇女。1968—1980年，增加的自立人口3/4是妇女；妇女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从34.9%增长到39.5%。1968年，男雇员和女雇员分别占自立人口77%和75%，1980年则分别为82%和85%。^①

70年代某些种类的雇佣工作者的数量和在全人口中的比重有所减少，这主要是指国内工业区（巴黎和巴黎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各省）的工厂工人。另一方面，职员、教师、工程师、行政人员增长了。

昔日乃是典型的小私有者国家的法国在战后年代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面貌。1954年国内计有600万城乡小私有者，1975年减少到330万，1980年则为300万。1954—1980年，他们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减少了2/3。^②与此相反，同一期间内新中间阶层的人数和在全人口中的比重显著增加了。

法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按其实质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并无区别，只是变化发生得很晚。例如，就农业人口来说，法国在30年代时就落后英国近一百年。甚至在50年代，法国的社会结构类似农业人口比重较高的意大利和日本。只是到了70年代，在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法国的社会结构才在城乡人口比例、雇佣劳动者和雇主的比例、服务业的份额等基本指标方

① 参见季里根斯基：《法国》，第189页。

② 同上，第190页。

面接近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指标上，法国目前略落后于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先于意大利和日本。

第二节 当代法国的工人阶级

战后法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和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总的说来呈增长趋势。1954年工人阶级人数为1 103万人，比重为57.4%；1962年为1 178万人，比重为61.3%；1968年为1 315万人，比重为64.4%；1975年为1 472万人，比重为67.7%，1980年为1 413万人，比重为65.8%。^①工人阶级的发展导致其成分的扩大和复杂化，导致其基本队伍之间相互关系发生变化。随着科技革命的加深，相当数量的职员阶层汇入工人阶级。

战后法国农业工人急剧减少。1954年农业工人有116万人，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6%，1980年则为28万人，比重为1.3%。^②农业工人中的外国籍工人所占比重在增加，从1954年的10%增加到1975年的19%。^③后来由于政府限制移民的政策，农业工人中的外籍成分重新缩减，1980年为13%。^④

工业工人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核心。工业工人的数量和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1954年为668万人，34.8%；1962年为740万人，38.5%；1968年为823万人，40.4%；1975年为896万人，41.2%；1980年为837万人，39%。^⑤1975—1980年工业工人总数和比重减少主要是因为专业化工人和粗工大量减少。在这期间，这两类工人分别由294万和161万减至262万和127万。^⑥科技进步、

^{①②} 参见季里根斯基：《法国》，第192、193页。

^③ 参见《经济和统计》，1977年第91期，第4页。

^④ 参见季里根斯基：《法国》，第196页。

^{⑤⑥} 同上，第192、193页。

新技术和新工艺大大提高了对工人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的要求。工业工人数量的增长主要靠熟练工人和技术员。1962年熟练工人有228万人，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11.9%，1980年上升为299万人和13.9%。1954—1980年，技术员由总数19万增加到82万，其在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由1%增加到3.9%。^①在70年代，具有中等专业教育水平，在生产、管理和信息领域工作的专业技术员（首先是计算机程序编制员）的数量增长特别迅速，这是因为越来越普遍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技术员依赖于资本，其劳动条件更差，失业危险增多，这些都使他们同工人相接近。他们与中级管理人员不同，基本上担负的不是指挥职能，而是生产性的执行职能。技术员越来越多地从工业工人的队伍中得到补充。例如，据1970年的调查，40%的男技术员来自工业工人。^②工业工人的技术结构的变化呈两种对立的趋向。在机械化广泛采用的部门如纺织、服装、制革等，不大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劳动力在增长，而在进入了自动化时期的最先进的部门如电子、石化、原子能等则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在部分实现了自动化的企业，除了需要增加能够调整和修理设备、受过专门训练的熟练工人外，还广泛需要完成半熟练工作的操纵工。在操纵工的生产活动中体力劳动减少了，但是心理和神经的负担加重了。

战后工业工人阶级的部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工业化中，劳动力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大量涌入重工业的一系列部门，首先是电机、化工、机器制造、电子、飞机制造、石油加工、原子能等部门。例如，1956—1961年，纺织业的工人从58.1万减少到55.2万；1959—1962年，服装业和制革业的工人分别从34.2万和17万减少到31.1万和15.3万。与此同时，在电机工业，1954—1962年，工人从20.4万增到30.7万，即增加了一半多；在化学工

^{①②} 季里根斯基：《法国》，第192、193页。

业，工人从29.9万增到34.7万；在冶金工业，工人从27.8万增加到31.4万；在机器制造业，工人从100.8万增到122.7万。^①在重工业中，煤炭业的工人急剧减少而石油加工业的工人相应增多。1954—1962年，煤矿工人从25.9万减少到20.3万，而石油加工业的工人1956—1961年从3万增加到4.9万。^②

法国工业工人阶级在组织方面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例如，它既有集中的一面，也有分散的一面。据1974年的统计，在965万工人中，有600万人集中在雇佣500人以上的大企业，近300万人在雇佣100—500人的中等企业，还有60—70万人在雇佣不到10人的小企业里工作。也就是说，虽然有将近2/3的工人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大企业，但也有1/3的工人在比较分散的中小企业劳动，这种分散的程度较之西德、英国和美国为甚。^③

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活动人口的无产阶级化，阶级两极分化的加强，这些都扩大和加深了工业工人阶级同其它劳动人民的社会联系。法国工业工人来自各种社会成分：50%是世袭工人，30%是农民和小商人的儿子。^④在工业工人阶级内部，不大熟练的工人常常补充熟练工人（甚至包括技术员和制图员），但是这种流动通常不逾越工人阶级的界限，也就是说，工人的儿子依然是工人。专业化工人和干粗活的壮工靠离开农村的农业工人、破产的农民和年青妇女以及移民来补充。同往常一样，工业工人由于其数量，由于其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由于其组织性和社会活

① 参见《经济和政治》，1973年6月号，第83页。

② 参见《法国工人运动概述（1917—1967）》，莫斯科1968年版，第363页；《经济和政治》，1959年第60、61期，第3页。

③ 参见克洛德·坎：《阶级结构与法兰西人民联盟》，巴黎1977年版，第151页。

④ 参见D.贝尔图克斯：《个人的命运和阶级结构》，巴黎1977年版，第249页。

动的积极性，是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

外籍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一支大队伍，约有200万人，占法国工人阶级队伍的1/5，他们大多数来自北非、南欧、东欧和法语非洲国家。^①1978年，参加生产的外籍工人中30%是技术水平较低的专业化工人，64%是最低技术资格的工人。^②他们基本上从事最繁重和最危险的不需要熟练技术的劳动。外籍工人广泛分布在建筑业、运输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1978年对54个企业的调查表明，近3/4的外籍工人在只需要培训三个星期的工作岗位上劳动。^③外籍工人与法国人相比，在更大更多的程度上受失业之苦，在寻找工作、劳动工资和签订集体合同方面遭受歧视，缺少社会保障，生活水平低。他们一心想着高工资和快收入，常常害怕失去工作，在企业主的法规和专横面前没有防卫感，因而常常产生消极冷淡的情绪，愿意用任何价格出卖劳动力以求得生存。但是，随着他们对在法国的生活条件的适应，随着第二代侨民数额的增加，他们也面临着同法国劳动人民一样的问题。他们对社会问题发生了兴趣，开始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参加法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

办公室职员和商业职员即“白领人员”是在数量上继体力劳动者之后的一支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他们是一个日益成长和变化的集团。1954年，他们共有206万人（其中商业职员162万，办公室职员44万），占全国自立人口的10.8%（其中商业职员占8.5%，办公室职员占2.3%）。1980年，他们共有368万人（其中商业职员290万，办公室职员78万），占全国自立人口的17.1%（其中商业职员占13.5%，办公室职员占3.6%）。^④女职员占

① 参见克洛德·坎：《阶级结构与法兰西人民联盟》。

②③ 参见《法国统计年鉴（1980年）》，巴黎1980年版，第67页。

④ 参见季里根斯基：《法国》，第192、193页。

全体职员66%。^① 职员数量的激增和科技革命，实质上改变了工人的体力劳动和“白领人员”的脑力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办公室劳动和商业劳动的机械化，“白领人员”集中于大办公室，采用科学的劳动组织和工业上的剥削方法，这些使得普通职员和工人在劳动性质上接近起来。随着机械化的实现，职员的劳动程序简单化了，他们的劳动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缺少主动性和独立性。“白领人员”劳动的受支配性质增长了。职员和工人的劳动工资水平逐渐接近，其工资超过职员中等薪金工人在迅速增加。随着职员数量的增长，其社会出身发生了变化。1970年，法国职员1/3是工人的儿女。工人和职员的家庭联系增多了；43%女职员是工人的妻子，20%的男职员是女工的丈夫。^② 女职员大多数担任办公室和商业劳动中的非熟练工作，他们工资少，上升机会也少。他们与工人通婚率要高于男职员与女工的通婚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女职员按其出身、劳动条件和收入水平同工人相联系。“白领人员”的传统意识随着其他地位的改变而改变。法国左翼工会活动家阿·格拉鲁写道：“在职员群众中，越来越多的新职员阶层不认为自己是那种向往资产阶级、极力使自己的儿女上升和鄙视穿工作短衫、双手满是油污的工人的‘白领人员’……他们失去了在资产阶级圈子里‘中等法国人’的可爱形象，不再是接受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无阶级的群众’。今天，他们越来越经常地意识到他们与工人之间没有深刻的差别。”^③

① 参见《经济和统计》，1977年第91期，第4、6页。

② 参见D.贝尔图克斯：《个人的命运和阶级结构》，第20页；克洛德·坎：《阶级结构和法兰西人民联盟》，第151页。

③ 格拉鲁：《掌权的金融资产阶级和法国的阶级斗争》，巴黎1977年版，第135页。

法国工人阶级中发生的上述过程，即它的范围扩大，传统队伍（农业工人、矿工）的急剧减少，新阶层（技术员、商业和办公室职员）的出现，妇女和侨民大量涌入它的队伍，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不同的后果。一方面，工人阶级的视野在扩大，其要求的水平在提高，新的斗争形式在发展。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新队伍带来自己的生活方式、世界观和社会经验。但是，在70年代后期，法国阶级矛盾尖锐化和政治力量两极化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发展的基本趋向是它团结在工业工人的周围，接受工业工人阶级的方针、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①

第三节 当代法国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法国两大基本阶级之一。从现实的生产关系来考察，现代法国资产阶级同上个世纪的资产阶级一样，掌握着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所有权，但是所有权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法律上的所有权并不一定就是经济上的所有权，在股份制的大企业里法律上的所有权不再完全反映经济上的所有权，唯有一些大股东才能决定企业重大问题。在60和7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的成分进一步复杂化，它失去了原有的同种性。统治阶级内部的社会分层过程加深了。1975年，法国资产阶级共有近55万人，占全国自立人口的3%，其中工业企业主6万人（1980年为7.9万人），大商人18.6万人（1980年为22.9万人）、大土地所有者7万人，主要靠剩余价值为生的自由职业者5—7万人，高级经理人员15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9—260页。

人，政府高级官员和资产阶级政客1万人。^①

法国的大资产阶级拥有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以致能在规模很大的范围内剥削雇佣劳动，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它包括大工业公司、跨国公司、金融企业的首脑（如总经理、董事长、大股东等），一部分大房产主、大土地所有者、少数自由职业者、高级政府官员、高级军警等。大资产阶级人数只有几万人，其中有些人表面上是领薪者，但掌有相当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大资产阶级内部，经过长期的竞争，经济和政治权力日趋集中，形成一个由垄断企业领导人和最高一级国家机器负责人构成的资产阶级最顽固的核心。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的金融资本，如今统治着整个社会，也统治着资产阶级的其它阶层。在现代法国，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基本工业生产集中在几百个特大的托拉斯企业。1959年，法国全部工业企业的0.15%企业占工业企业年流通额的41%，支付全部工资的一半。仅“雪铁龙”、“雷诺”、“普吉奥”、“西蒙卡”四个特大汽车制造公司，就垄断了法国汽车工业生产的98%。10家特大银行支配全国存款额的80%。^②同美国和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法国垄断资本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国家资本在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工业部门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形式在美国是少见的。法国这个资产阶级国家在战后时期成为最大的垄断企业主。由于国有化，国家在50年代末集中了几乎全部的煤炭生产，95%的煤气加工、铁路、海运，80%的飞机生产、电能生产，以及一系列特大银行。国家拥有36%的国民财产。在国有化企业中有近100万人就业者。^③国有化导致

① 参见格·季里根斯基：《法国》，第209页。

② 参见《共产主义手册》，1959年7—8月专号，第19页。

③ 参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经济和政策问题》，莫斯科1962年版，第126—128页。

企业主和整个资产阶级的人数急剧减少，尽管在官方统计资料中这种变化没有得到确切的反映。第二，同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法国垄断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具有最封闭的性质。法国有许多垄断资本仍为单一的财团，甚至为一个家族所控制。在2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中有近一半属于这种情况。法国学者德·海尔等人，把在60年代末从法国经济界的上层代表人物调查中得到的资料，同西欧的联邦德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荷兰有关资料作了比较以后，得出结论说：“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法国是最封闭的社会。”^①有的法国社会学家在指出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社会流动性不断增长的论断具有神话的性质时，强调说，法国统治阶级靠从劳动群众的中间阶层来补充是很次要的，如1954年占10%，1974年占19%。^②第三，外国资本对法国财团的控制相当可观。据1971年统计，法国最大的200家企业中有56家被外资控制，主要是美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瑞士、加拿大、西德等国的资本。同年外国资本提供了25%的工业生产投资，它们控制的企业雇佣法国工业部门的20%的领薪者。^③

法国的中等资产阶级包括大商人、大手工业主、大部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场主、中等企业主和少数工业家、某些自由职业者等，共有50万人（70年代的数字）。^④他们以剥削雇佣劳动力为企业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但本人不仅参加企业领导，而且常常参加生产劳动，从而使企业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中等资产阶级的经济阵地受到生产和资本的垄断集中的破坏，因而其地位越来越不稳固。为了摆脱经济上的不

① 海尔等著：《欧洲实业界的精英》，载《欧洲实业界》，1969年第23期，第52页。

② 参见《法国领导阶级》，巴黎1978年版，第105页。

③④ 参见克洛德·坎：《阶级结构与法兰西人民联盟》，第151页。

稳定状态，一部分中小企业主参加垄断集团的生产销售机构。据1975年的资料，法国有40%的中小企业主靠当转承包人才得以生存。^①国家资本和垄断资本的进一步联合生长，使中等资产阶级失去了有特权的同国家联系的渠道，而这种渠道早先为他们的社会稳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迄今为止中等资产阶级所掌握的经济阵地虽然为数可观，但是其在决定统治阶级的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在减少。因此，中等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化。

高级管理人员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殊阶层，是自有资本和职能资本相分离的过程加深的结果。掌握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个体资本家的数额在减少，而作为公司的、集体的资本家的高级雇佣经理的数额在增长。从1954年到80年代初，拥有自己的工业企业的企业家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在同一时期被官方统计列入雇员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至少增长了二倍。形式上是雇佣职员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增加并不完全反映业主和管理人员的相互关系。经理人员数量的增长在许多方面表现了一种法律形式的过程：个体资本家由于其企业或改组为股份公司或被其它企业合并而转变成企业的雇佣职员（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经理）。此外，相当部分的经理只是临时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作为企业家的儿子，终究要主持“家业”。经理和业主之间的界限在逐渐消除。一方面，工业家和大商人的薪金在家族收入中的比重增加。另一方面，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私人公司的行政委员会的数额在增长。例如，1974年在510个被调查的高级经理中，43%的人参加工业公司的行政委员会，13%的人参加银行的行政委员会。^②高级经理

① 参见B.A.鲁贝：《垄断统治下的中小企业（以法国为例）》，莫斯科1978年版，第91页。

② 参见《社会科学通报》，1973年10月，第88页。

在法律形式上虽然是雇佣人员，但是拥有相当数额的股份资本。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高薪、股份收入、红利和其它津贴获得一部分剩余价值。据1965年的调查，高级经理的46%的收入来自私人公司的利润。^①

大学文凭是获得大公司的总经理职位的必要的（但不是足够的）条件。例如，1952—1972年，100个特大法国公司的董事长中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重从35%下降到12.5%。公司愈大，公司领导人的教育水平就愈高。^②掌握财产能加快向上升的速度，有时还决定上升的最高限度。例如，在私人企业中，那些出身于资本家的年龄较轻的子弟比高级官员的儿子更有机会担任高级职务。特大公司领导人所受教育的类型发生了变化。那些讲授管理学和销售学的学校的毕业生的比例增长了。毕业于那些通常同国家官员有密切联系的大学的高级经理的比重增加了。当权上层人物教育水平的提高及其以管理为职业，使得他们能够在社会活动的各种领域周转，加强了政治官僚上层人物同垄断集团的管理机构的高层人物的融合过程。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期间，从国家机关转到实业界这一现象遍及所有大的国营公司。1958—1974年，58.1%的财政检查局的官员，54.2%的国务委员会成员，33.5%的审计署的官员，32.5%的省长离职后转到了私营公司。^③这种现象对于高级政治家是很典型的。对于官僚上层人物来说，国家机关不过是通向实业界的穿堂。

第四节 当代法国的中间阶层

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变革，农业中垄断资本的加强，法国政府

^{①②} 参见《社会科学通报》，1973年10月，第73页。

^③ 参见P.比尔恩姆：《论法国政权的精英人物》，巴黎1977年版，第143页。

和欧洲共同体的农业政策，所有这些使得许多中小农户破产，导致法国农民的进一步阶级分化。农业调查的资料证明了这一过程。1955—1977年，拥有5—10公顷耕地的农户的份额由21%下降到14%，拥有10—20公顷耕地的农户的份额由23%下降到21%，拥有50公顷耕地以上的农户的份额则从4%增加到11%。^①这类农户广泛采用雇佣劳动。7—8%的法国农场属于资本主义农场。^②60%的法国农民占地在20公顷以下，他们多数实行粗放经营，其收入低于粗工家庭的中等收入。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均不好，完全依附于银行或实际的土地占有者，经常面临破产的危险。1954—1980年，他们的人数和占经济活动人口的份额分别为396.6万人和20.7%，下降到147.4万人和6.9%。^③

在城市小商品生产领域，主要趋势是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减少。1954—1980年，小商人的数量和占经济活动人口的份额，分别由125.2万人和6.5%下降到87.5万人和4.1%，手工业者分别由75.7万人和4%下降到56.6万人和2.6%。^④由于超级市场网的增长，经营传统的商品如食品、服装、针织品的小商店减少了。与此同时，经营群众性的和高档的商品如服饰用品、化妆品、体育用品、书籍的商店增多了。小商品占需售商品流通的3/4。在服务业，像小旅馆、小饭店、加油站之类的小企业增长了。手工业者人数的迅速减少同工业生产的加速集中有关。手工业劳动现在主要保存在艺术行业、小型修理和劳务部门。相当一部分手工业者集中在建筑业。与农民相比，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要强一些。小企业的平均寿命（现在大约为七年）无疑在缩短，但是相当一部分小企业在竞争中站住了脚。^⑤

① 参见《法国统计年鉴（1980年）》，第167页。

② 参见季里根斯基：《法国》，第202页。

③④ 参见同上，第194、195页。

⑤ 参见D.贝尔图克斯：《个人的命运和阶级结构》，第20页。

在小商品生产中开办企业相对容易一些，因此对失业者、工人和职员有吸引力。在70年代末，失业和就业保障问题的急剧尖锐化使得小企业的范围有一定的扩大。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由于小业主缺少准备和经验，他们的企业大都“幼年夭折”。城市小业主的生存环境仍然像从前一样极不稳定。科技进步并没有对小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性质带来重大的变化。小商品生产者的劳动仍然是机械化程度很低的使人疲劳的劳动。为了增加企业收入，小业主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放弃假日。许多手工业者在疲劳程度、工作日长短和平均收入水平方面甚至比某些工人要差。小商人的处境虽然好一些，但是他们的劳动条件仍然是艰苦的。由于政府的价格政策和赋税的加重，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有下降的趋势。

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现代化导致一部分城乡小资产阶级陷入灭亡和无产阶级化，导致另一部分城乡小资产阶级失去独立性而成为垄断资本的奴仆。总的来说，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比重都在减少。1954—1980年，其人数和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分别由611.4万人和31.9%减少到313.5万人和14.6%。^①小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政权支柱的意义在降低。

小资产阶级的一支持殊的不断生长的队伍是自由职业者。按照法国官方统计，自由职业有80种专业。^②1954—1980年，自由职业者的人数由12万增加到19.9万。^③他们多数从事至少需要有大学文凭的熟练的脑力劳动。但是也有些自由职业者（如独立的护士、女助产士）只需要受过中等职业教育。自由职业者按其收入水平分为不同类型。一些自由职业者经营典型的小企业。另一些自由职业者主持大的医疗诊所或律师事务所，按其地位属于中

① 季里根斯基：《法国》，第194、195页。

② 《观点》，1979年第332期，第32页。

③ 季里根斯基：《法国》，第194页。

等或大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的一个特点是它具有特别的社会封闭性。在自由职业者中实际上没有出身于工农的人。通往自由职业之路对于“新手”是限制极严格的。因此，自由职业者人数的增长速度要比同类专业的雇佣工作者慢得多。1968—1976年，受雇的医生从2.5万人增长到5万人，而个体医生的人数只从4.4万人增长到5.1万人。^①自由职业者是法国收入最高的社会集团之一，其中30—40%（5—7万人）具有资产阶级的中等收入，因而接近于统治阶级。^②

在老中间阶层衰落同时，新中间阶层迅速兴起。新中间阶层是指地位介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受雇的中级科技人员、中级管理人员、中级公务员、中级专业人员。1954—1980年，法国新中间阶层的人数及其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分别由125.2万人和6.5%增长至351万人和16.3%。^③科技革命一方面产生新型的脑力劳动者，把知识分子的职业变为群众性的职业，另一方面又加强脑力劳动的“机械化”，使脑力劳动失去个性和分工更为狭窄。

新中间阶层的主要集团之一是受雇在企业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1954—1980年，工程师人数和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从7.5万人和0.4%增至30.8万人和1.4%，中级管理人员由53.4万人和2.8%增至120万人和5.6%。^④在化学工业部门，技术和管理干部占该部门就业人数1/4。在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和石油工业部门，技术和管理干部的比重则高达60—75%。^⑤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除了在工资方面与工人有较大的差别外，而且享有一些特权：社会保险方面的优待、较高的失

①② 季里根斯基：《法国》，第195、204页。

③ 季里根斯基：《法国》，第194、195页。

④⑤ 同上，第205页。

业补助金、提高技术熟练程度的权利、定额不那么苛刻的工作日、较长时间的休假。随着职务的升高，这些特权也相应增加。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内部的收入水平也有很大差别（1：10甚至1：20）。中级工程技术人员和中级管理人员的地位明显趋于降低，这表现在他们的劳动愈来愈具有服从支配的性质。他们集中在大机关，劳动分工很细，劳动内容十分死板。因此，他们丧失了对业主的亲近感。法国社会的传统的官僚主义，法国老板特有的专制主义和家长作风，使得他们同雇主关系更加疏远。随着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人数的增长，他们之中多数人越来越难以上升到高级职位，他们的专业劳动中的创造性成分越来越少，他们的智能越来越难以得到充分的运用。例如，40%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认为自己的知识没有彻底利用。所有这些因素减弱了他们对企业工作的兴趣和对事业的热忱。

法国中间阶层的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是受雇于国家的中级公务员。战后，法国政府除了原有的政治上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职能外，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和加强了指导、管理、服务、协调、监督法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等新的职能。法国政府由上个世纪设置的二三个部扩充到战后近30个部。它的公务员也猛增到1982年的236万人。法国公务员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丙、丁类公务员实际上是办事员，属于工人阶级。甲类属高级文官集团（不包括部长以上的最高级官员），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司局长、处长、监察等），占公务员总数的18%，其中大多数丧失了政策制订权和决定权以及种种特权。乙类公务员是中级官员（如科长、科员、监察员、秘书等），是一般政策的执行者，占公务员总数的40%。1982年统计，甲、乙两类公务员共有137万，占就业人口的6%。^①甲、乙两类公务员

^① 吴国庆：《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载《西欧研究》，1985年第6期。

除了极少数（3 000—10 000人）属于资产阶级外，绝大多数属于中间阶层。乙类公务员31.1%出身中小职员，26%出身工人，13.6%出身农民。甲类公务员大都出身资产阶级，出身农民的占7.8%，出身工人占14.8%。^①在中级公务员中，捍卫自己的物质利益和地位的意识在加强，因而对工会运动的倾向在增长。

战后法国的科学、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文化艺术、新闻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因而受雇于国家或私营单位的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艺术家、文学家、新闻工作者等专业人员也随之增长。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艺术家和文学家，1954年约有51万，1962年为70万，1968年100万，1975年147万，1982年增到186万。科技人员1978年约有26万。1985年达45万。^②

我国学者吴国庆认为，法国新中间阶层是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对当前法国经济、政治、思潮诸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重大影响。新中间阶层和旧中间阶层有很大差别。法国新中间阶层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脑力劳动为生，兼有总体工人的职能，因而比较容易摆向法国工人阶级。他们在政治上采取中间偏左的立场。在他们的代表人物推行的改良主义政策中，有采用进步措施来改变现状和变革法国社会的合理成分，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③

^{①②③} 《西欧研究》，1985年第6期。

第九章 当代联邦德国社会的 阶级结构

第一节 当代联邦德国阶级结构的特点

战后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联邦德国的阶级结构发生重要变化：（1）在金融寡头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加强的同时，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进一步缩小；（2）工人阶级分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切领域，其影响进一步增大；（3）中等阶层的分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趋向加强。

联邦德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历史发展趋势是阶级力量愈来愈两级化和内部多层次化。联邦德国的经济活动人口1950—1960年增加了300万人，随后其增长急剧减慢，一直到1975年只增加了50万人，70年代下半期则减少了100万人，80年代上半期仍呈缩减的趋势。经济活动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60年代初最高，为47.8%，1980年下降到42.1%。^①联邦德国的官方统计把有工资或收入的人分为两大类：（1）非雇佣工作者，包括资本家、手工业者、商人、农民、独立的医生、律师等；（2）雇佣工作者，包括工人、职员、学者、经理、政府官员等。根据官方统计资料，1960—1981年，非雇佣工作者的人数及其占就业人口的比

^① 参见B.H.舍纳西主编：《联邦德国》（《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丛书》），莫斯科1982年版，第248—280页。

重,分别从600万和22.8%下降到340万和13.5%。非雇佣工作者人数和比重的下降证明了资本集中和多数小资产者被消灭的过程。与此相反,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及其占就业人口的比重1960—1981年,分别由2 030万和77.2%上升到2 230万和86.5%。^① 尽管把就业人口划为非雇佣工作者和雇佣工作者可以证明阶级两极化的总趋势,但是抹煞了两个主要阶级内部和中间阶层中的多方面的分层过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驳斥了那种认为划分无产阶级和资本家没有什么意义的资产阶级理论。联邦德国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虽然体现了社会劳动的一个历史必经阶段,但它已日益明显地阻碍着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联邦德国的学者指出:“当前我们的生活进程赖以存在的这种经济对立的日趋紧张清楚表明,联邦共和国的阶级社会正走向四分五裂。资本主义并未被克服,联邦共和国的社会依然是由资本主义的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决定。”^②

在联邦德国,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基本社会矛盾不仅加深了,而且扩大了,成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和大多数人民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遍及全社会。一方面,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在不断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大量形式上独立的中小企业主、商人和手工业者越来越依赖垄断资本,为了保住形式上的独立而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作为贡赋献给垄断资本家。这样,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同工人阶级相接近。然而这些过程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裂的消灭,也没有导致代之以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所说的某种比较灵活的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

^① 参见B.H.舍纳西主编:《联邦德国》(《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丛书》),莫斯科1982年版,第249页。

^② 约希姆·比朔夫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阶级结构》,1980年第3版。

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属于这个或那个阶级或阶层的人的数量保持着足够确定的状态。社会流动过程主要发生在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内部：原先的独立或中等的企业主变成大垄断公司的经理人员，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工业工人的儿女或妻子变成无产阶级的职员；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变成在工业或国家机关就业的工薪劳动者。1961—1980年，联邦德国阶级结构比例变化如下表^①所示：

阶级（阶层）	1961年（%）	1970年（%）	1980年（%）
工人阶级	70.8	75.6	75.5
资产阶级	2.6	2.1	2.1
城乡小资产阶级	19.7	15.4	10.9
新中间阶层	6.9	6.9	11.5
全国经济活动人口	100	100	100

中间阶层和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社会变动首先表现为农民、手工业者和零售商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当然，也有相反的过程：工人阶级的个别分子争得独立的地位，成为手工业者或零售商。但是，有决定意义的还是两极分化的趋势。

第二节 当代联邦德国的工人阶级

战后以来，在联邦德国社会阶级结构中，工人阶级在人数和比重上都占主导地位。1950—1981年，工人阶级的人数和占自立人口的比重从1534.5万人和65.3%分别增加到2025万人和

^① 资料来源：舍纳西主编《联邦德国》，第250页。

75.5%。^①50、6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在这期间工人阶级人数增加了近500万人，其比重提高了10%。70年代期间，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采用集约化再生产方法、周期性的和持续的经济危机等因素，工人阶级的人数和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81年，联邦德国计有1 080万传统的产业工人、640万属于工人阶级的职员、125万在国家各部门工作其社会经济地位与工人阶级相同的雇员、180万失业者，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在生产部门就业的其地位处在工业工人和技术知识分子之间的技术员和初级工程师。

在70年代，62%的25—34岁的工人出身工人家庭。这个比例从本世纪初起就一直比较稳定。出身职员和公务员家庭的工人的比例从1925年的3%上升到1970年的15%，而同期出身农民家庭的工人的比例从22%下降到15%。出身职员和公务员家庭的工人的比例增加，首先说明这两个社会集团同工人阶级在社会经济上的接近。在无产阶级的职员集团中出身于职员和公务员的人的比例也增加了。只有20%的职员出身于旧的中间阶层。

由于科技革命，三大产业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工人阶级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分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农业中，雇佣工人的人数和比重都缩减了。1950年农业中有110万工人，1970年只有25.1万工人，1977年则降至20.8万人。农业工人占工人阶级总数的比重则从1950年的7.6%降至1970年的1.3%和1977年的1%。70年代中期由于工业中的工作岗位急剧减少，农民流入城市的速度放慢了，而在50公顷以上的大农业企业中就业的固定雇佣工人开始有了增长。

在工业部门，工人阶级在1965年前是增加的，但后来减少

^① 参见《联邦德国统计年鉴（1981年）》，第102页。

了。工业工人的减少是不均衡的。在那些与科技进步紧密相关的部门和对于出口特别重要的部门，如化学工业和电子技术工业、精密机械制造业、机器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雇佣工人占制造业工人总数的比重由1970年的39.7%增长到1981年的44.4%。在原料部门，如煤炭工业、建材工业、冶金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工人的比重下降较少，即从1970年的10.9%下降到1981年的9.9%。在传统的消费品生产部门，如纺织业和服装业，工人的比重从1970年的10.2%降到6.9%。整个制造业的工人1970—1981年减少了111万（13%）。在这些部门工人就业人数减少的事实，说明总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在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和比重都不断增长。服务业的雇佣劳动者占全国雇佣劳动者总数的比重1950年为33.7%，1960年为36.5%，1970年40.7%，1980年为45%。但是，这种增长很不平衡。在商业和运输业的就业人数从1960年到1979年实际上没有变化（商业就业人数1960年为330万人、1979年为322万人，运输业就业人数1960年为146万人、1979年为141万人）。在银行和保险公司，就业人数几乎增加一倍（1960年为38.3万人，1979年为71.2万人），但是从1975年起增长的速度大大减慢了，这是因为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而缩减了人员。在劳务部门，1960—1979年就业人数从200万增加到267万。在国家机关，就业人数由1960年的158万增加到1980年为259万，即增加了60%。在1980年的259万国家工作人员中，包括53万联邦军，2.2万外军职员，61.6万在缩短了的工作日条件下的临时雇员，20万在联邦政府主管部门的雇员，100万在铁路、邮电和其它国营企业就业的雇员。

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减少的趋势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变化。工业工人的人数和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70年代以来有一定的减少。1970年至1981年工业工人的人数，从1 247.4万下降到1 014.5万。

万，其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从46.8%下降到41.9%。^① 尽管如此，工业工人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强大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劳动的“合理化”和“集约化”加强了工业工人的革命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创造者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康采恩企业的工业工人是工人阶级内部最大的在社会经济上同种的集团。应该指出，联邦德国的工业工人在集中程度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方面，在占全部工厂的2%的最大的康采恩工厂中集中了50%的工业工人；另一方面，有10%的工业工人在占全部企业的90%的9人以下的小企业就业。工业工人的巨大集中便于工人阶级进行组织和开展阶级斗争。大企业是工人阶级反对垄断资本斗争的“命脉”。应该考虑到，和科技革命有关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重新提出了如何确定企业规模的问题。如果说，过去在相对低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情况下，企业划分为大中小三类主要根据其就业人数，那么今天在资本有机构成急剧提高的情况下，把就业人数作为企业规模大小的指标就越来越不确切了。民主德国的学者指出，今天有50个工人的企业在经济上可以认为是不大的，但同时又可以认为是大企业。例如，在慕尼黑的一个50人的企业1961年资金周转额为4800万马克，而另一个有1700工人的齿轮厂，年资金周转额只有3800万马克。^②

在体力劳动和单纯的脑力劳动的相互关系上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重大的量和质的变化。技术进步导致了物质生产劳动的份额的减少，流通和分配领域、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职员总数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比重的增长。1950年，职员人

^① 参见《联邦德国统计年鉴（1981）》，第96页。

^②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194页。

数为390万人，其中工人为210万人，占54%。1981年，职员人数为920万人，其中工人为640万人，占69.5%。^①技术职员（主要是指技术员）人数还不多，但是增长最为迅速。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劳动的条件与内容与工人最接近，因而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1968年，他们和工人的工资差额只有10%，他们失业人数在逐年增加。1966年，职员失业者2.5万人，1981年则为43.5万人。他们在和熟练工人一样的条件下劳动。技术进步导致许多职员成为操作机器和机械的劳动者，而这正是工业工人的工作特点。技术职员同中级科技人员在劳动中接触密切，因而在形成共同的反垄断资本的斗争中可以起到联系中级科技人员同工人阶级的作用。技术职员和工业工人有着由他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共同地位所决定的共同利益。因此，70年代中期有越来越多的技术职员参加了工人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联邦德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他们虽然客观上已成为工人阶级的成分，但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并没有主观上意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心理和思想意识中占优势的还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纯理性主义”、“技术至上主义”。因此，他们在工会组织程度上大大落后于工人阶级的其它部分。

低级的国家公务员的地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村社和土地的行政机关，在政府各部和主管机关，在联邦共和国的铁路和邮电的管理机构，有许多公务员，他们在物质待遇方面同熟练工人或普通职员没有多少区别。但是他们有两个重要特点：

（1）他们生存的条件要可靠一些，因为享有一系列优惠，尽管没有罢工的权利，特别是不能保护自己免受上司的侵害；（2）充当警察、狱吏、低级军官直接属于国家镇压机关的成分。低级公

^① 参见《联邦德国统计年鉴（1950年）》，《联邦德国统计年鉴（1981年）》

务员在全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随着国家作用的增加而增长，1950年为0.8%，1970年增到3.7%。一部分公务员仍然认为国家是凌驾于阶级之上而为“普遍的”福利服务的。他们比工人或职员愿意相信这样一种社会改良的观点：通过资产阶级国家可以进行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改革。因此，他们常常支持“强有力的国家”的口号。虽然有这些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的特点，低级公务员在地位上仍然十分接近工人阶级，是在争取社会进步和争取工人阶级参与社会管理的斗争中的一支重要的潜在力量。

联邦德国的工人阶级在技术熟练程度的变化上表现出极为矛盾的趋势。整个工人阶级的技术熟练水平无疑在提高，但是这种提高过程发展不平衡，并且伴随着工人阶级某些部分的熟练程度下降。工人阶级的平均熟练水平提高了。1960—1981年，熟练工人在工业工人中的比重由49.8%上升到56.3%，非熟练工人的比重由16%降到10.7%，半熟练工人停留在34.2—33%之间。工人阶级熟练程度提高的原因，一是普及了九年或十年制中等教育，二是对工业工人的专业内容和技术熟练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在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了。在工人阶级中，那些按技术水平和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处于向知识分子和中级领导人员过渡状态的工人增长特别迅速。这类工人1950年共有90万，到1975年增加了2倍，后来正在继续增长。微电子技术对精密机械和光学工业、印刷业、机器制造业、装配过程、文字和信息处理以及广泛的科研领域的采用，导致一系列不懂微电子技术的传统的熟练工人贬值，导致低级管理人员的劳动标准化和形式化，加强了他们对资本统治的服从。80年代，电子工业、精密机械、光学、钟表工业、印刷业中发生过的工人失掉专门技能或过剩的现象，扩展到了机器制造业、汽车和航空工业、电子信息加工等部门，首先是这些部门的电工、装配工、电焊工、冷焊工、排字工、描图工。

第三节 当代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

1950—1980年，联邦德国的实际资本家人数和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分别由76.5万和3.2%下降到56.7万和2.1%。资产阶级人数和比重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农业资本家减少。到60年代中期，许多农业资本家降落到劳动农民的阶层，其人数从1950年的35万减少到1970年的5万。70年代初，联邦德国共有各种大小企业190万个，其中120万个属于小资产阶级经营的小企业。在企业总数为10万个的制造业中，85%的企业不足100人。1970—1976年，工业企业的数量减少到8万个，而在生活服务行业产生了新的企业，属于资产阶级的高级经理和高级政府官员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资产阶级总的数额没有什么变化。

实际资本家可以分为两大类：（1）垄断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2）小资本家和中等资本家。在刚刚粉碎德国法西斯主义后，垄断资产阶级处在崩溃的边缘。但是，在西方大国的帮助下，1945—1959年联邦德国恢复并发展了垄断资本主义。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有5 518个拥有187亿马克资本的股份公司，那么在60年代初联邦德国就有2 501个拥有472亿马克资本的股份公司。^①从50年代起，垄断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是“蒂森公司”、“赫施公司”、“克虏伯公司”、“曼奈斯曼公司”和“克勒克纳公司”；垄断化学工业的是“拜耳染料公司”、“赫斯特公司”、“巴登苯胺和苏打公司”；垄断电机工业的是“西门子公司”、“德国通用电器公司”、“博施公司”；垄断汽车

^①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199页。

工业的是“大众牌汽车公司”、“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夏佩尔公司”、“福特公司”和“巴伐利亚汽车公司”。联邦德国的垄断资本主要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1970—1980年，各种大小的股份公司由7.8万个增加到24.7万个。从60年代起，大股份公司的资本积聚速度加快了。1954年1亿马克以下的股份公司的份额占股份资本的67%，而1967年只占41%，但是在这期间1亿马克以上的股份公司的份额，由32%上升到58%，1970年达64%。1亿马克以上的股份公司1954年3个，1959年50个，1964年73个，1969年95个，1970年102个。1954—1970年，资本1亿马克以下的公司股份资本总数增加33%，而资本4亿马克以上的公司股份资本总数增加了6倍。1980年，15家10亿以上马克资本的特大股份公司占全部股份资本的12%。1969年，300个最大的股份公司掌握500亿以上马克的资本，即全国69744个资本主义企业资本的56.2%以上。^①从60年代下半期起，以大康采恩的联合为形式的资本集中化急剧加强，建立了更强大的垄断集团（超级康采恩），如煤炭工业的“鲁尔煤矿联合公司”，冶金工业的“蒂森—曼奈斯曼联合公司”、电机工业的“西门子—通用电器—电报电话联合公司”。同时还建立了国际垄断联合公司，例如，“赫施钢铁公司”与荷兰的“霍托维恩斯钢铁公司”联合，“矮克发苯胺工业公司”与比利时的“格维特光化学公司”联合。联邦德国的主要金融垄断集团是德国银行集团、德累斯顿银行集团和商业银行集团。金融垄断集团集中掌握了对联邦德国的大部分工业、商业、信贷和其它经济部门的控制。垄断资产阶级占人口0.3%，支配的财产却比余下99.7%的人口的财产总和还要多。近600个集团和个人掌握了1亿马克以上的资本，其中最

^①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200页。

富的甚至有几十亿马克。在联邦德国，百万富翁的人数1953—1970年从1500人增加到2万人。^①金融寡头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核心，1971年计有209人，他们都是亿万富翁或千万富翁，其中50人在国民经济中占据1千个关键职位。^②在80年代，垄断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人数占全部资产阶级的4.5%。他们一方面为了维护整个剥削制度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统治，另一方面以垄断利润的形式获取中小资本家的特殊贡赋。垄断资本使许多中小资产者破产，把越来越多的非垄断的供货企业家变为自己的附庸，迫使他们接受垄断价格。垄断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着全体劳动人民的生存条件。巨大的康采恩在自己的企业直接剥削25%的工人阶级。在工业部门，被垄断资本直接剥削的工人阶级达40%。^③

雇佣100—999个劳动者的资本家可算作中等资产阶级。在工业部门，1980年这种资本家所经营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25.2%；占这种企业就业的工人和职员其总数的43%。这种企业的数量1970—1980年减少到1169个，即减少了9.1%，后来还在减少。中等资产阶级主要是在日用品工业和食品工业以及生活服务行业经营。中等资本家的企业前途依据其部门和生产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整个说来，它们受垄断资本的压迫，多半不适应科技革命提出的要求。70年代下半期，许多中等资本家的企业成了资本集中的牺牲品。仅在1976—1977年，100个特大公司吞并了434个总流通资金达300亿马克的中等企业。^④雇佣10—99个劳动者的资本家算作小资本家。小资本家的主要部分是大农。在工业部门，

①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204页。

② 同上，第205页。

③ 参见舍纳西：《联邦德国》，第253页。

④ 同上，第252页。

小资本家所经营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1970年为84.5%，1980年下降为72.5%。在小资本主义企业，占有生产资料的小资本家靠剥削雇佣工人生存，同时又是劳动过程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此外还依靠其家庭成员和少量骨干职员。这类企业很少能进入大的康采恩系统，但是常常在经济上依赖它们。在70年代，在一系列工业部门，49人以下的企业数量有所增加。这种企业在生产生产资料的各个工业部门增加了4.4%，其中在生产办公室机器和电子计算机的部门增加了61.8%，在生产公路运输工具的部门增加了40%，在电机工业增加了27.3%，在机器制造业增加了19.9%。^①与此同时，在这些部门中有许多中小企业由于无支付能力而被消灭。在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中，小企业数量和比重的增加，首先是因为大康采恩经常把那些费劳动和不可能采用自动化生产的零件转让给小企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小企业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紧密依赖垄断资本。在另一些工业部门，小企业的比重在70年代继续减少，例如，食品工业下降30%，木材加工业下降21.3%，服装业下降17.5%，陶器工业下降17%，玻璃制造业下降9.7%，精密机械、光学仪器，钟表工业下降7.5%。1981年，破产的中小企业数量达11653个。^②这种情况证明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不稳固的。但是企业不自发地导致他们反对垄断资本。中小资本家常常坚持保守的政治观点，对工会持敌视态度。

在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中高级经理和高级政府官员是一个特殊的重要阶层。一方面，高级经理通过获得股票，本身就成为资本所有者，巩固自己在垄断资产阶级中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资本家或大的股票持有者常常成为职业经理。属于中等阶级的经理在1950—1970年增加了30%，达18万人，即占全部实际资本家

^{①②} 参见舍纳西：《联邦德国》，第255、256页。

的1/3。①影响经理人数变化的因素一方面是中等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减少，另一方面是中等规模的公用事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的增长以及康采恩的科研中心网络的扩大。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除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过程直接相关的经理集团外，还有两个社会集团属于资产阶级。一个是企业主组织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在企业主联盟系统中最重要的组织是联邦德国雇主同盟和联邦德国工业同盟。前者主要协调企业主的共同的工资政策，后者是同国家联系的环节。此外，有执行一定局部任务的工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协会。还有1000个以上的地区性和部门性的企业主组织。企业主组织还拥有自己的科研、宣传、新闻机构。1961年，企业主组织的工作人员计有5万多人。②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约占三分之一）直接参与维护和贯彻资本的利益，因此应该看作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特殊集团。属于资产阶级的另一个集团是高级国家职员即政府行政机关的高级官员、高级军官、高级司法人员、国营铁路和邮电等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1950年，他们占国家职员总数的13%，1970年其比重上升为23%。③根据联邦德国的统计资料，1969年共有28万高级国家职员。④

综上所述，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包括实际资本家、高级经理、企业主组织的一部分工作人员、高级国家官员在内，70、80年代大约有100万人左右，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4%。

①②③ 参见舍纳西，《联邦德国》，第257、258、259页。

④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204页。

第四节 当代联邦德国的中间阶层

战后联邦德国的中间阶层由于无产阶级化而减少了，即从1950年的740万人和31.5%（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下降到1980年的594万人和22%。^①然而整个说来，中间阶层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继续保持着重大的意义，中间阶层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和斗争的条件有着许多影响。

农村的中间阶层主要是农民，即小农、中农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联邦德国的农民1971年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7.5%，1980年则为4.2%。他们的人数和比重虽然很小，但仍然是食品和农业原料这些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生产者。小农通常有5—10公顷土地，其资本只允许他在个体劳动的基础上，加上很有限的雇佣劳动进行简单商品生产。中农是有10—30公顷土地的农户。他们有时可以在个体劳动的基础上，利用少量雇佣劳动，进行小规模资本再生产。半无产阶级的农民是有5公顷土地以下的农户，他们往往要在农闲时从事农业以外的工作（主要是在工厂工作），被称作“有份地的工人”，处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地位。在70年代初，农业人口中，小农和中农各占20%，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占50%，农业资本家占10%（其中1%是大农业资本家）。联邦德国的劳动农民受到垄断资本和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垄断资本通过提高农业机器、电力肥料、饲料的价格和不利的贷款条件，通过经常对农产品价格施加压力，通过“垂直一体化”的新的统治方法，来剥削和控制农民。体现垄断资本意志的政府在“改善农业结构”的口号下，实行消灭小农和部分中农的政策，

^① 参见舍纳西：《联邦德国》，第271页。

把“没有生存能力的”农户排挤出农业，把他们的土地转交给“优秀的农户”即大农业资本家。政府在拨款方面歧视小农户，拨款给所谓有发展能力的大农户，而迫使“没有发展能力”的农户放弃农业。在垄断资本和政府的压力下，小农和中农及其家庭人数从1950年的438万人减少到1980年的143万人，即减少近300万人。^① 80年代初，由于受整个国民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相当部分的破产农户及其家庭劳动力被迫留在农村，因为在农业以外难以找到新的工作。农民由于其固有的两重性而难以找到通向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工人阶级的道路。因此，工人阶级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实践中指明工人和农民在利益上的客观一致性，帮助农民摆脱反动的政策和思想的影响，使之成为工人阶级的自觉的同盟者。

城市中间阶层首先包括传统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即雇工10人以下的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食利者等。1950年他们及其家庭辅助人员的人数为200万人，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9%，1970年则为190万人和7%。^② 在70年代，传统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两种趋向。一方面，在垄断势力、科技革命和政府的信贷税收政策的压迫下他们的分化破产的过程加快了。1968—1980年，手工业企业减少了10万个即20%。传统的手工业者如面包师、屠夫、裁缝、木桶匠、细木工的人数减少了。小食品店减少了。另一方面，同时又产生新的手工业企业和小商店。美容、洗涤纺织品、打扫楼房、汽车服务、电视机修理方面的企业、出售电子仪器、家用电器、手工制作工具、旅游商品的商店、饭店和旅馆的数量和比重增长了。1976年，属于中间阶层的手工业企业主

① 参见舍纳西：《联邦德国》，第271页。

②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188页。

占手工业企业主的82%，其就业份额占37%，其流通额占32.6%。据1976年9月的调查材料，手工业生产中17%的就业者是独立劳动者或家庭辅助成员；68%的就业者是工人，其中熟练工人占90%；15%就业者是职员。①在零售商业中也发生了同手工业领域相类似的分化。日周转额在25万马克以下的小零售商业1950—1974年减少了一半，其周转额的比重从62%下降到9.6%。1960年，零售商业中属于中间阶层的独立业主及其家庭辅助人员共有96万人，1970年共有78万人，1977年共有67万人。②零售商的减少是商业垄断资本施加强大压力的结果。生活服务业的小业主有所增加，1950年占就业总数7%，1979年上升为10%，其中开小饭店、小旅馆的有37万人，其它生活服务的小企业主有6万人。③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处境困难。随着原料、能源以及现代技术装备的价格上涨，维持或开办手工业企业和商店所必需的最低数量的资金在增长。为了获得这些资金，小业主不得不冒着很大的风险去申请贷款。那些不剥削他人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终日劳累，但其收入常常不及工人和职员。批发商和垄断商业企业对价格的操纵，房租、供暖和供电费用的增长，使他们深受其害。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他们不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这个事实，使他们同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基本利益有重大的共同之处。但是，他们为了维持其甚至是形式上的独立地位，仍然坚持历史上已经过时的社会理想。独立的城市中间阶层受保守势力的影响很大，常常是保守政党的投票人。在他们的企业中，工会组织程度低于平均水平，通常没有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所谓“参与管理”的法律没有得到贯彻。

属于中间阶层的还有受雇佣的中级职员、中级公务员、他们大都是有大学学历的受雇的知识分子。在联邦德国，这类中间阶

①②③ 舍纳西：《联邦德国》，第273、274页。

层呈增长的趋势，1950年共有114.9万人，1970年增加到235.5万人。1968年，属于中间阶层的有22%的职员，计164.3万人，有32%的官员，计47.8万人。^①从职员的部门分布来说，职员人数和份额在工业和手工业中增加了很多，1950—1965年分别由110万人和31.4%增加到260万人和36.8%；在服务业和国家管理部门（教育、医疗卫生、公用事业、军队、国家机关、广播电视、娱乐业等）增长特别迅速，1950—1965年分别由130万人和25.5%增加到250万人和35.3%；在商业和运输部门人数增加了，但是份额相对下降了，即1950年为120万人和34.2%，1965年为193万人和27.5%。在联邦政府机关服务的中级公务员（不包括军人）1952—1957年增加了2.5倍，1960—1969年增加了33%，即从19.3万增加到28万。在联邦德国的各级行政机关，1969年有80万中级公务员。在最现代化的工业企业中，工程技术专业的职员和行政管理的职员迅速增长，1969年达30万人。^②在目前的条件下，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少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被无产阶级化以外，多数处于中间阶层。1961年，知识分子共有66万，其中受雇知识分子53万，占就业总数2.1%。1980年，知识分子增长到124万，其中受雇知识分子110万，占就业总数4.3%。在70年代，30%的知识分子在私营企业受雇，55%受雇于国营成分，（其中四分之三在教育系统），约15%是自由职业者。^③年青知识分子即大学生在联邦德国社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大学生数量逐年增长，1969年达45万，占同龄青年12%。^④1970—1980年，

①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192页。

②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193页。

③ 参见舍纳西：《联邦德国》，第276页。

④ 参见赫梅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188页。

平均每万人口拥有在校大学生数从83人增加到201人。^① 根据1971年的资料，全国80%的大学生出身于中间阶层，1.5%的大学生出身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随着人数的增多发生了贬值和失业。1973—1980年，失业知识分子从1万人增加到4.2万人，即增加了320%。1980年，知识分子的失业率达5%。^②

在联邦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中，还有其它的中间社会集团，如部分退休人员（原来不属于工人阶级的雇佣劳动者），1968年计94.2万人；小食利者37万人；靠房租、利息生活的人31.8万人。

综上所述，联邦德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经济、社会、政治上是各种各样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在被冲刷，在社会结构中的份额不断减少。与此同时，属于中间阶层的职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数量在迅速增长。因此，中间阶层内部的各种份额的对比在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和职员在这里越来越占主要地位。

① 参见《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458页。

② 参见舍纳西：《联邦德国》第，277页。

第十章 当代日本社会的阶级结构

第一节 当代日本阶级结构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争结束到40年代末，主要是进行非军国主义化、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和农地改革，恢复经济。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摧毁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的军事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美国占领军当局在战后最初年代在日本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从而严重地触动了日本的社会阶级结构。虽然保留了天皇，但其地位大大削弱了。天皇仅仅是国家和人民统一的象征，不再是社会政治体制的堡垒。废除名位和称号意味着终止了作为社会集团的贵族阶层。解散帝国军队、宪兵和秘密警察，实际上就完全消灭了作为特殊等级的军阀。1946—1949年的农地改革从根本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由于农地改革，专门从事农业而不进行任何辅助工作的农户的数量和份额增加了，1946年农户为569.8万，1950年增加到617.6万，其份额1944年为37.3%，1950年增加到50%。^①由于农地改革，有地农民和无地

^① 参见尤·库兹涅佐夫：《现代日本社会阶级结构》，莫斯科1983年版，第27页。本节未注明出处的资料和日文书刊资料均引自该书。

佃农的比例发生急剧变化。1946—1950年，有地农户从186.9万增加到388.2万，其占农户总数的比重由32.8%增加到61.8%，而佃农相应从163.7万减少到31.2万，其比重从28.7%下降到5.1%。^①由于农地改革，小农经济成了农业生产的统治形式。在农地改革的同时，美国占领军当局为了摧垮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采取了解散日本财阀和其它反垄断势力的措施。这些措施大致分为四个方面：（1）解散财阀总公司的核心——“持股公司”；（2）排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3）分散股票所有权；（4）大企业化小。这样，在1946—1950年间，通过上述各种措施，日本的旧财阀被解体了。但是财阀所属企业，除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外，都依然存在，就是被指定化小的企业，虽然实际上分散化小，但也依然继续存在。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大银行的金融实力几乎无损伤地保存下来了。这就导致了日本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垄断企业集团“重组”的可能。

战后日本社会结构变化的第二阶段从5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在这一阶段，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国民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是8.8%，60年代是10.9%，70年代是5.5%，都高于战前的增长速度，也高于战后欧美各工业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日本经济按实际价值计算扩大了10.4倍。每人平均国民总产值从1950年的202美元，增加到了1979年的8600美元，国民总产值在资本主义各国中从第七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②第二阶段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在日本产业结构急剧改组的背景下发生的。战前日本的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和轻纺工业，是为战争和夺取殖民地市场服务的。这在日本战败

① 参见《农林渔业统计》，东京1961年版，第77页。

② 参见《企业管理》编辑部编，《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政策》，企业管理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后完全不适应了。军工生产缩减和殖民地的丧失，尖锐地提出了改组产业结构的问题。日本还面临在极短时间消灭同美国和西欧的科技差距。这种差距在战争年代特别拉大了，因为当时日本的经济处于几乎完全孤立隔绝的状态。1954—1955年，日本的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后，开始迅速建立电子技术、汽车制造、无线电电子工业、石化工业、造船业等新的工业部门。这些部门以最现代化的技术和工艺为基础，因为日本从国外大量购买了专利权和许可证。新工业部门的建立使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农业生产力在增长，但是农产品在总的国内总产品中的比重急剧减少，50年代初为18.6%，80年代初为3.5%，减少了89%。制造业的比重相应从19.8%提高到30.7%。^①制造业内部也发生很大变化。在科技革命条件下，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达到了特别大的规模，成为重工业增长的重要原因。1955年，重工业占制造业总产品价值的44.6%，而轻工业为55.4%，1972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分别为61%和39%，1980年为64.4%和35.6%。^②产业结构的复杂化，生产量的增长，大量新商品的涌现以及新的消费，促进了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在服务业、批发和零售商业、保险业、金融和不动产业务部门，1981年占日本国内总产值的45%。^③在15年的高速度经济增长以后，日本经济结构明显接近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机构。但是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暴露了日本经济结构的弱点。国际石油价格和其它原材料价格的猛涨，明显降低了日本耗费能源和材料多的重化工业部门的竞争能力。环境污染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就迫使日

① 参见《经济要览》，东京1980年版，第2、3页；《日本国势图》，1983年，东京版，第102页。

② 参见《日本国势图》，1976年，第327页；1983年，第219页。

③ 《日本国势图》，1983年，第102页。

本政府在70年代中期对产业结构进行新的改组，其基本方向是保证优先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压缩耗费能源和材料多的生产，改造那些由于受外国竞争而经受严重打击的纺织工业和造船工业。从80年代初起，日本产业结构的改组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出现了由于技术和工艺进步而产生的一系列部门，如微电子技术、集成电路、新型计算测量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电视磁带录象机、生物工程等。

战后日本经济的上述变化并没有改变它的所谓“二重结构”，即除了现代垄断资本的大企业外，还存在大量中小企业和城市小商品生产，它们在就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和出口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99%的日本企业是中小企业，其劳动力占全国企业劳动力的80.5%，其产值在制造业中占51%，在批发商业中占57%，在零售商业中占80%，在建筑业中占50%，在出口产品中占40%。^①中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落后于大企业。1980年30人以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100人以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43.8%。^②垄断资本建立了最现代化的大企业，同时又保留中小企业生产，使之适合自己的利益。大量中小企业实际上通过复杂的承包关系而同垄断资本一体化了。垄断资本广泛利用中小企业，以便重新分配劳动力，组织半成品和某些零件的生产。经济的“二重结构”是劳资矛盾的缓冲器，它减弱工人阶级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压力，保证这个制度在城市中的群众基础。

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5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阶级结构的最重要变化是就业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即雇佣劳动者的激增。1950—1980年，雇佣劳动者由1407.2万人增加到3998.1万人，增加了2.8倍，其在就业人口的比重由

① 参见《日本年鉴》，1972—1982年，莫斯科版，第191页。

② 参见《日本国势图》，1983年，第94页。

39.5%增加到71.8%，增加了1.8倍。^①这一过程的重要界线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当时雇佣劳动者超过就业人口的一半。雇佣劳动者人数的增长在50年代最快，60年代仍较快，70年代速度放慢。雇佣劳动大军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城乡自营业主。1950—1980年，自营业主的人数保持在930万左右，但其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由26.1%降到16.9%。自营业主的家庭辅助成员是雇佣劳动大军的重要后备。1950—1980年，他们的人数和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由1 225.8万和34.3%下降到629万和11.3%。^②上述变化是日本社会阶级结构现代化道路上的重大进步，是同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近的重大步骤。但是，明显的差别仍然保持着。80年代初，日本就业人口中的雇佣劳动者的比重处在意大利的水平，不仅大大低于英国和美国，而且低于联邦德国和法国。至于自营业主的比重，日本低于意大利，略高于法国，高于联邦德国1倍，高于美国 and 英国2倍。日本家庭辅助成员占就业人口的比重比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出许多，如高于意大利1倍，高于联邦德国2.4倍，高于法国2.1倍，高于美国12.5倍。日本经济的变化决定于就业人口部门分布的变化。1950—1980年，就业人口部门分布的变化主要倾向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首先流向第二产业，接着流向第三产业。1950—1980年，第一产业人数和比重由1720万和48.3%减少到606万和10.9%；第二产业人数和比重由781万和21.9%增加到1 862万和33.0%；第三产业人数和比重由1 056万和29.7%增加到3 086万和55.4%。^③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日本暂时还高于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同法国在一个水平，但低于意大利。至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日本把意大利、法国和西德都抛在后面。就业者的职业结构变化同就业的部门结构的变化相一致。50年代初最大的职业集团是农林渔工作者。60

^{①②} 参见《日本100年数字》，东京1982年版，第36、37页。

^③ 参见《日本100年数字》，第34页。

年代中期，这个职业集团被生产工人超过了。生产工人在80年代初仍是人数最多的职业队伍。虽然在70年代中期生产工人的比重开始下降，但其人数仍在继续增长。办公室人员和商业人员迅速增加，其人数在70年代中期超过农林渔工作人员。按增长的规模来说，最多的是行政管理人员，其人数在1950—1980年增长了4.3倍。其次是办公室人员和服务业的工作人员（3.3倍）和专业技术人员（3.2倍）。^①这都说明在科技革命条件下脑力劳动的职业在优先增长。在职业结构方面，日本与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体相接近，所不同的是，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的商业人员，农林渔工作人员的比重大，而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业人员的比重小。上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给自立人口的阶级结构的变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950—1980年，工人阶级的人数和占自立人口的比重由1388万和38.3%增加到3800万和66.6%；资产阶级的人数和占自立人口的比重由68万和1.9%增加到270万和4.7%；中间阶层的人数和占自立人口的比重由2174万和59.8%下降到1634万和28.7%。^②日本自立人口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反映了阶级的不断两极化的过程。

第二节 当代日本的工人阶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80年代，日本工人阶级的人数和占自立人口的比重明显增加，成了日本社会的最大阶级。由于日

① 参见《日本100年数字》，第35页。

② 参见《日本劳动年鉴》，东京1980年版，第51页；赫雷诺夫：《科技革命条件的日本工人阶级》，莫斯科1978年版，第34—35页，1981年4月2日《赤旗报》。

本官方统计中没有工人阶级部门分布的数字，只好利用雇佣劳动者部门分布的数字。既然工人阶级占雇佣劳动者的绝大多数，那么两者的变化趋向基本上是一致的。1955—1980年，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在制造业增加了2倍，在建筑业增加了2.7倍，在运输、市政企业和邮电企业增加了2倍，在商业、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务部门增加了3.1倍，在服务业增加了2.9倍；另一方面在农、林业减少了61%，在渔业减少了28%，在采掘业减少74%。^① 雇佣劳动者的部门分布仍不能提供工人阶级各支队伍人数和比重的准确图画。日本的进步学者提供了关于日本工人阶级部门分布的情况，如下表^②：

工人阶级队伍	绝对数(以千为单位)		所占百分比数	
	1955年	1980年	1955年	1980年
全体工人阶级	17 419	38 009	100	100
职员	4 977	13 275	28.6	34.9
专业技术人员	1 634	4 250	9.4	11.2
办公室人员	3 343	9 025	19.2	23.7
生产工人	8 956	16 267	51.4	42.8
农林渔业工人	798	405	4.6	1.1
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 运输和邮电业工人	8 158	15 862	46.8	41.7
非生产领域工人	2 733	7 056	15.7	18.6
商业工人	1 409	4 597	8.1	12.1
服务业工人	1 324	2 459	7.6	6.5
完全失业者	753	1 411	4.3	3.7

① 《经济要览》，东京，1974，1980年，第252页；
《1980年全国人口普查》，东京，1981年，第22、24页。

② 资料来源：1981年4月2日《赤旗报》。

根据上表中的数字可以看出：（1）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尽管其在工人阶级中的比重减少了，但仍然是工人阶级中人数最多的队伍；（2）包括办公室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工人阶级的职员队伍增长很大，成了仅次于工业工人的第二支大队伍；（3）农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在工人阶级中的比重最少。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致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产生了大量新的大企业。但是，工人阶级的集中程度并没有因此有大的提高。1960—1978年，在500人以上的企业中的工人所占工人总数的比重，由26.2%增加到26.4%，仅增长0.2%；100—499人的企业中的工人的比重，由13.4%增加到15.9%；30—99人的企业中的工人的比重，由16.8%增加到17.6%；在30人以下的企业中的工人的比重，由33.6%下降到40.1%。1978年，日本工人阶级的57.7%的人数在100人以下的企业就业。^①这种企业劳动条件差，工人组织程度低。这个事实强烈影响到日本的工人运动。当然，工人阶级在各部门的集中程度是不同的。在金融、保险、不动产的特大企业中、劳动力集中达58.6%。在运输、邮电部门，49.6%的劳动力集中在1000人以上的企业。在制造业中，31.9%的劳动力集中在1000人以上的企业。在建筑业、商业和服务业又是另一种情景。建筑业的55.7%的雇员、商业的49%的雇员、服务业的47.9%的雇员在30人以下的企业就业。

战后日本工人阶级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熟练水平普遍地明显地提高了。1950年，80.7%的工人受过初等和不完全中等教育，14.3%的工人受过完全中等教育，2.9%的工人受过高等教育。1970年，受过初等和不完全中等教育的工人的比重减少到56.7%，受过完全中等教育的工人比重增加到34.1%，受过高等教育的工

^① 参见《日本劳动年鉴》，1980年，东京版，第75页。

人比重增加到8.9%。受教育水平高和技术熟练水平高的工人集中在特大和大型企业。1974年，受过高等教育的雇佣工作者47.2%在1000人以上的企业就业，36%在100—999人的企业，16.8%在10—99人的企业。^①1960年，500人以上的大企业接受了初中毕业生的23.6%和高中毕业生的22.9%，而在1975年则相应接受了30.2%和47.8%的中学毕业生。另一方面，100人以上的企业，1960年接受了49.8%的初中毕业生和48.1%的高中毕业生，而1975年则相应接受了41.6%和23.3%的中学毕业生。^②1978年，全国的企业平均缺熟练工人6.7%。在500人以上的企业，这个指标为0.5%，100—499人的企业为2.6%，30—99人的企业为6.4%，5—29人的企业为12.3%。^③在各部门中最缺熟练工人的是建筑业，指标达13.9%。缺熟练工人的65%的企业是30人以下的企业。^④

在用现代技术装备的特大企业中，劳动力年轻化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现象，但是在日本特别明显，因为在日本实行“终身雇佣”、按年龄和工龄计算工资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年青工人可以少付给工资。此外，年青工人受的教育水平高，能较快和较好地掌握新技术。因此，资本家乐于雇佣年青工人。在非农业部门，30岁以下的青年工人，从1962年的1180万增加到1968年的1360万，占全体工人的45%。^⑤后来，由于教育培训的期限延长，由于出生率下降的后果和劳动力的普遍老化，青年工人的比重不断减少。1980年，雇佣劳动者1058万人

① 参见《劳动力白皮书》，东京1976年版，第345页。

② 同上，第272页。

③ 参见《日本劳动年鉴》，1980年，东京版，第82页。

④ 参见1976年2月11日《朝日新闻》。

⑤ 参见《日本阶级结构》，东京1976年版，第157页。

的年龄不超过30岁，占雇佣劳动者总数的26.5%。^①随着新技术的采用，对那些年龄较大、资格较老、有丰富实际经验的旧型熟练工人的需求减少了，而对有知识的青年工人的需求在增多。1980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每一个24岁的愿意工作的青年人有1.4个空缺职位，但是55岁的愿意工作的人每6个人只有一个空缺职位。^②

日本工人阶级中妇女人数及其占工人阶级总数的比重，在战后均有较大的增长。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妇女的雇佣劳动得到特别广泛的利用，因为当时劳动力非常缺乏。1953—1973年，女雇员从430万增加到1180万，即增加了2.8倍，其占雇员总数的比重由27.4%增加到34%。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曾导致女雇员减少，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女雇员的人数重新增长，1980年达1350万人，占雇员总数的33.9%。^③女雇员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在60年代初，25岁以下未婚妇女占女雇员半数以上。而在80年代初，这类女雇员只占25%。1969年，35—39岁的妇女只有6%参加工作，而1981年其比重增加到34%。80年代初，40—45岁的妇女38%参加工作，而过去这个年龄层次的人极少参加工作。^④战前雇佣劳动妇女主要在纺织业就业。从50年代起，由于自动化而使生产过程简化，妇女的劳动范围扩大了。70年代中期，30%的女工在制造业（特别是电子工业）工作，23%的女工在服务业和商业工作。雇佣劳动妇女的最大职业集团是办公室职员，她们实际上在一切部门就业，1980年其人数有450万，

① 参见《1980年全国人口普查》，东京1981年版，第22、28、30页。

② 参见1982年12月16日《金融时报》。

③ 《妇女和劳动》，东京1975年版，第42页；《1980年全国人口普查》，第22、23页。

④ 参见1982年12月16日《金融时报》。

占全部女雇员的33.4%。^①雇佣劳动妇女的工资大大低于男工。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相对缺少劳动力，男女工资差别暂时有所减少。1955年，女工平均工资为男工的41%，1975年为51%，1980年为48%。^②

上面考察的是日本工人阶级的横向结构。但是，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在生产和社会结构中并不处在完全同一的地位。工人阶级的上层是那些劳动性质、劳动条件和劳动工资最有利的工人，主要是大企业中部分执行最简单的管理职能的工人，低级职员和低级行政人员，他们大约有300万人。^③这个阶层的工人在阶级斗争中最容易动摇。工人阶级的中层是基本部分，是工人运动的基础。日本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包括四个全国工会中心，首先依靠这个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形成了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和顽强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力量。工人阶级的下层是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工作和就业的不稳定的工人。其人数最多的是小企业的工人。1962—1979年，在非农业的30人以上的企业中雇佣劳动人数，从690万增加到1 330万。^④属于工人阶级下层的还有临时工、短工和所谓“编外工”。临时工和短工是日本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1955年，有100万临时工和130万短工，而1978年相应应有226万和137万，分别占雇佣劳动者总数的5.9%和3.6%。^⑤“编外的”工人是指分包（转包）工人和在家里给雇主做定活的妇女。在化工、金属冶炼等部门，分包工人的比重相当高，他们起

① 参见《1980年全国人口普查》，第101页。

② 参见《远东经济评论》，1982年12月3日，第89页。

③ 参见《日本阶级结构》，第136页。

④ 参见《劳动经济分析》，东京1979年版，第231页。

⑤ 参见《劳动统计要览》，东京1974年版，第38页；《日本统计年鉴》，1979年，第50页。

初主要做辅助性工作，后来也参加生产的基本过程。受雇在家里做定活的妇女，1970年有200万，1980年有170万。^①他们每月平均工作21天，每天工作5.8小时，得到的工资极低。

战后以来，日本工人阶级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结构的重大改组和科技进步，不仅导致工人阶级人数大大增长，而且导致其范围的扩大和结构复杂化。随着日本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必将进一步壮大，它在今后社会生活和国家的命运中起的作用必将继续增长。

第三节 当代日本的资产阶级

在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处在社会金字塔顶部的资产阶级经历了重大变化。首先，它的人数和比重增加了。1950年资产阶级人数和占自立人口的比重分别是68.1万和1.9%，而1960年为118.3万和2.7%，1970年为205.2万和3.8%，1980年为270.1万和4.7%。^②可以看出，战后30年间资产阶级人数和比重分别增加了4倍和2.5倍。其次，人数极少的垄断资产阶级经历了“财阀解散”、“财阀复活”、“新兴的企业集团的组成”等阶段，形成了操纵日本经济命脉的六大垄断财团和独立系垄断企业集团。第三，高级管理人员人数和比重增多，1950年私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有42万，占资产阶级总数1.2%，1980年增长到244万和4.3%。^③他们通过薪金、奖金、优待股票、分红等形

① 参见《日本阶级结构》，第180页。

② 参见《日本劳动年鉴》，1980年，东京版，第51页；赫雷诺夫：《科技革命条件下的日本工人阶级》，莫斯科1978年版，第34页，1981年4月2日《赤旗报》。

③ 同上。

式分享资本家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的剩余价值，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中小资本家的人数增加了。战后日本资产阶级的这些变化，有的反映了一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过程，有的则是战败后日本所处的特殊条件引起统治阶级重新改组的结果。

日本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核心，由资本10亿日元以上的特大公司的领导人组成。1970年日本全国有1 185个这样的特大公司，共有16 500名高级管理人员，相应占全国公司的0.14%和全国高级管理人员的0.87%。1979年，资本1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增加到2 357个，其高级管理人员增加到35 000人。^①在日本经济中占主宰地位的是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的特大企业。1978年，1 851个资本10亿日元以上的特大公司（占全国企业总数的0.13%）占有国内55.2%的职能资本、42.3%的全部资产、33.6%的总销售额、42.6%的利润。^②这些垄断性质的特大公司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其多数加入了垄断组织。垄断财团在现阶段是日本垄断资本家的组织形式。现代日本最强大的六大垄断财团是三菱、三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银行。此外还有强大的独立系垄断企业集团，如松下、丰田、日立、新日铁。三菱、三井和住友三个财团是50年代初在改组战前“财团”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老财团的复活。在这三个财团的银行和公司中仍有“财阀”的高级管理人员，但“财阀”的家族代表已被排除出直接管理。芙蓉、三和、第一劝业银行形成于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后半期，是新兴的垄断财团。六大垄断财团统治着日本的经济。截至1983年3月

① 参见《财界》，1972年第2期，第64页；《日本国势图》，1983年，第349页。

② 参见《政治经济总览》，东京1980年版，第240页；《财界》，1980年5月专辑，第240页。

的统计资料，六大垄断财团“经理会”的成员企业共有160家，占全国私人企业总数不到万分之一，但它们的总资产合计86.4万亿日元，销售额合计444万亿日元，分别占全产业界的15.1%和15.7%，纯利润更高，达16.6%。这160家企业控制着为数众多的子公司和关系公司，其总资产额和营业额的规模，数倍于这些母公司。截至1982年3月，六大垄断财团的企业及其拥有的子公司（持股率超过50%）、关系公司（持股率为10—50%）共有11982家。公司数占全国公司总数的0.7%，而总资产额却占到34%，职能资本额占32.6%，营业额占27.6%。^①由此可见，六大垄断财团在日本经济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可以说没有一个日本的家庭可以不和垄断资本打交道。

由于解散“财阀”、产业合理化、重化学工业化等经济条件的出现，日本垄断资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新特点。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财阀的核心组织是财阀总公司，是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封闭性的家族持股公司；战后日本垄断企业集团的最高组织机构，则是“经理会”。经理会是由同一垄断资本集团的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人组成的。他们定期举行会议，就共同的问题进行协商。经理会是各公司的经理间的横向组织，采取集体领导体制。一般地说，经理会的核心是不固定的。经理会是协商机构而不是命令机构。在参加经理会的垄断企业集团中，各公司的关系不是垂直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横的“矩阵型”的结合关系。经理会既不同于战前的日本财阀总公司，也不同于当代美国垄断财团的统治形式。在美国垄断财团中，没有这类共同的协商机构。截至1983年10月1日，参加垄断企业集团“经理会”的大公司成员，三菱集团的“金曜会”有28家，三井集团的“二木

^① 参见《东洋经济·企业系列总览》，1983年，第30页，1984年，第26、55页。

会”有24家，住友集团的“白水会”有21家，三和集团的“三木会”有42家，芙蓉集团的“芙蓉会”有29家，第一劝业银行集团的“三金会”有45家。^①第二，战前的财阀把同族的“持股公司”作为金字塔的顶点，股票的所有权掌握在这里；而战后由于持股公司被解散，所有权分散了，大部分都掌握在法人企业的手中，并且各企业间的股票是相互持有的。截至1981年3月，六大垄断财团的同系列内持股率的情况是：三井15.8%，三菱23.7%，住友26.9%，芙蓉14.2%，三和13.8%，第一劝业银行11.9%。^②在相互持股中，不仅金融机关持有大企业的股票，而且大企业也持有金融机关的股票。第三，银行资本统治力量加强了。战前银行的任务只是从侧面加强“持股公司”的支配能力，仅起辅助机构的作用。战后，家族财阀总公司的地位实质上由银行资本取代了。每个企业集团的核心都有大都市银行，这些银行不仅占有企业成员公司的大量股票，而且在人事和贷款方面均有很强的影响力。第四，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垄断资本按照生产上的需要，根据资本利润率的要求，进行了重新组合。在现在大企业的集团化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围绕着新技术、新制品、新产品而进行的生产方面的结合。这就是所谓联合企业。独立系垄断企业集团，如新日铁、松下、丰田、东芝、日立、日产等，是按照现代技术装备和企业现代管理的要求组织经济活动，按照生产上、技术上的有机联系组建起来的，发展极为迅速。战后日本垄断资本除了上述特点外，还有以下特点：各企业独立经营的趋势加强了；经营方向上出现了综合化和国际化的趋势。^③

① 参见《东洋经济·企业系列总览》，1984年，第34页。

② 《东洋经济·企业系列总览》，1982年，第23页。

③ 参见孙执中主编：《日本垄断资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73页。

战后日本垄断资本支配政府的方式和渠道与战前相比、与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统治方式。第二次大战后，日本各垄断资本集团共同用金钱支持日本最大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作为他们共同的政治代理人。日本政府并不是由个别的垄断资本集团所左右的，它受日本所有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共同意志所左右，这是日本垄断资本支配政府的特点。这与战前由三井、三菱两大财阀分别支持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与有的财阀老板出任首相、大臣，与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分别隶属于几个财团、各有自己的政策的情况大不相同。日本前首脑池田勇人说：在日本，“政府是船长，财界是罗盘。”^①在垄断资本共同支持保守党执政的条件下，首脑的更迭，不过是调换船长，无论谁当船长，都必须按照整个垄断资本这个指南针所指引的方向行事。日本垄断资本支配政府的主要渠道是经济团体组织。日本垄断资本的最有权威的经济团体是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同友会（经济同友会）、日商（日本商工会议所）。经团联成立于1946年，是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组织，它包罗了日本800多家最大的公司，是日本大公司的联合会，是垄断资本支配政府的总枢纽。参加经团联的部门团体实际上控制相应的经济部门。例如，冶金协会的48个企业提供90.1%的全国黑色金属生产；电力协会联合了全部10个特大供电公司；日本36个石油加工公司中有29个加入石油协会；加入日本汽车工业协会的有13个汽车公司；全国银行协会联合了74个银行集团。^②经团联的首要任务是协调垄断资本的矛盾和利益，就一切经济政策的重大问题制定统一的

① 《经济》，1975年7月号，东京版，第95页；孙执中主编：《日本垄断资本》，第243页。

② 参见《日本统治阶级——财界》，东京1981年版，第126—129页。

纲领并保证其实施。经团联设有37个专门委员会，其中有行政改革委员会、对外政策委员会、经济合作和外国投资问题委员会、国际金融委员会、国防生产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向经团联和政府领导人提供详细的研究报告，从而对日本政府的内外政策施加重大影响。经团联同政府各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团联的领导人直接同政府领导人接触。政府领导人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常常出席经团联的重要会议。经团联是执政党自民党活动经费的长期征集者，该党自1955年以来每年的活动经费约有90%靠各大企业捐款，其中主要是通过经团联征集的。^①

非垄断的大资本家阶层紧密靠近垄断资产阶级。这个阶层包括1—10亿日元资本的公司的所有者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日本，这种规模的公司从1960年的214个，增加到1981年的14 713个，其高级经理人数相应从2.31万人增加到13万人。^②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非垄断的大资本家阶层越来越受金融寡头的控制。1974—1975年经济危机中，垄断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为了保持自己的阵地，不惜牺牲非垄断的大资本家的利益。例如，1975年8月，一家大的纺织公司破产。当这个公司处在破产边缘时，无论日本国家银行还是特大垄断银行和金融公司，都没有给它帮助，理由是这个公司的领导不听金融寡头的劝告。非垄断的大资本家阶层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当权集团，但是它是这个集团的次要的支柱。

在资产阶级内部除了垄断和非垄断的大资产阶级外，还有人数较多的中小资本家，这是与日本经济的“二重结构”相适应的。按照许多日本学者的意见，在日本目前的条件下，中小资本

^① 参见孙执中主编：《日本垄断资本》，第248页。

^② 参见《财界》1972年第2期，第65页；《日本国势图》，1983年，第349页。

家拥有资本的最高限额为1亿日元。换言之，1亿日元以下的公司、企业的占有者和高级管理人员属于中小资本家阶层。中小资本主义企业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业主的界线是：资本约200万日元和雇员4人。在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中等资本家阶层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其活动范围也扩大了。500万至1亿日元的公司数量从1965年的89700个增加到1981年的50.3万个。少于500万日元的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增长速度比较慢，相应从61.38万增加到97.88万。^①70年代初和1975年，资本1亿以下的中小资本主义企业主共有190万人，其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8.7%，其职能资本占全国职能资本的23.6%，其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者的60%。^②中小资本家阶层在社会阶级结构中处于矛盾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雇佣工人的剥削者；另一方面，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压力，不得不把剥削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分给垄断资本阶级。所以，中小资本家既同垄断资本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又同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处于对抗之中。

第四节 当代日本的中层阶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社会的中间阶层不断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分化，其人数和占全国自立人口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1950年，其人数和比重为2174万和59.8%，1960年为2010万和45.7%，1970年为1902.6万和36%，1980年为1634.5万和28.7%。^③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现代日本的中间阶

① 参见《日本国势图》，1983年，第349页。

② 参见《财界》，1972年第2期，第65页；《日本统计年鉴》，1979年，第92页。

③ 参见《日本劳动年鉴》，1980年，第51页；1981年4月2日《赤旗报》。

层可分为农村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新中间阶层三部分。

战后日本农村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变化。1946—1949年的农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使农民的基本群众从佃农转变为自耕农，从而农村小资产阶级获得很大发展，1950年达1 618.9万人（包括家庭辅助成员），其在全国自立人口的比重占44.6%。^①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城市工业部门需要大量劳动力，政府采取刺激农业资本主义和排挤农村劳动力的政策。这些因素使得农村劳动力外流，专业农户有所减少，非专业农户明显增加，因此农村小资产阶级减少了。1960年其人数和比重减少到1 348.6万和30.6%，1970年为957万和18.1%。^②1974—1975年经济危机以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转为适中，农业的就业暂时稳定下来，但是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的阶级分化加强了，1980年，农村小资产阶级人数和比重下降到559.2万和9.8%。^③农地改革后，日本农村的社会变化过程受资本主义关系发展所制约，这方面的情况类似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村所发生过的情形。但是，日本农村中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有如下特点。第一，政府一方面鼓励农业中的大型资本主义经营，另一方面又保护小农和农业小商品生产，从而使得农村小资产阶级保存下来。战后日本历届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建立现代的资本主义大农业企业，力图把农民中的最贫穷部门排挤出农业，以便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要。1962年，允许经营有方的农户可以增加使用土地的数量。1970年，取消了对使用土地租金的数额限制，提供对购买土地的优惠贷款。1980年，修改了土地法，允许用实物作土地租金。政府还采取了优先发展所谓“有生命力的农户”、

①②③ 《日本劳动年鉴》，1980年，第51页；1981年4月2日《赤旗报》。

“核心农户”的方针，即扶植富裕农民。1978年，这种富裕的农户（其农业收入至少等于中等城市家庭的收入）占农户总数9%，使用的耕地占29%，集中的资本占32%，就业人数占32%，提供的农产品占39%。^①日本政府尽力发展农村资本主义，但又担心小农经济的消灭会破坏执政的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因为自民党长期靠这个基础来维持其政治统治。于是，政府被迫采取了某些帮助小农的政策。例如，国家长期以较高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从而保证了粮食生产的赢利。第二，日本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采取了独特的形式。日本官方的出版物指出：“日本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之所以取得，靠大量从农村来的廉价的健壮的劳动力。”^②1950—1982年，农村的劳动力减少了950万或52%，但是住在农村的人口只减少了44%，农户减少33%。^③这就是说，农村劳动力虽然转移到城市就业，但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住在农村，还保持着自己的土地。不是整个家庭离开农村迁到城市，而常常是青年人、男人去城市工作，上年纪的人和妇女留在农村经营土地。日本农民无论如何都要顽强地保持属于自己的那点土地。这首先是因为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土地不仅不受通货膨胀的损害，相反还增值。少量的土地是外出工作的农民生活条件突然恶化时的重要补贴。其次是因为城市住宅极为紧张。因此，保留在农村的带有房子的土地很有必要。第三，战后日本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过程采取了复杂的形式。1950年，日本的典型农户是纯农户即农业专业户。1982年，日本2/3的农户以从事非农业生产为主，以农业生产为辅。近87%的农户不能只靠农业收入生活。这证明农民的

① 参见《农林渔统计手册》，东京1979年版，第127页。

② 《日本农业年鉴》，东京1982年版，第95页。

③ 参见《经济要览》，1980年，第116—117页；《日本国势图》，1981年，第206、209页；1983年，第160、162页。

无产阶级化过程的加深。那些在工业和其它部门从事雇佣劳动但仍保留小块土地的农民实际上不再是农民，而是雇佣工人。在农业以外的辅助性劳动中，雇佣劳动越来越占显著地位。从事辅助性的非农业劳动的农户从1965年的778.2万增加到1975年的867万，其中从事雇佣劳动的，从612.8万增加到731.8万。^①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扩大，从事固定的雇佣劳动，已成为农民家庭辅助劳动的主要形式。因此，雇佣劳动与个体经营相结合成了日本农民无产阶级化过程的一个鲜明特点。在日本农村中保持着足够广大的小业主阶层，其相当部分同时是雇佣劳动者。这使得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断影响无产阶级，在客观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政治影响。

在现代日本的社会结构中，工商业和服务业的自营业主，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战后时期不仅保住了自己的阵地，而且人数和比重都增长了。1950年他们（包括家庭辅助成员）共有489.2万人，占自主人口的13.9%，1960年为618.9万人和14%，1970年为796.6万人和15.1%，1980年为919万人和16.1%。^②城市自营业主按部门分布是（1980年的数字）：商业37.5%，服务业23.8%，制造业19.3%，建筑业14.2%，运输业2.3%，不动产业1.6%，金融、保险0.8%，采掘业0.06%。^③日本战后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绝对和相对的增长绝不意味着阶级的两极分化过程停止了，因为整个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农村小资产阶级）仍在减少。但是，由于日本经济结构的特点（包括“二重结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既有许多小商品生产者破产同时又有新的小业主产生。

① 参见《日本劳动年鉴》，1974年，第171页；1986年，第159页。

② 参见《日本劳动年鉴》，1980年，第51页；1981年4月2日《赤旗报》。

③ 《日本劳动年鉴》，1980年，第51页；1981年4月2日《赤旗报》。

阶级两极分化不等于完全消灭中间阶层，因为他们会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不断重新形成。战后日本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得以生存的重要原因。50、6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保证了就业，使城市小资产阶级不仅能生存下来，而且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工商业中不少自营业主是从大企业退休的年龄达到55岁的工人，他们利用退休金开办了自己的“事业”。还有一些中小企业的工人为了摆脱残酷的剥削而成了自营业主。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城市小资产阶级能够生存下来，是由于本人和家庭成员的紧张劳动和延长工作时间。城市自营业主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大大低于中小企业工人的工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收入水平限制了它对劳动力的雇佣。此外，在日本劳动力老化的情况下，他们能雇佣到的只是那些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找不到工作的中年和上年纪的人。1980年，城市自营业主采用雇佣劳动的占29.4%，其中商业29.5%，服务业39.5%，制造业25.2%。^①城市自营业主的存在在不小的程度上靠家庭辅助成员的劳动。他们的家庭辅助成员1960年有338万，1970年354万，1980年339万。^②近些小商品生产者遭受了很大的困难。从前，许多日用品包括民族服装、靴子、家庭用具等大都是在小手工业作坊制造的。现在，对这类产品的需求明显减少了，同时对耐用消费品（收音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等）和其它能大批量生产的商品的需求急剧增加了。因此，日常消费品生产大都转到大中企业中。根据承包从事装修工作的手工业者的状况在恶化，缺少稳定的定货，完成定货的期限苛刻，用长期票据支付工资，这些都给手工业者增加了困难。在城市小资产阶级集中的流通领

① 参见《1980年全国人口普查》，东京1981年版，第70—78页。

② 《日本劳动统计》，1974年，第67页；《1980年全国人口普查》，第70页。

域，新的大商业企业如大百货商店、超级市场等对小商人的打击很大。

现代日本社会的新中间阶层，即中级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在科技革命、经济增长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因素的作用下迅速发展。日本官方统计没有提供这一阶层人数的资料，据日本一家民间研究机构计算，其人数1950年为36.2万，1965年为42.5万，1970年为84.4万，1975年为115.4万。^①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人数在增长，其社会和经济地位都在下降。1974年对六个特大公司的900名处、科级负责人进行的调查表明，高级管理人员和中级管理人员的差距加大了。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说，他们公司的领导很少关心中级管理人员。约40%的被调查者抱怨在高级管理人员与中级管理人员的接触中缺少“坦率和友好的气氛”。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说，公司领导采取的重要决定并不完全会告诉他。只有10.3%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得到高级管理人员的信任。^②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也触及到中级管理人员。许多公司都降低了中级管理人员的工资。70年代末，中级行政管理人员过剩，产生了“行政人员的后备军”。在中级职员生活条件恶化的情况下，他们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在上面提到的那次调查中，有三分之一的被询问者表示希望成立捍卫其利益的联合会。

① 《日本劳动年鉴》，1980年，第51页。

② 参见1975年3月27日《日本时报》。

第十一章 当代意大利社会的 阶级结构

第一节 当代意大利阶级结构的特点

与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相比，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一些，但仍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大体与上述国家相似，但是它的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比上述国家表现得更加尖锐，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开展得更加活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大利的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趋势所决定的。在70年代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意大利的几个主要政治力量——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天民党——都在极力寻找联合各种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客观基础。这样，社会阶级结构问题就成为争取社会领导权的斗争中的联盟问题。

意大利阶级结构的最重要特点就是中间阶层比重比上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大。1955年意大利的中间阶层占全国自立人口的45.4%，1971年的比重为33.6%。^①这一现象的深刻根源是意大

^① 参见波捷欣主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基辅1978年版，第42页。

利的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其南部地区一直到今天仍比较落后。传统的农村小资产阶级显著减少了，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大增加了。小商人、小业主、个体手工业者人数众多，在中间阶层中占很大比重，是意大利社会的历史传统现象。

战后意大利人口变化的重要特点是经济活动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减少：1951年为41.2%，1961年为38.7%，1971年为34.8%，1980年39.8%。^①50—70年代经济活动人口急剧减少同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关。经济活动人口比重减少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基本原因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积累水平下降导致对工业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意共1972年举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在意大利，三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有机会工作，这可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独一无二的事实。”^②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如：由于社会福利提高，青年受教育和职业训练的时间增加，从而推迟了就业；加快了老年人的退休养老；流入城市的农民家庭的妇女一般不再从事正式工作，被排出经济活动人口范畴。

70年代初，意大利自立人口的社会职业结构大体是^③：

资本家和高级管理人员：20万；

自由职业者：30万；

农民：240万；

手工业者：110万；

商人：170万；

运输业和服务业的小业主：40万；

^① 参见《意大利统计年鉴》，罗马1981年版，第239页。

^②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73年版，第24页。

^③ 参见尼·帕·瓦西里科夫等著：《意大利》，莫斯科1983年版，第211页。

职员：310万（180万是私人企业职员、130万是国营和半国营成分的职员）；

工人：950万（农业工人120万、工业工人430万，建筑工人170万、商业工人70万、运输和服务业工人160万）；

专业人员：80万（军事人员35万、神职人员15万、其它30万）。

战后时期意大利社会结构变化的特点是雇佣劳动者人数迅速增加，其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急剧提高。下表^①反映50—80年代雇佣劳动者（雇佣工人和雇佣职员）和独立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变化的情况：

年代	独立劳动者	雇佣劳动者	雇佣工人	雇佣职员
1951	40.9	59.1	49.6	9.5
1961	31.6	68.4	55.7	12.7
1971	26.3	73.7	53.1	20.6
1980	28.4	71.6	—	—

第二节 当代意大利的工人阶级

随着战后意大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绝对人数和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呈增长的趋势。1951年，意大利工人阶级人数为1 040万，其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为53.4%。1979年，其人数和比重分别为1 420万和66%。^②工人阶级的部门结

① 资料来源：《意大利社会经济》，罗马1978年版，第53页；《意大利统计年鉴》，罗马1981年版，第242页。

② 参见鲍里斯·波诺马廖夫：《马列主义在当代世界》，牛津波洛蒙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特点是工业工人减少和第三产业工人增多。1951—1961年期间，随着战后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工业工人从490万人增加到640万人，净增了150万人。但是在60年代由于建筑业发生停滞，工业工人开始缩减。从1963年到80年代初，工业工人从占就业人口的1/3下降到不足1/4，减少了100万人。在一些传统工业部门，工人的就业率下降了。1980—1983年，工人就业率在大产业加工业（不包括建筑业、能源部门）下降13.5%，在纺织工业下降17.7%，在电机制造业下降16.1%，在运输业下降16.8%，在基础化工业下降20.4%。^①与此同时，在新兴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服装业和知识密集型工业部门，工人的就业率增长迅速。意大利工业工人和某些传统工业部门工人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危机使国家和私人资本对基础工业的投资减少，在生产中采用了新工艺、新设备，从而节省了劳动力。

工人阶级的集中程度在50—60年代达到最高，70年代以后就下降了。80年代初，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分散在中小企业。例如，在100—500人的中等企业中的工人占工业工人总数的21%，在10—50人的小企业中的工人占工业工人总数的23%。在占整个工业的80%的劳动力的制造业，15%的工人在小企业，34%的工人在中等企业，51%工人在大企业。^②工人集中程度降低与70年代中期开始的生产非集中化过程加速有关。生产非集中化遍及几乎整个经济部门。大企业把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有时把最后的装配工序转交给中小企业。生产非集中化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如分支机构网点，租赁、承包、转包、合同等。这些形式大都利用了意大利传统的人数众多的小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生产非集中化

^① 参见意共《再生》周刊，1984年6月2日。

^② 尼·帕·瓦西里科夫等著：《意大利》，莫斯科，1983年，第213页。

给工人阶级带来不良后果。首先，对工人的剥削加重了。出现了大量未经登记注册的和不受国家监督的“地下”小企业，这就促进了各种形式的“黑工作”（临时就业、家庭劳动、儿童劳动等），从而使企业主能够任意确定工资、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而不扣留社会基金、不付所得税。其次，生产非集中化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在大量的小企业中就业的工人，往往是失业的昔日农民。他们渴望得到工作，同意雇主提出的苛刻条件，不参加工会，也不同雇主进行斗争。这就客观上同那些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有组织有觉悟的工人相对立。因此，生产非集中化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不利的。

工人阶级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其技术结构发生变化。1961年，28%的工人是文盲，63.9%的工人上过小学五年级，只有7.8%的工人上过初中。1981年工人中的文盲下降到7.8%，小学毕业的工人占52.3%，初中毕业的工人占35%，高中毕业的工人占4.7%，大学毕业的工人占0.2%。^①工人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使得其技术结构发生了下述变化：第一，高级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比重普遍地显著地增长；第二，中级熟练工人的比重减少（某些部门除外）；第三，非熟练工人、辅助工的比重急剧减少。在某些部门，如在电子工业部门，几乎没有非熟练工人；在石油加工部门，多数是熟练工人。这都是由生产过程的性质决定的。在自动化程度高的企业，占多数的是熟练工人；在流水生产线的企业，占多数的是半熟练工人。

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年龄和性别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整个说来，工业工人的年龄“老化”了。他们的平均年龄从34.9岁增长到36.4岁，其中男工37.4岁，女工31.8岁。具体说来，14—25岁的工人，1967年占的比重为25.8%，而1981年则下降至18.47%；

① 参见意共《再生》周刊，1984年6月2日。

25—49岁的工人，1967年占的比重为57.6%，而1981年则增至66%。^①由此可见，进入工业工人队伍的青年人越来越少。从1961年到1987年，女工的绝对数和比重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她们在传统工业部门（纺织业、食品业等）就业的人数减少了，在其它部门就业的人数增加了。女工呈年轻化的趋向。1971年，30岁以下的女工占女工总数的50%，1981年则达70%。^②这表明妇女就业因受经济危机干扰更加不稳定。目前，女工的技术熟练程度与男工仍相差很大。在制造业，熟练男工占40.6%，熟练女工占18.2%，半熟练男工和女工相应为37.5%和41.9%，非熟练男工和女工相应为20.7%和39.9%。在妇女比较集中的服装业、纺织业、皮革业、人造纤维业，75%的女工是非熟练女工。^③

第三节 当代意大利的资产阶级

意大利资产阶级在战后以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数量在50—70年代有较多增加。1950年，资产阶级人数约有22.7万人，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1.2%，1970年则有35.1万人，比重为1.9%。70年代以后，其人数不断减少，80年代初为20万人。^④资产阶级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化：大的私营公司主要是家族私营公司、大土地所有者即传统的资本家衰减，而与现代国营的经济活动扩大有关的资产阶级的比重在增长。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参见瓦西里科夫等著：《意大利》，第214页。

② 参见意共《再生》周刊，1984年6月2日。

③ 参见瓦西里科夫等著：《意大利》，第214页。

④ 参见波捷欣主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第41页；瓦西里科夫等著：《意大利》，第217页。

和国家对私人经济干预的增强，传统的家族企业出现了危机。传统私营资本家和新兴的国营资本家开始联合生长。当然，私营企业活动并没有衰落。近些年，中小私营资本家显著增长，其活动范围不仅包括生产行业，而且包括第三产业。

国家资产阶级即国营企业的高级经理人员和国家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在迅速加强自己的阵地，这与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干预的加强密切相关。“新资产阶级”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之中明显分化出高级国家官僚（国家机器的传统部分）和“新行政官员”。这种“新行政官员”是由国家的非集中化产生的，首先是由地方自治扩大而产生的。国营企业的经理和国家银行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生产和积累过程中金融的中介作用加强了。在意大利南部、大土地所有者的活动范围缩小了，大中型资本主义农场增多，形成了对意大利来说比较新的农业资本家，他们同土地所有制没有传统的联系。在统治阶级中他们的地位和作用还不够明显，但是已经影响到保守的天民党的力量配置。他们在政治上采取右翼立场，具有鲜明的社团主义特征。这一点在围绕土地法案的斗争中得到了证明。

资产阶级结构的变化不仅严重影响到其内部力量对比，而且严重影响到资产阶级的整个政策。例如，大的私营资本家的削弱使得一些企业家组织企图制定“集团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所以，考虑这些变化对于工人运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第四节 当代意大利的中间阶层

战后意大利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农村小资产阶级减少。1951年，农业自立人口有826万，占全国自立人口的42.2%。1981

年，其人口和比重分别下降到223万和11.2%。^①农村小资产阶级发生了分化。许多拥有土地的农民及其子女流入城市，转化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少数拥有土地的农民及其子女上升成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一部分拥有土地的农民及其子女遭到破产，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继续留在农村的个体小农户通常不再是“全农户”，而是“半农户”。他们有了农业机械，因而可以腾出许多时间让其家庭成员到外面找工作，以补充自己的收入。根据1971年登记的材料，有32.6%的农户（共117.7万）同时在外边找工作做，其中83万户在非农业部门，34.7万户在农业部门当雇佣劳动者。^②

在农村小资产阶级减少的同时，城市小资产阶级则在增加。促成这一过程的因素之一是生产非集中化的加快。另一个因素是，由于高度的机动性和有回旋余地，城市小资产阶级能够对市场需求和经济行情作出灵活迅速的反应。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商业、服务业增长较快。在意大利，自营小零售商大都以家庭劳动为主，一般由妇女经营，其年龄偏老。手工业则建立在个体劳动基础上。在1981年，60.8%的手工业者活动在制造业、15.8%在服务业、9%在运输和公用事业、14.4%在其它部门。在手工业企业中就业的48.5%是业主、8.5%是业主的家庭成员和辅助人员、42.9%是雇员、0.1%是职员和管理者。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占手工业企业总数的10%。^③在70年代到80年代，建筑业、皮毛制作、家俱生产行业的手工业者、照相馆开业者、乐器生产者增加了。手工业者人数增长主要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传统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在南部地区，手工业生产显著衰落了。手工业者中

① 参见意共《再生》周刊，1984年6月2日材料。

② 参见瓦西里科夫等著：《意大利》，第222页。

③ 同上，第219页。

青年和中年占较大比重。70年代，一半多手工业者在40岁以下。29岁以下的青年手工业者从1971年的17.7%，增加到1976年的19.1%。中年手工业者相应从33%增加到38%。55岁以上的老年手工业者从18.8%减少到11.3%。^①在塑料生产、皮革加工、建筑、照相业、印刷业，青年手工业者增长更快。青年手工业者增多的原因之一，是青年人力图进行独立劳动，独立于父母，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生活计划。

自由职业者属于传统的中间阶层。意大利的自由职业者的数量暂时还在增长，但是他们的劳动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要服从于大资本和国家机器的利益，独立性越来越减少，这就使他们在客观地位上接近于中下级职员。医生、律师、记者、建筑师越来越与各种经济组织、私人团体、社会机构、国家机关和半国家机关结成整体。对大多数自由职业者来说，占首位的是保证工作位置和收入的“职员职业”，“自由职业”似乎成了兼职的“第二职业”。独立的地位只是在外表上保持着。

在意大利，那些在生产、行政、服务领域从事管理活动的职员集团迅速增长，他们的较大部分属于新中间阶层。职员集团处于分化过程中，其中客观地位低的一部分属于或接近于工人阶级。在工业、服务业，随着劳动内容的改变，职员劳动广泛扩展。职员劳动的机械化（特别是在管理部门）导致他们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和劳动内容上接近于工人，从而改变了职员的地位。在生产领域，技术职员（至少是其大部分）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与工人的一致性。在非生产的管理领域，一部分职员否认“职业的非阶级性”，在行动中表现出小团体主义的倾向。这种情况在国家行政机构和半国家组织网络的职员队伍中越来越明显。他们在

^① 参见瓦西里科夫等著：《意大利》，第220页。

很大程度上体验到自己失去“职业、地位和收入”，尖锐地感到自己的从属地位。但是这常常只是引起他们的小团体主义和保守情绪。他们往往对改造行政机构持反对态度，因为改造行政机构必然导致职员工作岗位减少，使他们失去行政管理的工作。一部分行政管理职员在执政党的政权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加上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的干预不断加强，这就产生了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这方面活动有关的社会集团。他们构成当权者的权力支柱，执行扼制社会冲突的重要职能，靠国家“养活”。他们是新中间阶层中的保守力量。

在意大利，存在稳定地处于过渡状态的社会集团。属于这一集团的主要是那些因各种原因（年龄、身体状况、文化落后等）经常失业和没有任何就业前途、靠偶尔的工作临时挣得的工资或补助金过活的人。属于过渡集团的还有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小业主。他们处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围，他们的劳动往往不能保证过最低水平的生活。属于过渡状态的人还有部分退休人员、部分农民、部分手工业者、部分小商、部分青年和妇女。在过渡状态的人中广泛流行“兼职工作”。产生这种兼职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弥补收入的不足。另一个原因是，有部分人寻找第二职业是为了消除第一职业的单调无聊，实现自己的创造潜力。过渡集团主要集中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南部地区。他们的存在是“地下”企业和“黑劳动”流行的基础。他们往往由生活所迫，同意做任何工作，这客观上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对立。

结 束 语

本书对阶级结构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了探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和阶层作了分析，对战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作了考察，对反映阶级结构新变化的各种学说作了评论。从这些论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初浅的看法：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野依然存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没有改变，中间阶层依然处在分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依然有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是不可否认的普遍事实。美国国会联合委员会1986年7月的研究报告《美国财富的集中情况》承认，1963至1983年，美国0.5%的家庭平均拥有的财富从360万元上升到890万元（按1983年的美元价值计算），而90%的家庭平均拥有财富只从2.74万美元增加到3.96万美元。这样，0.5%的家庭的平均财富增长额（530万美元）相当于90%的家庭的平均财富增长额（1.22万美元）的400倍。^①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近几十年提出的各种否

^① 参见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87年9月号。

认阶级存在，混淆阶级阵线和抹煞阶级矛盾的论点，如阶层论、社会流动论、非无产阶级化论、中产阶级化论、资本家阶级消失论、经理阶级论、知识阶级论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结构变化的情况，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和有害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大大优于它的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自建立之日起就孕育着导致其灭亡的矛盾即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上升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发现并深刻揭示资本主义自身的这个基本矛盾，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正当资本主义的晨钟回荡在欧美的時候，共产主义的“幽灵”同时在那里徘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趋势的科学研究则预先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厄运的预见在当时很少得到人们相信，但是后来被世界发展的历史所证实。70年前资本主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纪元。从此以后，资本主义不再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一系列固有弊病仍然存在。以经济危机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过五次周期性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因而必然会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在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内部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复杂化，出现了新的特点。今后几十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的变化仍然会保持战

后以来所显示的趋势，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大体也要经历类似的变化。首先，工人阶级的数量将继续增长，这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工人阶级中，体力劳动的工人将进一步减少，脑力劳动和半脑力半体力劳动的工人将继续增多。有人预计，英国到本世纪末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的比重，将从目前的30%多减少到只占10%左右。工人阶级的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水平进一步普遍得到提高，非熟练工人将减少，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将增多。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仍会有所提高，但受的剥削进一步加重，贫富悬殊进一步加深。其次，资产阶级中金融寡头仍将是这个阶级的核心。中等资本家将仍是资产阶级中人数最多的部分。脱离经营管理而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资本家增多。私营和国营的大公司大企业的职业高级经理、高级国家行政官员将在资产阶级中占更加重要的地位。最后，中间阶层将继续分化和重新组合。一方面，中间阶层中有人不断地分化补充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去，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进入中间阶层。中间阶层中受雇的中级职员和中级行政管理人员的人数和比重仍将有所增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提出的理论如新小资产阶级论、新工人阶级论虽然偏颇，但包含不少合理因素，提出了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需要加以丰富和发展。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给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不少共产党没有及时根据这种阶级结构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因而没有把工人阶级很好地统一和组织起来，也没有争取到中间阶层的支持，因此这些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性运动，没有构成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严重威胁。

它们坚持一种过于狭隘的工人阶级概念，不把受雇佣的相当一部分已经无产阶级化的脑力劳动者认作工人阶级，从而使工人阶级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和技术力量。它们也缺乏联合中间阶层的深刻观念。与它们相反，这些国家的社会党在阶级联盟这方面开的门过于大，致使有的社会党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性质，成为各种阶级和阶层混合的群众组织，或者成为代表中间阶层利益的党。在确定依靠力量和联盟力量的问题上存在的“左”的和右的倾向都脱离了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实际，阻碍了社会主义运动正常的健康的发展。

四、近些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张“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些共产党在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过程中，适应战后阶级结构的变化，逐步调整了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欧共各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的基本观点，认为在西欧这样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工人和资本家才构成阶级”，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对抗阶级之间存在着“一些处于运动中”的中间阶层。整个社会除阶级和阶层之外，还有“因在社会组织中具有其特定作用而有别于阶级和阶层的各种社会类别”，所有的社会阶级、阶层和类别，组成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①对于受雇佣的脑力劳动者，欧共党倾向于把他们的大多数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者看作是工人阶级联盟的对象。欧共各党不仅对雇佣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属性和重要作用有新的认识，把他们当作依靠或联合的对象，而且对当代资产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化看得比较准确，确定了工人阶级所要打击的重点对象。欧共各党强调包括中小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构的对立，争取中小资本家同劳动人民一道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对于中间阶层的变化，欧共各党也很注意。它

^① 克洛德·坎：《阶级结构与法兰西人民联盟》。

们指出，传统的中间阶层受到大资本的排挤和资产阶级国家所执行的不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的打击，经济和社会地位日益不稳，因而要求社会变革，也举行罢工、罢市。新的中间阶层尽管技术熟练程度和工资比工人高一些，但他们同资本家的关系同样是一种隶属关系，同样出卖劳动力，同样常常面临解雇和失业的威胁。因此，工人阶级对中间阶层应该采取联盟的政策。

五、资本主义的消亡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每个长着眼睛来看事物，并且用它来看过事物的人，都应该清楚地知道：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仍在蓬勃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当代资本主义能够通过调整 and 改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财政政策以及一定程度和范围的资本社会化、国际化来缓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使生产力在受到各种因素阻碍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发展，这说明它是有着较强的生命力的。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使现代资产阶级不仅比历史上奴隶主、封建者更为高明和强大，而且比马克思研究的老的、“古典的”资本主义阶段和列宁研究的20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更为高明和强大，它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丰富的统治经验，掌握着现代化社会化的大生产，具有高度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大量的教育因素，善于高效率地管理经济和社会，能够适应形势的需要来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政策，控制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立了形式上比较完备的各种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制度。因此，当代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来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从而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从国际资本主义的因素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看，资产阶级形成世界性的统一阶级，它能够用经济和政治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力图避免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从而避免战争必然造成的革命危机。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因素来看，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仍然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难以相信社会主义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因而安于资本主义的现状，不愿意冒险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要上述的因素继续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就不会根本改变。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能在某一时刻和某一局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尖锐性，但总的说来将出现长期的历史性缓和。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致力于国内的改革和建设，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发挥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则宜采取改良的斗争手段，扩大对中间阶层的影响，争取对社会的领导权，为过渡到未来高级的社会形态而作长期的准备和探索。

ON THE CLASS STRUCTURE IN PRESENT CAPITALIST SOCIETY

Contents

Preface (1)

Part I The basic theories of class structure

- Chapter 1 The theory of class and stratum (13)
- A. The theory of class before Karl Marx (13)
 - B. The Marxist theory of class (18)
 - C. The "theory of stratum" of modern bourgeois sociologists (23)
 - D. The "theory of social mobility" of modern bourgeois sociologists (29)
- Chapter 2 The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the class status (38)
- A. The Marxist definition of class (38)
 - B.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45)
 - C. The power, knowledge and class (53)
 - D. The productive labour and class (60)

Part II The analyses of class in the present capitalist society

- Chapter 3 The working class in present capitalist society (71)
- A. The new change of the working clas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71)
 - B. The concept of present working class (80)
 - C. The "deproletarianization" of working class and the "new working class" (88)
 - 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resent working class (101)
 - 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present working class (112)
- Chapter 4 The bourgeoisie in the present capitalist society (131)
- A. Some structural change of bourgeoisie (131)
 - B. Are the capitalist class disappearing? (137)
 - C. Comments on the "theory of manager class" (147)
- Chapter 5 The middle stratum in the present capitalist society (156)
- A. The composition and change of the middle stratum (156)
 - B. Marxism and the problem of the middle stratum (168)
 - C. Comments on the "theory of middle bourgeoisification" (179)

Part III The class structure of present developed

capitalist states

- Chapter 6 The class structure of present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3)**
- 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 structure in U.S.A. (193)
 - B. The working class (195)
 - C. The bourgeoisie (200)
 - D. The middle stratum (205)
- Chapter 7 The class structure of present society in the England (211)**
- 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 structure in the England (211)
 - B. The working class (212)
 - C. The bourgeoisie (219)
 - D. The middle stratum (224)
- Chapter 8 The class structure of present society in the France (230)**
- 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 structure in France (230)
 - B. The working class (233)
 - C. The bourgeoisie (238)
 - D. The middle stratum (242)
- Chapter 9 The class structure of present society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248)**
- 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 structure in F. R. G. (248)
 - B. The working class (250)
 - C. The bourgeoisie (256)

- D. The middle stratum (261)
- Chapter 10 The class structure of present society in the Japan (266)
- 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 structure in the Japan (266)
- B. The working class (271)
- C. The bourgeoisie (277)
- D. The middle stratum (283)
- Chapter 11 The class structure of present society in the Italy (289)
- 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 structure in the Italy (289)
- B. The working class (291)
- C. The bourgeoisie (294)
- D. The middle class (295)
- Concluding remarks (299)